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五卷

1954.2—1955.7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五卷

1954.2—1955.7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13405，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记录：通报高岗—饶漱石事件
1954 年 2 月 2 日 …… 13
№13406，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情况
1954 年 2 月 13 日 …… 17
№25967，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英美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1954 年 2 月 21 日 …… 19
№10128，尤金与黄文欢谈话纪要：越南抗法斗争局势
1954 年 3 月 5 日 …… 22
№21370，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致英共的电报
1954 年 3 月 5 日 …… 23
№20746，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3 月 6 日 …… 24
№14580，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朝鲜问题的指令草案
1954 年 3 月 17 日 …… 27
№21405，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草案
1954 年 3 月 19 日 …… 29
№21407，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1954 年 3 月 20 日 …… 31
№21408，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
1954 年 3 月 20 日 …… 34
№13015，尤金与毛泽东谈话记录：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
1954 年 3 月 26 日 …… 39
№14582，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朝鲜的国家统一和全民选举问题
1954 年 4 月 …… 41
№21409，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 年 4 月 7 日 …… 42
№21411，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 年 4 月 7 日 …… 46
№21406，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
1954 年 4 月 13 日 …… 50

№21410，鲁坚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年4月14日 …… 55
№21412，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关于中国宪法草案的结论
1954年4月14日 …… 57
№14581，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
1954年4月15日 …… 62
№09863，尤金致库兹涅佐夫报告：中国请求在反宣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4年4月15日 …… 67
№08809，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派人到苏联考察边防工作
1954年5月11日 …… 69
№25152，戈杜诺夫与姚仲明会谈纪要：缅甸政治运动状况
1954年6月15日 …… 70
№09931，佐林致谢罗夫函：苏联是否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活动
1954年6月17日 …… 75
№09929，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
1954年6月28日 …… 76
№09930，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
1954年7月5日 …… 78
№21415，阿尔希波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关于中国的农业状况
1954年6月30日 …… 79
№13016，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1954年7月5日 …… 81
№24880，贝内迪克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请求购买东北大麻种子
1954年7月7日 …… 82
№09973，国家安全委员会致佐林函：阿勒泰市通讯事宜
1954年7月8日 …… 83
№20750，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
1954年7月16日 …… 84
№20750-1，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记录：印度支那问题
1954年7月17日 …… 87
№25144，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老挝停止军事行动
1954年7月18日 …… 90
№25145，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
1954年7月18日 …… 91
№25146，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

1954 年 7 月 18 日 …… 93

№20751,莫洛托夫与艾登会谈记录:交换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意见
1954 年 7 月 19 日 …… 94

№10189,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向越南提供帮助的问题
1954 年 7 月 29 日 …… 99

№20752,马林科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重新将解放台湾提上日程
1954 年 7 月 29 日 …… 101

№10151,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
1954 年 8 月 …… 103

№08096,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庆祝中国国庆所采取的措施
1954 年 8 月 …… 108

№08097,库尔久科夫呈维辛斯基请示:苏联代表团访华有关事宜
1954 年 8 月 5 日 …… 109

№21381,斯捷潘诺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胡乔木要求了解和考察的问题
1954 年 8 月 11 日 …… 111

№21418,外贸部关于在华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计划
1954 年 9 月 …… 113

№21418-1,1950—1954 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1954 年 9 月 7 日 …… 132

№21418-2,1950—1954 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
1954 年 9 月 7 日 …… 133

№21418-3,1950—1954 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统计
1954 年 9 月 7 日 …… 135

№21418-4,统计资料:苏联出口商品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对比
1954 年 9 月 7 日 …… 150

№08101,费德林致葛罗米柯报告: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
1954 年 9 月 9 日 …… 153

№08098,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
1954 年 9 月 15 日 …… 154

№25149,卡巴诺夫致赫鲁晓夫函:苏联与中国、印度、越南贸易的材料
1954 年 9 月 24 日 …… 155

№24884,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华经济援助
1954 年 9 月 25 日 …… 157

№08100,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
1954 年 10 月 12 日以前 …… 162

№10219,多勃雷宁与哈什谈话纪要：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
1954年10月21日 …… 163
№10207,扎鲁宾与杜勒斯谈话纪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1954年11月3日 …… 165
№10208,多勃雷宁与比利谈话纪要：远东局势与美国的政策
1954年11月5日 …… 167
№21392,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954年11月18日 …… 169
№21393,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接待张闻天的问题
1954年12月3日 …… 170
№09932,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
1954年12月11日以前 …… 171
№09864,苏联外交部致尤金函：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事宜
1954年12月27日 …… 182
№24888,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1954年12月28日 …… 191

1955年

№21421,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
1955年1月6日 …… 195
№09844,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
1955年1月8日 …… 199
№23889,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
1955年1月13日 …… 202
№23892,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1955年1月28日 …… 213
№10249,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
1955年1月28日 …… 214
№13411,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
1955年1月29日 …… 222
№09933,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
1955年1月29日 …… 223
№09934,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
1955年1月30日 …… 225
№24891,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

1955年1月31日 ······ 226
№24892,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
1955年1月31日 ······ 227
№08839,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
1955年2月 ······ 229
№23891,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
1955年2月1日 ······ 230
№09935,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
1955年2月2日 ······ 231
№09936,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6日 ······ 233
№09937,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
1955年2月8日 ······ 236
№09940,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
1955年2月8日 ······ 237
№09938,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8日 ······ 238
№09939,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8日 ······ 240
№23893,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
1955年2月11日 ······ 242
№24895,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
1955年2月12日 ······ 245
№21404,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
1955年2月18日 ······ 247
№23894,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
1955年2月22日 ······ 256
№25968,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
1955年2月22日 ······ 257
№09941,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
1955年2月23日 ······ 272
№23907,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
1955年2月28日 ······ 274
№11803,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
1955年3月1日 ······ 278

№13017,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
1955 年 3 月 8 日 …… 281
№13413,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1955 年 3 月 9 日 …… 283
№21424,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
1955 年 3 月 12 日 …… 286
№13414,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
1955 年 3 月 14 日 …… 301
№21425,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
1955 年 3 月 19 日 …… 303
№16665,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
1955 年 3 月 19 日 …… 304
№10191,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
1955 年 3 月 19 日 …… 306
№13018,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
1955 年 3 月 30 日 …… 307
№25583,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5 年 3 月 30 日 …… 310
№13417,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 年 3 月 31 日 …… 310
№13418,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 年 4 月 6 日 …… 311
№20515,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
1955 年 4 月 7 日以前 …… 313
№13419,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
1955 年 4 月 9 日 …… 321
№13312,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
1955 年 4 月 11 日 …… 323
№13420,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 年 4 月 12 日 …… 324
№13313,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
1955 年 4 月 18 日 …… 325
№13421,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
1955 年 4 月 20 日 …… 326
№13422,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

1955 年 4 月 22 日 …………………………………………………… 327
№13423,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
1955 年 4 月 24 日 …………………………………………………… 329
№13424,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
1955 年 4 月 26 日 …………………………………………………… 330
№13426,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
1955 年 4 月 27 日 …………………………………………………… 333
№13427,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
1955 年 4 月 28 日 …………………………………………………… 333
№13428,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
1955 年 5 月 3 日 …………………………………………………… 334
№23056,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
1955 年 5 月 6 日 …………………………………………………… 336
№10192,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
1955 年 5 月 18 日 …………………………………………………… 338
№10193,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
1955 年 5 月 19 日 …………………………………………………… 339
№1381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5 年 5 月 19 日 …………………………………………………… 340
№2075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5 年 5 月 19 日 …………………………………………………… 341
№09943,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1955 年 5 月 21 日 …………………………………………………… 345
№13429,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
1955 年 5 月 23 日 …………………………………………………… 350
№13019,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
1955 年 5 月 25 日 …………………………………………………… 353
№10148,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
1955 年 5 月 27 日 …………………………………………………… 356
№10196,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
1955 年 5 月 28 日 …………………………………………………… 356
№10147,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
1955 年 5 月 28 日 …………………………………………………… 357
№11440,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
1955 年 6 月 …………………………………………………… 358

№23054,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
1955年6月1日 …… 362
№10197,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
1955年6月7日 …… 364
№13433,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
1955年6月12日 …… 364
№08862,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
1955年6月15日 …… 366
№08861,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
1955年6月15日 …… 367
№21429,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
1955年6月17日 …… 369
№13434,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
1955年6月22日 …… 370
№24899,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
1955年6月23日 …… 372
№23913,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
1955年6月23日 …… 373
№11547,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
1955年7月4日 …… 374
№08864,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
1955年7月6日 …… 376
№21431,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
1955年7月9日 …… 377
№21439,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
1955年7月9日 …… 419
№23057,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
1955年7月9日 …… 420
№24900,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
1955年7月9日 …… 425
№11548,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
1955年7月14日 …… 426
№09897,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
1955年7月15日 …… 430
№09892,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

1955年7月18日 …… 431
№13468,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
1955年7月18日 …… 432
№24901,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
1955年7月23日 …… 435
№09945,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
1955年7月25日 …… 445
№21437,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年7月29日 …… 446
№09829,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31日 …… 447

第五卷(1954. 2—1955. 7)

目　　录

№13405，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记录：通报高岗—饶漱石事件
1954 年 2 月 2 日 …… 13
№13406，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情况
1954 年 2 月 13 日 …… 17
№25967，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英美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1954 年 2 月 21 日 …… 19
№10128，尤金与黄文欢谈话纪要：越南抗法斗争局势
1954 年 3 月 5 日 …… 22
№21370，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致英共的电报
1954 年 3 月 5 日 …… 23
№20746，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3 月 6 日 …… 24
№14580，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朝鲜问题的指令草案
1954 年 3 月 17 日 …… 27
№21405，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草案
1954 年 3 月 19 日 …… 29
№21407，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1954 年 3 月 20 日 …… 31
№21408，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
1954 年 3 月 20 日 …… 34
№13015，尤金与毛泽东谈话记录：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
1954 年 3 月 26 日 …… 39
№14582，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朝鲜的国家统一和全民选举问题
1954 年 4 月 …… 41
№21409，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 年 4 月 7 日 …… 42
№21411，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 年 4 月 7 日 …… 46
№21406，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
1954 年 4 月 13 日 …… 50

№21410,鲁坚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 年 4 月 14 日 …… 55
№21412,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关于中国宪法草案的结论
1954 年 4 月 14 日 …… 57
№14581,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
1954 年 4 月 15 日 …… 62
№09863,尤金致库兹涅佐夫报告：中国请求在反宣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4 年 4 月 15 日 …… 67
№08809,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派人到苏联考察边防工作
1954 年 5 月 11 日 …… 69
№25152,戈杜诺夫与姚仲明会谈纪要：缅甸政治运动状况
1954 年 6 月 15 日 …… 70
№09931,佐林致谢罗夫函：苏联是否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活动
1954 年 6 月 17 日 …… 75
№09929,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
1954 年 6 月 28 日 …… 76
№09930,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
1954 年 7 月 5 日 …… 78
№21415,阿尔希波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关于中国的农业状况
1954 年 6 月 30 日 …… 79
№13016,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1954 年 7 月 5 日 …… 81
№24880,贝内迪克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请求购买东北大麻种子
1954 年 7 月 7 日 …… 82
№09973,国家安全委员会致佐林函：阿勒泰市通讯事宜
1954 年 7 月 8 日 …… 83
№20750,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
1954 年 7 月 16 日 …… 84
№20750－1,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记录：印度支那问题
1954 年 7 月 17 日 …… 87
№25144,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老挝停止军事行动
1954 年 7 月 18 日 …… 90
№25145,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
1954 年 7 月 18 日 …… 91
№25146,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

1954 年 7 月 18 日 …… 93
№20751,莫洛托夫与艾登会谈记录：交换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意见
1954 年 7 月 19 日 …… 94
№10189,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向越南提供帮助的问题
1954 年 7 月 29 日 …… 99
№20752,马林科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重新将解放台湾提上日程
1954 年 7 月 29 日 …… 101
№10151,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
1954 年 8 月 …… 103
№08096,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庆祝中国国庆所采取的措施
1954 年 8 月 …… 108
№08097,库尔久科夫呈维辛斯基请示：苏联代表团访华有关事宜
1954 年 8 月 5 日 …… 109
№21381,斯捷潘诺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胡乔木要求了解和考察的问题
1954 年 8 月 11 日 …… 111
№21418,外贸部关于在华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计划
1954 年 9 月 …… 113
№21418－1,1950—1954 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1954 年 9 月 7 日 …… 132
№21418－2,1950—1954 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
1954 年 9 月 7 日 …… 133
№21418－3,1950—1954 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统计
1954 年 9 月 7 日 …… 135
№21418－4,统计资料：苏联出口商品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对比
1954 年 9 月 7 日 …… 150
№08101,费德林致葛罗米柯报告：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
1954 年 9 月 9 日 …… 153
№08098,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
1954 年 9 月 15 日 …… 154
№25149,卡巴诺夫致赫鲁晓夫函：苏联与中国、印度、越南贸易的材料
1954 年 9 月 24 日 …… 155
№24884,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华经济援助
1954 年 9 月 25 日 …… 157
№08100,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
1954 年 10 月 12 日以前 …… 162

№10219,多勃雷宁与哈什谈话纪要：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
1954年10月21日 …… 163
№10207,扎鲁宾与杜勒斯谈话纪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1954年11月3日 …… 165
№10208,多勃雷宁与比利谈话纪要：远东局势与美国的政策
1954年11月5日 …… 167
№21392,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954年11月18日 …… 169
№21393,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接待张闻天的问题
1954年12月3日 …… 170
№09932,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
1954年12月11日以前 …… 171
№09864,苏联外交部致尤金函：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事宜
1954年12月27日 …… 182
№24888,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1954年12月28日 …… 191

1955年

№21421,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
1955年1月6日 …… 195
№09844,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
1955年1月8日 …… 199
№23889,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
1955年1月13日 …… 202
№23892,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1955年1月28日 …… 213
№10249,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
1955年1月28日 …… 214
№13411,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
1955年1月29日 …… 222
№09933,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
1955年1月29日 …… 223
№09934,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
1955年1月30日 …… 225
№24891,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

1955 年 1 月 31 日 …… 226
№24892,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
1955 年 1 月 31 日 …… 227
№08839,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
1955 年 2 月 …… 229
№23891,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
1955 年 2 月 1 日 …… 230
№09935,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
1955 年 2 月 2 日 …… 231
№09936,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 年 2 月 6 日 …… 233
№09937,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
1955 年 2 月 8 日 …… 236
№09940,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
1955 年 2 月 8 日 …… 237
№09938,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 年 2 月 8 日 …… 238
№09939,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 年 2 月 8 日 …… 240
№23893,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
1955 年 2 月 11 日 …… 242
№24895,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
1955 年 2 月 12 日 …… 245
№21404,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
1955 年 2 月 18 日 …… 247
№23894,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
1955 年 2 月 22 日 …… 256
№25968,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
1955 年 2 月 22 日 …… 257
№09941,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
1955 年 2 月 23 日 …… 272
№23907,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
1955 年 2 月 28 日 …… 274
№11803,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
1955 年 3 月 1 日 …… 278

№13017，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
1955年3月8日 …… 281
№13413，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1955年3月9日 …… 283
№21424，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
1955年3月12日 …… 286
№13414，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
1955年3月14日 …… 301
№21425，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
1955年3月19日 …… 303
№16665，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
1955年3月19日 …… 304
№10191，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
1955年3月19日 …… 306
№13018，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
1955年3月30日 …… 307
№25583，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5年3月30日 …… 310
№13417，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年3月31日 …… 310
№13418，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年4月6日 …… 311
№20515，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
1955年4月7日以前 …… 313
№13419，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
1955年4月9日 …… 321
№13312，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
1955年4月11日 …… 323
№13420，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2日 …… 324
№13313，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
1955年4月18日 …… 325
№13421，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
1955年4月20日 …… 326
№13422，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

1955 年 4 月 22 日 …… 327
№13423,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
1955 年 4 月 24 日 …… 329
№13424,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
1955 年 4 月 26 日 …… 330
№13426,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
1955 年 4 月 27 日 …… 333
№13427,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
1955 年 4 月 28 日 …… 333
№13428,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
1955 年 5 月 3 日 …… 334
№23056,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
1955 年 5 月 6 日 …… 336
№10192,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
1955 年 5 月 18 日 …… 338
№10193,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
1955 年 5 月 19 日 …… 339
№1381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5 年 5 月 19 日 …… 340
№2075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5 年 5 月 19 日 …… 341
№09943,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1955 年 5 月 21 日 …… 345
№13429,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
1955 年 5 月 23 日 …… 350
№13019,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
1955 年 5 月 25 日 …… 353
№10148,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
1955 年 5 月 27 日 …… 356
№10196,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
1955 年 5 月 28 日 …… 356
№10147,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
1955 年 5 月 28 日 …… 357
№11440,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
1955 年 6 月 …… 358

№23054,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
1955 年 6 月 1 日 …… 362
№10197,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
1955 年 6 月 7 日 …… 364
№13433,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
1955 年 6 月 12 日 …… 364
№08862,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
1955 年 6 月 15 日 …… 366
№08861,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
1955 年 6 月 15 日 …… 367
№21429,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
1955 年 6 月 17 日 …… 369
№13434,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
1955 年 6 月 22 日 …… 370
№24899,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
1955 年 6 月 23 日 …… 372
№23913,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
1955 年 6 月 23 日 …… 373
№11547,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
1955 年 7 月 4 日 …… 374
№08864,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
1955 年 7 月 6 日 …… 376
№21431,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 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
1955 年 7 月 9 日 …… 377
№21439,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
1955 年 7 月 9 日 …… 419
№23057,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
1955 年 7 月 9 日 …… 420
№24900,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
1955 年 7 月 9 日 …… 425
№11548,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
1955 年 7 月 14 日 …… 426
№09897,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
1955 年 7 月 15 日 …… 430
№09892,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

1955 年 7 月 18 日 …… 431
№13468,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
1955 年 7 月 18 日 …… 432
№24901,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
1955 年 7 月 23 日 …… 435
№09945,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
1955 年 7 月 25 日 …… 445
№21437,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 年 7 月 29 日 …… 446
№09829,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
1955 年 7 月 31 日 …… 447

№13405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记录：通报高岗—饶漱石事件

（1954 年 2 月 2 日）

摘自 П.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 年 2 月 23 日

绝　密
第 143 号

今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邀请我就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决议（草案）》进行会谈。刘少奇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昨天已将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的决议草案转交给我。在这次会谈中，他和其他同志想让我了解迫切准备这样的文件和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的事实和原因。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共内部暴露出派别活动，这些活动在较大范围内涉及相应的党的高层工作者。这些派别活动的领导人之一就是高岗，然后就是饶漱石（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由此，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状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全会将对上述人员的宗派活动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与此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刘少奇同时强调，在全会上将不具体指出参与宗派活动人士的姓名，在中共中央全会决议中也将同样不提及具体的姓氏。全会的过程将反映出高岗、饶漱石以及与其有联系人士是如何表现的，相应决议的性质将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为此，刘少奇说，所涉及的问题由周恩来做更详细、具体的介绍。

周恩来的谈话则由高岗的活动在客观上具有对抗中共中央的性质开始。周恩来说，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党是领导军队的力量，应当是统一的，牢不可破的组织。而高岗对此认识恰好相反。他在党的高层工作者中广泛散布，似乎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党取决于军队的观点。高岗就是如此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高潮和低谷、紧要关头与失败。高岗按自己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党在困难时期的发展历史。高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党的观点不同。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党首先诞生在城市，然后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和在

农村的影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城市中许多党的干部遭到残杀，大批党员前往农村，在那里积蓄力量并建立有争议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仍在继续。李立三、王明所执行的错误冒险主义路线使当时党在城市中的地下工作遭受了巨大损失。完全可以说，国民党人当时屠杀了中共在城市中几乎99％的党员。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以及在农村的工作。在同国民党反革命斗争的30年代，在陕西[1]省建立了大量的"苏区"。以王明(毛泽东同志当时不是党的领导成员)为代表的党的错误领导路线造成"苏区"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移师陕北。长征期间的1935年，在江西[2]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担任了领导职务。此后，党中央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党内因王明等人活动结果造成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党经历了由张国焘叛徒分裂带来的困难。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战胜了这些困难。

高岗当时在陕北领导着游击斗争，红军主力和中共领导机关也将那里作为根据地，因此在当地建立了最大的解放区。周恩来没有把谈话内容停留在详细介绍这个区的历史上，而是进一步强调了以这个区为基地，开始了全面的解放战争，最终获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强调，高岗不能正确、并错误地认识在革命进程中的自我以及中共的历史。例如，他把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内的正统部分，在解放区内的党的军事组织；另一部分是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犯过各种错误和遭受敌人迫害过的同志。高岗实际上认为似乎存在两个党，而真正的党的干部是当时来自解放区军队的。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清楚，党既不属于高岗的，也不属于王明的，而是属于中共中央的。我们没有两个党，而是只有一个在自己的存在期间统一的党。党在个别时期内当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无论是在地下工作中，还是在解放区的工作中，都遇到了失败和挫折，特别是在叛徒或有偏差的人在党内执政时期。但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党的状况朝好的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军队在中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自己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在武装革命同武装反革命斗争中，尤其在中国，军队是强大的力量。正因如此，如果军队脱离了党的监督，将会非常危险。毛泽东对此从来都是极为关注的。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众所周知，高岗负责了陕北地区的游击运动，红军主力和党的领导机构在1935年移师那里作为根据地。但高岗试图认为，如果没有他领导的游击区存在，那么党和红军也就没有开展革命的落脚点，革命也就会因此而丧失。在1942—1943年党"整风运动"期间，无论是对解放区，还是对国统区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全面批评。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对党在解放区、敌占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再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犯过错误的同志对此已进行了检讨。七大后，许多新人被推荐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在七大后，高岗违背党的纪

---

① 原文如此，应为江西。——译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遵义。——译注

律,继续暗地散布党分为两部分的观点,竭力把由刘少奇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中曾遭到的失败和所犯错误的责任归咎到刘少奇身上。

2. 因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竭力煽动对刘少奇臆造的错误,而且这一切不是公开的,是在暗地中。他不愿意同刘少奇见面,进行坦诚的交流,不把自己与刘少奇的分歧向中共中央提出,而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暗地散布对刘少奇的各种臆测和污蔑。高岗的这些行为对党的团结与统一事业带来了危害。为达到自己的宗派目的,高岗企图利用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在自己周围结成联盟和派系。例如,他企图利用在解放国民党统治的东北期间犯过严重错误的彭真(政治局委员)、前财经部长薄一波和其他同志。周恩来强调,高岗自 1952 年到北京工作后,特别是 1953 年,更变本加厉地散布对刘少奇的污蔑。高岗不仅对刘少奇本人进行污蔑,而且还污蔑其他同志,极力在工作人员之间制造矛盾,搬弄是非。高岗的这些反党活动是为达到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功名主义目的。

3. 高岗在党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其中在华北的工作中曾有过不少功绩。中央领导器重并信任了他,但高岗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领导对其良好的态度,为追求个人的功名目的,抬高自己的地位。为突出自己,高岗千方百计地夸大别的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他企图利用高层中一些人具有骄傲情绪和功名主义思想情况,而这些人则陷入了高岗的诡计。例如,他向一些人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强调,应当指出,高岗企图劝说的许多人对此曾给予了回击,最终的结果使高岗自己暴露了出来。

谈到高岗如此积极反对刘少奇的原因问题,周恩来强调,高岗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他想在党内占有更高的位置。众所周知,七大以后,刘少奇是毛泽东最亲密的和信任的人。毛泽东到外地去,都是由刘少奇代替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想到,除了刘少奇外,自己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因此高岗认为,如果得以打倒刘少奇,那么他自然就可以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周恩来说,不久前,毛泽东鉴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工作劳累过度及年龄的原因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减少自己目前的工作量,以便能有更多的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实际工作问题,因此毛泽东请书记处成员考虑设立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高岗极力反对此项建议,因为他清楚,如果赞同决定,设立这样或那样的职务,显然,刘少奇将会被选举为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高岗在私下谈话中表示,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现在暴露出来,给党的团结和统一带来了巨大损害。周恩来继续通告,毛泽东准备在 12 月份休假,而刘少奇知道高岗对自己的态度,建议毛泽东不在期间,由高岗在内的 7 人,集体轮流主持领导工作。毛泽东当时还询问了谁合适在他休假期间代替他,所有人都同意刘少奇,只有高岗一人表示反对。

周恩来强调,作为政府的副主席,高岗认为,这对他来讲还太少。他竭力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然后成为国家元首。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去年夏天召开的财经会议期间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组织工作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同高岗一起工作的陈云对其宗派活动从前就有所知晓。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曾有广泛表现,但关于他想成为毛泽东

在党内的副手这一情况，只是在最近才为人所知。谈到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周恩来说，饶漱石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他同高岗一样有功名主义倾向，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但与高岗有所不同的是，他做得更隐蔽。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高岗联系，并加入了高岗的宗派集团。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与该部其他所有工作人员对立，指责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副职(安子文)，强加许多臆造的错误并百般加以夸大，是在犯政治错误。尽管刘少奇在政治局中负责组织工作，饶漱石从不向刘少奇汇报任何问题，对其不予理睬，采取躲避中央的做法。特别是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1953年9月)，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得以积极地施展。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看法同中央的观点对立，而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导致了会议气氛的不健康。为改变局面，毛泽东召见饶漱石参加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对其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此后，饶漱石在会议上继续从事宗派活动。周恩来谈到，饶漱石是仅次于高岗的人物。

涉及目前的情况，周恩来说，中央正在对与高岗有联系的人做工作，大部分人开始理解高岗反党活动的危害性，但少部分人至今对高岗反党活动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认识不足。不能不认为，部分同志相信了高岗散布的谣言，以为这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因此信以为真。周恩来深信，大部分党的领导工作者认清了高岗的错误路线，少部分受高岗蒙蔽的人迟早会明白，他们受到高岗的欺骗。在追随高岗的人当中，有一小部分是在思想上蜕化和在理论上不成熟的人。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认清高岗反党活动的真相后，最终会反对高岗。谈到高岗、饶漱石宗派活动产生的根源，周恩来指出，在取得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落到了实际工作上，结果削弱了党对许多问题的警惕性，忽略了党内功名主义与追求个人利益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周恩来说，高岗、饶漱石以及其他人的宗派活动，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周恩来通告，全会决议的草案已散发给中共中央委员。高岗和饶漱石清楚决议所指的，是他们的所为，并在当前尽量同许多同志进行谈话、交流。在这些谈话和交流中，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部分错误，对内心的功名目的避而不谈。根据周恩来的看法，在全会上，高岗可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周恩来说，不排除在全会上一些人揭发高岗从前与其进行的反党谈话，高岗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些事实，进行抵赖；同样不排除地采取胆怯的做法，声明自己被逼到绝路，除结束生命外，别无选择。周恩来说，从高岗方面来讲，这种情况不能排除，因为他将在所有人面前受到揭发。例如，高岗在与陈云谈话时表示，准备去任弼时(前中央委员会书记，1951年去世)去的地方。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以及其他人同高岗谈话，目的是给高岗一个摆脱其目前陷入困境的机会，并加以改正。毛泽东指示，无论是报告中、讨论时还是在决议里都将对高岗、饶漱石不指名道姓。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不准备做任何组织结论。周恩来说，如果高岗、饶漱石在此次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将继续并观察他们在未来是如何表现的。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高度重视加强党的警惕性的必要性。也正是这个事件唤醒中共中央如此严肃地提出高岗的宗派活动问题。

在刘少奇提出,我是否认为有必要就今天通告的信息同毛泽东会面的问题时,我回答说,目前没有看到在此问题上的必要性。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周恩来请求将这绝对保密的信息通报给苏共中央。

谈话进行了3个半小时,出席的有朱德、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B. B. 瓦西科夫。谈话是由B. B. 瓦西科夫担任翻译的。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79,д. 7,л. 23-25

№13406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情况

(1954年2月13日)

摘自П.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　密

第144号

今天,受莫斯科的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我向他们通告,苏共中央对中国同志通报给他们的,有关中共中央就党的团结与统一特别全会的信息表示感谢。刘少奇、周恩来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在回答刘少奇提出的询问时,我向他和周恩来通报了苏共中央对行将到来的斯大林逝世周年所做出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感谢向他们通报此信息,并表示中共中央考虑到苏共中央的决定,纪念斯大林逝世1周年。

根据捷沃相[①]返回莫斯科前与刘少奇的谈话内容,我通告道,苏联政府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加快对鞍山钢铁公司1150初轧钢机设备的提供;扩大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刘少奇、周恩来请我转告苏联政府,非常感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请求给予的满足。

---

① 捷沃相,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编注

后来，刘少奇、周恩来主动向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全会的结果。全会自2月4—9日[①]召开了4天，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委员出席了会议。非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党的高层工作人员，除9人缺席外，其余52人参加了全会。刘少奇表示，将稍后转交给我报告的内容和决议的最终文本。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在全会上做了报告。在讨论后，赞同对拟定决议草案做部分修改，但与会人员对提交的决议草案未提出任何其他重要的修改意见。如同计划的一样，全会没有指出具体姓名，主要是在全会召开前已向许多中央委员通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事实，而对其他人是在全会工作过程中通报的。在发言中，有充分根据和原则性地批判了具体的现象，而且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清楚说的是什么，谈的是谁。许多同志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了全会决议中所提到的他们所犯的错误。在高岗和饶漱石的发言中，有自我批评的成分，但很不够彻底。较之高岗，饶漱石做了更多的自我批评。

刘少奇说，全会结束后，一批中央委员继续同高岗、饶漱石进行谈话，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从原则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至于高岗，直到现在仍然威胁说他准备自杀。同时，他表示自己准备好离开领导岗位，做一个老百姓。一部分同志指出了高岗执迷不悟，继续从事严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作为对刘少奇的谈话的补充，周恩来强调，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竭力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搪塞，两人甚至企图把自己的反党活动尽可能拉近更多数量的人，指责他人的错误和反党言论。但他们企图恶意攻击的这些同志都做了自我批评，而高岗、饶漱石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从整体上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没有诚意。

在详细谈到饶漱石的行为时，周恩来说，饶漱石的工作范围一直比高岗小，只限于华东(上海)。现在，当提出饶漱石宗派活动问题时，所有与其在华东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公开斥责他在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在的宗派活动。考虑到这些，不怀疑他最终将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与高岗不同，饶漱石的问题将会在不久得以解决。话题转到高岗的行为上，周恩来说，就高岗的工作量和范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饶漱石大。高岗先在西北，后在东北负责主要工作，最后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他与党的工作者具有广泛的联系，直到现在还在他们中间享有威信。许多同志没有完全认清高岗的本来面目。利用这一切，一方面，高岗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企图用威胁的办法向中央施加压力，准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其生命。饶漱石是一个口是心非、善于隐藏的人，当向他指出宗派活动事实后，他惊慌失措。高岗则是另外一种性格，表现相反，竭力威胁并用无赖的方式加以抵抗。最近一段时间，高岗在个人精神上有崩溃的迹象。

周恩来继续说，高岗承认计划打倒刘少奇，并以此为目的，在党的成员中做了相应的工作，但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他的位置。高岗承认自己有功名主义倾向，但从整体上说，他不是钻营家。高岗在谈话中表示，按照你们的看法，我是贝利亚，还是张国焘？高岗承认自己存在个人主义成分，但他声明自己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

---

① 此处原文有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为1954年2月6—10日。——编注

周恩来说,目前正组织一批负责同志一起给高岗保留在他们面前承认错误的机会,这能使高岗在未来停止其在个别人中间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的秘密活动。周恩来指出,所有接触过高岗和了解他的人在全会上都拥护中央的路线,只有少数不完全了解高岗宗派活动的与会人员对他的罪行程度有所怀疑。周恩来说,同高岗解决问题要比饶漱石困难、复杂得多。他要么以自杀相要挟,要么散布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和要逮捕他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自己的反党宗派斗争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在他们面前,党不会停止对那些人的逮捕,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功绩。周恩来说,尽管高岗有错误行为,中央在审查他的问题上严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一切犯过错误和有错误认识的人,应当采取“治病救人”而不是排斥的办法。

谈话进行 1 个多小时,使馆参赞 B. B. 瓦西科夫和师哲出席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79,д. 7,л. 36 - 40

№25967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英美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1954 年 2 月 21 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4 年 2 月 21 日
第 332 号文

绝　密
文本第 2 份

关于英美法海空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军事演习的报告
(简报)

从国外报纸获悉,1954 年 2 月 14 日,在苏联、美国、法国外交部长柏林会议结束之际,英美法驻远东海空军在菲律宾和印度支那之间的南中国海域开始举行第一次大型海

空军联合演习，演习代号使用了音乐术语“奏鸣曲”，演习的目的旨在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演习的准备

必须指出，演习的准备工作高度保密，在这一过程中，香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54年1月，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著名军事活动家迅速抵达香港就令人怀疑，从香港报纸获悉：从1月14日起，在10—14天有如下人员访问了香港：

1. 美国驻檀香山第14海防分队海军少将弗兰克·坎农。
2. 英军总参谋部副司令达德里·沃德中将。
3. 法军总参谋部司令克列门特·布兰克大将(有6名总参谋部军官随行)。
4. 美国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有5名总参谋部军官随行)。

同时，英国驻远东海军司令、海军中将查尔斯·拉姆在香港逗留，1月20日去了澳门。

还要指出的是，12月2日，美国海军部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和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查尔斯·托马斯也来到香港。

自然，如此数量的三国著名军事活动家齐聚香港的目的绝非他们在报纸上宣称的“两天休假”或“官方会晤”。

显然，游戏的幕后动机是准备军事演习。如果考虑到上述军事代表在会晤期间，参与演习的英国海军的领导人查尔斯·拉姆来到了香港(拉姆的司令部在新加坡)，这就更显而易见了。

1954年2月2日，利用军区俱乐部招待会的有利时机，我询问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是否知道上述高级军事代表会晤的目的。在我们看来，邱会作的表现，要么是对此全然不知，要么是在谈其他的情况。他说，他们会晤是为了协商途经香港运送朝鲜战俘的问题。我国在该军区的军事情报人员不接受这种解释。现在，我国的军事情报人员认为，此次会晤与准备军事演习密切相关。

二、参与演习的人员组成和演习的目的

从报纸获悉，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和空军参加演习。同时我们还从军区内的我国情报人员处获悉，国民党部队也参加了演习。对报纸的报道进行仔细研究后，无法证实国民党参加了此次演习。

必须指出，国民党报刊英文版对演习一事完全保持沉默。香港殖民当局半官方刊物《南华早报》2月10日只是刊登了一则关于英国军舰从新加坡出航参加演习的消息。2月16日和17日，在香港发行的国民党报纸也在显著位置使用大标题刊登了关于军事演习的消息。2月16日，《星岛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关于军事演习的消息，使用的大标题是：《三大国海军大型军事演习开始了。在远东同苏联的潜艇作斗争。对封锁的可能性进行探索。此举对在越南的战争的重要意义》。

国民党的香港报纸报道说，约有30艘军舰和1万多人参加了军事演习。据英国报纸报道，商船也参加了演习。关于参加演习的空军数量的资料，任何地方也没提过。

依据这些资料,美国方面有2艘驱逐舰和3艘护卫舰参加了演习,英国方面主要是参加朝鲜战争的军舰,即“哥萨克”号、“防御”号、“亲王”号、“康斯坦斯”号、“康科德”号和“科凯德”号驱逐舰,“山湾”号、“莫克姆”号护航舰,以及“萨罗”号潜水艇。关于法国部队的资料在报纸上没有出现过。

演习参与者赋予演习以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从委派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查尔斯·拉姆中将、英国远东空军司令桑德森元帅、美国驻菲律宾海军司令里查德·克鲁森少将和法国驻印度支那海军司令奥博弗托少将来指挥演习便可以看出。

为期10天的演习,其共同目的是完善侦查技术和反潜战。根据报纸消息,演习参加者的出发点是:苏联在远东水域部署了自己三分之一的潜艇舰队,其中大部分驻扎在远东南部水域。演习的目的,如报纸所说,还要探索封锁印度支那和中国沿海的可能性。

从我们的军事顾问卢卡舒克和阿盖耶娃那里得到的谍报资料判断,演习方还有一个任务是在中国南部登陆。

因为演习的目的是完善在南中国海针对苏联潜水艇的作战,因此,国民党宣传机关把向“盟友”提供关于苏联在海南岛水域的潜水艇的“谍报资料”作为自己的任务。

例如,香港报纸《星岛日报》(国民党办的报纸)2月17日转载了台北的消息,根据国民党情报机关的资料,似乎10艘苏联潜艇已经进驻了(海南岛)榆林港,这些潜水艇似乎是在向菲律宾和马来亚运送存放在越南的军火和共产党间谍。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低劣的挑拨者,国民党余孽非常无知。

鉴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和国民党分子从2月14日起在中国南部附属岛屿活跃的情况,为应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应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通知我们的军事顾问,中南军区部队已进入战备状态,并向防空部队空军下达了击落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的飞机的命令。

三、结论

根据我们的看法和我国驻南中国海军情报人员的看法,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的组织者追求的目的是恐吓中国和越南,在中国和越南毗邻地区展示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实力。

在华南的中国同志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提高警惕和做好战斗准备。

苏联驻广州领事

И.卡拉布霍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38,д.105,л.50-54

№10128

尤金与黄文欢谈话纪要：越南抗法斗争局势

（1954年3月5日）

3月5日，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拜访了我，他刚在越南待了4个月，不久前才从越南返回的。在交谈中，越南大使讲述了越南局势，并阐述了自己对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的看法。

黄文欢说，目前越南各条战线上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人民军队手中。鉴于除少数地点以外的越南北部地区均已被解放。人民军司令部打算在今后逐步让自己的主力移师越南中部。由于人民军没有必要的交通工具，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遇到极大困难。人民军的战略计划在于通过与敌人展开运动战，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人民军的任务中，暂时还不包括占领像河内、海防、西贡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它还不具备做到这一点的足够力量，特别是技术装备。人民军正规军的数目目前约有20万人，敌人的军队……①

随后越南大使说，他设想，有可能法国政府也会参加关于越南和解的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为，第一，越南不存在确定的战线，所以要划定一条分界线和确定非军事区将特别困难(在越南解放区生活着近80%的居民)；第二，法国人将会为保大争取一定的地位，而人民政府对此则不会同意；第三，美国将会通过向法国政府和保大施加压力力图破坏谈判。

在谈话结束时，越南大使黄文欢请我今后向他通报关于日内瓦会议筹备过程中涉及越南的部分。

谈话由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切卡诺夫同志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尤金

АВПРФ，ф. 079，оп. 9，п. 7，д. 15，л. 64－66

---

① 档案复印件以下缺2页。——译注

№2137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致英共的电报

(1954 年 3 月 5 日)

1954 年 3 月 5 日
第 406/ДВ 号

致苏共中央
В. П. 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给您中共中央要求转达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该电报是于今年 3 月 4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转给苏联外交部的。

附具体涉及上述内容，共计两页。

В. 库兹涅佐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保存转交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И. 谢尔巴科夫
1954 年 3 月 6 日

附件：

致苏共中央并请求转交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决定推荐希尔达·科恩或特列沃夫·希尔同志到我们中国从事英文著作的出版顾问工作。你们从上述两位同志中选择任何一位到中国来，我们都会感到高兴的。我们希望该同志在我们这里从事《人民中国》杂志的编辑工作或在《中国重建》杂志编辑部从事英文编辑、顾问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该同志在从事编辑、顾问工作的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培养编辑骨干。该同志在中国的工作期限为三年。该同志从英国到中国的旅途开销以及在中国居住期间的所有费用，其中包括赡养仍在英国的家庭方面的费用在内，均由我们承担。

我们期待着你们能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并通知我们该同志前往中国的日期，以便我们及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把给该同志的路费转给你们，并通知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国的使馆做好迎接该同志的准备工作。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

1954年2月19日

北京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21、22-23

№2074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年3月6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何宝贤(He Bao-Xian)和费德林(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出席。

张闻天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其他中共中央成员，让他传达他们对莫洛托夫同志的问候。

莫洛托夫感谢了他们。

张闻天报告说，苏联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支持会议上采纳的召集日内瓦会议的决定。

他说，尽管美国会试图破坏这次会议，但是民主阵营的代表会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积极参加这次会议，并且认为，如果在会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那么在这里的任何成功都很重要，因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条道路正在打开。

莫洛托夫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赞赏。

张闻天说，就日内瓦会议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于3月5日抵达北京。

他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就朝鲜问题准备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最高目标预设了以下几点:

1. 在平等的基础上,创建代表南北朝鲜的统一朝鲜委员会来统治整个国家,直到朝鲜统一政府建立。

2. 举行大选。

3. 外国军队撤离。

4. 统一朝鲜。

万一这个目标的建议不被采纳,那么就提出一个较低目标,即维持现状,逐渐撤离外国军队,规范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其他关系。

这两个目标都是以苏联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的立场为基础和模范而提出的。

他说印度支那问题更加复杂,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停火线,然而,印度支那结束战争的条件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就此协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莫洛托夫说,根据新闻报道,这个过程将要持续两到三个月,但是新闻里提到国外一些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将一直拖延到11月。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

张闻天说,尼赫鲁(印度总理)提议的“停火线”很难被接受,因为结束战争的条件很重要。

他指出,必须停止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否则战争会一直拖延下去。

莫洛托夫说,如果法国想缔结协约,那么当然有必要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张闻天报告说,有建议在北纬16度画一条分界线。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胡志明有利,如果正式提出的话,应该会被接受。

他说,在3月底邀请胡志明来京是明智之举。这时,大使问及邀请胡志明到莫斯科讨论日内瓦会议的立场问题和苏共中央党内问题的可能性。

莫洛托夫赞成邀请胡志明来莫斯科,但是补充说,苏共中央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就应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问题,张闻天提到,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邀请民主越南的代表,还要邀请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而不要把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会包括在越南代表团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邀请这三个民主国家的代表,可以作为对其相关国家的抗衡。

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考虑。

张闻天探讨了日内瓦会议上可能讨论的其他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重整军备,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协议,还有其他。

莫洛托夫说,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需要研究,但是似乎就他而言,这些可能性绝不会被阻止。

张闻天报告说,考虑到柏林会议上四个外长达成的协议,周恩来正在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这次会议,苏联代表应该会是莫洛托夫同志。

莫洛托夫承认了在柏林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达成的协议,并补充道,外长们可能不会全程

参与，因为会议可能会延长。

张闻天解释了中国、朝鲜和越南代表团于4月中旬(10日和20日之间)前往莫斯科，对各自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立场进行协调的可行性。

莫洛托夫说这样的会议是必要的，有利于事态发展。

对中国和朝鲜同志已经做好准备以适当的方式来讨论朝鲜问题，他表达了信心，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是更为知情的。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和越南同志将为印度支那问题做适当准备的信心，因为他们正有合适时机做这些事。

张闻天说，北京的工作已经开始：人员已经选出来了，正在起草建议，等等。他指出，中国同志现在指望苏联方面的援助。

莫洛托夫许诺给以援助，并谈到了联合努力的必要。

张闻天指出自己缺乏经验，要求选出有能力的苏联外交专家来帮助在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员，分享他们在国际会议组织工作上的经验以及对待资产阶级代表们的方法、技巧上的经验，等等。

莫洛托夫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且指出大使可以和(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同志商量这些问题，葛罗米柯有参加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他说，苏联外交部对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主要由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诺维科夫和费德林等同志负责。

张闻天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授权他就日内瓦会议的准备问题和苏联外长保持联系，并且他也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

莫洛托夫表达了赞赏。

张闻天谈到日内瓦会议的程序问题，并且对周恩来是否可能担任会议主席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还谈了其他问题。

莫洛托夫说，日内瓦会议上会出现许多程序问题，主席、全体代表、会址等等，争议和讨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做好适当准备，制订我们的行动计划。

张闻天很关心是否可能让中立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尤其是印度。

莫洛托夫说，朝鲜问题的参与者的组成已经完全地确定了，但是涉及到印度支那问题，有哪些参与者还不十分明晰，在此还可能有严肃的争论。

关于邀请印度的问题，他说，让印度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可能将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的角色地位降低，中国要和其他四个大国并驾齐驱，这是印度无法索要的。然而，他提出，让印度和泰国参加印度支那问题符合其他一些集团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

H. 费德林记录

发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

АВПРФ，ф. 6，оп. 13а，д. 25，л. 7

№14580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朝鲜问题的指令草案

(1954年3月17日)

绝 密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兹发给您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就朝鲜和印度支那等问题所起草的指令草案。该草案中所涉及的资料由相关委员会提供。①

库兹涅佐夫

1954年3月17日

附件：

为苏联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所起草的关于朝鲜问题指令草案

关于朝鲜问题给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如下：最高目标(纲领)——实现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统一；最低目标(纲领)——如果在会谈期间无法就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统一等基本问题达成协议，那就采取一切措施以使停战向实际上的和平过渡。

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应当指出，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倡议并提出的。

最高目标(纲领)：提出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的建议

一、在6个月期限内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以确保朝鲜人民行使其应有的权利——自由地解决本国内部事务。

二、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国家及其政府，兹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建议如下：

1. 在全朝鲜民众自由意愿的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举行全民选举。

2. 为了筹备朝鲜国民大会，举行自由的全民选举，应成立由南北朝鲜代表组成的全民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只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指示。——编注

委员会，其中代表均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事先必须强调，该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起草全民选举法，以便选民能够在自由意愿、没有外国干预以及地方政府和地域性集团的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选举和加入民主组织，从而确保选举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该选举法应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的批准。

三、如果在会议上(有人)提出关于成立国际委员会以监督朝鲜选举进程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应援引如下理由：举行选举是朝鲜人自己的事。

四、在朝鲜全民政府成立后，(各与会国)理应协助朝鲜加入联合国。

最低目标(纲领)：提出关于采取举措以确保(朝鲜)从停战状态向真正的和平状态过渡的建议

1. 如果会议期间没有就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等基本问题达成一致，那么在所有相关国家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之前，各与会国理应采取措施以确保朝鲜维持和平状态。为达此目的，会议应讨论如下建议：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在维护朝鲜和平的问题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不得再重起战端，以便通过和平调解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2. 建议将缩减外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数量作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第一步。

3. 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均缩减各自的军队数量。

4. 建议采取措施以促进南、北朝鲜的亲近(建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并为此目的提出其他相关建议。

5. 如果会议期间(与会各方)无法就上述建议(最低目标)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应提出关于在此次会议后各相关国家继续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这些谈判可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在为此目的而专门组建的委员会中，或通过正常外交渠道，等等)。

外交部副部长 A. A. 葛罗米柯

外交部副部长 B. A. 佐林

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 T. 费德林

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司长 A. A. 索博列夫

外交部南亚和东南亚司司长 K. B. 诺维科夫

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 A. A. 索尔达托夫

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 A. A. 拉夫里谢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佐林、费德林、索博列夫、诺维科夫、索尔达托夫和拉夫里谢夫等同志，档案室

АПРФ, ф. 0100, оп. 47, п. 389, д. 107, л. 1－4

№21405

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草案

（1954 年 3 月 19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4 年 3 月 19 日
第 247 号

绝　密

马林科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赫鲁晓夫同志：

我把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苏共中央转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送给你们。刘少奇再次提醒说，中共中央希望得到苏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提出全面的意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

手写批注：

文件首页标注“紧急呈送维诺格拉多夫同志”，……①，4 月 24 日。

说明：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最新修改稿，并根据修改稿提出了最终意见，已将建议交给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4 年 4 月 26 日

①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组织和国家机构(国家组织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构

　第五节　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机构)

　第六节　法院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①

手写批注：

打字稿为原稿，手写字体是对中共中央最初文本审议后做出的修改(1954 年 3 月 21 日)。

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组织和国家机构(国家制度)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构

　第五节　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机构)

①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15 日第 2、3 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第六节 法院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①

手写批注：

这是第一份稿子。手写字体改动的地方是对第二份稿子做出的修改。②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6, л. 2 - 61

№21407

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1954 年 3 月 20 日)

副本(手写)

致彭真同志：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根据你们的请求，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对前言的意见

第 2 页，在“该宪法体现了人民革命的成果”一处最好加上“并且将会使人民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

---

①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15 日第 2、3 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② 这里的第一份稿子是指附件二，而第二份稿子是指附件一。——编注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把个别条款中包含的一些具有纲领性的材料放到前言中这个问题，比如，把第10条中谈到的关于国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策放到前言中。在第4条中也包含有一些纲领性的内容。

对宪法草案结构和一些章的名称的意见

宪法草案第一章“总纲”最好改为“社会制度”，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通常都是这样表述的。

在第一章中一些条款的顺序能做如下调整就更好了：把第3条替换为第2条；把第17条替换为第3条；把第18条替换为第4条；把第19条替换为第5条。接下来是论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的条款。

草案的第二章最好划分为如下一些独立的章。

1. 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该章最好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列出一些条款。

2. 国家的管理机构。该章最好就国务院、各部和中央机构列出一些条款。我们认为，该章最好对一些部做出法律上的规定。

3. 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4. 民族自治区的权力机构。

5. 法院和检察院。

应当好好考虑关于在宪法草案中增加新的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这个问题。草案中可以把该章放在“社会制度”这一章的后面。

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宪法草案可以由如下几章组成：

第一章——社会制度。

第二章——国家制度。

第三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四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第五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六章——民族自治区的国家权力机构。

第七章——法院和检察院。

第八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国旗、国徽和首都。

对个别条款的意见

第3条的措辞最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

人民。”

第 3 条的最后一部分应分为单独的一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进行的整个建设中实行的民主集中原则固定下来。或许，该条的措辞应该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都建立在民主集中原则的基础上，并按这一原则行事。”

第 26 条应该准确一些。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组建”国务院中的“组建”一词应该为“批准”。

第 32 条应该指出一个期限，在该期限内应该对代表的质询做出答复。

第 33 条应当准确，其中应该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被发现犯罪，并且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他应当被拘捕。并且应立即报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后者许可对该代表实施逮捕。”

第 34 条应该指出，选民有权提前撤换人大代表。

第 36 条第 9 项“组建国防委员会”最好改为“批准国防委员会”。

第 38 条应该增加“行使选举权”一句。

第 45 条，最好不要把国务院称为“最高的管理机构”，而称为“最高的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

第 46 条应该指出，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确定。

第 50 条，我们认为该条应该被分为两条。第 50 条的前半部分最好移入“国家制度”一章中，而第 5 条的第 5 项保留不变，作为单独的一条。

第 54 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应该指出地方人民政府由谁选出。

第 61 条应该准确一些，应该进行修改。该条的前半部分或许应该修改为：“民族自治区自我管理机构活动的具体形式既应该符合该自治民族的利益，也应该符合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利益。”

第 64 条，专门的法庭不应该被称为特别法庭。其中“专门的法庭”包含特别的法庭。

第 75 条应该指出，法官的工作应独立于地方权力机构。

第 77 条最好写上“全体公民”，而不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 79 条应该指出，该条中规定的一些权利保障劳动人民及其组织享有出版、印刷的权利和使用公共建筑物的权利。

第 81 条在例举一些保障的同时应该把“住宅不可侵犯”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应该列出一条，或许应该为：“背叛祖国应该被作为一项最严重的罪行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宪法草案中应该指出各国家机构颁布的法令的准确名称。根据宪法草案，能够颁布命令的是：(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 国务院；(3) 部长；(4) 地方权力机构。

应该把如下行为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2) 常务委员会颁布法律；(3) 国务院颁布决议和命令；(4) 部长下达命令和指示；(5) 地方权力机构做

出决议。

这就是我们对宪法草案的意见。

祝好

A. E. 卢涅夫

1954 年 3 月 20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6, л. 98 - 102

№21408

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

（1954 年 3 月 20 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对前言的修改意见

对于前言有一处措辞上的修正。

第 2 页提到:“该宪法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体现”,在“体现”一词后加上“并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较能更好地反映实际。

关于把宪法草案的个别条款中包含的具有纲领性质的材料放到前言部分这个问题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比如,第 10 条的一些内容谈到的是关于国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策。第 4 条中也包含有一些这样的纲领性内容。

对宪法草案结构和章节名称的意见

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

宪法章节名称的准确和清楚对于宪法文件具有巨大的意义。章节名称应该反映其中包含的条款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这一名称与这种要求是不相符的。这种名称或许适用于前言,但不适合作为第一章的名称,第一章应该包含确定的内容、具体的法律准则,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社会制度。

因此,正如苏联宪法和几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一样,把第一章的名称改为“社会制度”较为准确和正确一些。

此外,第一章中载明的一些条款不连贯。首先第1条和第3条谈论了国家的政治基础,从第4条到第17条谈论的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从第17条到第20条再次谈论了关于国家的政治基础。

我们建议把关于国家政治基础的内容集中到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把第3条改为第2条,第17条改为第3条,第18条改为第4条,第19条改为第5条,等等。

对第二章的意见

我们认为,草案中第二章的名称“国家结构和国家机构”需要改一下。

从这一章各条款的内容来看,“国家结构”包含了国家机构总的架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再加上“国家机构”就重复了这一意义。

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结论,“国家机构”不属于“国家结构”,那么国家结构又包含什么呢?

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把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合并到一个章节中这个问题。

为了使宪法更加明确,我们建议把第二章划分为几个单独的章节。

第一章,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

该章中最好有一些包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一些条款。

第二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该章最好包含一些关于国家最高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条款,同时也应包含一些对各部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确定的条款。我们建议在草案中加入一些条款,来确定各部和中央部门的法律地位。

第三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四章,民族自治区的权力机构。

第五章,法院和检察院

此外,作为独立的一章,草案中应该加入“国家的制度”一章。

必须有这一章,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自治单位,并且其国内的行政划分非常复杂。

这些自治单位和行政划分都被一些法律准则固定了下来,这些法律准则体现在第2条,第5条和第59条中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些条款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中,而它们是必须被集中到一起的。

这样做对宪法只会是有益的。这样国家制度的民主原则就会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

我们建议把这一章放在“社会制度”这一章的后面。在制定这一章的时候可以参照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章。

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宪法草案可以由如下几章组成：

第一章——社会制度。

第二章——国家制度。

第三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四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第五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六章——民族自治区的国家权力机构。

第七章——法院和检察院。

第八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国旗、国徽和首都。

对个别条款的意见

第3条最好这样编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第3条的最后一部分应分为单独的一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进行的整个建设中的民主集中原则固定下来。或许，该条的措辞应该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都建立在民主集中原则的基础上，并按这一原则行事。”

第25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民主性质。比如，增加的内容可以类似苏联宪法第40条的内容或者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18条的内容。

希望第26条能够增加一些条款，指明立法应该由谁首先提出。

这一条的第5项内容指出，根据国务院总理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建国务院。“组建”一词意味着挑选政府候选人。这项工作由总理完成，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政府的成员。因此我们建议把“组建”一词改为“批准”。

第32条谈到了代表的质询权。但是在这一条中没有指明一个期限，在该期限内应该对代表的质询做出答复。因此，在该条中应该指明对代表的质询进行答复的期限。

我们认为，这一期限不应该超过10天。

第33条应当准确，其中应该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可侵犯，并指明对其进行逮捕的程序。该条应该同宪法草案的第80条联系起来。第80条不允许不经法官和检察官的判决就逮捕任何人。第80条规定，在得到法官和检察官进行逮捕的许可之前，允许进行3天以内的拘押。第33条还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表明，如果人大代表被发现犯罪，可以对其进行拘押，然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的许可对其进行逮捕。宪法草案第30条可以以如下的形式表述：“在全国人大代表被发现犯罪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拘

押。并且应立即报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经后者许可对人大代表实施逮捕。”

第 34 条指出,“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根据法定的程序撤换人大代表”。

这样的表述还不清楚,法定的程序是什么。把这项内容修改为“选民有权提前罢免人大代表”,是不是更好一些?

第 36 条的第 8 项内容应该进行补充,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履行本条阐述的职权。

第 36 条的第 9 项“组建国防委员会”最好改为“批准国防委员会”。

第 38 条应该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年满 35 周岁的每位公民都可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每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因此,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公民不能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如果把这一点表述如下,将会更加准确一些,即:“年满 35 周岁的每位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否应该为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确定年龄上的限制呢,而且确定的年龄还是这样的高,这在实际上有必要吗?

第 45 条的表述应该改善一下。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是最高的管理机构。”

此处,同一机构使用了两个名称。把该条作如下修改是不是更好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

第 46 条需要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国务院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国务院的组织地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研究决定。”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结论,这一工作可以由人大或常委会按其自身的意愿来完成。根据其他条款的内容,此处有另外的意思。也就是国务院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而在人大休会期间由常委会确定。我们认为,宪法中应该这样表述。

第 48 条的第 2 项指出,“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提出建议”,连接词“或”应该替换为“和”。同时指出就哪些问题提出建议也是适当的。

第 50 条应该被分为单独的两条。第 5 项内容以前的前半部分最好移入“国家制度”一章中,而第 5 条的第 5 项内容保留不变,作为单独的一条。

第 54 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应该指出地方人民政府由谁选出或任命。

宪法草案的第 61 条应该准确一些。

该条应该指出,在民族自治区的自治过程中主要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形式。我们觉得宪法草案第 61 条的前半部分最好修改为:“民族自治区自我管理机构活动的具体形式既应该符合该自治民族的利益,也应该符合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利益。”

这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宪法草案的第 64 条中,不应该以特别的法庭来代替专门的法庭。如果在该条中使

用“专门的法庭”，那么这一概念将概括工业、运输业领域的法庭和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等所有法庭，“专门的法庭”这一概念包含特别的法庭。苏联宪法的第102页在谈到专门的法庭的时候就指出，这也指军事法庭，是苏联专门法庭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宪法草案中的第75条对法官独立原则的确定不够准确。其中没有指出法官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独立于什么样的地方性权力机关。该条的阐述应该与苏联宪法第117页的内容、波兰宪法第56页的内容、匈牙利宪法第44页的内容、罗马尼亚宪法第76页的内容相接近。

在第77条最好写上“全体公民”，而不单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79条应该作一些补充，应该指出，该条中规定的一些权利保障劳动人民及其组织享有出版、印刷的权利和使用公共建筑物的权利等。

第81条在列举一些自由的同时还应该规定“住宅不可侵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的最后，我们建议作如下修改：“背叛祖国应该被作为一项最严重的罪行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宪法草案没有把国家各机构颁布法律的制度明确确定下来。比如，根据宪法草案，如下机构有权发布命令：(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 国务院；(3) 部长；(4) 地方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地方权力机构一样，也是有权做出决议的。

为了法律的合理性，正如苏联的宪法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也应该载明和确定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发布的法令的名称，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是，常务委员会颁布法律；国务院颁布决议和命令；部长下达命令和指示；地方政府通过决议。

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Л. Ф. 柯妮娜

A. E. 卢涅夫

1954年3月20日

手写批注：

未提交。

这份初稿是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法律委员会的苏联法律问题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这份稿件没有转交给中国同志，被大使馆认定已放弃。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6，л. 103－110

№13015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记录：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

（1954 年 3 月 26 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 年 3 月 31 日

绝　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4 年 3 月 26 日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谈到关于召集中国共产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共中央会面，研究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同时向他透露了苏斯洛夫同志信中的内容。我对这两件事情分别做了会谈纪要。

在有关上述问题的讨论结束之后，我正要离开，毛让我再待一会儿，他希望像同志那样跟我谈谈。在我先前对中国的几次访问中，我们也经常这样交谈。

一、他说他在杭州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疗养。在休假的最后三五天里，他常去爬山。毛泽东说："在我外出时，他们开始向外散播我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的谣言，有人说我得了肺结核，还有人说我有心脏病。他们还谣传说，我过世之后，高岗会接替我的职位。不过，你可以看到，我健康得很，离死还差得远呢。"

接着这一话题，他开始谈到高岗。毛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老觉得党内外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就像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前一样，觉察到这儿震动一下，那儿震动一下，但就是不知道震中在哪里。在去年的 6—7 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财经问题的会议上，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不久，在 1953 年 7—9 月间，我强烈地感觉到党内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另一个却隐而不现。震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剧烈。12 月 24 日在政治局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事情变得明晰起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震动都是从哪儿而来的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震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毛对我详细描述了"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他告诉我说，在 2 月份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之后，组织了两个委员会，工作了两个星期，最终澄清了大量的事实。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事实是高岗和饶漱石都曾被逮捕过。他们履历中的某些部分以前很含混不清，但是现在清楚一些了。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很不检点的人。他有很多女人，其中有几个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想弄清高岗究竟和帝国主义者有无联系。很多揭露高岗个人生活的有价值的材料都是他的秘书们提供的。

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在因贝利亚一事飞往莫斯科并返回之后，变得异常活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苏共中央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即宣扬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和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另一事件也很典型，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高岗没有回家，而是立即赶到各省来京出差的党员干部下榻的北京饭店，并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采用了这一策略来进行其秘密活动：声称拥护毛泽东和林彪，但是首先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毛说："当然，这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某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党的团结的问题。"我说，这是分裂分子通常采取的战术，因为他们无力公开反对毛泽东。毛回答说，正是因为分裂分子借他的名义欺骗了很多同志，他才要迅速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否则"党派斗争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党内迅速蔓延"。高岗事件暴露之后，绝大多数党员能正确理解党中央的行动，但有些同志会责怪中央的行动稍微迟缓了一些。接着，毛半开玩笑地说，是毛泽东提议让高岗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提名他当中央政府副主席的。现在同志们一方面通过了处理高岗事件的各种办法，一方面询问中央为什么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件事。毛回答说，显然是因为他自己瞎了眼。于是同志们又问道，既然你眼瞎了，怎么还能工作呢。对此毛回答说，他现在又复明了。在这方面，毛注意到自己在去年年底心情很不好。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有助于中共中央找到一个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恰当方式。那时他怀疑高岗在进行反党活动，但还不是很确定，这是他在与高岗交往时保持警惕的原因。我说，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杭州会议时，当你要求把贝利亚一事通报给政治局成员，却没有提到高岗。毛说，那时中央还没有把事情完全搞清楚。起初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后来决定必须召开一次全会。毛说，他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因为这些都有利于形势的好转。目前不断有关于高岗的新材料揭露出来，很多细节得到了澄清。最后的决定将会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我引用列宁的话说，当一个党清除了自己内部的敌人后，它就巩固了自己，目前中共正是处于一个巩固自己的时期。毛说，这并不排除以后还会出现党内分裂分子的可能性。我回答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阶级斗争，即使在党内也是如此。毛泽东说，外表看来党的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其内部并不一定是这样。

后来，提到高岗是科瓦廖夫的朋友，毛问我是否看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看过，但是斯大林同志跟我说过。毛泽东说，这封信在他的手里，他说会给我看，其中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高岗暗示的。信的大意是除了高岗，党中央没有一个好同志。当然，在高岗说中共中央的某些委员有亲美倾向，其他一些委员则有反苏意图时，他是在企图误导科瓦廖夫。很明显，高岗心怀叵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毛问科瓦廖夫现在在哪里工作，我说，我曾听说他原来是个铁路工作人员，后来投身政治，我不太清楚他的情况。他在中国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参加谈话的师哲说，他现在可能是煤炭部的副部长。）

二、然后，毛泽东对我谈到了中央的组织工作。他告诉我，目前他很少处理日常事务，而是交给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去处理。这些同志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会向他征求意见。这样的话，一方面提高了每一位中央委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己能抽出精力来

研究和准备最重要的问题和决定。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工作的方式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毛评论说:“在杭州的最后两个月,我干的事情远比在北京被日常杂务缠住时要多。”毛泽东说,在那段时间他编写了以下文件:(1)关于中共党中央工作的一个文件;(2)在中央2月中央全会上关于党的团结的一个决议;(3)周恩来关于高岗事件的一篇文章;(4)有关中央2月中央全会的新闻稿;(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毛接着说,最近中央开始推行一种新的做法,毛或者政治局其他委员起草的文件可以交给一些中央委员会领导同志联合审议。这种工作方法效果很好,也得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赞同。毛继续评论组织工作,并笑着说:“我们已经把中央的年轻同志放到了第一线,我退居第二线。这就像打仗的时候,如果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居于第二线的同志就会冲上前来坚持战斗。”……①

АВПРФ,ф.06,оп.13а,п.39,д.227,л.1-5

№14582

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朝鲜的国家统一和全民选举问题

(1954年4月②)

关于恢复朝鲜民族统一和举行朝鲜全民选举的问题③

一、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1. 在朝鲜人民自由意愿的基础上举行全民选举和召集国民大会,并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

2. 为了筹备朝鲜国民大会,举行自由的全民选举,采取果断措施促进南北朝鲜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将成立由南北朝鲜代表组成的全民委员会,其中代表均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大会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自己选举产生。

3. 必须事先强调的是,该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起草全民选举法,以便选民能够在自由意愿、没有外国干预、地方政府和地域性集团的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选举,从而确

① 所收集的档案原文至此中断。——编注
②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标注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③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既无作者,也没有时间,估计是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可参见以上№14580文件。——编注

保选举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4. 为了恢复朝鲜经济，提高朝鲜人民的福利水平，保护和发展朝鲜民族文化，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实现朝鲜的民族统一而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确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具体包括：贸易、财经结算、交通、边境关系的处理、通信往来、文化和科技交流，等等。

二、必须承认，所有外国军队在6个月期限内全部撤出朝鲜领土。

三、所有那些关心和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的相关国家，都应当承认和确保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之创造条件，以促进朝鲜和平统一问题的尽快解决，为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努力。

АВПРФ, ф. 06, оп. 13, п. 69, д. 5, л. 13-20

№21409

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年4月7日)

致M.A.苏斯洛夫同志：

我们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发送给你。

A. ……①(签名)

A. 高尔基(签名)

1954年4月7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提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俄语文本中包含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一些条款的叙述不够明确，编排得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许多问题看起来是由于翻译的质量不行，因此没有必要局限于对个别条款的编排和不够准确性提出意见，或许，这是由于翻译的质量造成的。在就宪法的实质提出建议的同时，必须指出草案中那些编排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会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歪曲宪法的意义。

我们认为,宪法草案非常完整,基本上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其国家机构的结构和权限,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第一,总的意见。

1. 宪法草案的第一章实际上阐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地位。因此这一章的名称不应是“总纲”,而用“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政治制度”的名称更合适一些,正如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一样。

第 18 条由于没有宪法条例的一般性质,应该被纳入第三章中,并替换该章中的第 88 条。

2. 宪法草案第二章的名字应该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据此,草案第一章的第 2 条(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应该被放到第二章的第 5 节“民族自治区”,并且作为这一节的开头。

3. 宪法草案中,应该更加明确地确定和限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详细地阐述其中一些机构的权限,以便在对这些机构权限进行界定的条款中消除其含糊不清和一些明显的矛盾。

宪法草案应该更加准确地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履行的那些职能。在宪法草案的第 41 条中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把总理候选人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条中也应该更加明确地说明,只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才有权任命和罢免总理以及其他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职务。

宪法草案还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立法权在他们之间是如何分配的。第 22 条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行使立法权的机构。同时,第 36 条的第 4 项内容指出,常务委员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法令”。

鉴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根据第 36 条的第 4 项条款,常务委员会有权颁布立法文件,并在随后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据此,应该从第 22 条中删除“唯一”一词。

更为合理的修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每年召开一届会议。

为了精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并避免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职能的重复,或许应当把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合并,可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4. 根据宪法草案的第 35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秘书处秘书长以及常务委员会委员。根据这一条以及第 26 条中的第 3 项内容、第 41 条中的第 6 项内容以及其他的条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的职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能由一人担任。

5. 第 41 条中的第 6 项内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但是宪

法草案中没有指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它的权限是什么，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国家机构具有什么样的效力。

6. 宪法草案的第二章被分为6节，包含了宪法草案98条内容中的56条。宪法草案的其他3章中没有被划分出小节。为了简化宪法草案的结构或许应该把这些节改为单独的章。

第二，对宪法草案一些条款的意见。

第3条。指出“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点最好删除，因为在随后的一些条款中具体地确定了这一原则的内容。

第6条。该条指出，国有成分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该条应该指出，以大型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大银行等为代表的主要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也就是属于人民所有。

该条中有一些不甚成熟的表述：“自然资源由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开发”。“开发”一词可以用其他词替换，比如替换为“使用”。

第7条。该条指出，劳动人民部分集体所有制是个体农民全民所有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不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所有制形式不是一种组织。

第8条和第9条。应该删除“根据法律”的词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本身就以立法的形式把相关的法令固定了下来。

第10条。“所有制”一词最好换为“所有制形式”。

该条指出，国家禁止资本家“盗窃国家财产”。以这种表述提出的要求是不能被作为法律准则的内容的。

第21条。在“权力”一词的前面加上“国家”一词(草案中其他相应的地方也应该作此修改)。

第23条。在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的时候，“建立”一词应该替换为“组成”一词。

第23条中的第1项内容最好以如下形式阐述：“各省人民代表大会按如下准则选举省人大代表：每80万人选举一名人大代表，但是每个省不少于3名人大代表。”

第24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职期限，应该阐述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行使权力的期限，因为代表的任职期限是由相应选举机构行使权力的期限确定的。

宪法草案中关于地方权力机构行使权限的期限的相关条款必须作这样的修改。

该条款的第二部分应该准确一些，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能够做出关于推迟举行选举的决议。

第26条。应该去掉“职能”一词，因为这一词是“职权”和“权限”的术语所不能替换的，这实际上谈的就是这一条。因此本条的开头建议以如下方式叙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 修改和通过法律”等等。对其他确定国家机构权限的条款也应该作类似的修改。

该条第3项内容的表述不能使人明白，谈论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的哪个机构。

该条的第6项内容应该谈论的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选举，而不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

成员的选举。对第 65 条也必须作这样的修改,该条谈论的是关于地方人民法院成员的选举。

考虑到,根据第 25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届会议,对行政领土的划分的变更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做出,随后由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变更。

第 29 条。该条应该删除。可以在宪法草案的第 26 条(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或任命)指出,全国人大有权罢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第 33 条。该条应该修改为:"全国人大代表不能未经全国人大的同意,而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不能未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同意就被审判或逮捕。"

宪法中未必必须指出关于对"当场抓捕"的人大代表采取措施这个问题。

第 36 条。该条中应该删除的内容是,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发挥自己的功能,因为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常委会也能发挥自己的许多功能。

至于常委会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发挥的功能,应该指出,这些功能只是该条第 4、5 和 8 项内容中阐述的功能。

此外,在第 36 条中还必须规定,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常委会可以组建新的部以及中央其他管理机构,并在随后把这些问题递交全国人大会议批准。

第 43 条。从该条的文本中还不能清楚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在岗位的时候,他的哪些职权可以由副主席行使。

第 48 条。该条的第 2 项指出,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应该确定一下,这指的是立法方面的建议,以及关于国家管理方面的建议。在涉及到其他机构的相关条款中也应作类似的修改。

该条的第 5 项必须指出,国务院可以撤销下级机构做出的决议,其条件是,这些决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关于第二章的第四部分。该部分没有确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形式。如果指的是,地方人大的工作形式是召开会议,那么在宪法中就应该指明这一点,或许还要尽量就每年召开的地方人大会议的人数做出规定。

第 61 条。该条的文本应该更为准确一些,应该指出,民族自治区的自我管理机构的具体形式指的是什么。

也必须确定,在民族自治区的哪些自我管理机构中每个民族都必须有自己的代表,是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还是在地方人民政府中?

第 63 条。该条的第一句话或许应该删除,因为第 60 条的第二部分已经包含了其内容。

第 62 条的第二部分指出,各民族都可以自由地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留或改变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该部分内容非常重要,应该分出列为特别的一条。

第 63 条。在该条中或许应该指出,民族自治区(省、区或县)的自我管理机构制定关于本自治区(省、区或县)的法律并递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讨论,该条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不应该把这一问题同这些自我管理机构履行自己的职能联系起来。

第73条。该条的表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察机构对违法犯罪的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该条应该作另外的表述，应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机构对相关的国家机构严格履行法律的规定进行监督，同时对相关负责人和个别公民进行监督。

A. ……①(签名)

A. 高尔基(签名)

1954年4月7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6，л. 111－118

№21411

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年4月7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发送给你。

K. 戈尔舍宁(签名)

1954年4月7日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草案的基础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该宪法草案也反映了中国在1949—1953年期间的立法。

同现行的法律文件相比，宪法草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包含了一些重大的新的条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成就提供了条件。

宪法草案包含了一些纲领性的条款，为中国近期的发展指明了前景。

---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现行的宪法文件中没有包含的比较重大的新的条款是：

1. 宪法草案明确确定了，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表述了中国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前言，以及草案的第 4 条)。

2. 草案中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新任务：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言)。

3. 草案以另外几种方式确定了中国国家制度的阶级成分。

如果说，迄今为止共同纲领中仍然规定，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行使中国的国家权力，那么宪法草案中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第 1 条)。

已经不再指出国家权力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4. 宪法草案强调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的原则，而民族问题不是通过联邦的形式，而是通过建立民族自治区的途径来解决(第 2 条，第 59—63 条)。

在 1949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口号，直至国家的分离，但是无论是在共同纲领中，还是在宪法草案中都已经不再提这一点了。

5. 宪法草案反映了国民经济中的国有成分要优先发展(第 6 条)，但是现在提出的却是在中国所有国民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中，国有经济成分的领导作用。

6. 宪法草案中首次确定了国家对矿藏、河流、森林和大块荒地的所有权(第 6 条)。宪法草案同时也巩固了现行的、农民根据 1950 年通过的相关的土地改革法得到的土地所有权。

7. 以另一种方式确定了对富农经济的政策。

宪法草案指出，国家对富农剥削制度的政策是对其进行限制并逐步消灭(第 8 条)，但是现在没有采取措施对富农经济进行限制，更不要说消灭富农经济了。

8. 宪法草案中也包含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活动进行限制的内容(第 10 条，禁止投机，限制对工业或商业某部门进行垄断，禁止从事危害社会利益、破坏国家经济和国家经济计划的其他活动)。

9. 宪法草案规定，如果必要的话，并且涉及社会利益的时候，国家可以征用、没收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的生产资料，甚至把其收归国有。

10. 现在推行的政策是对对外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施监督，取代这一政策的是，宪法草案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第 15 条)。

11. 对国家最高政府机构的结构进行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条款以及其拥有的非常大的权力(第 26 条、第 41 条等)，这些条款在以往是没有的。

根据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对国家的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确定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取代现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行政委员会。

引人关注的是，国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中没有设立部级机构，对全国的军事活动进行管理。

中国没有设立军事部或国防部，取而代之的是设立了国防委员会。

12. 对于中国的领土行政体系，宪法草案也有了一些变化(第50条)。

宪法草案设立了四级(中央、省、县、乡镇)取代了现有的七级(中央、大行政区、省、边区、县、区和乡镇)划分，这意味着撤销了大行政区、边区和地区。

13. 国家权力机构的选举还不是全面的选举、不是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

14. 同现有的关于法院系统的组织和活动的立法相比，宪法草案做出了重大的修改。

首先提出了所有的法院自下而上进行选举，让人民评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确立了被告辩护的权利。

人民法院的选举将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但是迄今为止法官仍是任命的。

15. 提出了检察院机构进行集权的原则，确定其在履行自己职能时的独立(第75条)。

最近检察院仍然根据双重从属的原则进行建设，并且从属于地方人民政府。

16. 宪法草案首次列出了特别的一章(第三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详细的阐释。

在公民的各项权利中，首次确立了劳动权、休息权、在由于年迈、生病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在公民的义务中，引人关注的是提出了公民保护国家财产的义务、缴纳赋税的义务，以及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应当指出，无论是现有的立法，还是宪法草案都没有提出在中国实行全面的义务兵役制。

1949年的共同纲领只是指出“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服兵役的制度”。

(二)

应当注意的是，需要对宪法草案作如下补充和修改：

1. 宪法草案的前言部分谈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应该强调说“目前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此时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在国家的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把中国变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 草案的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把其改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较为妥当，因为就其内容来说，本章包含的条款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说明。

3. 第1条应当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保留该条中的其余内容。

应该指出，中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在宪法中的反映是中国人民摆脱了多年以来国外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了胜利。

4. 第7条的内容指出,在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成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和劳动农民部分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鉴于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不存在诸如“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样的社会经济范畴,中国的宪法草案中使用这样的概念未必合适。

任何一个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中也没有使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一概念。

5. 第19条是关于对反革命活动给予镇压,惩处反革命分子,如果能够强调,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依据法律进行的就更加妥当了。

该条中也应该指出,剥夺政治权利只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6. 第20条确定了阶级成分和武装力量的任务,出于政治的需要,应该指出,“中国的武装力量保护公民从事和平的劳动和自由”。

7. 应该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引入了共和国主席制,在实质上也就是总统制(宪法草案的第二章对此作了规定)。

如果说在中国确立主席制应该被承认是必要的,那么,从宪法草案的第41条对其规定的诸多职能来看,应该把第3项内容删除,该项阐述的是共和国主席的如下权力:“任命和罢免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因为这些职务都是选举产生的。

第43条也应该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其部分权限由副主席履行。

应该指出这部分权限,或者省去这一点,或者具体指出,这些权限指的是什么。

8. 宪法草案规定(第41条),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召集最高国务会议,但是,最高国务会议是个什么机构,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它拥有哪些权力和权限。

非常必要的是,诸如最高国务会议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成员组成,其法律地位应该在宪法中规定下来。

9. 应该消除第51条中的一些矛盾,该条指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地方权力机构,而同时指出它是管理机构。

较为妥当的表述是,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地方人民政府是执行和管理机构。

10. 宪法草案中有许多条款涉及到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这些内容被分为不同的章(第一章,第19条;第二章,第23、34、52条等)。

较为合理的是,在宪法草案中划出专门的一章“选举程序”,把涉及到国家权力建设中一些重要领域的所有准则都集中到一起。

11. 宪法草案的第73条需要准确一些,因为其中指出,监察机构对违法犯罪活动实施监督,较为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监察机构有义务对国家各机构、负责人和公民严格地遵纪守法实施监督,并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第75条应该准确一些,应该指出,监察机构在履行自己职能的时候独立于地方权力

机构。

12. 宪法草案的第26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总检察官的准则，这一点没有必要。

选举这些负责人不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权限，而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权限。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6, л. 122 - 130

№21406

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

（1954年4月13日）

致M. A.苏斯洛夫同志：

我把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准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俄译本发送给您。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年4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54年3月23日提供）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今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了赞同并已提交给了立法委员会进行审核。在今年6月，宪法草案将被公布供全国人民讨论，1954年9月，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这部宪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在今年3月中旬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提供了由中共中

① 这是经苏方修改过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略去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文中标出了一些修改的地方。——编注

央委员会审议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请求尤金同志和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法学家担任顾问,对宪法草案提出意见。

根据尤金同志的报告,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3月26日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新版本,该版本在苏联法律工作者所提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同志同时还通知尤金同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希望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中国宪法草案提出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基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宪法草案还考虑到了1949年之后通过的其他一些最为重要的法律,同时,同现行的法律文件相比,该宪法草案还包含了一些新的条款,这些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成就的条件。

就其类型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事实上不同于现行的苏联宪法。如果说苏联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对事实上已经得到的和取得的成就固定了下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包含了一些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前景的纲领性条款。

如果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中国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做出任何指示,那么该宪法草案则直接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打算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国家的一些主要任务,该宪法草案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认为,总的来说该宪法草案非常完整,从总体上正确地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其国家机构的体系和权限,同时也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由四章和前言组成。

草案的前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成果、对国内各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新民主的实质和过渡时期形成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简短的描述。前言的最后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关于这一问题宪法草案的论述是:"我国已经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起了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友谊。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发展日新月异。为了崇高的世界和平的目的以及人类的进步,我国将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这种友谊,并且将根据权利平等和互惠原则同那些拥护和平以及对我国友好的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宪法草案的第一章"总纲"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实质进行了描述。

该宪法草案对国家阶级实质的描述与共同纲领中的描述有所不同。共同纲领中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宪法草案则没有提到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民主力量。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宪法草案中对统一战线的作用的描述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共同纲领指

出，人民民主战线行使国家权力，那么在宪法草案中，人民民主战线的作用被确定如下："统一的人民民主战线将在我国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是动员全国人民完成我国过渡时期任务的工具。"

宪法草案的第一章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以下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宪法草案的第七条指出，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根据宪法草案中指出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就要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关于今后中国经济不同成分的发展问题。共同纲领只是指出，国有经济起领导作用。宪法草案则强调，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优先发展，国有经济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宪法草案也指出，国家将鼓励并致力于发展合作社经济，认为合作社生产的发展是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小生产者进行改造的主要途径。同时，国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其他的财产，使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将在生产上给农民以帮助。

现行法律没有对富农经济的发展做出限制。宪法草案规定，"国家对富农所有制推行的政策是逐步予以消除"。

宪法草案宣布，"矿产、河流、森林、大块荒地"都是人民的财产。根据农业改革法，中国的土地属于那些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宪法草案则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根据法律"强行赎买、征用城市和农村中的土地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

宪法草案也确定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正如第10条所规定的，国家根据法律保护民族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国家禁止资本垄断、投机以及资本家从事其他危害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行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政策是为了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资本转变为国家资本，并逐渐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10条的上述规定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同时该条还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如下：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利国利民的积极成分和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成分和消极作用。"同第10条所列举的上述内容相比，这种表述实质上没有规定任何新的东西。这种表述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致可能导致对国家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产生错误的解释。

在对外贸易领域宪法草案也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在中国的共同纲领中，对外贸易的基础是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宪法草案则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对国内贸易予以管理。

中国共产党还适时提出了实施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在现行的中共党章的纲领部分提出了实行联邦制的要求。但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既没有提到民族自决权，也没有提到实行联邦制。

宪法草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禁止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禁止民族分裂活动。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

关于这个问题,从宪法草案可以看出,民族自治的行政单位可以是乡镇、县、区、省和自治区。自治区和自治省、区和县的管理机构除了拥有地方权力机构的共同职能之外,还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制定自治政策和单独的执行政策,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宪法草案中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结构也作了重大修改。现在中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国家行政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其功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履行。

宪法草案规定的国家权力机构如下:(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3)国务院;(4)最高国务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也是唯一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常务委员会并对其负责,常务委员会履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日常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功能基本上与现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功能是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务院,是最高的国家管理机构,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间要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就其功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与现行的国家行政委员会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中国政府机构新的组成成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

根据宪法草案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权力和权限的性质来说,这一制度的确立意味着等同于在中国实行主席(总统)制。宪法草案的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行使如下功能:(1)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和法令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2)任命和撤换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及副部长、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3)颁布大赦和特赦法令;(4)颁布国家处于军事状态的命令,宣布处于战争状态,颁布动员法令。

尽管宪法草案规定,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的基础上实现这些功能,但事实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生效的时间都由主席决定。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一些职能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些职能的区别还不够明确。

宪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召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其他负责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但是,最高国务会议的功能和权限在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

宪法草案简化了现行的中国行政划分,现行的中国行政划分是:包含几个省的大行政区,以及省、边区、县、地区和乡镇。宪法草案规定了四种类型的行政划分:中央、省、县和乡镇;而对那些实行民族自治的省来说划分为五类:中央、省、自治区、县和乡镇。

根据宪法草案,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而地方性的国家管理机构是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由于地方人民政府以及这些政府的主席和副主席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宪法草案中做出如下规定未必是适宜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有权任命和罢免地方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宪法草案中包含了一些新的关于司法机构的内容。取代现行法官任命程序的是确立了通过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法官的制度。规定了法官的独立原则，只能依据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查机构建立在双重从属的基础上，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它不仅要依赖于上级检察机构，而且还要依赖于地方人民政府。宪法草案则规定了建立集权的检查体系，确定了检察机构对地方政权的独立性。

与苏联宪法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规定全面的服兵役的义务，授予国务院每年在一定的地区征召公民参军的权力。宪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没有列出单独的一章或一节来对选举制度做出规定。这些问题在宪法草案的各章中都有所反映。

宪法草案第19、23、52和第79条中规定的选举制度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中规定的选举制度有明显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确定的是多级选举制，而不是直接选举制，也没就进行秘密选举做出规定。关于选举代表的名额和选举的程序宪法草案中也没有做出规定，而是由选举法做出规定。

宪法草案规定，海外华侨也可以被选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就需要在国外组织选举，这在事实上很难实现。

年满18岁的所有中国公民，无论其民族和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些依据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或被限制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宪法草案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依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政治权利"。

与苏联宪法和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没有规定国家同宗教相分离。宪法草案中只是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

应该说，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条款不甚清楚，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比如，第74条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指出，检察机构"有权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公民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第5条中的"所有制"一词用"所有制形式"来表述更为正确一些。或许，这些不当的表述是由于翻译的错误。

我们认为，可以向中共中央作如下通报：

1.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愿，苏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正确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并从法律上把这些成就固定了下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确定及其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的确定是非常充分的和正确的。

2. 如果中共中央认为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希望能够对如下问题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宪法草案规定,年满18岁的所有中国公民,无论其民族和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宪法草案没有对选举权进行全面的规定。或许在宪法中应该对选举权做出全面的规定,特别是要强调,对一些剥削阶级的代表政治权利的剥夺具有临时性。

(2) 宪法草案的第10条就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进行了正确的规定。同时,在我们看来,这一条在表述上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即"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为: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计民生的积极成份和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成份和消极作用"。或许这一表述应该准确一些。

(3) 为了预防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工作中的重复,最好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能做出更加严格的界定,同时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和权限做出更加严格的界定。

(4) 应该注意,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么在宪法草案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任命和罢免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自治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第41条,第3项)是否合适?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6,л. 62-97

№21410

鲁坚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

(1954年4月1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M. A. 苏斯洛夫同志:

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归还给你,同时把我对该草案的修改意见提供给你。

附2页文本。

P. 鲁坚科[①]

1954年4月14日

---

① P. A. 鲁金科,时任苏联总检察长。——编注

附件：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法律的履行将进行什么样的监督，在对宪法草案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

宪法草案第36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实行实施监督”。但是没有指出，它将借助于那些特别的机构实施这种监督。

宪法草案规定，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并设立总检察长的职务。但是检察院在对法律(如果不是翻译的问题的话)进行监督问题上的作用是不明确的。

第73条指出，监察机构“对政府、政府负责人和公民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监督”。很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正确的(如果翻译准确的话)。检察院不能对犯罪活动“进行监督”，而是通过对犯人判刑产生的警示作用，来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同样，检察院也不能对一些机构、负责人和个别公民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而是采取措施消除这些违法活动。

因此，在论述检察院的功能的时候，应该指出，它们的功能是对所有机构、负责人和个别公民对法律的履行实施监督(或者对法律进行监督)。

苏联宪法对检察院的监督做出了规定，也规定了检察院对严格履行法律实施最高的监督(苏联宪法第113页)。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宪法草案不使用这些术语。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它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建立严格集中的检察机构，对全国法律的严格履行实施监督非常重要，因此这一检查机构应该对法律实施最高的监督。这些都将强调对法律进行监督的功能，强调在国家、集体和其他的组织中贯彻遵纪守法的任务，其他的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也不例外。同样，常委会对检察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

P. 鲁坚科

1954年4月14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6, л. 119－121

№2141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关于中国宪法草案的结论

（1954 年 4 月 14 日）

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苏联外交部准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结论递交给您，该宪法草案是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今年 3 月 23 日交给我们的。

经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最新翻译文本已经在 4 月 12 日交给您。①

B.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 年 4 月 14 日
第 128BK 号

副　本
第 1655BK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结论

一、对宪法草案以及主要条款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草案的基础是 1949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宪法草案的制定中也考虑到了 1951 年通过的关于民族自治区国家权力机构建设的规章制度，1953 年的选举法。该宪法草案反映了 1949—1954 年期间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

此外，宪法草案中还包含了一些主要的新条款，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提出的一些具有纲领性的任务。

引人注目的是宪法草案中的如下条款：

1. 宪法草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如果说，在 1949 年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曾承认，需要就中国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① 原文如此。以上№21406 文件显示，经过修改的俄文本宪法草案是 13 日提交的。——编注

做出一些指示(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同志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到过)，那么，由于人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宪法草案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宪法草案的前言)。

宪法草案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新的主要任务，这些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2. 由于宪法草案指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就要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关于中国不同的经济成分在今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共同纲领规定，所有的社会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应该得到发展，而国有经济成分的作用只是对其他各种经济成分起领导作用，而宪法草案强调的则是国有经济成分的优先发展(第 6 条)。

如果说现在只是对私营企业、对工人和职员的剥削作了一些限制，那么宪法草案则规定，逐步消灭各种人剥削人的制度(第 4 条)。

3. 以新的方式确定了对富农经济的政策。

1949—1950 年，中国的一些地区开始擅自采取措施限制甚至消灭富农经济，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批评了这种擅自行为，并且指出，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还为时过早。

宪法草案包含了一些新的条款(第 8 条)，其中指出，“国家对富农剥削制度的政策是对其进行限制，并逐步予以消灭”。

4. 宪法草案确认了 1950 年农业改革法的一些条款，即：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其转交给农民所有，同时，宪法草案规定，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把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第 12 条)。

宪法草案首次规定，矿产、水流、森林、大片荒地属于国家，由国家或集体组织受国家的委托开发，或者租给其他人开发(第 6 条)。

5.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阶级成分的确定问题上，宪法草案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所不同。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宪法草案在指出国家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同时，则没有再指出其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宪法草案第 1 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6. 在对外贸易领域的规定有了重大的变化。

共同纲领指出，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监管，但是宪法草案则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第 15 条)。

7. 宪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 3 条)。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是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

宪法中没有规定，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直至与国家相分离，尽管在 1949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权利，直至国家分离，其中包括，这一点被 1931 年通过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固定下来。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宪法草案中没有什么不同于1949年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内容。

8. 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把中国统一的人民民主战线保留下来,用其作为"把全国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武器,来完成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前言)。

9. 宪法草案中保留了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代表的政治权利进行限制的规定(第19条),这一点在1949年就已经做出了规定(这一限制大概涉及2%—3%的选民)。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选举制度(第19、23、52条)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中规定的选举制度截然不同。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选举权尚不是全面的。从城市和农村居民中选举国家权力机构代表的名额还没有通过法律和宪法固定下来。没有规定进行秘密选举。

中国选举制度的特点在国民党的宪法中也有所表现,也允许一些海外华侨作为特别代表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3条)。这就需要在国外主权国家的领土上组织选举,这在实际上很难办到。

10. 宪法草案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组织的规定有了重大变化。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是:(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 中央人民政府;(3) 国家行政委员会。

取代这些的是,宪法草案规定:(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4) 国务院;(5) 最高国务会议。

宪法草案规定,在国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赋予其职能的性质来说是"从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日常工作的机构"(第35条),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现行的中央人民政府。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取代国家行政委员会的国务院的职能与早先存在的机构的职能几乎没有区别。

因此,中国政府机构组成的新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

11. 根据宪法草案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权力和权限,这一制度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主席(总统)制。

正如上述所述,根据第35条,宪法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从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日常工作的机构"。与此同时,宪法草案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做出了规定,就其职权来说,这一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类似于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一些职能的重复。

根据宪法草案第41条和其他条款的规定,授予主席的一些权限也是属于其他一些机构的职权。

比如,第41条(第16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全国人大决议的基础上任命和撤换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各部部长和副部长以及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但是,第26条第5项规定,国务院总理候选人以及国务院的组成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根据第29条的规定,撤换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其他成

员也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拥有的一些职权与全国人大的一些职权是重复的。这不符合宪法草案第21条规定的原则，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颁布立法文件，颁布大赦和特赦的命令，颁布处于军事状态的命令，以及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第41条第1、4、5项规定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置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上，因为，实际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令和做出的决议的生效的时间都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41条的第3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任命和罢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自治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但是，根据第51条，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第41条的第3项内容同第51条相矛盾。

必须注意到，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设立了总统。波兰曾在很长的时间内设立了独立的总统，根据1952年宪法，以集体的机构——国家委员会取而代之。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除了拥有广泛的权限之外，根据第41条的规定，还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还对国家的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建立类似部的从属于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最高的军事管理机构，关于这一点宪法草案中没有规定。迄今为止代替这一机构的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宪法草案规定组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领导的国防军事委员会。

现行的共同纲领也没有规定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根据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情况下召集最高国务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的人员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的负责人，尽管宪法草案没有对这一机构的权力和权限进行准确的规定(第41条，第6项)。

13. 宪法草案简化了中国现行的行政领土体系。迄今为止，中国的行政领土划分包括七个部分(中央、大行政区、省、边区、县、区和乡镇)，取代这七个部分的是，宪法草案中规定了5个部分(中央、省、自治区、县和乡镇)。

14. 宪法草案首次规定，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自己的代表对其选举产生并对其进行监督的机构负责，向其报告自己的工作。宪法草案也规定了撤换当选的代表的权力(第53条)。

15. 关于法院和检察院今后的民主化，宪法草案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内容。比如，宪法草案规定，法官通过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替现行的对法官进行任命的制度(第59条)。宪法草案宣布了法官的独立原则，规定其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只能依据法律(第71条)。

宪法草案还确定了被告辩护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

16. 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机构建立在双重从属的基础上，并且在行使自己职责的时候不仅依赖于上级监察机构，而且还依赖于地方人民政府。宪法草案提出了检察院进行集权建设，并且宣布了监察机构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独立于地方政府(第76条)。

17.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草案特别列出了第三章(第78—94条)。

该章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新的权利,这些权利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以及在1950—1954年颁布的其他立法文件中都是没有的。宪法草案对公民的新的权利的规定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劳动权;休息权;在年迈、生病或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教育权;上诉的权利。

宪法草案强调,国家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第89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一个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在国外生活着1 000多万中国人。

宪法草案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其中包括:保护社会财产的义务;纳税的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义务;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

18. 正如以前的宪法文件性一样,宪法草案没有直接规定实行全面服兵役的制度,尽管指出,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的职责。1949年的共同纲领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指出,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兵役制"。

二、结论和建议

宪法草案从总体上考虑到了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建设的经验,指出了今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可以作为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予以讨论和通过。

可以提出一些需要准确和进行修改的地方。

1. 第7条未必需要把个别的合作社经济成分评定为"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中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尽管这些宪法中有关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有完全社会化的合作社的概念。

2. 宣布实行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以及更加突出对选举权进行临时性的限制,或许会使人们忽视中国同邻国朝鲜和蒙古的不同。

3. 第41—44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使主席的职权如此之大,这需要仔细考虑考虑,需要更加准确地界定其同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和职权。

4. 关于地方权力机构的一些条款需要准确一些。

关于地方权力机构的第四部分,没有指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同地方人民政府职权的区别。第51条和第57条谈论的是关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职权是一样的,同时,地方人民政府从属于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

5. 根据宪法草案的精神和意义,由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是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应该把第41条,地方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任命和罢免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范围之内。

或许不能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人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因为他们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只能批准他们的任命。

6. 宪法草案中的个别条款需要准确一些。

(1) 让人不清楚的是,根据第48条第2项内容,国务院就什么性质的建议,或者就哪些问题提交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审议。

(2) 第74条需要准确一些,因为检查机构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它们对法律的遵

守情况进行监督，并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3）第80条没有指出对自由和民主的保障，但是苏联宪法的重心正是放在对自由的保障问题上。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也是这样。

（4）应当注意的是，宪法草案中缺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条款。或许在第2条中应该谈到这个问题。

（5）第95条和96条谈论的是关于国徽和国旗，其中必须准确说明，五角星指的是什么。

1954年4月14日

第311号

手写批注：

归档。

请把这份文件归入1954年3月23日的第9478号机密文件。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5月8日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131－145

№14581

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

（1954年4月15日）

机　密

1954年4月15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五大国会议的问题

（情况报告）

1月25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外交部长会议在柏林开幕。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以下问题：

1. 关于缓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和召集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等五国外长会议。

2. 德国问题和确保欧洲安全的任务。

3. 关于奥地利国家条约。

在会议上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极力回避讨论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坚持要求此次柏林会议只限于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关于会议的议事日程经过了两天的协商,最终苏联代表团所提议的议事日程还是被与会者采纳。不过,对此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他们接受了苏联代表团所提议的议事日程,并不表明自己同意了日程中诸条款的表述方式及其具体内容。

在坚决要求讨论会议议事日程问题的同时,苏联代表团还提出如下建议,即召集有中国参加的世界五大强国外交部长会议是一个早就应该做的事,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所有世界强国只有齐心协力并联合其他国家,才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里,苏联代表团又指出:联合国安理会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而根据联合国宪章之规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安理会的所有重大决定均应当在法、英、美、苏、中——五大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做出。

苏联代表团指出,目前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上述最重要的条款无法得以履行,原因在于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中国人民政府无法以代表的身份进入联合国。由于一个国家——美国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无法恢复自己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当前,显而易见,这种不正常的、错误的做法已是如此地无法让人容忍了。

苏联代表团还指出了当前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问题,如大规模裁军(尤其是裁减各世界强国的军队);通过相关决议以禁止生产核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对此实施有效的国际监督,其中作为禁止此类武器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求各国政府放弃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苏联代表团再次强调,解决包括恢复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权利在内的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的重大意义。因为此举对今后解决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

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国注意,目前已经有25个大小不同的国家(包括近10亿人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或正在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一个独立的亚洲国家没有与中国建立政治上的联系,或者至少,不希望调整与中国的政治或经济关系。很多欧洲国家,其中包括那些隶属于北约的国家在内,也都承认有必要与新中国建立外交联系。

时至今日,只是在南、北美洲区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下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但关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无需过多解释也会一目了然。苏联政府认为这一状况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苏联代表团声称,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将会大大地有助于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和健康发展。

杜勒斯首先发言反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他老调重弹式地继续就朝鲜战争问题对中国提出指责并称其之为“侵略者”。他还以美国人在朝鲜的损失数据——15万人伤亡——作为论据。

杜勒斯声称,美国不同意出席有中国参加的旨在讨论国际和平问题的五国会议。不过,

他也补充道，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并不拒绝与新中国探讨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和在朝鲜板门店召开的政治会议上进行谈判。在继续反对召集五国会议的同时，杜勒斯极力试图将该会议描绘为似乎是五大国打算借此来领导世界其他国家。

针对杜勒斯的攻讦和对联合国通过的所谓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的引证，苏联代表团回击道，苏联政府继续坚持本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提出的观点，即联合国通过的所谓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错误的、不真实的，这个决议只能对联合国的威望造成损害。

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朝鲜战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ЩЦР[①]的帮助下才得以停止的。正是由于周恩来和金日成于1953年3月底发表了讲话之后，朝鲜战争才得以结束，美、英、中、朝等国的士兵才得以返回祖国。苏联代表团指出，我们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该国在巩固世界和平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杜勒斯在1月27日的发言中再次声称，美国拒绝召开五国会议的建议。他援引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放弃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的决议，并坚持认为柏林四国会议只能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杜勒斯强调，在解决朝鲜的政治问题和签订朝鲜停战协议之时才有必要召集此类五国会议。在反对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其他问题的同时，杜勒斯也表示可以在联合国或者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方式进行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杜勒斯建议，本次会议“不对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做出任何决议，而直接转入讨论第二、三项议题，即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等问题”。

虽然与杜勒斯不同，皮杜尔声称，自己根据联合国宪章之规定承认五大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但也重复了杜勒斯的基本观点，即这些大国“在管理世界方面并不拥有特权”。关于中国参加五国会议的问题，皮杜尔认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建立联系或进行谈判，但他反对现在就召集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皮杜尔提出的理由似乎是中国政府“帮助并导致了印度支那战争的久拖不决”，因此“在印度支那的情况未发生变化和中国没有改变自己既定的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之前，法国政府不打算讨论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他补充道，如果(印度支那)情况发生变化，那么法国政府将会“根据新情况”对已有国际形势做出决策。

在重复了法国以往的不拒绝“保持接触和联系”的对华政策的同时，皮杜尔又强调，在亚洲有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朝鲜问题；其二，东南亚问题。皮杜尔声称，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在板门店的谈判；至于第二个——印度支那问题，他认为也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这一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协商的解决方式也适用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皮杜尔补充道，他本人并不拒绝讨论和采用其他可能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并引证说，在这方面至今我们还未曾尝试过使用外交手段。

对于上述问题，艾登的立场可归结如下：重复杜勒斯的基本观点，即此次会谈必须“从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入手”。他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之规定，即解决和平问题并非五大国的特权。艾登强调，当前亚洲的问题(包括朝鲜和印度支那等问题在内)是导致“世界局势紧张

① 原文如此。疑为俄文打印错误，按照内容这里应该是CCCP(苏联)。——编注

和诸多不安全因素的主要根源”。他重复了美国人凭空提出的所谓“缺乏证据”的论断,即无法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会协助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等亚洲问题的诚意。

关于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将在五大国会议上讨论各国裁减军队和禁止军备竞赛的声明,艾登声称,自己认为这一问题最好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讨论。

在指出上述三国代表对召集五国会议的提案提出反对意见和附加条件的做法不合情理的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上述三人杜勒斯、艾登,尤其是皮杜尔,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均在自己的发言中对召集五国会议附加了多种限制和条件。对此,苏联代表团再次强调,在召集五国会议时既应参考上述三人的意见,同时也要考虑到会议讨论内容不能只局限于亚洲问题,即它应当讨论当前对世界和平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其他国际问题。

在1月28日的讨论过程中,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等人再次试图否定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有利于召集五国会议的证据。为达此目的,杜勒斯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认为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似乎是打算将联合国的所有重要职能都转交由五国会议承担,并以五国会议替代联合国组织。杜勒斯继续发表了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敌视性言论,并对周恩来本人提出了指责。最终,在未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提出任何建议的情况下,杜勒斯便要求开始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

皮杜尔在发言中继续对召集五国会议的合理性问题表示了“疑虑”,并对中国“侵略印度支那”提出谴责。皮杜尔反对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关于裁减武器问题的讨论,并论证说此类问题本应由联合国负责解决。皮杜尔声称,“在世界各地仍存在着战争”的情况下讨论关于裁减武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政府不希望在当前条件和形势下让中国参与五国会议并讨论关于国际贸易发展的问题。关于禁止与中国贸易皮杜尔的解释是:法国人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商品,以便后者可能利用这些商品来反对分布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当然,“如果中国将改变自己的以往立场,法国也会重新考虑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皮杜尔声称,法国政府准备利用任何机会以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和方式结束本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和恢复那里的和平。皮杜尔试图对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作一小结,他说,虽然与会者的立场彼此差异较大,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根本无法协调。

艾登继续表示反对召集五国会议,并援引说举行如此大型的会议是没有“先例”的。他认为,不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与大国有关的实际问题”,其讨论都不应当采取召开五大国会议的方式,因为这些国际问题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利益,不应在有限的只有几个国家参加的会议上来讨论。艾登表示,应当解决亚洲所存在的政治问题(如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等),并寻求策略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建议将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个问题暂且搁置一段时间,而先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因为各方仍需要一些时间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和交换意见”,尔后再重新讨论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

作为答复,苏联代表团指出,上述三人的论断都是不合情理的。后者的意思是:似乎苏联的建议是想以五国会议来取代联合国。苏联代表团声称,苏联坚守联合国宪章,并始终致力于它的真正实现。苏联之所以提出召集五国会议的建议,也是援引了联合国1948年第三

次大会和1950年第五次大会对各大国所发出的特别倡议，即各强国应当以集体或其他方式集会，以便对那些可能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和对联合国工作造成阻碍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从而达到消除分歧和相互妥协的目的。另外，苏联代表团也注意到，西方强国经常会召集三国外长会议，并且不限制此类会议的议事日程。

针对上述三人提出的关于裁军问题是联合国的职能范围，苏联代表团则以1952年5月美、英、法三国向裁军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确定和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的军队数量的建议作为证据，并指出这充分说明上述三国是承认大国在裁军问题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的。苏联代表团还提请与会者注意，在上述美、英、法三国建议中除了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数量作了限定，也对五大国的军队数量作了协议性的规定。

针对杜勒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和攻击，苏联代表团声称，如果中国代表参加了此类会议，那它就必然会对杜勒斯所说的话做出应有的答复。因此后者所发表的此类攻击性言论，纯属无的放矢，既有失公正，也不足为信。苏联代表团还指出，杜勒斯对中国所提出的指责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因为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资料都是源自国民党。苏联代表团声称：中国并不是侵略者，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失误、不足和别人所犯的错误负责。如果说，中国有必要对某些人提出指责，或受了委屈，那倒是确有其事，因为它的确受到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公正待遇。后者的不齿做法与苏联与中国之间在平等、相互承认权利的那种友好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代表团提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可能在这样的意义上达成基本的一致，即与会者对召集五国会议持不反对态度，虽然召开此类会议的目标尚未达到共识。

杜勒斯表示反对这一结论，并声称“美国不同意召集有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的建议”，虽然美国并不反对与中国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因为后者并不属于五国会议的性质。

皮杜尔赞成以“谈判原则”来解决亚洲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认为关于此类谈判的性质、谈判的参加者和所要讨论的问题仍需作进一步的协商。对此，他又再次重申必须“确保(对方)在谈判开始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苏联代表团指出，看来既然与会者都希望继续通过协商方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我们对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事情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参加本次会议的四国外长将根据相关委员会的报告再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讨论。针对苏联代表团的这一提议，杜勒斯、皮杜尔和艾登先后表示，他们不愿意接受关于委员会的决定，但准备近期内四国外长在小范围内举行会面以讨论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点内容。苏联代表团保留了关于在此类会议期间再次提出关于建立上述委员会的问题的权利。

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还建议召集关于全面裁军的世界性会议(该建议内容已提前向中国政府作了相关通报)。

在1月29日的会议上，杜勒斯企图拒绝讨论苏联提出的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建议，并提议讨论德国。

作为回应，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者注意裁军问题的严重性，并表示如果其他三国代表不对苏联的这一建议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么就让人难以理解。

杜勒斯以召集此类会议的问题已在联合国作过相关决议为由,坚持会议转入讨论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严重问题”。

皮杜尔提议在会议间隙讨论“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并将美、英、法以前向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委员会提交的提案作为该草案的基础。所有这些提案都包括在已签署的联合国文件:“关于全面性裁军的纲领性协议”;“确保国际监督,只为国家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安全保留必要的军队”,等等。该草案还包括如下内容:要求无条件禁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地谴责一切帮助和支持侵略的活动等。草案建议,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组成的裁军委员会就裁军的一系列主要原则达成一致,以便“在适当条件下根据联合国大会1952年1月11日相关决议有可能召开一次成功的全面的裁军会议”。

在将自己提出的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草案与苏联代表团的建议性提案相互比较之后,皮杜尔建议,自己所提出的草案将与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近期由四国部长举行的特别会议更小范围内进行讨论。

艾登表示不同意接受苏联代表团的提议,理由如下:“裁军的进程”主要受国际紧张局势的强弱和国际间互信的恢复程度而定。在支持皮杜尔的提议——将法国的提案在部长会议小范围内讨论的同时,艾登坚持要求开始讨论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建议将上述两个提案——苏联的和法国的——都交由小范围内召开的会议上审议。这一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同意。

此次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苏方提出的关于减轻国际紧张局势和召集五大国会议等问题。会议进程表明,西方强国一方面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建议,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政治和策略角度出发认为直接拒绝这一建议会对自己不利。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9,д. 107,л. 8-20

№09863

尤金致库兹涅佐夫报告:中国请求在反宣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4年4月15日)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库兹涅佐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国请求苏联在中国同

“美国之音”、“联合国军之声”和国民党广播电台所进行的反动广播宣传作斗争中给予技术援助。

备忘录是由伍修权同志于1954年4月3日交给瓦西科夫同志的。

附正文3页,存档2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尤金

附件:

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一、根据我国广播事业局报告,“美国之音”及台湾匪帮对我国的反动宣传通过无线电台正在不断地加强。现在在北京用普通五灯收音机接收,可以收听“美国之音”、“联合国军之声”及台湾匪帮的广播共35个频率,计“美国之音”3个中波频率,13个短波频率;“联合国军之声”4个中波频率,2个短波频率;“联合国”无线电台3个短波频率;台湾匪帮广播4个中波频率,6个短波频率。“美国之音”和台湾匪帮的无线电广播,不仅进行无耻的造谣诬蔑,并用以指挥潜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二、我国广播事业局为了干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已在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济南、厦门、武汉、广州、福州等14个城市设立了小型干扰台,以200余部干扰机对中波波段的“美国之音”和台湾匪帮的反动宣传进行干扰。但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小发射台电力太弱,收效甚微,沿海地区利用无线电晶体收音机即可收听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短波方面,同样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

三、鉴于同上述有危害性的反动广播宣传进行斗争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必须在沿海地区有重点地建立干扰台,用以干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并应采取其他可能的措施。中国方面在对反动广播宣传的斗争方面非常缺乏经验,故请求苏联政府考虑在同反动广播宣传的斗争中给予我们技术援助的可能性。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4,д. 52,л. 22－25

№08809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派人到苏联考察边防工作

(1954 年 5 月 11 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同志的请求，我报告：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接待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10 人)前来考察国家边界守卫的组织、检查站工作制度、边防军实施侦察的原则以及其他边防勤务问题。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请审阅。

苏联内务部部长

C. 克鲁格洛夫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派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8 名工作人员，2 名翻译)前来苏联学习边防勤务组织经验的请求。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负责接待，安排住宿和饮食，给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守卫工作人员小组介绍国家边界的守卫组织、检查站工作制度、边防军实施侦察的原则以及其他边防勤务问题。

三、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来苏有关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50，л. 359－360

№25152

戈杜诺夫与姚仲明会谈纪要：缅甸政治运动状况

（1954 年 6 月 15 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呈此件介绍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 Д. А. 戈杜诺夫同志与中国驻缅甸特任全权大使姚仲明的会谈记录。会谈于 1954 年 6 月 15 日举行。

附上述文件——归档，第 1479/ЮВА 号；第三份文本，其中 9 页机密和 24 页非机密；仅送本人。

K. 诺维科夫（签名）

第 2 - зи 号

第一份交本人，第二份归档

第 737/ЮВА 号

1954 年 7 月 24 日

附件：

摘自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 Д. А. 戈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4 年 7 月 24 日

机 密

第 226 号

同中国驻缅甸特命全权大使姚仲明于 1956 年 6 月 15 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会谈纪要

姚仲明在会谈时简要地讲述了缅甸人民民主运动的状况，以及从缅甸共产党领导人的角度谈了有关领导运动的情况。

姚仲明说，众所周知，随着 1942 年日本人占领缅甸后，那时还颇具影响力的德钦党[1]的领导人与日本人妥协并合作，以图彻底结束英国人在缅甸的殖民统治。日本人进入缅甸之

① 德钦党，亦称"我缅人党"，正式名为"我缅人协会"，1930 年 5 月由缅甸抗英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组织。德钦，意为"主人"。——编注

前，有多达30名德钦党人从缅甸逃往中国，但在半路上被日本人截获，并送往东京"学习"。这些人里有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昂山将军、波儒昂(Бо Жму Аунг)上校、波塞(Бо Сэ)少校、波昂显雅(Бо Аунг Зейя)少校(现在是缅甸共产党最具权威的军事专家)等等。所有这些在日本受过训练后的德钦党人与入侵这个国家的日本军队同时来到了缅甸，并在最初阶段就与日本占领者进行了合作。

但是占领缅甸的日本人用新的方式对缅甸人进行压迫和掠夺，比英国殖民统治更为残酷。

结果，所有激进党都与德钦党人一起开始召集力量与日本占领者斗争。

大约在1941年，德钦党和缅甸其他政党及团体中更为激进的人首次成立了缅甸共产党，该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组织民众与日本占领者作斗争。这样的组织成立后，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和组织一起加入了它的队伍。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民众团体：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АФЛНО)，里面有不下10个不同的政党和团体(左派、温和派、右派)。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任务是与日本法西斯作斗争并解放缅甸。

……①

昂山支持所有改良主义政党和团体，他们是力求坚持在社会改革范围内的运动。

德钦丹东支持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是竭力要扩大运动，并以在缅甸建立人民民族共和国为目标。

最初支持共产党的是当时著名的党的领导人和进步运动活动家吴登佩敏(目前他是缅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当时吴登佩敏在缅甸共产党主管财务，并支持德钦丹东的政治方针。缅甸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德钦梭还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阶段就犯了左倾性质的错误，造成党内领导人之间的裂痕。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存在分裂的随后几年里，对于缅甸运动和斗争性质问题，共产党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更趋明显，这些都加剧了缅甸共产党的内部斗争。

德钦丹东和吴登佩敏认为，可以继续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合作，直到他们耗尽自身革命的可能性并将自己暴露在广大民众面前。

德钦梭不同意这样的论点，更倾向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决裂，将缅甸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以组织反对他们的斗争。

可是德钦丹东和吴登佩敏不赞成德钦梭的观点，缅甸共产党领导层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当时领导缅甸共产党活动的印度共产党，本身在其实际工作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结果是无法及时的、详细的分析……

……

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后来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改良主义错误，非常严厉地做了

① 该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一段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以省略号标示，下同。——编注

自我批评。1942—1943年间，在一系列会议和与党内同志的私人谈话时，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说“如果我犯了错，就批评我”，但不可能将党的领导权转交给德钦梭，因为他工作一贯采用领袖至上主义。

至于吴登佩敏，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针对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继续为自己进行辩解。

缅甸共产党在运动领导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德钦梭在党内拉帮结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缅甸共产党同样的一个共产党——“红旗党”。同时，他指责德钦丹东，说后者维护“白旗党”的利益。从此以后，仍与德钦丹东在一起的部分缅甸共产党党员开始被称为“白旗党”，以示与“红旗党”的区别。

在如何对待国内运动和对待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问题上，缅甸共产党内部的最终分裂发生在1946年，即德钦丹东和缅甸共产党党内的拥护者继续坚持仍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合作，为的是能最终揭露同盟的领导人背叛缅甸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并将他们吸引到缅甸共产党这边来。

德钦梭的拥护者要求马上拒绝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并与该组织展开公开的斗争。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人知道这些后，通过了将缅甸共产党开除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决定，并付诸实行。德钦丹东深信，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路线方针将危害人民民主运动，他带领缅甸共产党脱离了当时还领导缅甸劳动者统一民族阵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

1952—1953年间，在“白色左派”……分支基础上创建了第一个政党——人民同志党，该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对国内运动的领导和立场。

如果缅甸共产党在退出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而后又能增强自己的势力，在日益增加的危险面前重新真正的联合起来，从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下走出来，后者就无法掌握住国内的政权。

还能解释这一点的是，广泛的民族运动在1946—1947年极大地破坏了英国人在缅甸的统治和影响，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人对他们的控制却还刚刚建立。

仅仅是因为英国走狗1947年7月19日在仰光的暗杀行为，结果昂山将军(那时他开始倾向缅甸共产党方面展开民主主义运动)和剩下的6名执行委员会领导人(政府成员)在总督在场的情况下，在国会大楼里被杀害了，国内的局势对劳动大众方面来说急剧恶化。

在这项针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阴谋之后，来了以德钦努(现在是总理吴努)为首的英国走狗和英国人，这样就掌握了对缅甸行政的控制。

在最后的三四年里，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在缅甸加强了活动，削弱了这种控制，以致缅甸政府的部分成员拒绝与英国接触，越来越倾向与美国巩固关系(吴觉迎等人)。

大家都知道，1947年德钦努当时在印度签署了协议。这是英国人强加于缅甸的有关承

认缅甸的债务和有关军事、航空和航海的代表团驻留缅甸等协议。

吴努向英国人投降的消息引起了所有正直的缅甸人心中强烈抗议。缅甸共产党利用这样的局面,向人们发出……

……

缅甸共产党领导人查明吴登佩敏已成为叛徒,并转为政府服务。他参与对缅甸共产党的造谣诽谤,但做得很隐蔽,可有时却公开拥护缅甸共产党和国内的进步力量。

至于德钦丹东,在缅甸对他的评价,他就是一位严肃的、颇具影响力的和训练有素的缅甸共产党领导人。在缅甸共产党党内和缅甸广大劳苦大众眼里,他被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目前他正率领缅甸的共产党员和劳苦大众与右翼社会主义政府作斗争,领导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解放区的建设,尽管在最近几年有所减少。

如果说吴登佩敏喜欢写更多不同的文章和论文,如果说德钦梭喜欢对运动大肆议论和写"有思想性"的文章,那么,德钦丹东就是更喜欢在党和运动中做实际工作。

话题回到缅甸各派势力在运动中的历史时,姚仲明说,从 1948 年开始的国内战争最初阶段,尽管缅甸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分裂,但它的势力和影响都颇具规模。

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缅甸共产党任命德钦丹东为党主席。党的机构从这时开始由中央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德钦丹东在上述委员会中占据领导地位。进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有:丹妙(Тан Мьяйнг)将军、显雅(Зейя)、赛义津(Сейн Тин)、梭貌(Со Маунг)、尧东(Йо Хтут)等人。中央组织委员会中有:丹妙、德钦丹东、波尧东(Во Йо Тун)等人。

……

由于力量分散,缅甸共产党党内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分裂,对运动缺乏统一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以及缅甸共产党策略上的一系列错误和民众的疲倦,民族运动的势力到了这个阶段渐渐地脱离了党的原则,慢慢地放弃了参加斗争和运动,而无可挽回地继续衰弱下去。

缅甸共产党与"红旗党"之间相互的斗争、与人民志愿者组织的领导和起义运动中的克伦族人、克钦族人、孟族人……和其他民族派别缺乏实际有效的沟通,这些都削弱了整个为击溃反动势力和创建真正的缅甸人民民主政府的革命势头。

民族解放运动这样的局势大约一直持续到 1952 年的中期,这时的缅甸共产党、"红旗党"和民族志愿者团体的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党必须团结,以及必须要共同指挥和行政上领导解放区和经济基地的组织。

众所周知,1952 年 3 个政党的领导人为此目的召开了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关联合自己所有的力量(党的、军事的、行政上的和经济上的力量)为积极展开反对右翼社会主义政府斗争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决议才过了差不多 2 年,各进步力量却并没有真正联合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没有产生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到最后时期这些党的队伍都分散了,只能在形成有利于敌人的情况下冒着危险和恐惧孤立地进行游击战。

缅甸右翼社会主义政府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解放区进行围剿,缩小其

地域。政府竭力将这些革命队伍驱赶入缺少粮食、群众基础和经济条件很差并且人烟稀少的山区。这导致近来一些零散队伍和起义者团体，甚至缅甸共产党著名的高级人员——郭克朗貌(Ко Кланг Маунг)等人——投降的事件时有发生。

……

会谈结束时，对于缅甸共产党领导在组织民族民主统一阵线各派力量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府作斗争方面的失败，姚仲明将其主要原因归结如下：

当运动在军事、政治和管理方面力求有效的统一行动而发现面临分裂的危险时，缅甸共产党至今还在犯严重的错误。此外，每个领导人都在竭力亲自继续对“自己”的党和运动进行领导，以使自己能在人民民主运动历史上留名。

每个领导人竭力将党和运动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下，自身一点不具备谦虚和勇气为了共同的革命任务甘愿服从其他领导，将自己分散的队伍服从于统一的军事指挥，正是这些使民族大众的运动注定无所作为和遭受可能的失败。这些“忘却”了人民民族运动结果的党领导人置个人的成就高于一切，并因此给整个缅甸大众的人民民主运动带来了无法消除的危害。

三个党派的委员会放着实际的、同心合力的工作不做，而是经常在会议上分析自己在运动中犯过的错误，至今没能明白，如果他们现在还不集中自己的努力，不停止分析过去的错误，他们就可能遭受重大的失败，并导致民族民主统一阵线的整个运动走向崩溃。

……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使用的是中文。

结论：

根据中国大使姚仲明通报的情况，以及苏联大使馆通过官方定期刊物和文件的着重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缅甸共产党目前的情况令人深感担忧，需要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方面与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共同尽快采取协助、建议和帮助的措施。

对此事宜的做法是，尽快在云南(中国)某地组织安排非正式会见，邀请缅甸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德钦丹东、德钦梭等人)，听取他们有关缅甸共产党内部事件的情况，坚决建议缅甸共产党停止党内的意见分歧，采取措施动员所有的力量开展人民民主运动，并以此避免革命队伍的失败，防止党和缅甸整个进步运动面临失败的状况。缅甸共产党的失败和民族民主统一阵线(ЕНДФ)的运动可能将缅甸从一个“中立”国家转变为公开协助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的国家。

备注：会谈时附送有缅甸北部缅甸共产党政治局的简要报告，此报告在今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并刊登在亲美的反动英文报《民族报》(Найци)上(今年6月16、17、18、19日)，该报纸在仰光出版，通常消息很灵通。苏联大使馆不怀疑这份报告的存在。至于对报告中一系列情况的评论，可以认为是报纸编辑故意所为。报告中对政府不利的章节被修饰或完全删掉，同时……

但全面评论这份报告可以看到，缅甸共产党政治局的情况……并要求采取组织措施以使党的队伍健全起来和加强群众工作。

附件共24页,非机密。①

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

Д. 戈杜诺夫(签名)

打印5份:第一份送部长会议;第二、三份送东南亚司;第四份送图加里诺夫同志;第五份归档

第216号

经办:戈杜诺夫

打印:叶戈罗娃

1954年6月22日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资料已在我处工作中使用。

处长……②

9月26日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245,л. 21－30

№09931

佐林致谢罗夫函:苏联是否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活动

(1954年6月17日)

绝 密

文本第2份

第074/ДВ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И. А. 谢罗夫同志:

据苏联驻阿勒泰③领事卡瓦列罗夫同志报告,领事馆工作人员别洛夫同志得到指

① 该附件未翻译。——编注

② 手写人名,无法辨认。——编注

③ 俄文原文 Шара-Сумэ,系维吾尔语发音。该地1910年设承化县,1954年改为阿勒泰县。——编注

示：恢复无线电台活动，而不必在中国当局登记。您知道，中国政府1950年曾声明，苏联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进行任何侦察活动。有鉴于此，请告知苏联外交部，现在是否确实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的工作，苏联外交部如何向中国当局解释此事。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佐林(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4，д. 53，л. 155

№09929

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

(1954年6月28日)

发文第1/4748号

机　密

第1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A. 佐林同志：

复1954年5月21日第791/ДВ号文。

苏联驻乌鲁木齐市总领事馆在1953年的总结报告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工作一节中，正确地指出了在领导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严重缺点以及违反平等原则和该公司某些苏联领导人不正确对待中方领导人的事实。

现将外贸部就改进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活动、消除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以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在报告中指出的其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报您。

1954年1月，派E. 沃斯克列先斯基同志去担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今年2月，派了公司总会计师和8名主任会计师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整顿会计工作，今年头5个月，共

派遣了79人到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出差,其中会计人员20人,矿山地质专家14人,选矿工程师4人,电器机械部门工程师16人。

为了帮助选矿厂和电厂实际完成安装工程,今年2月向喀什矿务局派遣了专家小组,在他们的帮助下,安装工程已经结束,选矿厂和电厂已于今年4月投产。

今年3月,苏联国外财产总局生产处因公在中国出差的几名工程师与公司和公司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一起,对公司企业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了检查,并且制订了1954年改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的措施。

为了改善各公司企业工地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基本建设计划规定1954年拨出1 629亿元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其中为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拨款427亿元,为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拨款1 202亿元。

1954年4月,外贸部部委会听取了苏中石油公司和苏中金属公司的工作报告。按照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根据部委会会议对该问题的讨论结果,我们起草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两中苏股份公司生产和财务工作的报告以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4—1957年两公司今后发展前景的决议草案,并且指出了克服公司工作中严重缺点的实际措施。

今年5月24日,我们派了以总局副局长什马科夫同志为首的专家小组赴华,与中方研究公司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初步商定公司的发展前景,采取措施克服股份公司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

此外,我已于5月指示这两个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涅列京同志和沃斯克列先斯基同志采取相应的措施,今年不得发生过去存在的那种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并将苏方机密公文的办理工作转移到苏驻乌鲁木齐领事馆或商务代表处分部。

Я. 尤申①

ЦХСД, ф. 5, оп. 4, д. 136, л. 156 - 157

① 尤申,苏联国外资金器材物资总局官员。——编注

№09930

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

(1954 年 7 月 5 日)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发文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第 1007/ДВ 号

致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С. Н. 卡赞斯基同志：

复 1954 年 3 月 21 日第 45 号电。

据苏联国外资金器材物资总局(尤申同志)通报，外贸部已就改善两股份公司工作、消除违反平等原则现象以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在 1953 年报告中指出的其他问题采取了必要措施。

1954 年 1 月，已派沃斯列先斯基同志去担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1954 年 2 月，又派总会计师和 8 名主任会计师赴苏中金属公司，今年头 5 个月，共派遣了 79 人到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出差，其中会计人员 20 人，矿山地质专家 14 人，选矿工程师 4 人，电器机械部门工程师 16 人。

1954 年 3 月，苏联国外财产总局生产处因公在中国出差的几名工程师与公司和公司下属企业领导人一起，对公司企业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了检查，并且制订了 1954 年改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的措施。

为了改善各公司企业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基本建设计划规定 1954 年拨出 1 629 亿元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其中为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拨款 247 亿元①，为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拨款 1 202 亿元。

今年 5 月 24 日，以总局副局长什马科夫同志为首的专家小组已赴华，与中方研究公司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初步商定公司的发展前景，采取措施克服股份公司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此外，已指示两公司总经理将苏方机密公文的办理工作转移到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或商务代表处分部。

---

① 原文如此。笔误，应为 427，参见以上№09929 文件。——编注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 费德林

ЦХСД,ф. 5,оп. 4,д. 136,л. 158-159

№21415

阿尔希波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关于中国的农业状况

（1954 年 6 月 30 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1954 年 6 月 30 日
第 518 号

机　密

致苏共中央书记
H. C. 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您的委托兹向您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现状。

附上述内容共 21 页(非机密)。

仅发给收件人。

苏联驻中国专家组组长
И. 阿尔希波夫(签名)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中国现有耕地约 1.05 亿公顷；估计，国内可以用于耕种和农业生产的土地共计约 2 亿公顷。但要开发新土地，便需要国家大量投资。

据最新资料，国内现有农户 1.134 亿，农业人口 4.936 亿，其中近半数拥有劳动能力。

国内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拥有约0.21公顷耕地，而拥有的尚未开发的土地量大致也是这样。中国各区域人均土地数量差异很大(参见下表：中国各地区农业人口、耕地、未开发土地面积和现有耕地人均数量)。

……①

在中国农业部工作的苏联农业专家小组由4人组成，其中一名农艺师、两名机械工程师和一名高级顾问——农艺畜牧学家。

该小组近期的任务：

研究中国增加耕地，开发生、熟荒地等相关问题。

帮助中国专家采取相应措施以优化灌溉土地的使用、提高灌区农业产量、防治土壤盐碱化和水资源的正确利用。

研究和总结中国先进农业经验，帮助农户广泛采用新的、先进农艺技术；深耕、土壤秋耕管理、新农业机械。

作物密植、农业良种遴选和培育。

作物适时护理、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农家肥的积累、正确保存和使用。

参与制定和实施畜牧业发展举措——引进绵羊人工授精，建立牲畜交配站和畜牧兽医站，组建饲料基地，采取兽医预防措施。

总结国家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经验，帮助农业机关组建一批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并改善其工作；在大型国营农场推广轮作制、农业新工作法和新型农业机械。

研究和总结各种农民联合的农业形式工作经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方面帮助中国朋友，采用先进农艺技术。

在国内农业科学的组织方面予以帮助，充分利用科学机构来提高农业。

苏联驻中国专家组负责人

И.阿尔希波夫(签名)

苏联驻中国高级农业顾问

П.巴列京(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53－74

---

① 以下数页列举了大量有关中国农业的统计数字，略去未译。——编注

№13016

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1954 年 7 月 5 日)

摘自 B. B. 瓦西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4 年 8 月 27 日

绝　密

今晚 7 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我通知他说，苏共中央认为，利用法国有利形势的发展来找到一个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在这次接触中，(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将在 7 月 7 日抵达日内瓦，计划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会见(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我还通知他，苏共中央的意见是，如果周恩来同志能在 7 月 10 日之前到达日内瓦，那将是很好的。我还告诉他，通过苏联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馆，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将得到通知，B. M. 莫洛托夫将在 7 月 10 日之前抵达日内瓦，以便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休息几天。

毛泽东说，他认为我们利用法国正在改善的形势来寻求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是绝对正确的。同时，他告诉我，周恩来正在柳州(广西省)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武元甲进行磋商，这次磋商在 7 月 5 日应该有个结果。情况好的话，周恩来可能不早于 7 月 6 日或 7 日回到北京，他可能在 7 月 9 日或 10 日从北京飞抵莫斯科，这样，他实际上只能在 7 月 12 日或 13 日到达日内瓦。

随后，在谈话中，毛谈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近结束的会晤。毛说，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一篇从 7 月 3 日的《真理报》上翻译过来的针对这次会晤的文章。毛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正在关闭同苏联和其他民主阵营国家的谈判大门，然而英国政府却表示它赞成这些谈判。自诩为反共老兵并立下了功劳的丘吉尔，也仍然对美国人宣称他是赞成与共产主义者谈判，赞成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毛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显然，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就连像丘吉尔这样的保守反动人物也开始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交原则了。

至于美国，毛继续说，他们已在全球扩展了他们的势力，但是，如果发生重大的国际纠纷，对他来说也不好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试图借助他的侵略政策去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然而，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对美国政策的抵制，指望西德和日本对美国来说也是靠不住的。

在会谈期间，鉴于我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把周恩来 7 月 4 日从柳州发回来的电报交给了

我(我已经把译好的电报电传到莫斯科去了)。

这次谈话是在毛泽东的住所进行的，持续了30分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И. И. 萨夫罗诺夫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谈。

B. B. 瓦西科夫(临时代办)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79，д. 7，л. 69－70

№24880

贝内迪克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请求购买东北大麻种子

(1954年7月7日)

为了履行苏联部长会议在1952年1月12日做出的第1782号决议，苏联农业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俄罗斯中部大麻种植业中南方大麻的种植面积。1952年，南方大麻的种植面积是45 200公顷，1953年的种植面积是88 100公顷，而1954年的种植面积，根据预定的数据将近14万公顷。

苏联中部南方大麻种植的种子主要基地是北高加索以及乌克兰的敖德萨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科州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州。近年苏联的育种专家引进了能够快速生长的南方大麻品种。1953年和1954年南方大麻播种面积的扩大主要靠的是使用东北的大麻种子，这些种子来自中国，为的是进行试验。

正如1953年的经验所表明的，在土地返青时播种东北大麻使商品大麻的产量急剧增加，农民种植大麻的收入也急剧增长。比如，在苏联的白俄罗斯，种植东北大麻的比重在1953年是29%，农民完成了大麻收购计划的240%。在坦波夫州，在土地返青时播种的作物80%都是东北大麻，农民们完成了大麻收购计划的596%，而在往年，农民们出售的大麻不超过每公顷45公斤。主要的大麻种植区是库尔斯克州、奥尔洛夫州、奔萨州和高尔基州，摩尔多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这些地区的农民在1953年大面积种植了东北的大麻以及其他南方品种的大麻，并且超额完成了大麻的收购计划。

苏联农业部认为，应该在1955年把在土地返青时种植南方大麻的播种面积保持在1954年的水平，也就是种植14万公顷。

考虑到，预计1954年收购的南方大麻作物的种子只能保障1955年不超过5万公顷的

大麻播种面积,因此,苏联农业部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 9 000 吨大麻种子到苏联进行种植,所购种子从中国的北方省份收购,由日用工业消费品部在 1955 年 1—2 月提供。①

苏联农业部部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
1954 年 7 月 7 日

РГАЭ,ф. 4372,оп. 54,д. 925,л. 92 - 93

№09973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佐林函:阿勒泰市通讯事宜

(1954 年 7 月 8 日)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
1954 年 7 月 8 日
第 4395/с 号
对 1954 年 6 月 17 日第 074/ДВ 号文的回复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 А. 佐林同志:

在阿勒泰市及其附近的居民点上,分布着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各企业、商务代办处的一个分部及其他苏联代办机构,有 300 多名苏联公民在这些单位工作。由于阿勒泰与阿拉木图距离遥远(相距 1 000 多公里),并且缺乏良好的通信线路,我们驻在阿勒泰的工作人员与其

---

①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了苏联农业部提出的建议,但是就这些问题在 1954 年 7 月 17 日给米高扬的信件中指出:"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必须提请农业部注意,在 3 年的时间内,在土地返青时播种南方大麻仍要依赖进口的种子。必须责成农业部加强南方大麻的良种培养基地,保障 1956 年在土地返青时种植的南方大麻的种子都是国产的。"苏联部长会议管理处在给苏联农业部、对外贸易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信函中通报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就……问题提出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大麻种子的建议"(РГАЭ,ф. 4372,оп. 54,д. 925,л. 95 - 96)。——原注

在阿拉木图的上级联络十分困难。

鉴于上述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希望在阿勒泰市保留一部电台。根据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通报，苏联驻阿勒泰的领事也对该电台的工作表示关切。自1953年12月起，由于更换工作人员，电台曾经一度中断工作。

该电台我们已经使用了15年以上，有关机构对它的存在十分清楚。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当地登记此电台，并向中国同志宣布它恢复工作的时间。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①(签名)

1954年7月8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7, п. 384, д. 53, л. 160

№2075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

(1954年7月16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7月16日

机　密

莫洛托夫称，他想告知周恩来和范文同同志关于7月15日他同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谈的内容。

同艾登进行的会谈

莫洛托夫：在与我的交谈中，艾登说他还没能就我们(苏联、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对法方的宣言草案做出的修改进行仔细研究，但他想要给出如下初步意见：在宣言的文本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在艾登看来，它们应当分开并被分别谈及，因为这些国家各自面临的形势是不同的。艾登得到的答复是(这些国家)的确存在着差异，但同样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艾登强调,他认为给选举设定一个时间是十分困难的。

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即将军事问题从宣言草案中拿掉并将其移入到停战协定当中。

艾登接着说,老挝的代表向其抱怨,他们已经注意到最近以来向老挝境内转移人员和武器的加剧趋势并对此感到忧虑。我给予艾登的回应是,这件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老挝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同他们的会谈中并未谈及此事。

莫洛托夫:我告诉艾登,我们还没有收到来自法国代表团关于停战的草案宣言,并且法方给我们的是这份文件草案的一部分。艾登说,此事造成了一些延迟,而现在应当加快对文件的准备。

同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

莫洛托夫简要地叙述了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谈的内容,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选举,分界线以及撤离外国军队的期限。

莫洛托夫说,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的会谈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即法国只会同意在十六度线以北某处划定一条分界线。

莫洛托夫进一步描述了孟戴斯-弗朗斯关于举行一个三方代表会议(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和莫洛托夫)的建议以及他对该建议的反应。

莫洛托夫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恩来说,他同莫洛托夫的立场相同。此外,他认为接受孟戴斯-弗朗斯关于举行苏、法、英三国代表会议的建议是明智的。周恩来还补充说,我们不欢迎美国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坚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看起来并不合适。

范文同表示同意周恩来的观点。

莫洛托夫谈到了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反对在1955年6月前举行选举,并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是否应当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之前的立场,抑或在商谈中提出新的合适的建议。比如建议在1955年举行选举,或采取这样一种方案,即提议双方在1955年6月前解决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举行选举的时间问题。

周恩来表示,对于选举的日期问题,应当采取以下立场:坚持通过会议确定举行选举的一个时间,不要迟于1955年6月。如果这一建议遭到拒绝,那么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指出选举要在1955年举行。如果这一建议同样得不到采纳,那么作为最后的姿态,要坚持达成一个决议,即双方内部要确定在1955年6月前解决举行选举的日期问题。

范文同称同意周恩来的上述观点。

周恩来强调他将在与胡志明的一次会面中讨论有关举行选举的日期问题的细节。胡志明原则上同意周恩来提到的第三种选择,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解决选举的时间问题。

莫洛托夫随后询问,在今天同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范文同打算讨论什么问题。

范文同说他更愿意谈及关于印度支那的主要问题,首要的是选举和分界线。范文同补充说,他将根据我们之间交换的意见,坚持设定举行选举的确切时间,并在十六度线上确定

分界线。

周恩来说，在未来几天，我们将有可能就上面谈到的议题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不能忽视，这就是一个美国军事集团在东南亚的建立。周恩来强调，有理由怀疑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已就这个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某种协议。如果美国设法将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拖入一个军事集团，那么我们起草的有关阻止在这些国家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协议将失去我们所期望的重要意义。周恩来还说，在印度和日内瓦分别同尼赫鲁和艾登举行的会谈中，他强调不应当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并且这三个国家也不应被拖入任何军事同盟或集团。周恩来问道，范文同同志是否应当在与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谈及这一问题，并表达我们的立场。

莫洛托夫表示，他同意周恩来的观点，并说在与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的会谈中，我们应当向新闻界表明有关试图在东南亚建立军事集团的可靠传闻，并宣布我们反对这一集团。莫洛托夫问道，是否需要形成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

周恩来说，西方国家的代表将很难同意在任何特别文件中记述这些内容。

莫洛托夫说，关于在东南亚的军事集团的问题，应当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准备中的印度支那问题宣言文本的过程中提出。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英国正在采取积极措施，组织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①]的体系，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各国紧密联合的同盟。美国则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反对英国的方案。他们在新加坡五国同盟会议的基础上，主持建立了一个包括泰国、巴基斯坦、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但又不仅限于这五个国家的军事集团。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利用美英在这一做法上存在的分歧，反对在亚洲建立军事集团。

莫洛托夫和范文同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莫洛托夫询问，在就军队实行整编的时间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们)是否应当说明，法国军队从越南北部的撤出可以通过海路及铁路、公路共同完成。他强调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依据，坚持缩短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军队整编时间(380天)。

周恩来和范文同说，从整体情势上来看(缺乏良好的公路，部队食品供应的困难等)，敌军不可能从越南北部向南方转移。

周恩来接着说，在同莫洛托夫同志的会谈中，孟戴斯-弗朗斯可能会谈及从越南南部地区撤出法国军队的时间表问题。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希望提请莫洛托夫同志注意一个事实，法国指望在越南南部更久一点保留它的军队。周恩来说，这一推迟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法国在越南的存在可以成为美国人和保大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相互勾结的一个障碍。周恩来还说，当然，法国军队应当在南越大选举行前离开那个地方。

---

① 又称“罗加诺公约”，是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编注

这次会谈持续了3个半小时。

A. 列多夫斯基记录

АВПРФ,ф. 06,оп. 13а,д. 25,л. 8

№20750－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记录：印度支那问题

(1954年7月17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莫洛托夫询问范文同关于他同艾登和柬埔寨外长狄潘(Tep Phan)举行的会谈。

范文同说,在同艾登和柬埔寨代表的会谈中,他主要谈到了在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外国军事基地以及东南亚的军事集团问题。艾登和柬埔寨外长共同表示,美国应当没有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说,他们也不愿在自己的领土上出现外国军事基地。在回答有关美国人可能在东南亚策划涉及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集团的问题时,艾登和柬埔寨代表回应说,他们并不赞同美国人的做法,并且在未来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们补充说,如果这三个"相关国家"遭到侵略,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军事集团,艾登表示,美国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很长时间,因而将其拿到巴黎来讨论并没有什么新意。艾登补充说,上面提到的由美国人建立的集团大概只是防御性的。

范文同说,在同艾登和柬埔寨代表的会谈中,他对在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和在东南亚建立军事集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周恩来说,在刚刚收到的来自法方的草案宣言的新文本中,如同最初的版本一样,没有阻止在越南、老挝或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并且这一条款同样没有出现在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草拟文件中。

莫洛托夫说,有必要在这些草案中加入相应的变化。

莫洛托夫问道,今天我们应当讨论什么问题。

范文同说,在他看来,在分界线、选举以及军队整编、监督委员会的组成等许多其他重要

问题上，有必要就如何采取行动以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协议而交换相互之间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首先就有关我方立场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然后讨论已经准备完毕的文件文本。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宣读了主要文件以及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分界线，选举日期，监督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武器和武装人员在印度支那的撤离和派入，以及对于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设立外国军事基地和禁止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军事集团。莫洛托夫然后说，孟戴斯-弗朗斯在7月16日的私人会谈中暗示，政治代表应当讨论那些双方都有可能做出相互让步的主要问题。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上述七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有关分界线)问题，并让周恩来和范文同发表一下看法。

周恩来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法国代表团的一个代表吉耶尔马上校告诉王，法国代表团不可能同意共同使用九号公路，并想使其明白，法国将坚持把分界线划在这条公路以北。吉耶尔马还说法国代表团将坚持为在印度支那举行的选举设定一个更为遥远的期限，并给出了一个时间——两年。

莫洛托夫询问对于分界线问题我们最终将回归到什么立场上。

范文同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在九号公路问题上对法国做出让步，并同意将分界线划在这条公路以北某处。他还补充说，有必要要求法国在土伦(岘港)和顺化地区做出让步。范文同表示，孟戴斯-弗朗斯在早先曾暗示过做出这种让步的可能性。

莫洛托夫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法国在土伦(岘港)和顺化地区做出什么让步。

范文同回答说，他想要求法国不要在土伦地区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至于顺化，他还没有任何具体想法，并且(对这个问题)考虑很少。范文同接着表示，有必要要求同法国就设定一个在印度支那举行选举的具体日期达成协议，(作为交换)可以在分界线问题上表示让步。他还补充说，这一日期可以稍微延迟一些，但应当确定，从而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机会在民众中开展一定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表示，范文同关于分界线问题表明最终态度的建议，符合我方代表团接到的指示，而且(他们)也能够接受。关于土伦问题，周恩来表示，孟戴斯-弗朗斯在同他进行的交谈中，暗示了法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周恩来问莫洛托夫，基于他同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进行的会谈，我们能否指望在选举问题上实现某些目标。

莫洛托夫说，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谈了选举问题，并强调有必要为应当举行的选举明确一个具体时间。至于举行选举的确切日期，那么(我们)或许会建议应根据双方主管部门的协议，在当地加以确定。

周恩来和范文同同意莫洛托夫的建议。

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准备同意在九号公路以北设定分界线，那么，就有必要确定这条线。

范文同说，他将指示军事专家们去研究这个问题，并准备一个标注了上述分界线的合适地图。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在东南亚的军事集团问题，并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关于我方意图的看法。

周恩来建议，让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在他们的声明中明确表示，他们将不允许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并且不会参加任何军事同盟或集团。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在宣言的文本中加入一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关于不在其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且不会参加军事同盟的义务是可行的。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问题。

周恩来说，在 7 月 16 日同梅农(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梅农告诉他，法国倾向于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加拿大和波兰代表在内的监督委员会。梅农赞同这一选择，并对没有让巴基斯坦参加表示满意。周恩来接着说，他在同艾登进行的一次会谈中也谈及了法国的这一选择。艾登对该监督委员会的组成表示同意，但同时也表示英国不能主动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会让巴基斯坦方面产生不满。

莫洛托夫说，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最好还是坚持我们三国代表团先前的立场。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周恩来建议就委员会的活动范围达成一个协议。他说，如同中越方面所建议的那样，法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个计划，建议国际委员会沿边界(包括陆上和海上)而非在单独的地点进行观察。周恩来认为，这将更加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沿边界的监测，从而能够实现对美国或法国向印度支那境内输入部队或武器的活动进行更为全面的观察。

莫洛托夫建议，在这一问题上继续维持这样的策略——如果法方坚持自己的提议，那么就在表面上做出一个让步，同意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军队整编区域的问题。

周恩来和范文同建议作为一个最终姿态，应同意在老挝东北地区建立军队整编区域。

莫洛托夫问，我方将由谁签署关于老挝和柬埔寨的协定。

周恩来和范文同认为应当授权两名代表，分别来自越南人民军和抵抗力量。他们还认为这一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周恩来提出从印度支那撤出外国军队的时间安排问题。他说，(他们)能够同意确定一个 240 天的周期(不是法国提出的 380 天)。

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建议就撤出部队和撤出武器分别确定一个周期，并认为撤出武器需要的时间可以比撤出部队的时间略长。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草案宣言。

周恩来和范文同同意莫洛托夫关于以法国草案为基础并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建议。

接着莫洛托夫，周恩来和范文同就宣言文本的所有要点及所做的修改交换了意见。

会谈持续了1个小时。

A. 列多夫斯基记录

АВПРФ，ф. 06，оп. 13а，д. 25

№25144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老挝停止军事行动

（1954年7月18日）

1954年7月18日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2稿，修订稿）

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抵抗部队和越南人民军方面与老挝王国军队和法兰西联邦部队方面就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开始在老挝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所有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应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__月期间从老挝境内完全撤离。训练老挝部队所必需的特定数量的外国军事人员，可以留在该国，但老挝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老挝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三、在随附地图上的指定区域建立老挝抵抗部队集结区。所有老挝抵抗部队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__月内应全部在上述指定地区集结。

四、老挝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老挝自卫所需的特定种类和数量的武器和弹药除外。

五、双方应在老挝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双方应保证不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人员和团体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152,л. 192 - 194

№25145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

(1954 年 7 月 18 日)

1954 年 7 月 18 日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 2 稿,修订稿)

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以柬

埔寨抵抗部队名义的越南人民军方面与柬埔寨王国军队方面就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开始在柬埔寨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所有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__月期间应从柬埔寨境内完全撤离。训练柬埔寨军队所必需的特定数量的外国军事人员，可以留在该国，但柬埔寨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柬埔寨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三、双方承诺，在接到停火和停止交战命令后的____日内在柬埔寨抵抗部队所在地区实行集结；与此同时柬埔寨王国军队不得对柬埔寨抵抗部队进行进攻。柬埔寨王国政府在以普选方式统一国家后，根据柬埔寨抵抗部队的意愿或者将他们收编入王国军队或地方警察部队，或者让他们复员。

四、柬埔寨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柬埔寨自卫所需的特定种类和数量的武器和弹药除外。

五、双方应在柬埔寨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抵抗部队已复员人员和团体，双方应承诺不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152，л. 195－197

№25146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

(1954 年 7 月 18 日)

1954 年 7 月 18 日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 2 稿，修订稿)

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法兰西联邦军队方面与越南人民军方面就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 1954 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开始在越南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为了有效的停止敌对行动，如随附地图所示划出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在临时军事分界线的两侧各不超过五公里的距离划定非军事区。在关于停火协定生效后的____日内，双方部队应做调动并按各自的非军事区驻扎：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南为法兰西联邦军队集结地区。在以普选方式实现越南统一之前，军事分界线北边和南边非军事区和两个集结区的主管代表当局负责管理自己区域内的民事行政事务。

三、双方部队根据上述设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进行的集结和调动，应于关于停火协定生效后的____月期间完成，如果在部队集结和调动时，出现一方集结区的居民中有愿意迁居另一方集结区的，应允许他们迁居并予以协助。

四、越南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

五、越南境内停止敌对行动后，后者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越南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六、所有外国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应在各方同意的规定期限内从越南撤出，如果双方之间一致同意的话，作为例外，特定数量的法军可以特定的期限留在一定的地区。

七、双方应在越南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人员和团体，双方应承诺不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152, л. 198 - 201

№20751

莫洛托夫与艾登会谈记录：交换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意见

(1954 年 7 月 19 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晚 10 点于日内瓦别墅。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葛罗米柯、英国常务副外务大臣哈罗德·卡恰以及艾登的首席私人秘书安东尼。

艾登热情欢迎莫洛托夫的到来，并说道，他认为在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中，全权代表们的决议将“从老挝及柬埔寨撤离外国军事人员”的议题囊括进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莫洛托夫认为，关于从老挝和柬埔寨撤离一切外国军事力量的问题，以

前的对话和谈判中亦曾涉及,而今天的会谈也并未取得重大进展。

莫洛托夫指出,如果忽略不计有关撤离外国军事人员的言论分歧,那么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方案和构想之间只存在着极其细小的差别。

艾登对于全权代表们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能够经过谈判并最终通过相关决议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已经尽己所能,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了。

莫洛托夫问道,艾登的意思是否表明部长级会谈已完成其使命,未来的谈判应交付给交战双方。

艾登答复道,他的意思是说,部长级会谈已经完成了在当前阶段的会谈中他们所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在他看来,今后他们还将再次举行会晤来正式通过和批准全权代表们的决议报告,以及妥善解决诸如监管、安全防卫等问题。

莫洛托夫答复道,这一进展对于日后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正确、至关重要的。

莫洛托夫说,他并不理解当前法国的立场。一方面,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急于谈判,但另一方面,孟戴斯-弗朗斯又在国民议会上宣称将在7月20日之前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艾登指出,他也不理解法国的态度。

莫洛托夫认为,很有可能法国议会随后将延长孟戴斯-弗朗斯所提出的最后期限。

艾登说,昨天他同孟戴斯-弗朗斯通了电话,并向其询问是否计划去日内瓦。孟戴斯-弗朗斯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宣称他不能够去日内瓦。因此,艾登继续说道,他已经损失了其所特意安排出来的三天时间。

艾登说,他得知明天周恩来将接见老挝和柬埔寨外交部长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在艾登看来,同老挝和柬埔寨之间的对话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艾登已经同周恩来讲过,他对于越南军队是否仍将如他们近来所做的那样继续发动进攻表示密切关注,这一举动无疑将向那些质疑日内瓦会议的人们提供新的指控和口实,声称胡志明及其追随者是利用日内瓦的对话作为挡箭牌,企图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艾登似乎是半开玩笑地说道,他希望在全权代表们举行会谈期间,范文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不要采取过多的军事行动。

莫洛托夫指出,范文同是一位爱好和平的文职官员,热衷于战争的说法并不适用于他。

莫洛托夫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在强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这里最为重要的一点,即越南问题。"

艾登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表示,西方代表团们普遍认为,老挝和柬埔寨是一方面,越南问题是另一方面,二者之间有着很大不同。在西方代表团看来,越南内战仍在继续,而此时的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艾登再一次表达了对于当前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来开启双方全权代表之间对话的期望:只要他们之间进行谈判对话,就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

莫洛托夫声称，在他看来，危险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新的挑衅和进攻的行为，而在于那些已经进行了8年斗争的印度支那人民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

莫洛托夫问道，是否在艾登看来，孟戴斯-弗朗斯升任总理意味着法国正在试图寻求一个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有效方案。

艾登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又说，绝不能忘记孟戴斯-弗朗斯是不会投降和妥协的，只有在法国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就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达成一致。艾登继续说道，法国将在谈判中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但是艾登怀疑，孟戴斯-弗朗斯所提出的实现和平的条件将同其前几任的和平条件有着显著的不同。

莫洛托夫指出，没有人要求法国人投降或做出妥协。

莫洛托夫说道，史密斯①在昨天同他的会谈中，阐述了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讨论的相关问题的立场。尽管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但很显然，美国人非常担心法国人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和妥协，美国政府的立场明确显示，要阻止法国在当前发展的事态中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莫洛托夫说，现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但英国的立场还不确定。

艾登半开玩笑地回答道，英国是没有明确立场的。艾登继续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们认为应该由法国人他们自己商定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可接受条件。我们认为由其他人来告诉法国人他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是不正确的。很有可能，艾登补充道，美国人的立场可以部分地解释为，基于其作为法国盟友的事实，他们希望法国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有利的条件。

莫洛托夫说，同理而言，美国人也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很乐于阻扰法国开展谈判，达成共识。莫洛托夫继续说道，我们在昨天的会晤中更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一印象。法国人曾声称，在他们看来，中国所提出的方案应该受到足够重视。老挝代表同时也表示，他们的方案应作为谈判的一个基本框架。而饶伯森②则明确反对法国和老挝的观点。那么对这样一种立场是否可以理解为，他试图从法国获得比法国人所期望的更多的利益，从老挝获得比老挝人民所期望的更多的利益。

艾登说，昨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于伦敦的电报，电报中提到了一位出席苏联大使馆午宴的英国人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之间的会谈。马立克告诉这个英国人，艾登其实同杜勒斯一样坏，在日内瓦会议上，他和杜勒斯之间对于双方所扮演的角色已进行了明确分工，杜勒斯负责“唱红脸”，扮演决不妥协的强硬派，而艾登则负责“唱白脸”，扮演息事宁人的温和派。

莫洛托夫回答道，他不认为马立克会说这样或者其他类似这样的话。但如果马立克果真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莫洛托夫可以确信他百分之百地错了。

---

① W.B.史密斯，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② W.S.饶伯森，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艾登说,他只是顺带告诉莫洛托夫这些,他并不希望马立克因此而遇到什么麻烦。

莫洛托夫表示,他是在私下场合收到这一信息的,因此也只能够在私下里对马立克给予适当的警告。莫洛托夫又补充道,杜勒斯在日内瓦仅仅待了几天,而与此同时,艾登则已经在这里待了8周之久。这只能证明二者之间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艾登对此表示赞同。

莫洛托夫表示,杜勒斯从一开始就对日内瓦会议没有好感。

艾登指出,杜勒斯同意在柏林召开类似的会议。

莫洛托夫表示,这仍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艾登说,他曾试图劝说杜勒斯不要离开日内瓦,但是显然他的游说依旧没有成功。

艾登同时表示,如果对话能够朝着有利的一面发展,杜勒斯很有可能重返日内瓦。

莫洛托夫说,在昨天史密斯同他的会谈中,史密斯表示,他或是杜勒斯,有可能重返日内瓦,但是这个说法并不确定。

莫洛托夫向艾登问道,在他看来,当前日内瓦会议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艾登答道,他很难回答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3周中,当双方全权代表之间举行对话时,所有现存问题都将暴露出来。但是,艾登认为,当老挝和柬埔寨问题逐渐变得相对容易解决时,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就集中到了越南问题上。

莫洛托夫表示,所有关于印度支那的问题都是普遍联系的。如果关于越南问题的对话能够顺利进展,那么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也更加容易解决。从另一方面来讲,成功处理好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将有力地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

艾登向莫洛托夫询问,他是否满意军方代表之间关于越南问题的对话进程。

莫洛托夫回答道,他不能够说十分满意他们之间对话的进程。法国人暴露出控制整个对话进程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们的这一举动也是同当前法国政府所面临的危机所紧密相连的。

艾登说,法国人曾向他通报,自从拉涅尔[①]政府倒台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便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在艾登看来,如果认为孟戴斯-弗朗斯将会采取比其前任更为温和的政策,那就错了。

莫洛托夫说,他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近来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因为自从拉涅尔政府倒台以后,双方全权代表之间有关越南问题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最近一次所拟的方案,甚至还是在该政府倒台以前提出的。

艾登就部长级会谈重返日内瓦的可能性征求莫洛托夫的意见。艾登说:"在我看来,在21天后军方代表之间的对话报告就将被提交,那时,我们应当就我们重返日内瓦的问题进行外交磋商。"

---

① J.拉涅尔,曾任法国总理,1954年6月下台。——英译者注

莫洛托夫表示，他认为这一建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尽管部长们现在也有可能重返日内瓦，但是尚未就举行会谈做好足够充分的相关准备工作。

艾登说，在他近日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发现，周恩来积极地致力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妥善解决。

莫洛托夫答复道，他认为也是如此。中国试图稳定和巩固其南部边疆。这毫无疑问是与其切身利益高度一致的。

莫洛托夫对于中英之间在日内瓦建立起了更为友好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

艾登表示，关系的建立和改善是同莫洛托夫的帮助密不可分的。

莫洛托夫说，关系的改善首先取决于艾登和周恩来双方的共同努力。但另一方面，法国同中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改善和进步，但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改变。

艾登说，通过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他可以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是没有野心的，并且有理由相信，两国完全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国军队进驻的情况下，过上同其他中立国家一样安居乐业的生活。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和判断，艾登继续说道："我坚持留守在日内瓦开展工作，我希望我的判断不会产生偏差。"

莫洛托夫说，在他看来艾登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没有任何野心。但是，莫洛托夫认为，在老挝和柬埔寨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同当前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广泛存在的人民的利益和诉求相一致的措施和步骤。尽管这是这些国家的内政问题，但是也需要达成共识。莫洛托夫继续说道："我通过同周恩来和范文同的谈话，逐渐形成了以下观点，即柬埔寨当前的局势表明，在解决有关该国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将不会遇到重大阻碍和困难。老挝的局势要更为复杂。越南问题也更为复杂。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都一样是非常必要的。"

艾登指出，周恩来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提供帮助。

莫洛托夫说，获得这些帮助其实是法国的一种交易行为。

艾登说，在他看来，假使全权代表之间的对话得以顺利进展，那么有关托管问题的解决就不会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进展困难。

莫洛托夫说，艾登过去过高地估计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看来，他(莫洛托夫)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苏联代表团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夸大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

艾登说，托管问题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各方之间关系的改善，将更为有利于通过最终的决议。

艾登指出，日后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来协调和统筹日内瓦会议中通过的有关越南以及老挝、柬埔寨问题决议的实施。

莫洛托夫说，法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主动和积极态度。也许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法国国内的民主政治氛围所致。莫洛托夫希望当前事务能够取得更快的进展。

艾登指出，法国政府不同于(其他政府)，他们只在其出席活动的前几周内显示出了足够的精力和积极的态度。

莫洛托夫说，在起初的几周时间里，他们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克服当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艾登说，日内瓦会议之前，他主要致力于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然而，他认为，对于缓和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会议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危机仍然存在，但是局势已经开始变得不是那么紧张和尖锐了。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日内瓦会议在这方面上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莫洛托夫似乎是半开玩笑地说道，在接下来的华盛顿之旅中，希望丘吉尔和艾登能够协调和处理好所有问题，给日内瓦会议带来好消息。

艾登答复道，在日内瓦取得的成果将有助于他和丘吉尔把握在华盛顿对话的进展。

会谈持续了45分钟。

O. 特罗扬诺夫斯基记录(签名)

АВПРФ，ф. 06，оп. 13а，д. 25

№10189

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向越南提供帮助的问题

(1954年7月29日)

机　密

1954年7月29日
第438/ЮВА号

致B. M. 莫洛托夫同志：

兹就7月27日范文同与我谈话中涉及到的问题的建议提请您审议：

一、关于黄文欢、何文楼等人前往德里参加关于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工作会议的问题。

8月1日之前，这些同志无论如何到不了德里，因为需要数天时间获得经欧洲到印度的

过境签证。除此之外，根据经验，经过罗马的飞机行程本身也需要 5—7 天。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上述同志只能在 8 月 7—10 日才能到达德里。

鉴于这些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步骤之一：

1. 请求印度政府将会议延期至 8 月 7—10 日。预计这个请求可能不会获得赞同，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将推迟国际委员会的建立。

2. 越南同志会立即准备好自己关于国际委员会问题的建议(委员会驻地，委员会成员数目，委员会中代表的级别，视察小组的数量，这些委员会中三国代表的数量及级别，总秘书处等等)，并将这些建议转交波兰同志，请波兰同志在德里会议上坚持这些建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应采取紧急措施把黄文欢、何文楼和其他一些人送往德里。这样才有可能使这些同志在工作会议结束之前到达德里。

二、关于用船只将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从越南南部送往越南北部地区的问题。

为此目的提供苏联船只看来是不适宜的。可以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试一试在印度、法国、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租船。可能波兰也可以提供自己的船只。租船运输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实施。

三、关于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小组的问题。

看来，在最近一段时间往越南派遣这类小组是适宜的。比如，昨天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就曾请求费登科将军在最近即将转交越南民主共和国掌握的大机场的使用和管理上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除此之外，在履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时会产生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将需要我们的忠告。为避免与中国同志出现某种复杂化的关系，可以派遣一个苏联军事顾问组，作为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处的工作人员前往。

四、关于在编制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需要的计划中对越南同志进行帮助的问题。

可通知范文同，不管是从苏联还是从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以适当价格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其所需要的商品方面，我们将千方百计予以协助。

K. 诺维科夫

1954 年 7 月 29 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同志、佐林同志、档案室

第 759/ЮВА 号

1954 年 7 月 28 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13а, п. 35, д. 156, л. 1-2

№20752

马林科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重新将解放台湾提上日程

(1954年7月29日)

绝　密

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同志接见马林科夫

1954年7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王稼祥在场。

周恩来同志表达了他对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的看法：

在印度支那的计划遭到挫败后，美国政府试图在远东其他地区策划冲突和矛盾。策划冲突的主要目标即中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非法侵害公海的自由航行权，并抢劫前往中国的船只。中国的海岸也常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扰。

近来，美国将其航空母舰驶向了中国的领海地区。几天前，这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还在海南岛地区附近击落了两架中国飞机。

蒋介石和美国政府正筹备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国人仍没有决定要签署该项条约。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举动将刺激中国依旧强大的反美情绪，并且阻碍在日后解决同中国之间的分歧。

美国政府仍将致力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反动集团。毫无疑问，这一集团最初将包括以下一系列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它也很有可能将菲律宾和泰国囊括进去。美国也将继续向举棋不定的印度支那地区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加入到这一阵营中去。

基于这些事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重新将解放台湾的问题提上日程，采取切实有力的步骤，挫败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协约的阴谋。在他，即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发表声明：指出当前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只存在于一个地区，即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在海上犯下了一系列的暴行，并且袭击了中国的领空，在各方面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

为保卫中国的海岸线，海军和空军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防御。中国军队将随时待命，以阻止任何对中国领海和领空的侵略行径。

为挫败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反动的、侵略的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阴谋，就必须打破这些国家同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并且尽可能地加剧和恶化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对于周恩来的观点表示了充分赞赏，并且说道：关于国际形势的相关措施和判断的问题将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认真讨论并通过决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将得到足够重视。打破美国同蒋介石之间签订协约的目标是极其正确的。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周恩来关于其目的在于加剧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重要说法，他也表示了充分赞同。

周恩来同志向马林科夫通报了他同印度尼西亚大使们在德里、仰光和北京的谈话内容——他们邀请他访问印度尼西亚。因为此后需回到日内瓦参加会议，周恩来无法接受这次邀请。周恩来在日内瓦期间，正在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派其在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同周会面，重申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在同印度尼西亚大使们的谈话中，双方达成共识：现在是同中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最佳时机。周恩来提到，这项条约的草案目前正在北京由中国外交部和印度尼西亚大使一同起草，条约很有可能在周恩来访问雅加达时签署。周恩来计划在 8 月访问印度尼西亚。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祝愿他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他赞同周恩来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评论，并且说，决不允许在东南亚地区勾结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将印度尼西亚拉拢进去。他简明扼要地讲了同克奇鲁[①]博士和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约的谈话，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某种程度上正在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苏联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中国与印度之间协定的签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迈出的异常成功的一步。该项协定所确立的原则将在苏联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进行大力宣传。

周恩来同志还向马林科夫通报了他同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谈话。梅农建议在朝鲜和韩国分别进行公投选举，进而确定整个朝鲜国家的国体。梅农试图探求，如果联合国表露出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讨论朝鲜半岛问题的意愿，中国将会有何种反应。周恩来向梅农答复道：中国支持联合国召开日内瓦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倡议。他认为，如果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应该扩大与会成员国，应邀请印度来参加会议。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说，梅农在同莫洛托夫同志的会谈中也提及到了这一问题。

周恩来说，针对当前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加强沿海防御力量，亟需重新评估和改进现有方案来发展海军和空军力量。周恩来计划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问题。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指出，加强中国沿海防御力量、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针对苏联军方同志有关在中国建立图-4 远程重型轰炸机师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说，中国军方的意见是：这种飞机已然过时，而对于远程飞机来说，最好配备喷气式技术。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答复，苏联军方同志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认真考虑和调查。

周恩来同志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热切盼望苏联同志派出的高级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5 周年国庆庆祝活动。如果能够派出这一代表团，中国政府将发出官方正式邀请函。

---

① S. 克奇鲁，时任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英译者注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答复，代表团一定会派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商议决定出访代表团成员的人员组成。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还说，将其诚挚友好的问候带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们。

М. 贾丕才记录

1954 年 8 月 12 日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抄送 В. М. 莫洛托夫

АВПРФ，ф. 06，о. 13а，д. 25

№10151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

(1954 年 8 月)

机　密

附件 1

关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指示①

同胡志明同志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友好合作。同时是指在尽力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国际地位、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越南、全面履行日内瓦的印度支那协定、最迅速地恢复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事业中给予越南朋友以帮助。

在同胡志明同志的谈话中要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日内瓦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要对执行日内瓦协定的第一阶段的顺利结束——即履行了协定的有关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的军事条款表示满意。

在同胡志明谈话的过程中要着重指出，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

①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应该是某文件的附件，上面既没有文件起草人，也没有起草时间。这里所标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测的。——编注

义斗争一贯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的团结精神。要声明，苏联政府往后也将在中国朋友的协作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以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必要的支持。

* * *

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一些个别的问题时必须从下列观点出发：

1. 履行日内瓦协定。

在指出日内瓦协定的关于越南停战的军事条款已得到顺利执行的同时，要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也准备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实实在在履行日内瓦协定的政治条款的斗争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协助——筹备和举行1956年7月的越南普选，以及要在1955年7月20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南越当局代表的协商会议，以讨论与这次选举筹备工作有关的问题。

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上打算提出关于大国方面按日内瓦协定给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调解予以必要的协助的问题。

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已了解越南朋友所准备好的"实现统一的斗争中的总路线、战略和政纲的提纲"，并且依苏共中央之见，这些提纲中所拟定的斗争的目的和战略在南越大体上是正确的。

要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为下述意愿作斗争而所持的肯定态度，即要在南越建立起一个能履行日内瓦协定以在全越南举行普选的政府。

2.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问题。

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南越同法国人和亲法人士一起建立一条尽可能更广泛的反美共同战线的意愿表示肯定。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这些目标中所拟定的措施大体上是正确的：保障在南越的法国人的企业和种植场的工作，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合作。

要声明，苏联政府赞同越南朋友认为增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的社会集团和实业界的代表的联系是合理之举的看法。

鉴于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要越南政府为了简化国家统一问题而发表下述的一个声明的合理性，即关于有可能在统一后的一段时期里在南越保留一种有别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参与经济的、放慢民主改革速度的共和制度)，故要向胡志明同志声明，依苏联政府之见，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出于战略考虑在一定时期里可以比北越的速度慢一点，这种情况原则上是可以容许的。

3. 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方面的计划。

鉴于美国在印度支那各国关系中的行动是旨在破坏日内瓦协定，故要说出我们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条印度支那进步势力的广阔战线去进行反对美国干预印度支那各国事务的斗争。要强调指出，依苏联政府之见，应该让越南朋友为反对美国人的影响而致力于在南越各阶层居民中间开展积极的工作。建议在考虑到各教派的领袖对美国人的傀儡吴庭艳的政策感到

不满的同时,要更广泛地利用印度支那的宗教教派去增强国内的反帝情绪,首先是反美情绪。

4. 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

要从苏联政府赞同旨在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建立越南同老挝和柬埔寨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出发。应该强调指出,国王的政府与巴特寮进行直接谈判和相互让步是老挝国内的政治调解的最正确的道路。

考虑到美国与柬埔寨于1955年5月16日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是公然与日内瓦协定相对抗的,并且正在遭到柬埔寨的一些政治集团的反对,要建议越南朋友采取一些措施,以组织一场柬埔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这一协定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是与印度的利益相抵触的,故建议采取措施以建立越南与印度在反对美国对老挝和柬埔寨加强影响的斗争中的更密切的合作。

要表达出我们的愿望,希望越南朋友在考虑到上面所指出的情况的同时,从老挝和柬埔寨的内部政治状况出发去加强自己与这些国家里的民主力量的工作。同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可能会给人以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破坏日内瓦协定之口实的那种行动是不应该发生的。

5. 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要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更广泛地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去建立和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亚非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最后公报的第一部分第11条,该条款建议民族政府要委派进驻这一会议的参与国的代表,以便为全面扩大与亚非国家的联系而交流信息。

6. 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中国和苏联的联系的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已形成的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要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对越南朋友来说,在与给予越南以帮助相关联的一些实际问题上,时常向中国朋友咨询和请教是合理的,因为后者更了解越南的情况,还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现在不得不解决中国不久前已解决或现在正在解决的那些问题。

如果胡志明提出关于在越南设立苏中混合的经济和军事代表团的问题,那就向胡志明说明这种行动是不合理的,因为越南朋友和中国朋友的合作实践已经形成,并且也已证明是有效的,当然不排除苏联方面也会给予越南以技术方面的支援。

7. 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定基础上把支持越南的和平、统一和独立立场的各阶层居民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的途径去扩大该统一战线的计划表示同意。要强调指出,尤其重要的是不仅仅依靠的是在解放区,而且还要在南越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要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而更广泛地利用国家统一要求的思想是合理的。要建议胡志明同志分析研究关于建立一个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群众组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该组织会把南北方广大的爱国民主力量都吸引过来,同时在形式上却不是与民族统一战线相关联的。从战略观点出发,如果建立这种组织的主动精神能在南方

表现出来，如果第一批这种组织能在南越建立起来，那倒是有利的。

8．土地改革。

要表态说，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顺利结束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要说出我们对劳动党中央关于在1956年7月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土地改革的决议所持的赞同态度。要对越南朋友说，劳动党中央认为，进行土地改革就有可能把极大多数的越南居民团结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周围来，就有可能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这一想法是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吻合的。

9．关于天主教徒疏散到南越去的问题。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天主教徒从北越疏散到南越去的问题，那就发表意见说，为了使敌对的宣传难以有机会在难民问题上投机，即使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越南朋友或许也不应该阻挠个别的疏散事件。然而，与此同时，依我们之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该坚持不懈地争取南越当局对民众从南方疏散到北方这个问题的类似态度。

建议越南朋友要加强在天主教徒中间的解释工作，并在对待天主教会的态度上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便对抗敌人在天主教徒中间所进行的移居南方的宣传。

苏越关系的问题

1．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无偿的经济与技术援助。

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遭到了破坏，并需要最快地得到恢复，苏联政府在审核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后，决定把3亿卢布作为供1955—1956年使用的一笔无偿贷款拨给共和国政府，以便其恢复经济。

按越南方面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3亿卢布投向：

1.25亿卢布用于重建和建造25个工业和公用企业，其中包括一个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一个年产10万吨的过磷酸钙化肥厂、一个年产6万吨的开采黄铁矿的矿场、一个年产3 000件不同的机械制品的机械厂、六个总功率为1.8万—2.25万千瓦的发电站、两个鱼品罐头厂、两个茶叶厂。

在上述数额的账上还将给予技术上的援助，援助的方法就是派遣苏联专家进行地质勘察工作，实施同沙眼、疟疾及其他疾病作斗争的防治措施，组织水文气象工作，等等。

1.25亿卢布用于供应商品以满足国民经济和居民的迫切需求。

5 000万卢布是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货用的储备金。

同时通知胡志明同志，下面列举的协议草案是在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驻苏联的大使的：

(1)“关于苏联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复兴中予以无偿援助的协议”；

(2)“关于被派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提供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的报酬情况的协议”；

(3)“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通过技术生产实习的条件的协议”(附件)。

在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的草案的情况下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A. И. 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份协议。第二份和第三份协议委托由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 K. И. 科瓦利同志签署。

2. 关于苏联与越南之间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审核了越南政府关于发展苏联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政府签订贸易协定。贸易协定的草案已在今年 4 月 23 日交给了越南驻苏联的大使。

因此苏联政府希望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立苏联商务代表处。就这个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在今年 5 月 18 日交给了越南驻莫斯科的大使。

在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的情况下请求他下达签署它们的命令。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外贸部长 И. Г. 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定。

3. 关于为越南人民军供应装备和提供贷款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审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供应物质和贷款以满足越南人民军之需要的请求，并决定为此目的而以优惠条件向越南政府提供一笔供 1955—1956 年使用的数额为 3 000 万卢布的长期贷款，优惠条件是：所供应的货物按半价偿还，年息 2%，从 1960 年起为期 8 年。通知胡志明同志，在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的情况下，苏方签署有关的议定书的工作就委托由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办理。

4. 关于在苏联帮助越南培训专家事宜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政府关于 1955 年接受 300 名越南公民进入苏联的学校学习的请求。

在胡志明同志提出要把 1955—1956 年间越南大学生在苏联学习的费用列入无偿援助的款项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就同意这个请求。

5. 关于顾问和俄语教师事宜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政府关于从苏联派遣 6 位顾问去帮助组织越南高校里的教育工作的请求，同样也同意派遣 5 位俄语教师到越南去。

6. 军事问题。

鉴于胡志明同志提出了希望在越南国防计划的筹备工作中予以帮助和本着这一目的召开越南、苏联和中国的军事代表会议的请求，故宣布，苏联政府同意给予越南这种帮助，并提议实施这一帮助的下列程序：

(1)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与中国军事顾问一起制订一份初步的越南国防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苏联驻越南的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办法给予帮助。

(2) 苏联方面将派 2—3 名负责军事的专家到北京去，同中国和越南的军事工作人员讨论在越南准备好的初步的国防计划。

7. 关于公报的事宜。

商定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公报中要说明苏联与越南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说明两国对维持和巩固和平的向往，说明履行日内瓦协定所涉及的在印度支那进行政治调解这

一部分条款的重要性。公报里要提一下签订苏方在越南的经济复兴中给予经济援助的协定，提一下苏联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协定等。

АВПРФ，ф. 022，оп. 8，п. 117，д. 30，л. 12-21

№08096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庆祝中国国庆所采取的措施

(1954年8月[①])

鉴于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为进一步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派苏联政府代表团赴北京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代表团由А. И. 米高扬(团长)、М. А. 苏斯洛夫、И. Г. 卡巴诺夫、Г. Ф.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组成。

委托代表团以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在北京国庆盛典大会上发言致贺，宣布按照1953年6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已准备就绪的苏联经济和文化成就展览会开幕。

二、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发祝贺电并在报上发表。

(一) 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巴库、第比利斯、埃里温、阿拉木图、塔什干、杜尚别、阿什哈巴德和伏龙芝等地组织群众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

(二) 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联妇女和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苏联作家协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给相应的中国组织发去祝贺电，并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去个人贺信。

(三) 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材料：《真理报》、《消息报》刊登社论，《共产党人》、《新时代》、《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星火画报》等杂志刊载文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成就。

(四) 责成苏联文化部：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在全国上映中国电影，组织电台播放中国流行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歌曲和音乐、刷写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

2. 组织专题报道,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

3. 于今年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委托以M. A. 苏斯洛夫、Г. Ф. 亚历山德罗夫、В. П. 斯捷潘诺夫、А. П. 杰尼索夫、В. А. 佐林、В. А. 亚斯诺夫和А. В. 科罗博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并向中央提出组织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提案,应重点考虑协会的以下任务:系统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促使中苏友好协会广泛宣传苏联的成就;组织双方文化和社会代表团的相互交流;帮助苏联社会文化组织、学者、国民经济专家、艺术活动家交流经验,进行互相帮助以及研究两国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54—2255页

№08097

库尔久科夫呈维辛斯基请示:苏联代表团访华有关事宜

(1954年8月5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1211/ДВ号

致А. Я. 维辛斯基同志: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①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②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在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

① 原文件中此句被划掉,用手笔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译注

② 原文件中"从那里"一词被划掉。——译注

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2 年 9 月 15—20 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港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营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联合股份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

请您指示。

И. 库尔久科夫

1954 年 8 月 5 日

手写批注：

致葛罗米柯、佐林同志：

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

库兹涅佐夫

8 月 5 日

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

А. 葛罗米柯

8 月 5 日

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

佐林

8 月 10 日

葛罗米柯同志：

应该开始认真筹备参加庆祝活动的事情了：外交部派谁参加代表团、访问计划、问题、提纲。请远东司提出建议。

库兹涅佐夫

8 月 11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3，д. 40，л. 4－5

№21381

斯捷潘诺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胡乔木要求了解和考察的问题

（1954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

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已经结束了治疗，请求苏共中央提供机会了解苏联共产党党的教育组织和对党校的领导工作经验、党对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经验，了解不脱产学习提高专业技能的工作，了解杂志《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编辑部的实践工作，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就其工作问题进行会谈，与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就苏联的各民族文字改革的经验进行会谈，以及与在苏联出版中文教科书的作者会谈。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胡乔木同志的请求，并责成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组织党务工作部、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以及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同胡乔木同志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与胡乔木同志关于特别问题的会谈可在苏联科学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和《共产党人》、《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进行。

胡乔木同志提出的问题清单见附件。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B. 斯捷潘诺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4年8月11日

第25－c－1699号

手写批注：

归档。

胡乔木同志的所有要求都已得到满足。他于8月23日返回北京。

……①

1954年8月28日

①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附件：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感兴趣的问题清单

关于不脱产学习

1. 如何制定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的政治学习大纲。以下的理解是否正确：每个党员都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但是在其按照这个固定的学习大纲学习之前要不要预先学习一些政治通识知识，然后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自学，还是应该在党校的夜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共青团员和无党派志愿者要和党员一样学习吗？

2. 如何对那些自学的党员进行管理、检查和帮助？

3. 如何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决议和刊物？

4. 请允许我简要了解一些关于苏联党校的大体情况。如不同级别的党校学员的情况，他们的年龄界限，学习方案和对他们的管理。

5. 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帮助那些在工作岗位上不脱产进行中等和高等学习的人们。

关于这些问题，除了一些基本了解，能否获得以下材料：

(1) 一些能够说明关于在岗的人们如何进行继续教育的材料。

(2) 举一些单位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们如何边工作边在高等和中等学校学习。

(3) 一些夜校和函授学校的情况(它们的历史、学生构成、学习年限等)。

6. 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其工资？

7. 苏联政府和党有没有做出过提高职工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水平的决定(如果有，能否能够了解一些这些决定)。对于那些业务不熟练的职工，除了将他们从岗位上撤换，党和政府机关有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来使领导干部系统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关于党对文化教育组织的监督

1. 中央、地方党组织、政府和文化教育单位之间在功能上是如何划分的(如学校和电影制片厂在对文化教育组织干部的管理上如何划分功能)。

2. 工作中需要对干部进行考察，但是对干部进行管理的工作和关于对所通过决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的区别？比如，对高等学校领导干部进行考察的工作提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研究的工作，对报纸行业领导干部进行考察的工作和对报纸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工作等等。

3. 在监督决定的执行方面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功能如何划分以及他们如何进行协作。如在教育领域、出版业、艺术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工作。

4. 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如宣传部、科学文化部)不能通过决定。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不通过任何决定是难以想象的。这些部门在哪些范围内可以不经书记处批准自己进行工作？能否就此问题做大致说明。

5. 中央委员会各部与地方党组织相应部门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如中央委员会各部门

如何对这些部门的工作和干部情况进行评价。

关于《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杂志

1. 编辑部的组成和工作方法。

2. 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作者及记者的情况。如何管理作者、积极分子以及组织的情况。

3. 杂志和党组织的联系。对杂志中刊登的批评和建议的反响。人们如何阅读和讨论其中的内容?

4. 来自中央方面的领导。

关于苏联的文字改革

1. 十月革命后的俄语文字改革。

2. 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尤其是那些没有语音文字的民族,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和语言中有不同方言的民族的文字改革。

3. 最好能获得一些东干语的出版物,既包括相对简单的文章,也包括相对复杂的。

4. 最好能理解最简要的关于俄语和一两个重要欧洲语言中一些方言的历史以及它们现今的状况,以便在研究汉语方言问题的时候作为参考。

关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

科学院的任务、历史、组成、教学方案(每个年级的教学科目)、教学方法以及如何补充学员。如何考入社科院以及如何毕业。

手写批注:

给斯捷潘诺夫同志。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5,л. 46-49

№21418

外贸部关于在华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计划

(1954年9月[①])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一)

---

① 该档案未标示文件起草的时间,根据文件内容判断为9月。——编注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4年北京）选题计划

在北京举办苏联展览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成就。

为举办此次展览会，需要提供大量的陈列品、样本和模型、资料照片、镶板、墙画、一览表，这些物品要展示：

1. 苏联的工业力量，苏联企业的高超技术水平，现代生产设备生产的所有品种和消费品。

2. 日用品和食品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

3. 铁路、水上交通和公路发展取得的成就。

4. 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高度机械化水平、农业生产电气化、高收成和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

5. 国民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高等院校和专家的培养、医疗保健、体育运动、音乐、艺术、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

在苏联馆正面的钟楼部分，大写字母CCCP置于苏联国徽的上面，国徽正面使用汉语题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入口处要布置俄语和汉语的欢迎词：

"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二）

前厅是展览会的开场部分。前厅的正中央放置参展模型和游览流程。在前厅有4个纵深半圆形的、明亮的壁龛，里面布置大型的、富有形象的壁画，画的主题要反映苏联人的劳动、休息和学习情况，以及以"莫斯科——我国的首都"为主题的大幅壁画。

在圆形的卷边花饰围绕的镶板上方张贴题词，揭示这样的主题：

"苏联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创造力，沿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胜利前进。"——Г. М. 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41页。)

"苏联公民有受教育权。"(苏联宪法第121条)

"苏联公民有休息权。"(苏联宪法第119条)

"苏联公民有劳动权。"(苏联宪法第118条)

此外,在通往中心工业展厅的通道侧面使用如下题词:

"……我国的和平政策得到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列宁(列宁:《列宁全集》第4版第30册,第365页)

"……苏联是各平等民族的联盟……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权利平等。"——斯大林(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第526页)

(三)

在中心展厅及其附设展厅摆设工业制造企业产品、电力设备、测量仪器和其他一些装置,金属样本、石化产品、无烟煤、矿石等。

在进入工业展厅的影壁墙正对面摆放列宁—斯大林雕像(高3.5米)。

在上述影壁墙上悬挂苏联国徽(直径4米),附录社会主义经济法主要内容:

"在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68页)

在离开大厅前厅的影壁墙正对面左右两侧书写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增长率

(与1940年相比的%)

1940年	1950年	1953年	1955年(计划)
100	173	251	294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8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页)

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

(与1940年相比的%)

1940年	1950年	1953年	1955年(计划)
100	164	219	262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44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2年1月21日,

1953年1月23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在影壁墙侧面书写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与1940年相比的%)

1940年	1950年	1953年	1955年(计划)
100	137	171	206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44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0页)

苏联工人和职员人数的增长 单位:百万人

1940年	1950年	1953年	1955年(计划)
31.5	39.2	44.8	45.1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25页)

在通往中心工业展厅入口的上方使用如下题词:

"近28年来苏联工业生产增长了55倍。"(根据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材料,《真理报》1953年8月9日)

在大厅的正中央摆放大型陈列架:金属切割机床(旋床、六角车床、单立架式车床、铣床、磨床等)、纺织机械设备、缝纫机、印刷设备。

此外,在大厅内放置12个展台,陈列品要展现苏联工业领域的成就。

展台的正中央要布置绘声绘影的图表。

石油工业展台

展台内要摆放石油制品样本(汽油、煤油、粗柴油、润滑冷却液等),展台布景用的照片要展示石油和石油制品企业。(注:照片下方的题词取决于照片的题目和内容。没有列入选题计划)

苏联石油开采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年	1940年	1950年	1953年	1955年(计划)
9.0	31.0	37.0	52.0	69.9

煤炭工业展台

展台内摆放煤和无烟煤样品、气动工具等。展台的照片要展示煤炭工业繁重程序的高度机械化水平。镶板背景为一个煤矿，并附上如下表格：

苏联煤炭开采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29	166	261	320	373

矿石原料展台

展台内摆放铁、猛、铬矿石样品，石棉和石棉制品。照片要展示矿山开采和加工过程的机械化。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展台

在展台内的特殊支架上摆放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材料、铝制品和由其材料制成的商品。照片要展示苏联金属工业先进的工艺。在示图中描绘生铁和热导材料时使用如下表格：

苏联生铁生产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4.2	15.0	15.3	21.7	27

苏联钢产量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4.2	18.3	27.3	38	44.2

(根据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集会上的竞选演说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7 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 年 4 月 17 日，1952 年 1 月 29 日，1953 年 1 月 23 日，1954 年 1 月 31 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 1951—1955 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2 年版)

测量和切割工具，检测机器和仪表展台(2 个展台)

展厅内要摆放用于检验金属裂痕、老化以及确定金属其他物理特性的机器；测量仪器和设备，金属测量和切割等成套工具。

照片要展示独一无二的大型机床，车床自动流水线，其他一些金属再加工工具。

照片之间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仅在 1950—1953 年期间就制造出 2 200 多台新型重要机器和机件。”(根据 1954 年 3 月 12 日萨布罗夫在明斯克选区的竞选演说材料，《真理报》1954 年 3 月 13 日)

中央大厅靠墙的陈列台摆放的各工业主题照片同各工业领域知名人士的肖像都列入陈

列品。

上述用照片材料来装饰商品展台的原则适用于多数展览馆。

(四)

阁楼下展厅的摆设——

电力设备、电力测量设备、电动工具和通讯设备展览馆(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X射线装置、断路器、避雷器；功率10万千瓦的发电机、功率为7.2千瓦涡轮发电机模型；焊接设备；高压线路传输设备；矿井用和调度用整流器、电报机、公用电话、无线电台和无线电转播装置)。

这部分作为背景的墙画使用发光二极管装饰的图表，展现苏联电力增长情况。

使用题词：

“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列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

使用表格：

苏联的电力生产 单位：10亿千瓦/时

1913年	1940年	1950年	1953年	1955年(计划)
1.9	48	90	133	162

(1913年——《苏联政权建立20周年文章选集》，联共(布)中央党的出版社1937年版，第24页；1940年——《1946—1950年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令》；1950年——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赫鲁晓夫讲话，《真理报》1954年3月7日)

在齐姆良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及其他水电站、高压转换器、科学研究实验室和工厂实验室的照片旁边使用如下题词：

“通过第五个五年计划，苏联实现了电气化的宏伟纲领。建设和扩建了711个电站，这些建设任务完成后，苏联的电力总功率同五年计划之前的1950年相比增长了75%。”(别尔乌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1954年4月27日)

在其中一幅电站照片下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电站发电1 330亿千瓦/时，是1913年的68倍。”(别尔乌辛讲话，《真理报》1954年3月12日)

交通设施展馆

(桥梁模型、沉箱、桥式起重机；线路控制系统、机车信号器、自动闭塞装置，机车头模型、保温车厢、负载量1吨的油轮，湖河用拖揽、地铁车厢、自动梯和其他模型)

该展馆还要摆放：伏尔加—顿河全景图；“莫斯科是五海港口”的图画；莫斯科地铁站运

行示意图和其他站的照片,使用题词:

“莫斯科地铁是一项宏伟工程,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最好的榜样。”(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

在交通设施展馆配置相应的镶板画时使用下列图表:

苏联铁路货运增长率

(与 1940 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3 年
100	192.6

苏联海路货运增长率

(与 1940 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3 年
100	174.4

苏联汽车运输增长率

(与 1940 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3 年
100	350.3

(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60、61 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 年 1 月 31 日)

伏尔加—顿河全景图

“1952 年夏天,以列宁命名的伏尔加—顿河航运公司投入运营,把苏联欧洲部分的海洋——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和黑海——联合为统一的水运交通体系。”(《真理报》1954 年 7 月 11 日)

电话、电报、广播展馆

广播站、无线电转播站装置、有效验的灯泡、电视稳定器、电报—电话仪器:民用电话机、各种型号的转换器、校准器、电阻测量仪、Q 表等。

该展馆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广播事业的使命是启发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灌输人类社会高尚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意识。”——加里宁(《党的建设》1945 年第 6 期,第 8 页)

该展馆的照片要展示各无线电企业、电报和电话站等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

光学设备展馆

验电器、生物显微镜、矿石显微镜、金属钱、全套工具、大型测量仪器、放映机、显微镜用的照明器材、大型摄谱仪、长度测量仪器等。

大学、科学和农村实验室的照片，要展示光学仪器的实践应用，等等。

电影放映机展馆

各种款式的放映机、全套设备、滤光器、电影放映机固定设备等。

该展馆要使用以下题词：

“电影是鼓动群众的最重要的工具。”——斯大林(摘自斯大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讲话)

摄影棚和自然条件下的照片、演员和其他电影活动家的肖像、制作最优秀的电影的一些干部的照片。

计算分析仪器、精密仪器展馆

计算机、打孔机、检验器、制表机、积分仪等；各种技术用途的仪表。

水文气象仪器展馆

风速表、水样采取器、日光仪、专用温度计、计程仪、绞车、雨量计和气象记录图、检流表、反照仪、铁制水表、测位仪、海洋底质采取器、降水量计、冻土测量仪，等等。

水文气象服务部门大厅的墙壁上使用如下题词：

“水文气象服务部门为庄稼播种和收割、为航期的开始和结束时期的确定、为水电站规程的确立、为电报电话工作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 1950 年版)

照片要展示水文气象仪器在国民经济中应用情况。

在大厅的左右两侧靠近前厅的位置是以下部分：

林业和造纸业展馆

支柱、造纸木材、胶合板、纸浆、底板、纤维板、不同等级的纸张、火柴。

这部分要展示苏联林业资源的丰富、林业机械化加工和运输、木材流送、锯木厂、纸浆造纸联合厂。配置苏联森林分布图，使用题词：

“苏联拥有大量的林业资源，是世界林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

在相应的照片下使用如下题词：

“1953 年木材采伐厂拥有的林业机器数量同 1940 年相比增长了 3 倍，拖拉机增长了 6 倍，机车增长了 7 倍。现在林场拥有 17 000 台发电机，12 万把电锯。”(根据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材料，《真理报》1954 年 4 月 27 日)

化学和林产化学工业展馆

这部分要展出大量化学制品、染料色样、林产化学产品——松香、树脂、松节油、福尔马林等。

照片要展示染料在纺织企业的使用情况，以及展示化学企业的部分生产环节。

食品工业设备展馆

乳脂分离器、灌肠注射器、马铃薯去皮机、磨盘、冰激凌机。

牛奶和肉类企业的照片，磨盘和其他一些食品企业的照片，以及公用餐桌和炊具企业的照片，现代技术设备的照片。

（五）

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展馆

这部分的陈列品绝大多数都放在中央展厅上面的阁楼上，展品包括：纺织品（棉布、棉线、棉丝）；连衣裙、内衣、针织品；化妆品；鞋；皮革制品。

使用题词：

“从 1947—1954 年苏联 7 次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制品的价格，由此价格水平总体上降了 2 倍多。”

“1953 年日用品生产比 1950 年提高了 79.2%。”

（根据米高扬在贸易工作者联盟会议上的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 年版，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 年 4 月 27 日）

这部分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物质福利增长情况，日用品的部分生产环节，贸易企业等。

照片间使用如下题词：

“仅 1953 年一年新投产的日用品企业就达 300 多家。”（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 年 1 月 31 日）

“1953 年苏联国营和集体贸易额比 1940 年增长了 79%。”（根据米高扬在贸易工作者联盟会议上的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4 页）

日用品摆放在展览馆右侧第一层陈列架上。这里还摆放家具、日常生活用品、住房用品和装饰品。

家具展馆

该展馆展示四组全套家具：餐桌系列、旅馆系列、卧室系列和教授或科研工作的办公室系列，房间全套布景，以及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

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休息和家庭情况等，在住宅建设照片中间和新式住宅内部和外部使用题词：

“近年来在苏联各城市和工人居住点，为工人和职员提供了 1.83 多亿平方米居住面积，而在农村为集体农庄庄员和农业技术知识分子建设了 400 多万套房子。”（根据 1954 年 3 月 10 日布尔加宁在莫斯科选区选民集会上的讲话材料，《真理报》1954 年 3 月 11 日）

日用电器展馆

电冰箱、电熨斗、电茶壶、咖啡壶、吸尘器、电风扇、电动打蜡机和洗衣机、电烤炉、电炉灶，等等。

照片要展示这些设备在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以及这些器皿的生产环节。

收音机和电视机展馆

“和平”牌、“波罗的海”牌、“祖国”牌、“莫斯科人牌”、“图拉”牌、“里加-6”牌、“里加-10牌”、“白俄罗斯”牌收音机，“记录”牌、“乌拉尔-52”、“卡马”牌录音机，“T-2”牌电视机，等等。

照片要展示石收音机和电视在苏联城市和农村居民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音乐器材展馆

三角钢琴、立式钢琴、竖琴、管乐器、提琴和拨弦乐器、大手风琴、手风琴、键盘式手风琴、苏联阿塞拜疆民族乐器。

这部分的照片：音乐会演出、交响乐队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独奏、国际比赛；歌舞团、歌剧和芭蕾舞剧团、文艺活动；演员和艺术活动家的相片。

手工作品、儿童玩具、织毯和手织品、器皿、精制玻璃器皿展馆

用木材、石头、骨头、金属或纸板做的手工制品；密缝刺绣和花边作品；塑料制品；手工和机器制作的毛毯。

照片要展示作为副业的手工业制品生产环节；苏联人民的生活。

（六）

医疗保健展馆

这部分位于中央展厅右方的阁楼上。

这里摆设：手术台、麻醉器械、静脉注射器、医用照射灯、水疗所、理疗器械等；医用器具和医用照相机、三本主题为母亲和儿童的保健相册；苏联的疗养事业和保健事业繁荣情况，传单、宣传画、幻灯片，等等。

使用题词和图表：

苏联全体公民享受免费医疗；

“苏联人民福利的增长、国家关心改善和保护妇幼保健工作，其结果是我国的死亡率急剧降低。近三年来，苏联人口净增长900万。”（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70页）

“苏联现有350多个疗养地、2 500多个疗养院，建设了宏大的疗养院网络。劳动人民可以无偿或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这些设施的绝大多数疗养证。”（社论，《真理报》1954年1月10日）

苏联城市和农村病床数量增长率

（与1940年相比的%）

1940年	1950年	1955年(计划)
100	125	150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 年 4 月 17 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 1951—1955 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26 页)

苏联医生数量增长率

(与 1940 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0 年	1955 年(计划)
100	175	219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 年 4 月 17 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 1951—1955 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26 页)

苏联国民收入在医疗保健和物质文化方面的支出额 单位:10 亿卢布

1940 年	1950 年	1952 年	1954 年(计划)
9.035	21.396	22.342	29.300

(根据苏联财政部材料,1953 年 5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通信。关于 1954 年度苏联国家预算的法律,《真理报》1954 年 4 月 22 日)

这部分的照片要展示城市和农村医院、分科诊所、疗养院和休息室;儿科保健所、幼儿园、医生上门服务。

要有展示苏联东部地区加盟共和国医疗保健情况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间使用题词: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医疗保健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几乎在苏维埃政权下建立了医疗保健和疾病预防网络。”

体育器材展馆

冰刀、滑雪板、各种球类、运动鞋、哑铃、杠铃、(打冰球用的)曲棍等,猎枪、自行车、摩托车,等等。

这部分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体育文化和体育运动是巩固健康的普及手段,在居民同长寿的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

“在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苏联运动员获得 38 枚金牌、56 枚银牌和 18 枚铜牌,创造 2 项世界纪录和 12 项苏联纪录。”

(根据苏联卫生保健事业材料)

这组照片要展示各种体育竞赛情况、在苏联国内和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和胜利者的相片。

（七）

报刊展馆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美术文学，艺术书籍、国外经典和现代文学俄译本或苏联各语种译本，名画复制品、乐谱、唱片、邮票、留声机唱片，等等。

这部分置于展厅的右翼，并且分割为两个分支：一支是马列主义书籍，还包括对这个科学领域的研究作品；另一支为文艺书籍，包括儿童文学。

这部分的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景况。

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品展架的上方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使用题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让我党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开辟新的历史道路，清晰地看到我们前进的目标，快速而又持久地巩固胜利。"——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07 页）

在摆放科学书籍的展架上面使用题词：

"近 15 年来，苏联出版了 7 亿多册各领域的科学书籍。"（根据联盟书库的消息）

在进入出版物展厅入口的上方使用题词：

"1953 年苏联出版的年度出版物的数量达到 9.62 亿册，是 1940 年的 2.2 倍。使用苏联 76 种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出版。"（根据联盟书库的消息）

在摆放文艺作品的展架上面使用题词和表格：

"在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中，人民意识到苏联的文学和艺术是新的、正确的，帮助党和国家培养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共产党人》1954 年第 21 期，第 14 页）

苏联出版的俄国文艺经典作品和革命前的俄国相比较：

印数：千册

	1888—1917 年	1918—1953 年
A. C. 普希金	10.711	65.437
M. Ю. 莱蒙托夫	4.086	18.729
H. B. 果戈里	5.813	28.421
H. A. 涅克拉索夫	254	17.414
Л. H. 托尔斯泰	10.784	53.965
A. П. 契诃夫	672	38.127
A. M. 高尔基	1.083	73.694
B. B. 马雅可夫斯基	4	20.391

在照片之间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拥有38万家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分布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中,藏书总额达10亿册。”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八)

职业教育展馆

步行式挖掘机、联合采煤机等机械模型;手工业学校和工厂职业培训学校的学员制作的艺术品;中等学校的教科书和教具。

这部分展品和出版物放在同一个展厅。两个展厅使用一个题词,写在通往大厅的影壁墙的端面:

“国民收入用于各种教育、干部培训、发展科学和艺术及其他教育方面的投入,1954年的总额达670.1亿卢布,是1940年的3倍。”(根据《1954年度苏联国家预算法令》,《真理报》1954年4月22日,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71页)

照片要广泛反映培训青年工人的主题,反映手工业学校和工厂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学片断,他们的生活、休息、体育活动、文艺活动,等等。

这部分使用题词:

“国家劳动资源系统保障为社会主义生产源源不断提供专业化的工人干部队伍。”(《经济问题》1949年第2期)

“从1946年到1953年国家劳动资源学校为工业培训和转交了400多万名青年职业工人。”(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47年1月21日,1948年1月18日,1949年1月20日,1950年1月18日,1951年1月26日,1952年1月29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

“在苏联劳动后备军得到国家全面保障:免费接受职业培训,提供饮食、服装、鞋、宿舍、教科书和直观教具。”

两支分部联为一体:中学、职业教育、大学、技术学校,在两个大厅之间使用一个题词:

“1953年学员数量,包括各种形式的培训,达5 700万人,几乎比1940年多800万人。”(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市选区选民集会上的演说,1954年3月11日)

(九)

高等院校展馆

高等院校展馆设在展览馆右侧一个正方形大厅内。

大厅的正中央放置模型：莫斯科大学主建筑楼(高 2.5 米)和莫斯科大学总的建设规划。

大厅纵向陈列台的中间在墙壁正面悬挂苏联一些大学的电子画片和不断切换的题词，介绍大学、大学生和正在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的增长数量，等等。图片配备录音机，播放的文本介绍关于高等教育的信息和苏联的学术研究活动。

图片的上面使用题词：

“苏维埃共和国为青年一代学习知识、全面发展天分和潜质提供一切可能。”(《真理报》1952 年 1 月 14 日)

在墙壁的反面，大厅入口的上方使用题词：

“苏维埃共和国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苏联科学为利用我国难以计数的财富提供了无限可能……”——马林科夫(马林科夫：《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2 周年》,《真理报》1949 年 11 月 7 日)

在墙面大学图片的两边摆放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两个陈列台，展现这两大综合性大学培养苏联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的教育体系。在墙的正面再附加两个不大的展台展示苏联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喀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等等。

在这个大厅的其他展台上摆放照片，展示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专家的特点和方式，展示苏联大学和技术院校的科学和艺术。此外，还要展示个别教学片断(讲义、课堂讨论和实验课、生产实践，等等)。还要摆放展示大学生生活、休息和体育运动的照片，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的留学生的学生情况，特别是中国的。

除了照片，在高等院校展架上还要摆放教科书、教辅用具，在展架上方悬挂俄国科学巨匠的椭圆形肖像：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茹科夫斯基、门捷列夫、皮罗戈夫、梅奇尼科夫、罗巴捷夫斯基、米丘林，俄国科学奠基者 M. B. 罗蒙诺索夫的半身塑像摆放在大学照片的下方，在台架上摆放鲜花。

(十)

农业展馆(注：按照全苏农业展览会编制的农业分类选题展览计划)

该展馆要展示：粮食和粮食产品、各种玉米种子；棉花、不同等级的棉纤维、各种型号的亚麻纤维、大麻纤维、洋麻；蚕茧、桑属植物；细毛绵羊织品、杂种兽毛；苏联细毛绵羊标本；水果和蔬菜的样本，以及按照米丘林方法培育的水果和蔬菜样本，等等。

这部分摆放在展馆的左侧，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在那里展示农业机械。

使用系列照片、图片、数字资料，展现苏联在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的成就，阐明苏联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艺学的发展，等等。

农业展厅的正中央摆放工农联盟的雕像——全苏农业展览会的浮雕。

农业部分有如下选题：

选题一

开场。苏联农业的任务和取得的成就

1.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时代。

2. 近 5 800 公顷的土地转交给苏联集体农庄永久使用。

3. 集体农庄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千万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农村中的贫困和寒苦现象消失了。

4. “……技术薄弱、依附于富农的无数的小农经济被取代了，现在我们有了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机械化大生产，其形式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斯大林

5. 苏联拥有 94 000 个集体农庄，4 835 个国营农场，8 980 个拖拉机工作站。平均每个集体农庄拥有 5 960 公顷土地，每个国营农场拥有 19 800 公顷土地。

6. 国家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技术装备保障。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用机器数量　　单位：千辆

拖拉机	1 260
粮食收割机	326

1953 年农业经济用电量是 1940 年的 4.5 倍。

7. 农业劳动组合的章程是集体农庄的基本法。“劳动农民志愿联合成为农业组合，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共同劳动建设集体农庄，也就是公有经济。”(摘自章程第一条)

8. 集体农庄公有财产增长率

单位：%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投　资	100	157	232
货币收入	100	165	240

9. 苏联集体农庄的任务：充分满足人民对饮食的增长需求和工业所需原料。

商品增长情况　　单位：百万吨

	1926/1927 年	**1952/1953 年**
粮　食	10.3	40.4
肉(活重)	2.4	5.0
奶	4.3	13.2
马铃薯	3.0	12.5

10. 苏联农业是以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先进经验和强大的现代技术为基础根据国家的计划发展的。

11. 这个主题要展示农业经济专家的增长数量。

选题二

拖拉机工作站是集体农庄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力量

列举关于1930年、1940年和1953年拖拉机工作站的数量的材料，关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功率提高的材料。强调拖拉机工作站在集体农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展现拖拉机工作站同集体农庄在合同的相互义务规定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列举以老拖拉机手Т. Г. 舍甫琴科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的收成指数，指出拖拉机工作站在畜牧业中的工作方式。

选题三

扩大重要粮食作物——小麦的生产

小麦在粮食播种中的比重。品种、机械化耕种。列举各地区和集体农庄取得高收成的例子。

在这个选题中要列举为了提高粮食生产，首先是小麦生产，而开垦的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主要资料。

陈列架上还要摆放关于育种问题的画册。

选题四

扩大稻米生产

指出产量的增长。列举产量创纪录的例子：伊布莱·塔哈耶夫——171普特/公顷，金万山——150普特/公顷。指出金万山使用了稻米农业技术员培育的种子。

展示：新的灌溉系统，外顿河地区、纳曼干州、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巨人”集体农庄扩大播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新品种培育网络，有213个全苏稻谷试验站，强调大米收割的机械化。

选题五

增加食用玉米和饲料玉米的生产

列举在粮食种植和饲料种植中玉米取得高收成的例子。

展示玉米耕种机械化，正方形穴播，垄间距，混种的应用。

选题六

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大豆种植

近年来，苏联政府成功地把大豆种植推广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豆的播种面积扩大了。先进的例子是基辅国营农场和普里莫尔斯克市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国营农场，农业技术专家保障了大豆取得高收成。

选题七

棉花——苏联主要的经济作物

苏联的棉花种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水烧地播种面积增长情况

单位：千公顷

1913 年	1940 年	1953 年
690	1055	1880

苏联集体农庄棉花收成增长

（1953 年每公顷平均产棉）

单位：公担

苏　联	20.3
埃　及	17.5
美　国	9.5
印　度	3.3

棉花种植机械化的工作效率：每台棉花收割机可以取代 50 名收割工人的劳动量。

以如下先进的集体农庄：科京·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庄、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阿赫努巴巴耶夫集体农庄、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基洛夫集体农庄来展示棉花种植广、产量高；这些经济单位棉花种植的收入额。

选题八

新的韧皮纤维作物罗布麻和黄麻在苏联的推广和顺利发展

展示播种这些作物取得的成果和方法，取得高收成的有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下丘亚国营农场，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季米特洛夫集体农庄和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列举这些作物高收入的材料。

选题九

苏联的养蚕业——农业高收入领域

列举苏联蚕茧收入高增长的材料，蚕卵产出增长量，桑树种植面积的增长量。

列举产蚕先进单位：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列宁集体农庄，展示蚕蛾快速成长法。

选题十

苏联的甜菜种植

苏联在甜菜种植和甜菜糖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位。出示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甜菜糖生产的表格。

苏联产糖甜菜的播种面积和甜菜糖的生产量保持增长。

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产糖甜菜高产量。

波尔塔瓦州米丘林集体农庄农业技术员。产糖甜菜的科学研究机构。

选题十一

苏联组织大规模的马铃薯栽培和蔬菜栽培

马铃薯和蔬菜的种植面积。温床和温室作物增长量。制作蔬菜罐头，蔬菜和马铃薯晒成干菜。9月苏共中央关于马铃薯和蔬菜生产的全体决议。蔬菜和马铃薯取得高收成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土地开发和保护方面的先进做法。

正方形穴播和蔬菜与马铃薯的正方形种植方法。在草炭腐殖质营养体栽种秧苗。利用工业企业的热能残料和电能给暖窑和温室供暖。

马铃薯和蔬菜栽培科学成果(马铃薯业研究所、蔬菜业研究所、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格里博夫蔬菜育种站)。

选题十二

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畜牧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先进经验

苏联养殖牲畜的类别。在饲养大牲畜方面取得的成绩。在牲畜业生产方面取得高指标的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育种站和国营种站。

新的畜牧良种的推广。“卡拉瓦耶夫”集体农庄和其他一些先进经济体在提高畜牧产量方面的经验。

养羊业展台

国内细毛绵羊的主要种类。羊毛质量的改善。一些高产牲畜的指数。卡拉库尔绵羊养殖业的发展。先进单位和养羊户的成绩和经验。

选题十三

苏联的狩猎业、养兽业和鹿茸业

苏联是世界上毛皮资源最为富有的国家，动物种类繁多。在苏联领土上栖息着130多种毛皮类动物，250种有猎取价值的飞禽。

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的面积是140万平方公里。

苏联畜牧业的发展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带来大笔收入。

苏联的鹿茸业和鹿茸生产。

选题十四

苏联的园艺业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果园和葡萄园面积保持增长。

宅旁园地和集体果园。

果实和葡萄取得高收成的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培育果实和葡萄高产的农艺专家。

草莓——高产作物。草莓可以采用正方形窝种法。果实生产程序机械化。果实、干果和葡萄的主要等级。

米丘林中央实验室及其对生产的帮助。

培育新品种作物。远亲植物杂种方法。

选题十五

苏联的茶业生产

茶叶种植面积,茶叶总收成。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茶叶收成指数。茶叶种植机械化。

(十一)

食品展馆

该展馆从理论上讲同农业原料部分相关联。列入展架的有:肉、鱼、水果和蔬菜;熏猪肉制品、香肠、乳酪;鱼子和鱼;植物油、果汁、干果、葡萄干;糖果;糖、维生素、压缩食品;酒类、茶;烟叶和卷烟。

照片要展示米高扬肉制品厂的车间,渔业公司,糖果公司明亮宽敞的车间,浓缩食品生产,茶叶、葡萄的采摘,烟草的种植,等等。

使用题词:

"1955 年苏联食品生产比 1950 年增长了 84.7%。"(根据米高扬在全苏贸易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0 页)

"1953 年苏联向居民供应的牛奶和奶制品是 1940 年的 2 倍,植物油和其他食用油、奶制品和糖是 1940 年的 2.5 倍。"(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 年 3 月 21 日)

香肠和肉制品展架:

"1956 年苏联生产肉和肉制品近 300 万吨,或者说是 1950 年的 2.4 倍。"

鱼制品展架:

"1956 年苏联捕鱼量达到 3 600 万吨,或者说是 1950 年的 2.1 倍。"

罐头展架:

"1956 年苏联生产罐头 41.500 万罐,或者说是 1950 年的 2.9 倍。"

糖果展架:

"1955 年苏联糖果产量达到 1825 万吨,或者说是 1950 年的 2 倍。"

(根据关于苏联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措施的决议,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3、65、73、79 页)

蔬菜和糖果展架:

"1953 年苏联向居民供应的糖果是 1940 年的 2 倍,供应的蔬菜是 1940 年的 1.5 倍。"(根据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 年 3 月 21 日)

(十二)

造型艺术展厅

这个展厅的主要题词是:

"艺术属于人民。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

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的会谈资料)

这个展厅要展示苏联写生画、线条画、雕塑领域的巨匠作品。

附注：括号里使用的引文出处不列入陈列题词。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7,л. 179 - 205

№21418 - 1

1950—1954 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1954 年 9 月 7 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二)

机　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出口		进口	
	数量(百万卢布)	所占百分比	数量(百万卢布)	所占百分比
五年的总额	9 191*	100	7 806	100
机器和设备	2 722	30	142	2
燃料、金属、矿物原料	2 281	25	1 665	21
化工产品、化肥、橡胶及橡胶产品	199	2	631	8
建筑材料和零件	24	0.3	77	1
动植物原料(粮食除外)	471	5	1 673	21
活的牲畜	12	0.2	—	—
食品生产原料	47	0.5	2 088	27
食品	169	2	1 264	16
民用工业品	288	3	302	4
供应总工程管理局的(专用物资)	2 788	30	—	—

* 其中包含 1954 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 1.9 亿卢布。

注:(1)出口超过进口13.85亿卢布是因为在出口中包含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提供的总值11.07亿卢布的商品,根据1952年9月15日贷款协议,向种植橡胶提供的总值3 500万卢布,剩下的是苏联提供用外汇支付的商品的和用于非商品的开支以及非商业支出的补偿金。(2)1954年的进出口是根据现在所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207

№21418-2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

(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三)

机 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 单位:百万卢布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应该供应的)		1950—1954年总量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总量	1 114.9	100	1 461.3	100	1 857.7	100	2 329.5	100	2 427.5*	100	9 190.9*	100
机器设备	172.6	15.5	427.6	29.3	611	32.9	650	27.9	860.8	35.5	2722	29.6
燃料、金属、矿物原料	186.2	16.7	446.8	30.5	472.6	25.4	545.1	23.4	630.4	26	2280.6	24.8
化工产品、化肥、橡胶及橡胶产品	27.6	2.5	66.7	4.6	42.2	2.3	26.7	1.1	35.3	1.5	198.5	2.2
建筑材料	2.4	0.2	7.3	0.5	5.9	0.3	4.9	0.2	3.1	0.1	23.6	0.3
动植物原料(粮食除外)	46.8	4.2	105.7	7.2	87.9	4.7	80.9	3.5	149.3	6.1	470.6	5.1
活牲畜	6.7	0.6	0.1	0.01	0.2	0.01	2.1	0.1	3.3	0.1	12.4	0.1

续 表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应该供应的)		1950—1954年总量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食品生产的原料	46.7	4.2	0.4	0.03	—	—	—	—	—	—	47.1	0.5
食品	106.4	9.5	23.5	1.6	14.7	0.8	14.2	0.6	10.2	0.4	169	1.8
民用工业产品	110.3	9.9	103.8	7.1	38.1	2.1	19.2	0.8	16.8	0.7	288.2	3.1
供应总工程管理局的(专用物资)	409.2	36.7	279.9	19.2	585.5	31.5	986.4	42.4	528.3	21.8	2 788.9	30.4

* 其中包含1954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1.9亿卢布。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机 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 单位：百万卢布

商品种类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应该供应的)		1950—1954年总量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总量	765.1	100	1 327.7	100	1 655	100	1 899	100	2 159.5	100	7 806.3	100
机器和设备	45.7	6	28.2	2.2	10.1	0.6	10.3	0.5	47.4	2.2	141.7	1.8
其中：拖车	6.4	9.6	—	—	—	—	—	—	29	—	45	—
燃料、金属、矿物原料	147.4	19.8	244.3	18.4	343.2	20.7	449.2	23.7	480.9	22.3	1 665	21.2
其中：锡	25.2	—	72.7	—	96	—	188.1	—	180.6	—	562.6	—
钨精矿	28.8	—	71.9	—	129.9	—	153.4	—	155.4	—	539.4	—
化工产品、肥料、橡胶	26.9	3.5	360.4	27.1	81	4.9	77.3	4.1	85.9	3.9	631.5	8.1
建筑材料与配件	11.4	1.5	10.5	0.8	16	1	21.6	1.1	18.1	0.8	77.6	1
动植物原料	160.6	21	228.3	17.2	412.4	24.9	420.1	22.1	415.4	19.2	1 636.8	21
其中：羊毛	45.6	—	61.9	—	69.4	—	87.7	—	77.9	—	342.5	—
生丝	17.3	—	43.5	—	51.6	—	76.2	—	75.9	—	264.5	—
烟草	—	—	—	—	88.3	—	97.9	—	96.3	—	282.5	—
食品生产原料	276	36.1	346.1	26.1	499.3	30.2	488.7	25.7	478.1	22.1	2 088.2	26.8
其中：大豆	194.2	—	212	—	213	—	222.3	—	213.3	—	1 054.8	—
花生	22.8	—	43.2	—	147.2	—	132.1	—	131.5	—	476.8	—

续 表

商品种类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该供应的）		1950—1954 年总量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食品	87.1	11.4	90.8	6.8	229	13.8	354.7	18.7	502	23.3	1 263.6	16.2
其中：大米	18.3	—	18.6	—	61.6	—	119.3	—	184.6	—	402.4	—
民用工业品	10	1.3	19.1	1.4	64	3.9	77.1	4.1	131.7	6.2	301.9	3.9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 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7,л. 208－209

№21418－3

1950—1954 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统计

(1954 年 9 月 7 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四)

机 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数量

五年内的总数	9 190.9*	百万卢布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	6.7	千个
锻压设备	0.3	千个
动力和电力设备	198.2	百万卢布
矿山机械设备	45.2	同上
石油开采设备	155.6	同上
提升运输设备	64.8	同上

续 表

铁路牵引列车和设备	88.1	同上
泵式压缩机设备	47.3	同上
化工设备	25.8	同上
企业的成套设备	823.8	同上
轴承	3	百万个
拖拉机	2.5	千台
农业机械	45.5	百万卢布
自动卸货车、客车、专门的	46	千台
汽车零配件	66.8	百万卢布
筑路机械	27.2	同上
仪器	28.2	同上
石油和石油产品	3.3	百万吨
其中：原油	0.5	同上
石油产品	2.8	同上
黑色金属和轧材	2 005	千吨
其中：黑色金属轧材	1 472	同上
可再加工的产品	113	同上
管道	256	同上
合金铁	26	同上
有色金属和轧材	98	同上
电缆和电缆成品	96.8	百万卢布
化工产品	121.6	同上
纸浆	88.7	千吨
纸张与纸板	240.8	同上
糖	101	同上
棉织布	70	百万米
医药和医学仪器	39.3	百万卢布
重要工程处的供应（专用物资）	2 788.8	同上

* 其中包含 1954 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 1.9 亿卢布。

注释：（1）上面所列的商品构成 5 年间的出口订购数量 9 190.9 百万卢布的 86%。（2）1954 年的出口是根据现在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东方局代理局长

H. 希里亚耶夫（签名）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数量

五年内的总数	7 806.3	百万卢布
其中：锡	49.6	千吨
钨精矿	81.7	同上
钼矿	10.4	同上
锑	34	同上
生铁	802.5	同上
煤	2 478	同上
萤晶石	103.8	同上
滑石粉	92.7	同上
油驳和干货驳船	98	艘
拖车	137	台
橡胶	113.2	千吨
煅烧苏打	153.5	同上
桐油	32.3	同上
大豆	2 702.3	同上
植物油	286.7	同上
花生	608.3	同上
油类籽种	301.6	同上
大米	443.7	同上
猪羊牛肉	211.2	同上
大型牲畜	28.9	活重千吨
小型牲畜	41.9	同上
鸡蛋	167.1	百万个
茶叶	57.5	千吨
苹果	45.6	同上
柑橘	51.7	同上
烟草	86.3	同上
黄麻	40.3	同上
苎麻纤维	39.2	同上
大麻纤维	24.5	同上
粗绵羊毛	48.1	同上
半粗绵羊毛	7	同上
生丝	7.6	同上
麻袋	25.1	百万个
鬃毛	7.2	千吨
细毛原料皮	10.4	百万个
软毛原料皮	29.5	百万卢布
丝绸布	45.5	百万米

注释：（1）上面所列的商品构成 5 年间的订购的口数量 7 806.3 百万卢布的 88%。（2）1954 年的进口是根据现在所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 希里亚耶夫（签名）

机　密

1950—1954 年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统计表

（根据商贸协定年度供货列入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贷款和用于发展种植橡胶的贷款）

单位：百万卢布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总　计	百万卢布	—	1 114.9	—	1 461.3	—	1 857.7	—	2 329.5	—	2 427.5
其中：铁合金	千吨	4.6	5	5.9	8.9	4.6	11.6	7.1	21.7	4.1	20.0
黑色金属轧材	千吨	119.4	56.9	276.7	122.7	320.6	157.2	338.8	162.5	416.1	196.0
其中：普通轧材	千吨	115.9	53.6	268	114.8	307.6	139.6	318.2	139.6	390.8	171.3
其中：梁柱和槽钢	千吨	8.8	3.4	28.9	10.5	43.5	17.2	63.5	25.1	73.3	28.8
型铁	千吨	23.4	9.5	43.1	17.2	29.8	12.6	57.1	23.5	66.4	26.8
普通线材	千吨	0.5	0.2	29.9	11.7	26.7	10.5	9.4	3.7	0.2	0.1
薄板材	千吨	12.3	5.5	21.9	10	120.9	52.7	122.7	54.1	46.9	21.5
厚板材	千吨	22.2	9.6	66.3	28.6	—	—	—	—	88.0	37.8
黑铁皮	千吨	2.2	1.2	2.3	1.3	8.4	4.6	9.8	5.3	9.1	5.0
宽钢轨	千吨	29.9	13.5	53.7	22	46.2	20.9	37.2	16.8	77	34.8
轧线	千吨	11.2	7.8	13.3	9.2	10.8	7.5	4.2	2.9	12.8	8.9
优质轧材	千吨	3.3	3.2	8.6	7.9	13	17.6	20.6	22.9	24.7	24.9
其中：螺纹钢	千吨	1.1	1.1	0.6	0.6	2.5	2.5	5.2	5.0	3.6	3.5
变压钢	千吨	0.7	0.7	2.1	2.2	2.8	3.0	2.6	2.8	4.2	4.6
可再加工的普通轧材产品	千吨	1.8	1.3	11.2	9.6	30.8	21.3	22.2	17.3	46.9	29.1
其中：白铁皮	千吨	0.4	0.4	6.3	6.4	12.6	11.7	9	8.9	10.6	10.1
镀锌铁	千吨	1.3	0.9	3.4	2.3	13	8.4	10.6	6.9	10.9	6.9
管道	千吨	12.1	10.5	42	34.1	58.9	58.9	69	70	74.3	69.1
金属制品	千吨	4.4	4.2	23	18.4	11.8	12.7	19	14.8	10.1	10.6
有色金属和轧材	千吨	5.7	11.5	27.5	66.3	22.7	61.1	17.8	52.0	24.5	81.2
其中：铜	千吨	0.8	1.4	5.2	11.6	5.2	11.8	1.9	4.7	10.4	31.9
铝	千吨	1.0	1.5	3.5	6.3	5.0	8.8	5.3	9.5	6.2	10.9
锌	千吨	1.2	1.1	5.7	10.2	0.1	0.2	0.03	0.06	—	—

续 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铜轧材	千吨	0.5	1.8	3.8	11.6	4.5	13.9	2.6	10.4	2.7	14.0
铝轧材	千吨	0.4	1.2	0.5	1.7	1.1	4.4	1.0	4.7	1.4	6.2
黄铜轧材	千吨	0.2	0.7	1.6	5.8	2.0	7.9	1.7	7.0	2.2	11.2
电缆产品	百万卢布	—	26.2	—	23.5	—	11.8	—	16.5	—	18.8
金属切削机床	个	1 813	39.3	770	25.9	1615	41.2	1 858	62.4	769	30.9
锻压设备	个	51	1.2	26	1.6	79	1.9	120	4.0	48	1.6
动力和电力设备	百万卢布	—	24.5	—	32.8	—	28.1	—	42.7	—	70.1
其中:活动发电机	个	10	0.3	439	6.1	45	1.1	57	1.3	241	4.9
电动机	个	4 830	10.7	5 516	7.9	1 095	1.5	840	2.4	1 215	2.2
各种电炉	个	51	0.9	181	5.8	193	2.6	225	5.1	148	2.5
电源变压器	千瓦	123.8	2.5	103.3	2.5	67.7	1.8	12.4	0.4	21.1	0.5
电源开关	个	344	2.0	135	0.7	53	0.3	162	2.9	97	4.0
矿山机械设备	百万卢布	—	9.3	—	9.6	—	4.5	—	2.7	—	12.1
其中:割矿机	个	43	1.4	14	0.5	61	2.1	10	0.4	12	1.0
联合采煤机	个	2	0.2	—	—	4	0.4	17	1.5	9	0.7
岩石装运车	个	55	2.8	2	0.1	—	—	66	2.0	33	1.1
矿井提升机	个	15	3.8	7	2.6	—	—	—	—	21	5
石油钻井设备	百万卢布	—	7.6	—	9.1	—	46.4	—	56.8	—	35.7
其中:钻井台	个	63	3.4	62	3.4	346	28.7	503	31.3	188	11.7
提升运输设备	百万卢布	—	7.3	—	7.6	—	9.9	—	13.6	—	26.4
其中:自动载重车	台	21	0.3	50	1.1	71	2.2	25	0.6	14	0.5
各种起重机	台	14	1.6	51	3.6	81	5.8	116	6.0	105	7.4
铁路牵引列车和设备	百万卢布	—	1.8	—	36.5	—	34.8	—	9.8	—	5.2
其中:蒸汽机车	个	11	1.1	—	—	35	3.5	—	—	—	—
电气机车	个	—	—	198	25.2	14	0.9	85	7.3	40	5.1

续 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压缩泵设备	百万卢布	—	1.4	—	8.9	—	7.6	—	9.8	—	19.6
其中：泵	个	896	0.5	548	5.8	637	3.8	493	4.1	801	5.9
压缩机	个	46	0.9	60	3.1	132	3.2	165	5.5	328	12.1
化工设备	百万卢布	—	—	—	0.7	—	9.1	—	6.0	—	10.0
货车	台	1 897	18.8	3 843	41.8	12 360	101.6	11 071	93	11 809	108.7
轿车	台	128	0.7	516	2.8	727	3.6	1 334	6.4	1 046	7.9
专用车辆	台	179	3.7	381	8.8	333	9.1	270	10.1	85	2.1
汽车配件	百万卢布	—	4.1	—	21.2	—	15.3	—	13.1	—	13.1
拖拉机	台	305	4.5	259	6.3	643	14.6	812	19.4	430	10.7
农业机械	百万卢布	—	8.1	—	7.9	—	10.2	—	16	—	3.3
其中：联合收割机	台	191	2.4	25	0.4	105	1.6	193	8.0	87	1.2
筑路机	百万卢布	—	1.0	—	1.5	—	4.1	—	11.7	—	8.9
其中：推土机	台	—	—	11	0.5	11	0.5	135	4.9	160	6.2
平土机	台	5	0.05	11	0.2	3	0.1	29	0.8	38	1.7
仪器	百万卢布	—	2.7	—	2.9	—	7.8	—	7.4	—	7.4
轴承	千个	446.7	3.4	291.8	2.2	386.6	4.0	964.9	10.4	940.3	16.2
硬合金	吨	1.3	0.7	3.1	1.0	15	5.2	17	6.6	22.3	8.2
光学仪器	百万卢布	—	0.7	—	2.1	—	2.4	—	4.2	—	2.6
企业全套设备	百万卢布	—	4.0	—	128.9	—	145.7	—	180.3	—	364.9
石油及石油产品	千吨	148.9	35.6	715.2	155.8	607.5	129.0	879.9	178.5	935.2	191
其中：原油	千吨	38.9	5.8	61.4	9.2	102.3	15.3	111.2	16.6	139	20.6
航空汽油	千吨	27.7	8.5	57.5	17.1	66.9	16.0	140.3	32.5	61.4	18.6
车有汽油	千吨	43.0	8.2	223.6	46.7	135	28.5	301.3	61.6	175.9	37.7

续 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柴油	千吨	12.2	2.0	126.4	20.9	19	3.2	60.5	10.3	51.5	8.9
润滑油润滑剂	千吨	22.5	10.2	63.0	27.1	68	27.1	39.5	17	45.7	22.0
煤油	千吨	36.9	6.6	86.5	14.7	211.1	36.3	199.5	35.4	134.3	18.4
纸张和纸板	千吨	14.7	15	70.9	44.6	92.2	66.3	42.8	35.7	20.2	35.4
其中：报纸用纸	千吨	8.5	3.9	50.6	22	48.2	20.9	30.5	12.4	12.5	5.4
钱币用纸	千吨	2.7	9.8	1.6	6.3	2.4	9.7	1.4	14.0	4.3	17.4
纸浆	千吨	13.5	5.9	15.7	9.5	35.7	18.7	23.8	11.1	—	—
橡胶和橡胶产品	百万卢布	—	4.4	—	16.9	—	14.3	—	7.5	—	6.7
其中：汽车轮胎	千套	7.2	1.2	91.5	14.7	51.6	10.3	26.3	4.9	31.1	5.7
化工产品	百万卢布	—	21.6	—	46.2	—	21.4	—	18.3	—	14.1
医药和医学仪器	百万卢布	—	6.1	—	11.3	—	9.1	—	5.9	—	6.9
棉布	百万米	10.4	14.9	44.1	59.2	8.7	12.9	1.1	1.7	5.5	7.8
糖	千吨	20.7	17.4	19.9	11.8	15.5	9.8	14.3	9.1	31	12.9
供应重要工程处的专用物资	百万卢布	—	409.1	—	279.9	—	585.1	—	986.4	—	528.3
此外的技术援助	百万卢布	—	3.1	—	31.5	—	31.8	—	56.7	—	118.1

在上面供应的商品中

一、列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中的：

	计量单位	预定供应	1950年供应	1951年供应	1952年供应	1953年供应	1954年应供应
总计	百万卢布	1 200.0	236.1	157.1	315.0	258.7	233.1
企业整套设备和技术援助	〃	670.7	0.4	102.1	152.0	163.1	233.1
其中：设备	〃	557.5	0.4	89.7	142.8	144.6	200
技术援助	〃	93.2	—	12.4	9.2	38.5	33.1
各种设备和材料	〃	529.3	235.7	55.0	163.0	75.6	—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	台	584	—	—	556	28	—

续 表

	计量单位	预定供应	1950年供应	1951年供应	1952年供应	1953年供应	1954年应供应
锻压机床设备	个	95	51	18	25	1	—
金属切削和测量仪器	千卢布	4 039	—	—	3 698	341	—
硬合金	公斤	2 057	—	—	1 859	198	—
试用机床和仪表	千卢布	208	—	—	145	63	—
动力和电力设备	〃	15 505	992	3 528	4 565	6 420	—
其中：发电机和摩托发电机	台	3	—	—	3	—	—
电力变压器	千瓦/时	88.8	—	80.8	8.0	—	—
75马力牵引机	台	10	10	—	—	—	—
蒸汽锅炉和设备	〃	3	—	—	3	—	—
移动电站	〃	38	—	—	26	12	—
电动机	〃	710	—	—	702	8	—
X光设备	〃	13	—	—	7	6	—
电焊机	〃	58	—	—	48	10	—
大功率油断路器	〃	67	—	—	—	67	—
各种继电器	〃	738	—	—	685	53	—
金属水银整流器	千瓦/时	17.2	—	—	4.0	13.2	—
玻璃水银整流器	个	39	—	—	23	16	—
炼钢和铁的电炉	〃	12	1	2	3	6	—
各种电炉	〃	27	—	—	25	2	—
硒整流器	〃	51	—	—	46	5	—
低压机组	〃	10	—	—	5	5	—
压缩泵设备	千卢布	2 501	409	1 865	227	—	—
其中：泵	个	182	66	110	4	—	—
压缩机	〃	32	5	12	15	—	—
矿山机械设备	千卢布	12 372	6 709	—	2 832	2 831	—
其中：割矿机	个	61	33	—	27	1	—
联合采煤机	〃	23	2	—	4	17	—
联合采煤机配件	千卢布	17	—	—	—	17	—
钻孔枪	个	1 216	1 216	—	—	—	—
风镐	〃	20	20	—	—	—	—

续 表

	计量单位	预定供应	1950年供应	1951年供应	1952年供应	1953年供应	1954年应供应
装载车	台	102	55	—	17	30	—
立柱凿岩机	〃	150	150	—	—	—	—
钻孔机	〃	100	100	—	—	—	—
钻采机床	〃	40	28	—	—	12	—
矿灯	〃	12 500	—	—	12 500	—	—
提升运输设备	千卢布	14 995	10 388	1 164	1 226	2 217	—
其中：各种卷扬机	个	51	49	—	2	—	—
矿井提升机	〃	15	15	—	—	—	—
桥式起重机	台	6	—	1	5	—	—
铁路吊车	〃	19	10	8	—	1	—
汽车起重机	〃	12	—	—	8	4	—
各种运输机	〃	92	50	—	7	35	—
各种装卸机	〃	35	16	—	—	19	—
汽车装载机	〃	31	5	—	15	11	—
电动搬运车	〃	19	—	—	—	19	—
铁路设备	千卢布	84 592	11 777	34 215	31 252	7 348	—
其中：工业机车	台	7	—	—	—	7	—
滑接轮机车	〃	92	20	60	4	8	—
电瓶机车	〃	94	11	3	10	70	—
窄轨机车	台	11	11	—	—	—	—
翻斗车	〃	200	—	200	—	—	—
铁路罐车	〃	1 086	—	—	1 086	—	—
铁路平板车	〃	45	—	—	45	—	—
重车厢	个	5	—	2	3	—	—
重建满洲铁路的设备	千卢布	8 996	8 996	—	—	—	—
石油钻探设备	〃	32 288	2 371	1 428	7 849	20 280	—
其中：钻探机床和设备	台	488	335	141	309	—	
渗碳处理机组	〃	4	—	—	4	—	—
冲洗机组	〃	2	—	—	2	—	—
延伸杆	千米	75	—	—	75	—	—
管道牵制器	台	1 370	—	—	1 370	—	—

续 表

	计量单位	预定供应	1950年供应	1951年供应	1952年供应	1953年供应	1954年应供应
套管柱	吨	83.5	—	81	2.5	—	—
钻探设备配件	千卢布	496	5	4	—	487	—
建筑设备	〃	15 003	7 012	4 274	661	3 056	—
其中：挖掘机	台	51	28	7	11	5	—
打桩机	〃	3	—	—	3	—	—
载重汽车	〃	1 350	—	635	715	—	—
各种设备	千卢布	5 374	176	1 233	2 281	1 584	—
其中：超级离心器	台	10	—	5	5	—	—
三轴压延机	〃	8	—	—	4	4	—
冷却机组	〃	8	—	—	4	4	—
冲洗设备	〃	3	—	—	3	—	—
橡胶搅拌机	台	51	4	—	—	—	
氧气装备	〃	4	—	4	—	—	—
硫酸浓缩器	〃	2	—	—	2	—	—
热压器	〃	9	—	—	7	2	—
反应器	〃	12	—	—	2	10	—
黑色金属	千卢布	172 016	54 354	1 845	85 337	30 480	—
其中：带扣件的宽轨	千吨	179.9	85.1*	2.4	43.1	49.3	—
轮箍	〃	25.2	11.2	0.1	9.9	4.0	—
车厢和蒸汽机车车轴	〃	12.1	—	—	7.4	4.7	—
铁路道岔	套	270	—	—	270	—	—
横梁和槽钢	千吨	35.2	—	0.4	34.7	0.1	—
型铁	〃	18.1	—	0.8	17.3	—	—
普通线材	〃	9.9	—	—	8.7	1.2	—
叶状铁	〃	22.3	—	0.1	21.0	1.2	—
管道	〃	25.5	—	0.3	24.0	1.2	—
供应重要工程处的专用物资	千卢布	140 142	140 142	—	—	—	—

* 其中含1949年预支付的5.5万吨。

2. 列入1952年9月15日帮助中国种植、收割和生产橡胶贷款协定中的：

	计量单位	已供应总数(额)	1952 年供应总数(额)	1953 年供应总数(额)
总计	百万卢布	35.6	19.2	16.4
其中：动力和电力设备	千卢布	1 016	877	139
其中：交流电动机	台	52	—	52
电焊变压器	台	15	—	15
电焊仪器	台	4	—	4
移动发电机	台	16	16	—
硒整流器	台	2	—	2
电动机	台	12	—	12
功率计	台	5	—	5
拐角电刷	个	540	—	540
化工设备	千卢布	31	—	31
其中：焊枪	个	4	—	4
乙炔发生器	个	2	—	2
切割器	个	2	—	2
氧气减压器	个	2	—	2
乙炔减压器	个	2	—	2
滑油净化器	个	3	—	3
挖掘机	台	8	—	8
锯木机架	台	2	—	2
汽车运输	千卢布	6 838	2 955	3 883
其中：载重汽车	辆	400	100	300
轻便汽车	辆	80	—	80
汽车配件	千卢布	329	—	329
汽车蓄电池	个	150	—	150
汽车灯	个	1 420	—	1 420
液罐汽车	辆	40	40	—
流动修配厂	个	20	10	10
汽车汽配厂设备	套	6	3	3
筑路机器	千卢布	5 366	2 993	2 373
其中：铲土机	台	15	—	15
平土机	台	15	—	15
挖沟机	台	15	—	15

续 表

	计量单位	已供应总数(额)	1952年供应总数(额)	1953年供应总数(额)
牵引压路机	台	5	—	5
推土机	台	15	—	15
灌木铲除机	台	54	48	6
除根机	台	38	21	17
农业机械、拖拉机和配件	千卢布	18 456	10 404	8 052
其中：拖拉机	辆	490	300	190
拖拉机配件	千卢布	2 392	757	1 635
拖拉机的电气设备	千卢布	20	—	20
修理拖拉机的成套仪器	套	10	4	6
汽车拖拉机的装设	公里	8	—	8
各种犁	个	676	556	120
挂钩犁	个	140	140	—
中耕机	辆	84	84	—
播种机	辆	50	—	50
牵引割草机	辆	120	120	—
各种耙	个	990	840	150
宽幅耙草机	辆	120	120	—
马拉喷雾机	个	50	50	—
农机配件	千卢布	494	—	494
拖拉机灯	个	3 360	—	3 360
拖拉机集油槽和灰尘收集器	个	294	—	294
过滤元件	千个	14.5	—	14.5
灯玻璃	个	690	—	690
三合玻璃	平方米	13.3	—	13.3
钢化玻璃	平方米	5.1	—	5.1
修理柴油机器的整套设备	个	10	—	10
橡胶产品	千卢布	35	—	35
其中：成型盖板	个	1 320	—	1 320

续 表

	计量单位	已供应总数(额)	1952 年供应总数(额)	1953 年供应总数(额)
汽车拖拉机的软管	个	125	—	125
摩擦离合器圈	个	3 564	—	3 564
针线皮带	个	1 400	—	1 400
针织布皮带	个	1 233	—	1 233
成型橡胶元件	千克	30	—	30
毡制产品	千卢布	2.2	—	2.2
滚珠和滚柱轴承	千个	20.9	—	20.9
金属切削机床	台	15	—	15
木材加工机床	台	5	—	5
水压机	台	5	—	5
“巨人”轮胎	套	2 400	—	2 400
普通轮胎	套	400	—	400
柴油机润滑油	吨	966	966	—
汽车拖拉机黑机油	吨	443	419	24
夏季黄油	吨	330	330	—
汽车润滑油	吨	250	206	44
包装材料成本	千卢布	271	262	9
技术援助(派遣专家)	千卢布	826	700	126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 希里亚耶夫(签名)

1950—1954 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统计表

(按年供货)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总计	百万卢布	—	765.1	—	1 327.7	—	1 655	—	1 899	—	2 159.5
其中：锡	千吨	3.8	25.2	6.8	72.7	8.1	96	15.9	188.1	15	180.6
钨精矿	千吨	8	28.8	10.9	71.9	18.1	129.9	21.7	153.4	23	155.14
钼精矿	吨	647	3.1	1 339	8	2 430	14.3	2 940	18.4	3 000	18.3
铍精矿	吨	307	6.3	1 006	12	910	6.4	818	5.7	2 100	13.8
锂精矿	吨	1 800	9.4	706	1.5	3 014	5.6	2 700	4	5 000	7.4

续 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锑	吨	4 003	8.6	5 788	12.2	8 600	18.7	9 100	20	6 500	14
生铁	千吨	85.4	15.4	286.7	51.6	150	27	100.4	18.1	180	32.4
煤炭	千吨	972	37.8	148	5.7	159	6.1	439	17.3	750	28.8
萤晶石	千吨	—	—	—	—	16.8	1.8	37	3.9	50	5.2
滑石粉	千吨	6	0.6	18.1	1.8	25.5	2.5	14.1	1.4	29	2.8
菱镁粉矿	千吨	11	1.7	16.1	2.7	45.6	10.9	4	1	—	—
水泥	千吨	113.8	4.3	197	7.5	215.9	13.7	248.5	15.5	250	15.8
液体和干货驳船	艘	10	2.8	—	—	14	4.2	19	7	55	13.5
拖船	艘	50	6.4	75	9.6	—	—	—	—	12	29
浮动船坞	个	—	—	—	—	—	—	—	—	4	3.1
平底驳船	艘	95	6.4	75	5.1	23	1.6	17	1.2	—	—
橡胶	千吨	1.4	6.1	57.6	339.2	13.8	68.3	20.4	60.1	20	57.7
烧碱	千吨	34.1	4.7	26.9	3.7	29.9	4.2	32.6	4.5	30	4.4
火碱	千吨	1.8	0.5	0.5	0.1	—	—	18.5	4.9	11.5	3.1
桐油	千吨	5	10.4	5.1	10.5	7.4	14.8	5.6	11.5	10	14.3
硫化钠	千吨	—	—	—	—	7	4	10.2	5.9	0.1	0.1
粉末涂料	千吨	5.3	2.8	3.5	1.8	3.6	1.9	3.4	1.8	3	1.6
天然奥立夫油	千吨	0.5	0.8	0.5	0.8	0.8	1.3	1	1.6	1.5	2.4
松香	千吨	—	—	2	1.2	2	1.2	—	—	—	—
大豆	千吨	500	194.2	535.8	212	548.7	213	567.8	222.3	550	213.3
植物油	千吨	39.1	40.7	40.6	51.5	53.4	68.1	80.5	99.7	73.1	95.4
花生	千吨	29.9	22.8	55.1	43.2	187.3	147.2	167.8	132.1	168.2	131.5
油菜籽	千吨	4.6	2.6	7.7	4.7	68.9	44	107.1	73.3	113.3	74.9
豆饼	千吨	42.6	10.7	65	17.5	50.4	13.3	15	4.1	15.2	4.1
大米	千吨	8.9	4.6	4	2.1	72	40.4	149.4	83.8	209.4	117.4
小麦	千吨	17.5	4.6	21.9	6.5	11.1	3.9	—	—	7	2.1
面粉	千吨	5.3	2.9	7.5	4.1	24.9	13.7	15.5	7.1	19.7	9
猪牛羊肉	千吨	9.6	18.3	9.5	18.6	32.3	61.6	62.6	119.3	97.2	184.6
大型牲畜	活重千吨	9.6	5.6	4	2.6	8.2	5.4	5.1	3.3	2	1

续 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小型牲畜	活重千吨	13.6	9.7	11.4	8	9.3	7	4.6	3.4	3	2.3
鸡蛋	百万个	13.3	1.6	9.8	1.1	11.2	1.2	32.8	3.5	100	11.2
鲜活鱼	千吨	1.2	0.5	3.5	1.6	2.8	1.3	2.5	1.2	2.1	1
盐	千吨	33.8	1.1	50.6	1.6	91.9	3.6	92.1	3.1	121	3.9
茶叶	千吨	4.3	18.4	12.3	42.8	20.5	76.9	11.8	47.3	8.6	38.3
苹果	千吨	0.3	0.3	3.1	2.1	12.2	8	10	6.6	20	12.5
柑橘	千吨	—	—	0.2	0.2	12.2	9.5	14.3	11	25	19.4
香蕉	千吨	—	—	—	—	0.1	0.1	1.8	1.5	2	1.6
水果罐头	罐	2 250	2.2	1 580	1.5	4 910	4.8	2 995	3	4 413	4.4
淀粉	千吨	—	—	—	—	—	—	5.4	2.9	6.5	3.5
土豆和各种蔬菜	千吨	21.5	3.9	32.5	4.8	33.7	6.9	30	6.5	29.6	5.7
烟草	千吨	—	—	—	—	26.1	88.3	30.2	97.9	30	96.3
黄麻	千吨	—	—	—	—	—	—	20.1	15.7	20.2	14.6
苎麻纤维	千吨	—	—	5	10.3	9.2	18.9	13	26.8	12	24.7
大麻纤维	千吨	—	—	1.4	2.4	6.6	10.8	8.9	14.2	7.5	12.5
粗绵羊毛	千吨	8.2	44.6	7.4	51.6	7.2	49.4	13.3	74.5	12	61.9
半粗绵羊毛	千吨	—	—	1.1	7.9	2.4	17.9	1.5	9.7	2	12.9
驼绒毛	千吨	0.3	1	0.4	2.4	0.3	2.1	0.4	3.5	0.3	3.1
生丝	吨	634	17.3	1 359	43.5	1 617	51.6	1 991	76.3	2 000	75.9
麻袋	百万个	—	—	—	—	—	—	10.1	11.2	15	16.9
猪羊肠	千束	828	0.8	1 070	1	6 239	7	2 069	2.9	2 450	3.6
鸭毛	吨	—	—	—	—	507	4	1 006	7.9	1 500	11.8
鬃	吨	769.7	31.3	1 239	53.6	2 845	94.5	609	20.8	1 718	41.7
细皮料	千个	792	2.2	2 214	5.9	2 368.7	7.5	2 814.7	8.7	2 200	6.2
粗皮料	千个	18	0.2	44	0.7	45	0.7	40.7	1	5.3	0.1
猪皮	千个	—	—	—	—	45.1	0.4	7.3	1.1	—	—
皮毛原料	百万卢布	—	2.6	—	4.7	—	7.9	—	7.5	—	6.8
丝绸布	百万米	—	—	4	14.2	12.5	51.5	13.9	53.4	15.1	61.2
手工艺品	百万卢布	—	—	—	—	—	1.5	—	3.8	—	3

续 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餐巾和桌布	千套	—	—	4.6	0.1	113.6	1.9	100.3	1.7	86	1.3
地毯	千平方米	—	—	—	—	130.5	3.8	60.1	3.3	58	2.6
珍珠	吨	—	—	227	0.6	227	0.6	181.1	0.5	—	—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 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7, л. 210 - 227

№21418 - 4

统计资料：苏联出口商品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对比

(1954 年 9 月 7 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五)

关于苏联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及其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的对比

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苏联政府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整套设备和技术援助以建设和重建 134 个企业(根据中方的请求，4 个企业停止援建，3 个企业列入其他项目)。除此之外，根据补充承担的义务，苏联将提供 18 个企业的新建和扩建的援助，其中 14 个是新建的，4 个是扩建的，这是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协议提供的援助。在 1953 年协议签订之前苏联已完成了对两个企业承担的援助义务。

如果苏联履行了上述援建义务，中国政府将具备每年生产主要供应产品的新的生产能力，这个能力和 1954 年原有企业生产能力的比较数字如下：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黑色冶金业	—	7	—	—
钢	百万吨	4	5.2—5.8	1.8*

续　表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有色冶金业	—	11	—	—
铜	千吨	1	30	40.6
铝	〃	1	30	—
钼精矿	〃	1	7	4.1
钨精矿	〃	1	30	26.9
煤炭企业	—	21	—	—
煤	百万吨	18	31.9	76.4
石油工业	—	1	—	—
石油(加工的)	百万吨	1	1	0.9
化学工业	—	7	—	—
硫酸	千吨	2	80	323
火碱	〃	1	10	98
合成橡胶	〃	1	15	—
机械制造	—	26	—	—
汽车	千台	2	90	—
拖拉机	〃	1	15	—
滚珠轴承	百万个	2	20—22	2.2
造纸工业	—	1	—	—
纸张	千吨	1	48—53	404
电站(发电量)	千瓦/时	24	1 631.5	1 984.5**

* 统计含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现有设备恢复生产的65万吨。
** 到1954年1月1日电站发电能力,不计在苏联帮助下的发电量24.15万千瓦/时。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中,中国每年还将生产如下产品:

铁合金	43.5	千吨
钒钛精矿	130	〃
硬质合金	0.5	〃
镁	1.2	〃
碳化钙	60	〃
有机合成染色剂和半成品	50	〃
氨硝酸钠	210	〃

续 表

冶金装备	60	〃
采矿设备	20	〃
汽轮机	360	千瓦
涡轮发电机	600	〃
蒸汽锅炉	3.6—4	千吨蒸汽/小时
石油工业设备	15	千吨
金属切削机床	46	千吨
高压开关	13	千套
水银整流器	250	千千瓦
油冷凝器	1 000	千千瓦
青霉素	50	万亿剂
链霉素	36	吨

及其他商品和原料

把1950—195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一些商品与该时期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做一对比也是令人感兴趣的：

	计量单位	**1950—1954年间苏联供应的产品**	**1950—1954年间中国生产的产品***	**苏联供应与中国生产产品的比较(%)**
汽　车	千台	46	—	—
石油和石油产品	千吨	3 272	2 542	129
黑色金属轧材	〃	1 472	5 356	27
铝	〃	21	—	—
铜	〃	23	128	18
锌	〃	7	40	18
纸张	〃	240	1 549	15

* 不包括台湾岛。

注：(1) 苏联在1954年根据现有义务向中国提供的商品。(2) 中国1954年的生产是按照1954年计划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 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7，л. 228－230

№08101

费德林致葛罗米柯报告：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

（1954 年 9 月 9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1954 年 9 月 23 日

第 1528/ДВ 号

A. A. 葛罗米柯同志：

由于政府代表团将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 周年庆典活动，我们认为采取下述措施是适宜的：

一、在 10 月 1 日前成立苏中友好协会。

关于苏中友好协会的建立，苏共中央已有决议。现在，苏共中央正在研究协会的章程和编制问题。

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把苏中金属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等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卖给中国。

苏共中央已原则上决定要摸清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外贸部机关已拟定出关于这一问题同中国政府的协定草案，打算让米高扬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签署该协定。协定草案现在卡巴诺夫同志那里。

三、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这一协定草案已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同中国方面谈判并签署这一协定的任务落到了外贸部的头上。外贸部机关准备建议在北京签署该协定。

四、同中国政府领导人交换意见，讨论苏联、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可能的共同措施来应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的问题。尤其希望中国和印尼之间尽快签署协定。（在日内瓦会议上，印尼政府邀请周恩来访问雅加达，并提出了中国和印尼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正如周恩来不久前同马林科夫同志会晤时所说的，他曾想 8 月份完成印尼之行。）

五、就同日本调整关系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换意见。

关于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步骤的提案即将向您提出。

H. 费德林(签名)

存档

第 2012 号

1954 年 9 月 9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3，д. 40，л. 18－19

№08098

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

（1954年9月15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即将赴华，苏联外交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一、发表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关于苏中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同日本关系问题的声明。

二、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7月22日苏联部长会议已做出决议，批准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草案，任命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人选。已委托外贸部长卡巴诺夫同志在协定上签字。

应考虑改变7月22日的决议，委托A. И.米高扬同志在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中国后在那里签署协定为宜。还希望发表签署协定的联合公报。

三、到1954年10月1日即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阅。

A. 葛罗米柯

1954年9月__日

附件：

草　案
机　密

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中国之行有关措施的决议

一、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中联合声明草案(附件一和附件二①)。

二、改变苏联部长会议7月22日决议(第1511-680c号)第二条规定，委托 **А. И.** 米高扬同志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批准苏中关于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的准备文本(附件三②)。

三、委托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于今年10月1日在报刊上发布成立全苏中友好协会的消息。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3，д. 40，л. 17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66页

№25149

卡巴诺夫致赫鲁晓夫函：苏联与中国、印度、越南贸易的材料

(1954年9月24日)

机　密

第2-75/19062号
1954年9月24日

苏联对外贸易部
呈苏共中央委员会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秘书处：

兹对先前呈您处的文件材料补充如下：

1. 根据截至1954年9月1日相关统计资料编写的有关苏联与中国相互供货状况的资料。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件。——编注
②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编注

2. 关于苏联与印度之间经贸关系的资料。
3. 关于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各项协议的资料。

И. 卡巴诺夫(签名)
1954年9月24日

情况说明：材料已用于本部的工作中。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
И. 科兹洛夫(签名)
1954年12月8日

手写批注：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熟悉一下情况。

苏斯洛夫
9月29日

归档

B. 戈尔布诺夫
12月2日

附件一

……①

附件二

……②

附件三：③

苏中之间的贸易供应状况(根据截止1954年9月1日的统计资料)

根据1954年贸易协议，苏中之间商品相互供应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百万卢布

	已签署合同		截至1954年9月1日发运	截至1954年9月1日供应
	共计	其中截至1954年1月1日完成供应		
苏联供应(包括技术援助在内)	2 065.8	1 319.7	1 231.9	1 139.3
中国供应(包括外汇支付在内)：1）通过贸易	2 121	1 630.0	1 521.6	1 503.1
2）偿还贷款	160	94.2	94.2	94.2

① 列为附件一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二项内容，即苏联与印度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② 列为附件二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三项内容，即苏联与越南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③ 列为附件三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一项内容。——编注

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议,1954年苏联应(向中国)提供贷款数量为2.331亿卢布。根据截至今年7月1日的统计数据(每个季度末编制的贷款供应报告),苏方已向中方提供商品和技术援助共计1.071亿卢布,而根据合同规定今年上半年苏方应向中方提供的贷款总量为1.448亿卢布。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在今年10月10日以前完成全部供应总额。

根据合同规定的商品供应期限,中国外贸组织有责任在10月1日以前向苏联供应中国商品,其总额将比苏方所供应的总额多出3.1亿卢布。

具体原因如下:

1. 根据与中方在合同中所作的相关约定,我们对中方的机器和设备供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进行。而中方向我们供应的大部分商品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原因在于:这些商品——如大豆、大米、花生、肉和肉类加工品、烟草等的生产和采购受季节和交通条件影响较大。

2. 在今年1月23日签署贸易协议时,中方储备了2.2亿卢布,以进行补充订货。今年6—7月份中国只使用了上述储备的一部分,只是在今年8月份才用1亿卢布向工程管理总局提出了一笔主要的订货。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满足中国人所要求的补充订货,与此同时中方今年在其他方面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费用,因此截至今年年底双方相互间的贸易供应仍能够保持平衡。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1954年9月24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43,л.1,13-14

№24884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华经济援助

(1954年9月25日)

绝 密

1. 根据1953年5月15日达成的协议,苏联向中国供应设备,并提供技术援助,建设和扩建134个企业以及24个单独车间、组合机件和机器。

此外，根据额外承担的义务，还要建设或修复 14 个新的企业，并在今后扩建 4 个企业，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达成的协议，已经开始提供这些援助。到 1953 年 5 月 15 日协议签署时，苏联已完成了对 2 个企业承担的援助义务。

在附上的企业完整的名单中，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企业、供应设备的企业、设计的企业的完成计划的期限都做了简单的评价，并附上了民用企业的分布地图。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是建设和修复 7 个黑色金属企业，11 个有色金属和矿业，21 个煤矿、露天采煤厂和富矿厂，26 个一般的机器修理厂，24 所电站，42 个国防工业企业，15 个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上述企业进行援助的总量、性质和基本条件都在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协议中作了规定。

根据条件，苏联将完成 70%—80% 的设计工作，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占预定的技术方案中的设备总价值的 50%—70%，向中国上述所有企业提供的设备的总价值大约为 50 亿卢布，提供的技术援助价值 7 亿卢布。

1954 年，在为 23 个企业和电站完成设计工作和供应设备的同时，也考虑了根据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署的协议向中国提供贷款。关于贷款执行情况的报告见第 658-27/18224 号。

苏联对中国政府履行的援助义务的结果是使中国主要工业品的年生产能力达到了新的规模，1954 年的生产规模如下：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黑色冶金业	—	7	—	—
钢	百万吨	4	5.2—5.8	1.8*
有色冶金业	—	11	—	—
铜	千吨	1	30	40.6
铝	〃	1	30	—
钼精矿	〃	1	7	4.1
钨精矿	〃	1	30	26.9
煤炭企业	—	21	—	—
煤	百万吨	18	31.9	76.4
石油工业	—	1	—	—
石油（加工的）	百万吨	1	1	0.9
化学工业	—	7	—	—
硫酸	千吨	2	80	323
火碱	〃	1	10	98
合成橡胶	〃	1	15	—

续 表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机械制造	—	26	—	—
汽车	千台	2	90	—
拖拉机	〃	1	15	—
滚珠轴承	百万个	2	20—22	2.2
造纸工业	—	1	—	—
纸张	千吨	1	48—53	404
电站(发电量)	千瓦/时	24	1 631.5	1 984.5**

* 统计含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现有设备恢复生产的 65 万吨。
** 到 1954 年 1 月 1 日电站发电能力,不计在苏联帮助下的发电量 24.15 万千瓦/时。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中,中国每年还将生产如下产品:

铁合金	43.5	千吨
钒钛精矿	130	〃
硬质合金	0.5	〃
镁	1.2	〃
碳化钙	60	〃
有机合成染色剂和半成品	50	〃
氨硝酸钠	210	〃
冶金装备	60	〃
采矿设备	20	〃
汽轮机	360	千瓦
涡轮发电机	600	〃
蒸汽锅炉	3.6—4	千吨蒸汽/小时
石油工业设备	15	千吨
金属切削机床	46	千吨
高压开关	13	千套
水银整流器	250	千千瓦
油冷凝器	1 000	千千瓦
青霉素	50	万亿剂
链霉素	36	吨

此外,国防工业企业还可以生产:飞机 1 500 架,其中包括喷气式米格-17 歼击机 1 000 架;航空发电机 3 000 台;机床 1 800 台;机床发电机 2 500 台;对空大炮、坦克大炮和飞机大炮 9 300 门;瞄准器和其他各种光学仪器 25 800 个;Гром-2 型高射炮瞄准器、检测器 250

套；高射炮指挥操作系统 300 套；炮弹 2 300 万颗；炮弹壳 1 500 万个；地雷 300 万颗；水雷和深水炸弹 6 500 枚；木棉和硝化甘油炸药 5.45 万吨；爆炸物品 4.1 万吨；附带识别器雷达照明设备 150 套；飞机雷达设备和无线电测高计及识别设备 2 000 套；移动雷达设备 400 套；复合接收装置 7 900 套；防毒面具 5 200 套。

苏联以直接派遣专家帮助设计企业、提供援助的形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提供的类似援助便宜得多。

2. 中国方面向苏联请求的援助超出了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协议以及附加的备忘录中苏联所承担的义务。

1952—1953 年中国请求完成设计的企业、要求供应设备的企业和提供技术援助进行建设的企业有 190 个(其中包括 44 个军事工业企业)。中国请求提供设备的价值以及为企业进行设计的价值共计 110 亿卢布，其中设备的价值为 95 亿卢布(出口价格)。

苏联在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协议承担对中国的 91 个工业企业进行援助的同时，还根据早先签署的苏中协议帮助中国建设和修复了 50 个工业企业。在这 141 个企业中其中有 35 个是军事工业企业。在中国政府申请的援助中，在民用工业领域申请的援助总额大约被满足了 38%，而申请的军事企业的总额大约被满足了 65%。

与中国政府申请的供应设备的期限相比，向大部分企业供应设备的期限都被延长了 1—3 年。

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没有被完全满足，有以下一些原因。

中国政府指定建设的煤炭工业企业、黑色和有色金属企业没有得到必需的矿藏勘探的充分保障。比如，预计建设的煤矿总生产能力为 5 370 万吨，但只有 9 个煤矿能够保障共计 1 990 万吨的煤炭储备资料。

中国拥有的铁矿储备大约为 60 亿吨，但没有建设指定的金属联合加工厂所必需的关于铁矿储备的勘探资料。

中国政府预定开展的勘探工作的规模、工业的发展和建设，没有干部和地质工程师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专业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方面的保障。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组建尚处于初级阶段。

此外，中国政府预定的由苏联方面帮助设计的工作、由苏联方面供应的设备不能不因为本国工业的需要而受到影响。

为了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援助总量，1954—1957 年平均每年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大约为 16 亿卢布，但是 1953 年向中国提供的企业成套设备只有 1.8 亿卢布，1954 年计划提供 3.7 亿卢布，1955 年打算提供 4.6 亿卢布。

根据苏联承担的义务，向中国提供的设计工作的总价值大约为 5 亿卢布，而预计在 1954—1957 年向中国提供的设备的价值平均每年为 6 亿卢布。

1954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请求对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苏中协议进行修改和补充，并且援助中国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苏联政府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请求(见 1954 年 7 月 31 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但以下各项除外：

为兰州橡胶合成工厂生产硝基丙烯酸和设计合成酒精生产车间并提供设备。这是因为苏联对硝基丙烯酸的生产技术掌握得还不充分,不建设生产合成酒精的车间是为了不使在石油加工厂附近有过多的油气。

为抚顺煤炭联合加工厂的东西部露天煤矿的修复工作进行设计和提供设备。这是由于苏联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协议,已经为该煤炭联合加工厂设计了整套的方案,在此之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关于中国方面在今年 7 月 1 日提出的为建筑工地之间设计管道问题的请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近期已经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建议。

3. 根据 1954 年 9 月 1 日的情况,自苏中协议生效以来,对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的技术援助总额为 1.22 亿卢布(设计费用以及专家到中国出差安装和调试设备的费用),并提供了价值 6.6 亿卢布的设备。

建设完成的 3 座电站、2 个企业以及 12 个单独项目投入了运行。此外,首批建设的 4 座电站以及鞍山金属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单个的车间以及抚顺铝联合加工厂投入了生产(投入运行的企业的名单附后)。

到今年 9 月 1 日,已经对 89 个设施、50 个建筑以及 27 个企业的技术设计完成了考察。

1954 年对 8 个项目、31 个大楼设计、25 个项目的技术设计完成了考察以及为 28 个企业制订了工作计划。

1954 年要为 44 个项目提供总额为 3.7 亿卢布的设备。到今年 9 月 1 日,提供的设备的总额为 1.6 亿卢布。

为沈阳电缆制造厂、吉斯-150 汽车制造厂、铝合金加工厂以及其他的一些企业继续提供设备,这些设备的总供应者是苏联机械和仪表制造部、汽车部、拖拉机部和农业器械制造部、有色金属部。

1955 年根据供应设备相互协商的条款计划,苏联要向中国的 66 个项目提供价值为4.6 亿卢布的设备。

这些设备主要由 18 个部门供应,生产这些设备的苏联工厂大约为 1 200 个。

为了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将向中国派去了大约 1 600 名苏联专家。目前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有 398 名,其中包括:安装和调试专家 148 名,建筑工程师 43 名,工业企业设计专家 29 名,测绘专家和防病虫害专家 152 名,工艺工程师 9 名,机械工程师 4 名,地质工程师 3 名,设计工程师 10 名。

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协议的第 3 条内容,最近 2 个月向中国派遣了 132 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设计单位进行帮助以及为中国的工业设计培养本国的干部。

根据上述协议,每年应该有 1 000 名中国人到苏联进行生产技术训练。在 1953—1954 年到苏联接受训练的大约有 950 名中国人。

4. 中国人可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

(1) 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在中国主要的 8—10 个工业建设地区组织大规模的机械化建设;

(2) 在建设北京到新疆的铁路问题上加大技术援助的力度；

(3) 显著增加派往苏联企业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的数量，以便接受训练；

(4) 加强鞍山金属联合加工厂第一期的改组，并对该厂第二期的建设提供技术帮助；

(5) 帮助设计高射炮试验场，因为这类高射炮不能同其他的大炮一样在大炮试验场的中央进行试验，苏联已经接受了对这类高射炮试验场进行设计的义务。

1954 年 9 月 25 日

РГАЭ，ф. 4372，оп. 11，д. 1865，л. 1－8

№08100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

(1954 年 10 月 12 日以前[①])

机　密

附件 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公报

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中两国科学技术合作问题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最后于 10 月__日在北京签署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苏联政府授权，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 А. И. 米高扬同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代表中国签字的是____。按照协定，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科学技术领域，通过交换相应信息以及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经验，以促进合作的发展。

为制定实施合作的措施和给双方政府提出有关建议，成立了苏中委员会，委员由苏联和中国各派 7 人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在莫斯科和北京召开。

为保障双方在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上保持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

① 该档案原件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和国政府相应地在北京和莫斯科派1名他们任命的委员会成员。

该协定的期限为5年。如果在这一期限到达之前1年内,双方均未宣布希望该协定终结,那么该协定将再延长5年。

苏联政府方面任命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苏联建设部部务委员会委员В.И.奥夫相金同志,苏联国家计委机械制造局副局长Н.Н.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苏联食品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А.Л.马尔琴科同志,苏联日用工业品部技术管理局局长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苏联农业部部务委员会委员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苏联驻华贸易代表В.П.米古诺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任命的代表是____。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是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密切合作事业的新的重要贡献,其目的是相互帮助和达到共同经济繁荣。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67—2268页

№10219

多勃雷宁与哈什谈话纪要: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

(1954年10月21日)

机　密

文本第__份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1954年11月16日

第__号

摘自苏联驻美国代办А.Ф.多勃雷宁的工作日记

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哈什谈话纪要

1954年10月21日

谈话开始时谈到了许多涉及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哈什声称,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似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感到强烈不安,而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卷入这场远东的冲突。美国政府从来

未考虑把福摩萨(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以目前“美国国内存在的情绪”而言，如果现在就把福摩萨(台湾)“交出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控制权力。在说这番话时，哈什肯定地说，军事考虑只在这里起着次要的作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甚至还担心，在这一地区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美国第七舰队可能会处于困境，因为第七舰队处在一个狭窄的海峡里，没有多大的行动自由。据哈什说，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福摩萨仍然是整个中国的“象征”，美国往这里投入了“太多”的美元，美国“现在不可能”失去这个“象征”。

据哈什说，虽然美国政府从来未考虑把福摩萨“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又不想因为福摩萨而被卷入“大战”之中。蒋介石似乎考虑到了所有上述情况，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前的微妙处境——美国现在正进行激烈的竞选运动，共和党政府在自己的行动中受到某种束缚——以便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袭击除了其他一切原因外，就是为了追求上述目的。根据艾森豪威尔的直接命令，美国决定立即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派往福摩萨，去“制止”蒋介石有可能采取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挑衅”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此。饶伯森向蒋介石指出，现在，特别是在联合国开会期间，不是积极行动的时候，包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点扔炸弹。同时他向蒋介石许诺，美国方面将继续向他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应当指出，哈什在谈话过程中曾数次强调了艾森豪威尔对自己那帮“好战”的参谋长，特别是海军上将雷德福所起的“遏制”作用，雷德福明显地向往拿破仑的战绩。据哈什说，艾森豪威尔已开始越来越坚决地干预外交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完全被杜勒斯所垄断。哈什说，在这方面他“准确地知道”，好几次艾森豪威尔在各种外交问题上不同意杜勒斯意见的情况，而这在以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对于目前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议，哈什说，在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担心，怕法国人和英国人会要求此次会议结束之后到会议通过的协定批准之前的某个时间，举行有苏联参加的外交部长会议。哈什说，这里很清楚，在法国、英国甚至西德存在着一些有影响的集团，他们都赞成在关于德国问题的巴黎协定批准之前举行类似的会议，因为这些集团认为，这类会议可能取得某种成就。据说这是因为，如果这个会议失败的话，苏联“会顾及到”由西方大国制订的有关协定“被批准的威胁”。如果这个会议仍然以失败告终，那么有关国家的议会将比较容易批准巴黎协定。但是美国国会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坚持认为，应当在与苏联举行任何谈判之前批准协定。在协定批准之后，美国“自己就会准备参加有苏联参加的会议”。据哈什说，杜勒斯在巴黎向孟戴斯-弗朗斯、艾登和阿登纳宣布了这个意见。

关于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哈什说，目前国会对这一关系的恶化感到强烈不安，认为这种恶化“太过分”，必须“趁还不是太晚”而暂停这种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原因。促成国会形成这种意见的因素之一，是目前尼赫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这里正十分密切地注视着这一访问。国会现在认为，必须继续“援助”巴基斯坦，但不要过分吵吵嚷嚷，以免“平白无故激怒”印度，同时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哈什说，美国方面可望在最近半年内采取有关步骤。

我就现在正进行的美国竞选运动询问了哈什的意见。哈什说,这个运动中有一些独特的特色:在这次竞选运动中听不到加强反苏政策或加强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有经验的政客考虑到美国居民广大阶层情绪中最近发生的变化,认为以这个题目作文章"当前收效不大",所以在自己的竞选运动中避免涉及这个问题。选举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麦卡锡主义影响的削弱。比如,只有不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还在试图炫耀自己与麦卡锡的友谊,而大多数候选人则认为,这种炫耀在国内当前的情绪中,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损害而不是益处。近一年来这方面局势变得很厉害,而且不是朝对麦卡锡有利的方向变。

谈到竞选运动的激烈,哈什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说共和党人甚至在这个运动中利用了利比里亚的总统杜伯曼,他们把杜伯曼的来访专门安排在竞选运动最火热的时候以借此争取黑人选民的选票。在华盛顿和纽约给予黑人总统杜伯曼的"豪华接待"以及这种接待被美国报刊广泛地宣扬,毫无疑问具有上述的竞选考虑。共和党领导人向杜伯曼"建议"的"熟悉"美国之行的访问路线,依据的也是这种竞选考虑,这条路线通常是通过有大量黑人居民的城市和州。

谈话是在大使馆共进早餐时进行的。

A. 多勃雷宁(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69—2273页

№10207

扎鲁宾与杜勒斯谈话纪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1954年11月3日)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1954年11月12日
第889号
摘自苏联驻美国大使Г.Н.扎鲁宾的工作日记

与国务卿杜勒斯的谈话纪要

1954年11月3日

今天应杜勒斯之邀请拜访了他。

在通常的寒暄之后杜勒斯声称,美国政府已仔细研究了苏联政府1954年9月22日的

备忘录。杜勒斯说，从该备忘录中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希望继续与美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在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讲话中阐述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进行谈判。

因为苏联政府同意继续进行上述谈判，所以他杜勒斯才邀请我到他这儿来，以便把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交给我。在该备忘录中阐述了他的政府就进行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谈判的进一步程序问题的某些考虑和建议。

然后杜勒斯说，除了备忘录中所阐述的以外，他还想就该问题谈点非正式的意见。美国政府在美苏就原子能问题谈判的初期阶段曾认为，在谈判具有秘密性质的条件下才可以获得更大进展。杜勒斯认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了解这一问题，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知识。杜勒斯随后声称，如果顾虑进行原子能谈判的通信今后可能在报刊上发表，那么这种通信在某种程度上就利少弊多。

在就原子能问题交换头一批文件后，苏联政府提议发表所有的来往信件；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个提议，但他坚持认为，秘密交换意见才更为有益。他杜勒斯想了解一下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此时他又补充道，比如可以达成协议，哪些文件可以发表，哪些文件最好不发表。同时他声称，我们两国间在谈判中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决定什么样的文件可以发表。

为明确起见我问杜勒斯，我对他的意思理解得是否正确，即美国政府认为，苏美就原子能问题进行的进一步谈判最好是秘密进行，并且某一文件是否发表的问题应当单独决定。杜勒斯回答，他认为可以达成协议，美国与苏联间关于原子能问题的进一步通信将是秘密的，或者关于某个文件是否秘密将在每个单独情况下通过协商决定。

我问杜勒斯，他所阐述的进一步谈判的两个办法中哪一个对美国政府更可取一些——是对随后所有通信都保密呢，还是对某一文件是否保密应每次单独协商。

杜勒斯回答，最好是预先知道某个文件将发表还是不发表，因为这一情况不得不在撰写文件时予以考虑。

我又问杜勒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希望。

杜勒斯宣称，他认为，如果苏美间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今后进行的通信将是秘密的话，那么谈判就可取得更大进展。

我向杜勒斯保证，我将把备忘录文本转交苏联政府，并把他所谈的苏美间今后就该问题进一步谈判的非正式意见一并转告苏联政府。

谈话结束时杜勒斯称，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对关于原子能问题的谈判发表一个声明。国会建议发表以下消息："国务卿杜勒斯今天接见了苏联大使扎鲁宾，并向他递交了一份照会，这是对苏联9月22日就总统关于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中进行国际合作建议的备忘录的答复。"

谈话时在场的有：美方——梅尔钦特，我方——大使馆一等秘书斯米尔诺夫斯基同志。

谈话持续了15分钟。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2274—2277页

№10208

多勃雷宁与比利谈话纪要：远东局势与美国的政策

(1954年11月5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第902号
1954年12月8日
摘自苏联驻美国代办 A. Ф. 多勃雷宁的工作日记

与英国大使馆参赞比利谈话纪要

1954年11月5日

在谈话过程中涉及到几个问题。

一、近东和中东的局势

我借口说比利应熟悉近东和中东的局势(他曾在伊拉克担任数年英国代办)，所以向他询问该地区的局势，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作用和英国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比利的谈话很零散，他的意见可以归结为：现在美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逐步扩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公约上，希望有一些单独的阿拉伯国家加入该公约——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总体上反对与土耳其建立紧密的联盟。同时，考虑到自奥斯曼帝国时代保存至今的这些国家强烈的反土耳其情绪。伊拉克看来是可以期待在比较近的将来加入土耳其—巴基斯坦公约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英国曾是促成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基本力量之一。但是，目前英国已对该联盟的活动“有些失望”了，因为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个联盟一直进行了许多“消极的”活动(比如反对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但在“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包括建立近东和中东整个地区的集体“防御”问题上，却又太不果断。美国尽管还在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认为它在将来还可能“有用”，但也不反对伊拉克加入巴基斯坦—土耳其公约，尽管这将削弱阿拉国家联盟，因为这个联盟的成员国都反对伊拉克的类似行动。比利在说这番话时是想让我明白，英国认为自己的老“盟友”伊拉克参加巴基斯坦—土耳其集团是有益的，尽管在该集团美国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英国希望有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伊拉克获得对该集团以及对将来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更为广泛的集团施加影响。

当我询问他对英国与埃及缔结关于苏伊士运河协议的看法时，比利说，英国政府认为，条约的7年期(包括其中关于土耳其的条件)是“足够长”的，到这一期限结束之前“还来得及决定，为保卫不列颠在近东的利益应采取什么样的新措施”。

关于欧洲集团现在在美国进行的十分活跃的有利于以色列的运动使美国政府受到批评的问题，比利说，这些“叫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竞选运动的缘故。这类“叫喊”在1948年和1950年的选举运动期间也曾发生过，当时的数量更大。用比利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它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批评并不特别担心的缘故。

二、远东局势

当问到他对远东局势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看法时，比利声称，艾森豪威尔政府及总统本人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之间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扩大“感到十分不安”。在说这番话时比利证实，去年美国政府和有影响集团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上似乎发生了“初看起来不起眼，但意义深远的分歧”，尽管考虑到美国的国内政局，这一分歧无论如何不会被渲染。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坚信，毛泽东政府牢牢掌握着政权，所以对大陆中国只好“不再理会”。比利认为，这一点是“足够明显的”。在刚结束的美国竞选运动中，与以往进行的竞选运动不同的是，这次竞选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关于“解放”中国的问题，而且总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竞选运动中很少被提及。比利认为，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似乎是反映了美国领导集团的相应立场。但是，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出于内政外交的考虑，尤其是为了对数不清的居住国外的中国居民保留某种“标志”。因为这些人在东南亚各国特别有影响力)也没有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把福摩萨(台湾)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将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它。比利说，正是要“让北京明白这一点”，美国政府决定加紧与蒋介石缔结双边“防御”协定。否则的话，北京就可能会以美国立场“不明朗”为由，对福摩萨采取“冒失”的行动，以至于引起美国的“自动”干预并造成远东大规模冲突的危险，而这似乎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担心并极力避免的。比利在说这番话时重申，美国正在逐步采取使福摩萨“中立化”的方针，就是既保卫它，但同时似乎又“将不允许”蒋介石“向北京挑衅”。在与蒋介石的双边条约的草案中，美国不顾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似乎打算足够明确地奉行一条路线，即这个条约只涉及福摩萨而不涉及大陆中国。在讲述这层意义时，比利重申，如果美国政府的类似立场在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反映出来的话，就意味着美国朝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向有了“一定位移”。比利好像是一带而过地指出，在这件事情上，英国政府的立场也起了“某种作用”，但比利却回避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三、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计划

关于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计划和洛奇最近在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发言，比利在回答我的有关问题时指出，从各方面情况判断，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大大简化”自己的初步计划，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害怕美国国会可能拒绝批准这样的计划，特别是如果苏联及与苏联友好的国家也将参加该计划的话。当前，在美国与英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间，正就缔结关于原子能问题的双边协定进行谈判。比利认为，这些双边协定应该成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交换原

子能情报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进行合作的主要“工具”。从各方面情况判断,国际原子能同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着国际协定登记局的作用,它登记美国与其他国家间(供货国与收货国之间)缔结的协定以及交换有关上述问题的非秘密情报。

谈话是在我邀请比利共进午餐期间进行的。

A. 多勃雷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78—2282页

№2139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954年11月18日)

机 密

第1876/ДВ号

致M. A. 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张闻天转交给苏联外交部的,关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如何领导苏联外交部以及苏联外交部中央和境外机关内党组织工作的问题列表。

附涉及上述问题的列表,共计1页。

B.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年11月18日

附件:

1. 苏共中央是如何领导苏联外交部的工作?

2. 苏共中央是如何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外事活动实施统一领导的?

3. 苏联部长会议是如何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实施领导和监督的?

4. 在苏联部长会议中是否存在有这样的机构,如对外政策委员会,以协调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外交活动?

5. 在苏联外交部中除了党的委员会外,是否还存在有党小组?

6. 党委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党委的任务和职能是什么？

7. 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附属的对外政策事务司和外贸司之间，境外事务司和对外关系司之间关系如何？

8. 苏联境外大使馆和公使馆内的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

9. 苏联使节和使馆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5，л. 101 - 102

№21393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接待张闻天的问题

(1954年12月3日)

致苏共中央：

中共中央请求苏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有机会了解苏联外交部的工作组织和系统如何配置，以及苏共中央如何对外事和国际活动实施领导等问题。张闻天同志已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列表。

根据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报告，外交部已起草了一个计划，以便张闻天同志了解苏联外交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将受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各部门负责人的接待。

张闻天所提出的问题具体涉及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司及出境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情况。关于该问题，苏联外交部已发送给苏共中央审阅(见附件)。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巴拉年科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等同志负责接待张闻天同志，并就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4年12月3日

第23-с-2637号

手写批注：

归档。举行会谈的日期为1954年12月11日。

И. 维诺格拉多夫

附件：

张闻天提交的问题清单

1.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各司及出境委员会与苏联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

2. 苏联境外大使馆和公使馆内的党组织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

3. 苏联境外使节和使馆内党组织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5, л. 103－104

№09932

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

(1954年12月11日以前)

一、苏中金属股份公司

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的苏中协议，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而成立的。

上述协议规定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股份资本为2 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

苏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房屋、建筑物、设备、运输工具、地质勘探工作的费用、材料及其他商品物质价值，总计1 400万卢布。

中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新疆地区为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所必需的土地地段以及工业设施和任务所必需的建筑材料，总值为1 400万卢布。

根据苏联和中国政府交换的照会，公司的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一方的资本为5 000万卢布。

截至1954年4月1日的股份资本额为：

单位：万卢布

	苏　方	中　方	总　计
总计(其中)	5 077.4	4 993.6	10 071
1. 已办手续的投入资本			
房屋与建筑物	321.7	—	321.7
设备和材料	3 173.1	—	3 173.1
地质勘探工作	164	—	164
现金	204.7	2 284.5	2 489.2
航空地质和航空摄影工作	720.3	—	720.3
运输服务	20.3	—	20.3
设计工作	65	—	65
总计	4 671.1	2 284.5	6 955.6
2. 未办手续的投入资本			
设备和材料	406.3	—	406.3
土地地段和建筑材料	—	1 400	1 400
建筑工作	—	1 309.1	1 309.1
总计	406.3	2 709.1	3 115.4

产量

公司经营期间每年的产品产量如下：

产 品 名 称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一、1951年计划不变价格的总产值(万卢布)	1 501.6	2 589.48	3 883.13	4 805.1
二、产量(吨)				
1. 绿柱石10%精矿	873	1 004	1 204	1 300
2. 锂辉石4%精矿	1 905	3 155	3 863	5 000
3. 钽—铌精矿	0.98	4.1	6.5	5.0
4. 铅50%精矿	—	—	—	9 000
5. 锌50%精矿	—	—	—	5 000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19	205	122	100
7. 含铅15%的铅—锌矿石①	2 100	10 300	18 700	—

① 此处复印件字迹不清，系判译。——译注

成立公司的协议约定,向苏方提供按世界市场价格购买公司的50%产品的权利。在向中方购买其份额的产品并运往苏联时,这些产品应根据中国的法律缴纳出口税。

在公司的各企业中共有8 921人,其中进行生产活动的有5 970人,进行基本建设的有691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有1 750人。在公司工作的苏方人员共计400人。

基本费用

公司在3年内的基本费用如下:

单位:万卢布

	三年总和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计划
支出总额	5 554.44	681.4	1 716.74	3 156.3	4 083.7
1. 地质勘探工作	1 703.78	203.86	651.72	848.2	1 440.0
2. 工业建设	2 602.38	251.98	478.62	1 871.78	986.78
3. 住宅建设	750.34	151.98	338.14	253.02	487.68
4. 公用事业和文化生活建设	419.3	56.1	179.9	183.3	435.86
5. 建设采矿石油中等技术学校	—	—	—	—	697.56

从上面列出的表格可以看出,在3年内用在工业建设上的费用仅为2 602.38万卢布,或者说占总费用的47.3%。

原料基地和生产前景

公司主要有两类企业:开采稀有金属矿床、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铌)精矿和云母—半成品的企业以及生产铅和铲精矿企业。

根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索夫同志的鉴定意见,公司的绿柱石和锂辉石矿床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床之一,并且有很大的工业价值。铅和锌矿床,虽然也富含金属矿石,但它缺乏巨大的……①

截至1954年4月1日按A-B-C-C类计算,矿物的可采储量分别为:绿柱石1.46万吨,锂辉石15.41万吨,云母—工业半成品93.3万吨,铅12.66万吨,锌17.38万吨。

已开采矿床的勘察储量使我们可以根据它来计划今后几年的最低生产量,具体如下表: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按1951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万卢布)	4 805.1	4 870.0	5 560.0	6 460.0
生产总量(吨)				
1. 绿柱石精矿	1 300	1 400	1 550	1 700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续 表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2. 锂辉石精矿	5 000	6 000	8 000	10 000
3. 钽—铌精矿	5.0	6.0	7.0	8.0
4. 铅矿(含量 50%)	6 900	6 900	7 500	7 500
5. 锌矿(含量 45%)	5 000	3 700	4 000	4 000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100	100	—	—

为使产量达到上述规模，公司必须补充基建投资额 22 480 万卢布，其中各年度分别为：

	亿 元	万卢布
1954 年	2 042	4 080
1955 年	3 520	7 040
1956 年	3 180	6 360
1957 年	2 500	5 000

成本及出厂价格

每吨产品的商业成本如下：

单位：卢布/吨

精 矿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1. 绿柱石 10%	11 481	13 472	13 469
2. 锂辉石 4%	800	1 417	1 385
3. 钽—铌	248 800	247 800	287 700
4. ……①			
5. 锌 45%	—	—	731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3 902②	11 309	10 924
7. 含铅 15%的铅—锌矿石	250.3	250.6	—

上述成本中未包括苏方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1953 年这一费用为 719 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 334.5 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 384.5 万卢布；1954 年第一季度这一费用为 159.1 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 91.9 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 67.2 万卢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公司的产品成本逐年增加。之所以成本增加主要是由于缴纳了公司产品流转税、冲销地质勘探工作费用的数额增加、矿石中金属含量减少(1951、1952 年未征收流转税，1953 年缴纳流转税款 184.2 万卢布，按 1954 年计划，将缴纳 190.4 万卢布；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② 原文如此，疑为 13 902 卢布/吨。——编注

地质勘探工作费用1953年冲销产品成本150万卢布，而1954年计划冲销340万卢布；绿柱石矿石含量降低一半，1951年为0.63%，1952年为0.38%，1953年为0.32%)。

公司产品的出厂价格根据贸易协定的价格确定，这一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并显著低于成本，具体数额如下：

单位：卢布/吨

产品名称	1954年计划成本	世界市场参考价	公司出厂价	苏联工业部门出厂价	…①
绿柱石10%精矿	13 469	2 496	7 000	2 000	…
锂辉石4%精矿	1 865	517	1 487	2 800	…
钽—铌精矿	367 700	40 171	60 000	44 514	…
云母—半成品	10 984	—	18 100	16 078	…
铅50%精矿	915	585	535	245	…
锌45%精矿	780	394	412	518	…

在目前的产品成本和现行的出厂价格情况下，公司经营是亏损的。1953年公司亏损的数额达686.8万卢布，主要是由于自1953年9月1日起提高了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提高了26%，因为对所销售的产品，苏联外贸部全苏联合公司不用人民币支付，于是在稳定出厂价的情况之下，公司对1953年销售的产品就少收了相当于527万卢布的人民币。这样一来，由于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以人民币计算的出厂价实际上是降低了26%。1954年销售产品的亏损额增加到1 446.7万卢布，其中苏方亏损为723.3万卢布，而考虑到给苏方工作人员的补助工资，苏方1954年的总亏损额为1 442.3万卢布。

公司目前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和继续发展生产的美好前景。过去的几年内建立了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铌、铅和锌精矿的采矿工业企业。这些年，公司培训了当地的工人干部并挑选了一些必需的苏联工作干部。

二、苏中石油股份公司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是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3月27日的协议组建的。

最初的股份资本数额规定为4 600万卢布，后来根据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

根据初步估算，双方各年度投入资金如下：

单位：万卢布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总　计
双方共投入	4 790.6	6 534.7	7 802.6	1 824.6	20 952.5
其中：苏方	2 490.6	3 357.9	3 834.3	8 681.0	10 550.9
中方	2 300.0	3 176.8	3 968.3	9 565.0	1 0401.1

---

① 此表最右边一项复印件缺项。——译注

投入资金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卢布

	总　计	苏　方	中　方
1. 土地地段	1 350.0	—	1 350.0
2. 房产	1 874.7	—	1 874.7
3. 设备和材料	18 777.6	9 274.8	6 508.8
4. 航拍地质工作	1 096.8	1 096.8	—

……①产品，其加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

各年度钻探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发展情况见以下数据：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钻探总计(千米)	8.5	26.1	34.5	42.0
其中：勘查钻探(千米)	5.8	9.3	19.9	30.0
生产钻探(千米)	2.7	17.8	14.9	12.0
结构钻探(千米)	6.2	2.8	8.4	6.0
物理探矿工作(千平方米)	8.0	26.6	48.8	63.7

由于进行了上述地质勘探工作，业已查明以下可供深层勘查钻探的良好结构：安集海、霍尔果斯、南捷克斯京(Южно-Текстинская)、科桑-托凯(Косан - Токайская)、克拉玛依、瓦拉-托(Уара - то)。现正在安集海、霍尔果斯、科桑-托凯等结构上进行深层勘查钻探。

位于开采区内的独山子矿床第三级采矿层 1954 年 1 月 1 日的石油工业储量为 A2 - B 级，580 万吨。

目前正在进行侏罗纪和白垩纪更深采矿层的工业含油量的调查工作。

1953 年的石油开采量为 70 200 吨，而 1951 年仅开采 3 500 吨。

石油开采和加工量的增长情况、轻柴油产品产量及各年的石油总产量见下表：

名　称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石油开采(吨)	3 500	52 100	70 200	75 000
石油加工(吨)	3 500	52 100	70 100	75 000
其中石油产品加工：汽油(吨)	600	11 500	20 400	33 300
煤油(吨)	600	1 600	3 900	7 500
柴油(吨)	300	350	17 500	18 000

全部开采的石油均送到公司的石油加工厂进行加工，而石油产品则通过新疆的中华人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民共和国贸易组织在中国国内销售。

1954 年新疆的石油产品需求量如下：

单位：万吨

	需求量	供给渠道	
		苏中石油公司	由苏联进口
汽　油	4.75	3.3	1.45
煤　油	0.70	0.70	—
柴　油	2.03	1.80	0.23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生产的石油产品的出厂价格和苏联石油出口联合公司供给新疆的石油产品的出口价格见下表：

单位：卢布

	1953 年每吨的商业成本	新疆的每吨现行出厂价	折合为新疆内部价格的出口价格(独山子交货)
汽　油	481.1	556.8	494.58
煤　油	240.5	278.4	645.30
柴　油	200.5	231.6	631.86

上述的石油产品商业成本并不反映实际状况，因为其中未包括由苏联预算向苏联工作人员支付的补充工资以及没有把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计算在内。

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分别在 4 年内注销，并且查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花在探查钻探无效部分上的费用为全部探查钻探费用的 30%，而当时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一费用却分别计划为 45%和 75%。

如果将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的费用及完全抵消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列入预算，则石油产品的成本增加 26%，这时实际出厂价便低于商业成本。

1951—1954 年向基建费用的总额达 25 482.3 万卢布。

各年度的基建费用额及其用途如下：

单位：万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　计
基建费用总额	3 016.6	7 309.4	8 107.3	7 049.0	25 482.3
其中：探查钻探	291.4	904.3	2 061.1	2 741.0	5 997.8
生产钻探	173.3	730.8	961.6	640.0	2 505.7
地质勘探工作	81.7	1 316.2	817.5	650.0	2 865.4
工业建设	2 416.2	4 012.0	3 516.2	2 426.0	12 370.4
其中：石油加工厂	—	720.0	1 051.5	1 889.0	1 960.4
住宅建设	54.0	287.8	450.9	592.0	1 384.7

上述期间基建费用的财政拨款来源是双方同等投入的股份资本和折旧扣除款，二者在总费用数额中的比重分别为91.2%和8.8%。

由于所进行的各种工作，公司已经建立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足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的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独山子石油区建造了年产15万吨石油的气压管道和裂化设备，建设了总功率为1 500千瓦的发电站3座，修建了装有39台机床的维修机械厂，可保存1.4万立方米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油罐，年工作量为2.5万米的修理钻探管的管道基地，奎屯河上的进水装置、黏土厂、重晶石再生和粉碎厂以及建设了总面积为1.3万平方米的住房。

为了减少从苏联运送重晶石，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在伊宁布地区组织了对当地的重晶石矿床的开采。

由于公司经营的结果，公司获得如下的利润：

单位：万卢布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计划)	总　计
总利润	52.0	66.4	239.5	164.4	522.3
苏联分红利	18.7	23.9	86.2	59.2	188.0

各年度苏方投资的效率如下：

单位：%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计划)	总　计
苏联投资的分红利率	0.75	0.41	0.78	0.56	…①

应当指出，公司生产成果和投资效率，是计入苏方提供补充工资和全冲销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得出的支出统计结果而确定的。这一支出费用的数额可从下表看出：

单位：万卢布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计划)
苏方工作人员的补充工资	65.4	260.8	387.4	410.8
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总额	300.0	771.3	434.2	243.1
未考虑到的费用总计	365.4	1 032.1	821.6	653.9

从上表可以看出，仅仅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一项就显著提高了苏方得到的利润。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字。——译注

截至1954年7月15日,公司共有工作人员5 6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01人。苏联工作人员的数量为4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265人。1955年计划全体工作人员达到6 84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496人。全体工作人员中,苏联工作人员为35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255人。

根据已提出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1955—1957年间的工作量如下: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钻探总计(千米)	75.0	90.0	100.0
其中:探查钻探(千米)	50.0	60.0	70.0
生产钻探(千米)	25.0	30.0	30.0
开采石油(万吨)	10.0	12.5	15.0
加工石油(万吨)	10.0	12.5	15.0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这一决议草案,1955—1957年的基建费用总额双方投资额及利润规定如下:

单位:万卢布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基建费用	9 500	9 800	11 400
双方投资	5 300	5 100	6 000
总利润	252	300	…
苏联红利份额	90.7	108.0	…
苏联投资的利率(%)	0.65	0.65	…①

根据石油开采和加工的预计增长情况,1955—1957年可以满足新疆石油产品的如下需求量:

单位:吨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加工量	需求量	加工量	需求量	加工量	需求量
汽油	40 000	52 700	50 000	57 500	60 000	…
煤油	11 500	11 000	12 500	13 500	15 000	…
柴油	20 200	18 000	25 000	22 500	30 000	…②

① 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译注
② 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译注

因此，新疆所需的煤油和柴油完全可以满足，而1956—1957年的汽油加工量也接近这一产品的需求量。

苏中石油公司已建立起物质技术基地，足以保证今后3年(1955—1957)进一步发展石油的钻探、开采和加工。

公司已拥有进行当前生产活动的一批苏联和当地的骨干，并正在培训进一步发展生产所需的当地干部。

虽然在新疆石油的工业储量目前还不太多，但苏中石油公司有能力查明并投资开采当地的矿床，从而准备好较多的有利于深层探查钻探的地质结构，开采独山子矿床……①和新的前景可观的开采层。

三、苏中造船股份公司

苏中造船股份公司是根据1951年7月28日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成立的。

协议规定，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建设和修理海船及其他水上工具。

根据1951年7月28日的协议，中国政府将大连市的“大连船坞”造船修船厂作为公司的财产(确定其价值为4 660万卢布)并作为公司的股份资本投入该公司。公司股份资本的一半由中方投入，另一半由苏方投入。苏联政府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辽东—多摩那浦”(Риото-Таманаура)应得的1 000万卢布，并通过转账作为自己的股份资本，此外还通过转账从划拨账户上支付现金1 300万卢布作为股份资本。

公司1952年的生产计划额定为4 960万卢布，完成了94%。1952年总共生产了54艘非自行船只，总载重量为11 000吨，经大修、中修、小修的船只共18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180万卢布的订货。

1953年苏中造船股份公司工厂的计划数额为5 000万卢布，完成了105.6%。出厂了19艘船只，总载重量为10 000吨，修好船只14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3 200万卢布的订货。

1954年的计划生产额为6 200万卢布，其中苏方为5 000万卢布，中方为1 200万卢布。

截至7月1日公司总共有：生产工作人员8 000人，工程技术人员900人，职员500人，公司中有苏联专家78人。

公司经过自己的经营获得利润：1952年332万卢布，1953年985万卢布，1954年计划761.5万卢布。

在1954年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根据中方的申请，确定中方1955年的产品生产计划总额为1 800万—2 000万卢布。这一计划规定建设20艘运输鱼类的驳船。中方已经交出建造驳船的订货单。因此，为了完成苏联订货单的各项计划，1955年公司仍保持1953—1954年的生产规模。

在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中方同意签订苏联机构根据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进行

① 此处原文字迹不清。——译注

扩建和改建企业的设计工作的协议。

目前由6人组成的苏联海运河运部设计单位的设计工程工作队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近日即可来大连市进行工厂设计任务和总体计划的制订工作。

四、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苏中民航股份公司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建立的。

公司完成中国和苏联领土上的下述民航空中航线的经营活动:(1)北京—伊尔库茨克直达运输,经蒙古人民共和国;(2)北京—沈阳—赤塔;(3)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12月17日决议开辟了乌鲁木齐至喀什的新的空中航线,该航线于1953年底投入运营。另一条空中航线:乌鲁木齐至阿勒泰,正在建立之中,将于1954年底投入运营。

公司的股份资本确定为4 200万卢布,每一方均为2 100万卢布。

截至1953年3月19日,公司苏方的股份资本2 100万卢布已经完全投入,其中包括所用飞机发动机和其他设备的折款,以及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法定资本中苏方份额计360万卢布,还有现金240万卢布。苏方的所有上述投入均已评估并拟定了相应的文件。

截至1954年4月13日,中方投入公司的股份资本为1 691.3万卢布。为抵偿这一数额,中方向公司转交了飞机场、房屋、建筑物和其他财产,以及现金240万卢布和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股份资本360万卢布。中方剩下的欠款408.65万卢布由中方以人民币现金支付。

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公司共获利29 401 013 859元人民币。

扣除应缴各种税款后拟分给双方的利润部分在双方之间分配,划拨给苏方11 426 410 026元人民币,折合228.5万卢布。

拟划拨给中方的利润份额(包括各种税款)共计308.22万卢布已按中方的意见拨出。

根据决算,1954年第一季度苏中民航经营中共获利240.8万元人民币,折合48.16万卢布。

1954年公司员工总数为896人,其中苏方236人,中方660人。开辟了两条新空中航线:乌鲁木齐—喀什,乌鲁木齐—阿勒泰。

随着对中国公民中的专业人员的培训,公司中的苏方员工逐渐减少,他们将被公司所培养的中国干部取代。

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17名航空站副站长,6名航空技术员,77名航空机械员,2名飞机无线电电气灯光设备和仪器机械员,17名无线电技术员,16名无线电机械员,36名无线电测向员,53名无线电操作员,6名无线电台发动机工,4名蓄热室工。

所培训出的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因为中国民航深感干部不足。

根据1954年的计划，公司应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培训65名中国同志，其专业如下：无线电技术员10人，航空技术员10人，无线电测向员10人，无线电操作员10人，无线电机械员10人，航空机械员15人。

公司正在从中国公民中培训10名驾驶员，到1954年底他们将取代10名苏联驾驶员，后者将被派回苏联。

1954年还将替换11名苏联医士。

1955年拟通过开辟包括中国工业地区在内的新航线的办法扩大公司的经营活动，并将把中国民航的某些航线转交给苏中民航公司经营，因为中国民航由于缺少干部和经验，不能胜任这些航线的运输服务方面的工作任务。

伊万年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53，д. 384

№09864

苏联外交部致尤金函：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事宜

(1954年12月27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同志：

鉴于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于1954年11月25日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苏联专家和关于另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企业学习的决议》：

一、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附件一、二、三、四)。

二、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企业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附件一和附件二)。

三、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所指企业的能源供应由中国方面保证。

在弄清一些企业所需电站的情况下，为这些电站的建设提供援助的问题由双方另行

研究。

四、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 1955 年第一季度给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附件三)。

五、发电站部必须在 1955 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 13 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 1 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其中包括农业部专家工人,河运部专家工人,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 1 名专家。

六、建设部、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 1955 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 11 名专家,期限为 2 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 11 个托拉斯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

七、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必须按照附件四规定的专业,在 1955 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订北京市的总计划。

第四、五、六点规定的专家出差,按苏中 1950 年 10 月 25 日的协定条件执行;而第七点规定的顾问出差按 1950 年 3 月 27 日协定规定的条件执行。

八、黑色冶金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对鞍山冶金联合企业轧钢设备的使用能力进行鉴定,意在帮助中国方面确定联合企业整个冶炼周期的设计能力;务必在 1955 年 7 月 1 日前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

九、对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6 月 23 日的决议作部分变动。苏联黑色冶金部必须预先考虑在中国一个冶金厂生产 T－54 坦克装甲板的能力。最迟在 1955 年 5 月前将这一问题的决定报告苏联部长会议。

十、航空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不再承担帮助中国建设伊尔－16 飞机修理厂的工作。遵照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6 月 23 日和 1954 年 7 月 31 日命令……①

十一、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除按 1953 年 5 月 15 日协定规定的数额外,每年额外接收 2 000 名中国技工来苏联工厂进行生产实习。

十二、受托培养(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苏联各部和机关,必须提高培养外国工人和专家的水平,以技能娴熟的人员保证通过同订货人协商所确定的课程(作业)。在能保障学员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地区挑选一批先进的企业作为培训地点。

培训外国工人和专家的企业名单应征得外贸部的同意。

十三、委托对外贸易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同其他工业部协商,确定苏联企业接收和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程序训令。

允许对外贸易部,经过同其他有关部协商,在外国订货人请求的情况下,可延长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训练时间,延长期限可到半年。

十四、鉴于中国政府的申请,允许车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把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7 月 23 日规定的工作期限延长 1 年,提供设备的期限延长 2 年。

十五、委托国防部、造船工业部、运输机械制造部、重型机械制造部确定,本决议 2 号附

---

① 此处复印件缺字。——译注

件中所提起的工厂……①并在1个月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关于这些武器型号的许可证交给中国方面的提案提交苏联部长会议。

十六、建设部、化学工业部、电站部必须根据造船工业部的任务，如期完成造船厂和鱼雷生产厂的建筑、卫生设施、交通和电力部分的设计任务(苏联建设部)以及设计方案的特别部分，以便及时制定出上述工厂的配套设计。

十七、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有关炼油厂改造的问题。

在上述专家回来之后，苏联对外贸易部和石油工业部在1个月的期限内，就帮助中国改造炼油厂以从油母页岩中提炼人造液体燃料的问题同中国举行谈判并给部长会议提出提案。

十八、1953年5月15日的苏中协定和1953年6月23日的部长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原则，适用于总供货人的各部委及在建设附件一和附件二所列企业中与完成相应设计勘察工作、提供设备和技术服务的有关部委。

十九、委托对外贸易部同中国政府按照本决议签署援助中国议定书，规定按照现行的贸易协定条件实施对中国的援助。

在补充协定中还规定，由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生产驱逐舰和潜水艇的工厂，苏联所承担的军舰建造厂的设计任务(1953年5月15日协定备忘录)自行消失。

以上谨向您通报。

附上述附件，共13页。

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费德林

附件一：

由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及履行期限

总供货人——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

齐齐哈尔市特种钢厂(第二批)

该厂的生产能力可达到每年30万—35万吨

在编制课题和收集原始资料方面给予技术帮助，1955年第三季度

设计资料，1956年第二季度

---

① 此处复印件漏印一行。——译注

工厂车间的技术方案,1957年

施工图纸,1958年

供应设备,1957—1959年

总供货人——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

东川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云南省)

开采和加工铜矿

设计工作,1955年第四季度

会泽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云南省)开采和加工铅锌矿

设计工作,1956年上半年

设计实验装置

加工被氧化过的铅锌矿,1956年下半年

供应实验安装设备,1957年上半年

根据双方协商的期限在进行试验工作中给予技术援助

1. 为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设计工作,总订货人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总供货人提交具有代表性的铜和铅锌矿样品以及关于这些样品的必要的技术资料。

2. 在完成设计工作并获得总购货人在对截至1956年1月1日工业类矿石储备进行统计确定的材料之后,将讨论有色金属联合企业的生产能力、组成以及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期限的问题。

总供货人——苏联煤炭工业部

抚顺煤矿联合企业东部采矿场,开采油页岩,每年产量为300万—400万吨,(一级)有可能扩大产量达每年600万—800万吨油页岩。

收集设计工作用原始资料,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课题,1955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依据1953年5月13日签订的苏中协议,向抚顺煤矿企业……河北省……给予技术援助。……①

总供货人——苏联机器制造与设备建设部

①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为援建年产为2.5万吨工厂，提供石油加工和化工设备。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总供货人——重工机器建设部

援建汽轮机厂

在哈尔滨市(分两级)建立补充生产机构：

1. 生产发电功率为1.2万—2.5万千瓦/时的汽轮机，供给年发电量为24万千瓦/时的发电厂使用。

2. 生产功率为1.0万—3.6万的轮船用汽轮机，年总功率为56万。

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二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8—1959年

总供货人——汽车、拖拉机和农用机械制造部

生产小功率拖拉机的工厂

年功率为20 000的拖拉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二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上半年

施工图纸，1957年第二季度至1958年

设备供应，1958—1960年

在研究制订设计任务时确定拖拉机的型号

总供货人——发电站部

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发电功率为……①

---

①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对制订的设计任务进行研究,1955 年上半年
设计任务,1956 年第四季度
在收集原始资料和对技术方案进行研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1957 年
技术方案,1958 年第二季度
施工图纸,自 1957 年开始,并按照与中方协商好的工作进度表执行
供应设备,1958—1962 年

总供货人——电力技术工业部
船舶用电力机械生产车间
附带操纵装置的年生产率达 100 000 千瓦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 年第 2—3 季度
设计任务,1956 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6 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 年
设备供应,1957—1958 年

在制订设计任务时将明确关于在哈尔滨或者上海电力机械制造厂建设这些车间的问题。

备注:……①

附件二:

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国防工业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及履行期限

总供货人——船舶制造工业部
渤海船舶制造厂
年生产能力为 8 艘驱逐舰和 12 艘潜艇
规定备用场地用以扩建工厂
在制订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5 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 年第一季度

①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技术方案，1957 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 年

设备供应，1957—1959 年

生产鱼雷的工厂

年生产能力是 1 200 枚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 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 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 年第二季度

施工图纸，1957 年

设备供应，1957—1959 年上半年

总供货人——高速柴油机工厂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 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 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 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7 年

设备供应，1957—1958 年

总供货人——重型机械制造部

年生产能力为 320 000 马力的中速柴油机工厂，同时考虑到扩大生产内燃机车用柴油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 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 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7 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 年

设备供应，1957—1959 年

总供货人——航空工业部

生产飞机用轮胎的工厂（该工厂的生产能力可确保 2 家飞机制造厂的计划需求和 5 家飞机修理厂的需求）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 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 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5—1957 年第二季度

设备供应,1957—1958 年

伊尔-28 喷气式飞机修理厂

年生产能力为 150 架飞机(在设计该工厂时,应该考虑到以后能够使工厂从维修转入生产喷气式轰炸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 年第一季度

设计任务,1955 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5—1957 年第二季度

用于维修飞机的设备供应,1957—1958 年

附注:

1. 在制订设计任务时,确定上述企业的生产能力。

2. 根据双方协商好的范围和日程表来提交施工图纸。

附件三:

为帮助中国铁路建设 1955 年
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在中国铁路工程设计和建设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由交通建设部于 1955 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期限为 2 年,以下是专业和专家人数清单:

工程名称	专 业 名 称	专家人数
供应宝鸡—绵阳等地段的电力牵引综合设备	设计电力牵引综合设备的各类工程师	4
修建、扩展和改造 15 条铁路(北京、沈阳、郑州、武汉、兰州、西安、哈尔滨、天津等)	各枢纽站设计工作的总工程师 各枢纽站设计工作的各类工程师 设计编组场的工程师 制定列车运行计划的工程师 制定施工计划的工程师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设计编组场用设备的总工程师	3 3 1 1 1 1 1
在成都等各城市建设新的枕木防腐工厂	枕木防腐工厂防腐技术工艺工程师	1

续 表

工程名称	专 业 名 称	专家人数
长春—四平、沈阳—北京地段自动闭塞装置	设计各车站和区间站自动闭塞装置的各类工程师 计算自动闭塞装置牵引功率的工程师	1 1
在长春、郑州和兰州等城市建设新的蒸汽机车修理厂	蒸汽机车修理厂综合设计总工程师 蒸汽机车修理厂技术工艺设计工程师	1 1
建设新的铁路线：宝鸡—绵阳和成都—昆明	设计铁路路基的工程师 设计人工设施的各类工程师 工程地质方面的工程师 设计隧道的工程师 施工设计工程师 综合设计工作总工程师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地质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大地测量和计算工作工程师 铁路路基设计工作工程师 人工设施设计工程师 车站设计工程师 设计供水和排水工程工作的工程师 设计中心闭塞系统的工程师 设计施工组织工作的工程师 编制预算计划的工程师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综合设计总工程师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地质学家 水文—地质工程师 设计人工设施的工程师 设计铁路路基的工程师 设计车站的工程师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设计供水和排水工程工作的工程师 设计供电站的工程师 设计通讯工程的工程师 设计中心闭塞系统的工程师 施工组织设计工作工程师 制定预算计划的工程师 设计隧道工程的工程师 桥梁设计工程师 铁路路基工程师 各类岩石爆破工程的工程师 组织施工设计的总工程师 施工机械化工程师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总 计		63

附件四:

为帮助北京城市建设规划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协助制定北京市城市建设总计划,由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期限为2年,以下是专业和专家人数清单:

专业名称	专家人数
城市设计工作专家	2
供水和排水系统工程专家	1
天然气供应工程专家	1
集中供暖工程专家	1
城市公共交通工程专家(汽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	1
工程设计方面的专家	1
建筑工程专家	1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2,л.52-56、57-61、62-64、65-68、69

№24888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1954年12月28日)

参加会议的有:

中国方面:中方委员会主席薛暮桥,中方委员会委员李昌、关豪陶(Гуань Хаотао)、张方(Чжан Фан)、王忠义(Ван Чжун-и)、唐南平(Тан Наньпин)、孙大山(Сюй Дашань)——中方委员会代理科学秘书,崔义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部副部长。

苏联方面:苏方委员会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苏方委员会委员:Н.П.亚历山德罗夫、

A. H. 阿斯科琴斯基、B. И. 奥夫相金、A. Л. 马尔琴科、П. Г. 特列季亚科夫、A. B. 戈卢布科夫——苏方委员会科学秘书、A. H. 拉夫里谢夫——对外贸易部科技合作事务管理局局长。

会议主席：H. M. 西卢亚诺夫

会议秘书：A. B. 戈卢布科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通过了第一次会议的议事日程，具体如下：

批准关于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条款。

审议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问题。

审议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科技经验的问题。

审议双方转交科技资料的程序问题，专家出差的规定以及双方的核算问题。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科技合作协议为基础，在第一次会议审议和讨论了上述议事日程中提出的问题之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1. 根据附件一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条款。

2. 由于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满足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请求，苏联各部和各部门将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各机构转交技术资料，所转交的技术资料的数量和期限根据附件二进行确定。

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满足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和各部门将向苏联相关的机构转交技术资料、工业产品样品、接枝、树苗和农作物种子，并使苏联专家熟悉工农业各领域工作经验的成就，熟悉医药的生产和同各种特别危险的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提供的这些资料、产品的数量和期限根据附件三和附件四进行确定。

4. 关于技术资料的转交、专家的出差和费用的核算，双方同意接受如下条款：

(1) 双方的出发点和采取的原则是：为技术合作、相互转交技术资料和技术信息奠定基础，正如以前一样，无偿提供的只是根据附件中的第一种形式(附件五)列出的实际花费以及邮寄费。上述文件的副本将是进行核算的基础。

如果必须对资料重新进行制定或者对其进行修改和修正的话，双方将根据与这些开支相关的实际费用进行支付。

(2) 通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苏联专家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需要根据附件中列出的第二种形式(附件六)签署文件。

上述文件的副本将是进行最终核算的基础。

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根据中苏在1950年10月25日签署的协议和双方在1952年12月31互换的信件进行支付。

如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预计他们出差的期限多于3个月，苏联对外贸易部科技合作事务管理局在进行最终的费用核算之前，有权进行中期的费用核算，

而中国相关的单位应当予以支付。

(3) 应当把与进行科技合作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资料转交给苏联方面，这些资料由在北京市相应的中国单位转交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处任命的苏联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而应当转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由苏联在莫斯科的相关部或部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办公厅的商务参赞。

(4) 在双方进行科技合作中相互转交的技术资料及其他的资料和情报，不能被相关国家在任何一方的领土之外使用，不应被转交给第三国的法人和自然人，不能不经另一方的同意把这些转交的资料发表或者公开。

该纪要于1954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一式两份，分别为汉语文本和俄语文本，对于任何一方面来说，两份文本中的任何一份文本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中方委员会主席

苏方委员会主席

附件一：①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条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建立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合作协议，该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根据上述协议采取措施，进行合作，并且双方的代表处要相互提出建议。

2.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由14名成员组成，每方各7名成员。

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都由各方的主席领导。

任何一方委员会主席的更换都要相互告知。

3.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召开由双方委员会主席进行协调，每年召开的次数不少于2次，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召开，而且所召开的会议的秘书由中方委员会或者苏方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担任。

4. 在例行的会议召开之前，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应当相互以书面的形式提供得到本国政府赞同的、双方希望列入本次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问题的清单。提交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应当有相关的资料，来确定给予的技术援助的总量和规定。

5. 中方委员会主席和苏方委员会主席可以让一些技术顾问参加委员会会议。

---

① 所公布的附件只有这一件。——编注

6. 对于委员会会议中讨论的问题，经协商一致、形成决议的会议纪要要有两份原件，分别为汉语和俄语文本。会议纪要由中方委员会主席和苏方委员会主席签署。

7. 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每年不少于1次互换他们得到的与中苏科技合作有关的、关于本国对生产经验和技术资料的利用情况的信息。

8. 与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的组织和举行相关的费用，由会议举办国支付。

委员会委员、技术专家以及会议的参加者的个人花费由其派遣方支付。

中方委员会主席

苏方委员会主席

1954年12月28日

РГАЭ，ф. 9493，оп. 1，д. 910，л. 1－6

1955 年

№21421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

（1955 年 1 月 6 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1 月 19 日

机　密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5 年 1 月 6 日

与陆定一同志的会谈是刘少奇同志安排的。我曾请刘帮助大使馆了解中国正在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情况。

中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部秘书胡绳、中宣部文艺司司长林默涵。

大使馆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使馆参赞 B. И. 利哈乔夫和使馆二秘 B. A. 克里夫佐夫。

会谈伊始，陆定一便通报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宣部就目前意识形态战线进行的争论问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该草案在卷入争议的各组织（中国作协、学院和高校等）进行了讨论，现正在中共中央进行审批。鉴于该决议草案尚未批准，此次会谈仍将依据的是争论材料，而非中央决议。

我说，目前在意识形态战线展开的辩论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意识形态问题早就提了出来。我们过去就曾开展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清除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封建和买办思想。但是这一运动只是泛泛地打击了封建和买办思想，而未消除这些不良思想的各种形式在社会意识中的具体表现。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当时一些新干部素质依然较低，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因承担着其他工作，无法把运动提高到应有水平。

运动期间曾对艺术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批判了一部道德败坏电影《武训传》，以及作家萧也牧——其作品与左琴科的作品相类似。

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许多复杂、严重问题。中共中央正在对中国意识形态战线

的真实情况加以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业已成熟，已为辩论准备了条件。围绕古典小说《红楼梦》，以及俞平伯就《红楼梦》所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著作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如今，关于小说《红楼梦》和俞平伯著作的路线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在这场斗争中又产生了另一问题，即关于批判胡风观点的问题。胡风的艺术观点与目前住在苏联的匈牙利评论家卢卡奇的观点相似。

胡风 1926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然而不久便退出，借口是他是个诗人，而共青团活动占用了他许多时间，影响了他的创作。

当时，在北京共青团担任领导职务的陈毅同志曾让胡风去他那里，但后者拒绝前往。

胡风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文学系，之后又到日本学习；30 年代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他写了许多各式体裁的文章，均收录在他的八部著作中。他开始写作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曾在各杂志社做过助理和编辑等多种工作。

目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管理局成员，《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胡风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并且不仅仅是在无党派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党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

胡风观点的实质：否定文学的党性，以及党和意识形态领导文学的必要性；反对作家拥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作家应真诚而自由；应是个现实主义者，现实地反映生活，真诚地描写所看到的一切。因此，即使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胡风总爱引用巴尔扎克的著作为例，认为后者政治观点虽然反动，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与此同时，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却是蹩脚作家；苏联出版的许多好书，也都是由无党派作家撰写的。

不过，呼吁作家向生活学习的胡风本人却对生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认为，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作家不应在生活中寻求斗争和参加群众斗争。群众斗争——是一个自发的进程。因此，作家要反映的并非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而只是描写个别英雄和个别事例。

胡风指出，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

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活力的原因在于作家丧失了“主观精神”。

胡风的特点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掩护，声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问，胡风的哲学观点如何。陆定一说，虽然胡风没有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但从他的文学作品可判断，他本质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1954 年，胡风更加活跃，撰写了近 30 万字的大量材料。他在一封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专函中阐述了自己对文学和文学界组织的看法。他主张，作家应围绕杂志工作，否定党对这些杂志的领导。

鉴于胡风的错误，他近期的文章没有刊发。因为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错误并无充分

的认识。目前,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文艺报》杂志上用专刊方式发表他的部分新作,以揭露他的真实嘴脸。

中宣部正准备他的专门材料,随后将散发到各地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党内一些人仍在支持胡风,并在辩论中维护他的观点。

与胡风观点的斗争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问题在于,胡风一直坚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证明,他实际并非如此。

陆定一同志还谈了中国当前思想领域的其他一些问题。

在哲学领域——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反动唯心主义观点。

在历史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在建筑领域——主要是批判传统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问题。梁思成过于痴迷于民族艺术形式。他对在建或者由他批准建设的所有建筑均要用中国典型的屋顶来装饰。在新建的集宁—二连铁路沿线所有车站建筑都采用此类屋顶。可这样的屋顶得让国家花大量的钱。此外,梁思成对中国设计师的影响如此之大,没有他人们都不敢搞设计,从而阻碍了国家的建设进度。

在语言学中也存在许多尖锐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有三种基本的汉语教科书,但其中对汉语问题的解释各不相同。汉语音标的制定工作也有诸多困难和争议。

在政治经济领域正就当前中国过渡阶段的经济规律问题展开一场广泛的辩论。就该问题,仅《学习》一份杂志便收到70篇文章。但杂志尚未决定是否发表这些文章,因为仍需等待辩论的结果,以便最终发表一些结论性的文章。

上层建筑在中国过渡时期的作用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教育领域正在讨论中国教育的性质问题。部分辩论者认为,中国教育带有人民民主的性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另外,教育界仍在讨论初中教科书的编写方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之所以现在暴露出来且变得如此尖锐,主要是因为中国知识界的自由辩论尚不发达。无党派人士害怕批评党员;而党员因担心损害统一战线,自然不愿批评无党派人士。

一些杂志不愿刊登那些攻击其编辑部成员的文章。为了就某个问题展开批判,他们总要等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另外,一些同志自认为是某个问题的权威,因而容不得别人的品头论足。在中国辩论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辩论的意义估计不足。

中共中央的结论是有必要展开辩论。鉴此,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自由辩论和反辩论的批示。辩论期间,无党派人士可以批评党内同志,而后者也可以批评无党派人士。辩论过程中少数派不必一定服从多数派。对于那些在辩论期间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不会给予组织结论,保留其职务给予其从事学术活动的机会。例如对俞平伯就未采取任何组织措施。总之,所有人都有机会就所思考的各方面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存在一定错误的书籍也可出版,否则中国就会出现图书出版急剧缩减的危险。

关于目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共中央将之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那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这些问题与国家总路线的

实施和五年计划的建设密切相关(如建筑领域的错误倾向的问题，等等)，以及意识形态战线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学界就小说《红楼梦》所展开的辩论，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始终处于党的监督之下。必须就这些问题展开广泛和迅速的讨论，并做出相应结论。

另一类属于涉及整个科学领域、带有纯粹理论性质的问题(如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非立刻要求解决，因此可以展开长期的辩论。

意识形态领域的那些问题，依据其尖锐程度也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辩论的时机业已成熟；另一类，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展开辩论的前景尚不十分明朗。党要抓好第一类问题，针对资产阶级影响开展广泛的辩论。

与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意义重大，因为我们曾有一些党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面前缴了械(如《文艺报》杂志编辑部的一些党员)。

不过，在开展斗争的同时，我们依然应执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新闻媒介在辩论期间仍将刊登各种倾向的文章——不论它们观点正确与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欢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的任何进步举动，也不会把那些拒绝放弃自己错误观点的人当作敌人(当然，条件是他们不从事反革命活动)。

中宣部认为，辩论的结论理应由辩论参与者自己来做。一般而言，参加辩论者都是那些有能力对辩论做出必要结论的学者。

陆定一同志指出，中国国内(舆论)对辩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具体表现就是近期对各杂志和报刊的咨询大幅增加。

会谈期间，我对陆定一同志说，跟中国当前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样，苏联当年也曾出现并解决过类似思想问题。我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物理、数学、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尤其关注，通报了苏联个别学者在解决辩证法同文学和科学之间关系问题时所犯的那些错误。

出席这次会谈的中宣部一位工作人员问我，胡风关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不应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论断是否正确。对此，我作了详细解释，认为该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我问陆定一同志，在党组织内部是否也在讨论与辩论相关的那些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党组织正积极讨论辩论的进程。

对于利哈乔夫同志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否参加辩论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这些党的党员正在参加辩论。至于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内部关于辩论讨论的问题，只是在那些知识分子人数较多的党派内进行(例如，九三学社、民主建设党等)。随后，我问，目前中国国内是否建有党的教育网络。陆定一同志说，目前党的教育网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已有一些党校，但其数量还远远不够。

会谈期间，我们还涉及到中宣部和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比苏共中央宣传部更为复杂，因为其中还包括文学部、艺术和科学等部委。

我对这次有意义的会谈向陆定一同志表示感谢，并询问他是否能够就各学科的个别具

体辩题为苏联使馆组织一些会谈。陆定一同志答应将组织此类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各部门负责人传阅。

В. 斯捷潘诺夫

1955 年 2 月 1 日

文件分送给如下同志：谢尔巴科夫、巴斯卡科夫、别利亚科夫、契尔诺夫、卡宾、果阿洛夫、莫斯托维茨、捷列什金、列萨科夫、别谢金、帕夫洛娃、布赫洛夫、费多谢耶夫

2 月 2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07, л. 12 - 20

№09844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

(1955 年 1 月 8 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1 月 19 日

机　密

第 2 份

1955 年 1 月 8 日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并向他递交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一封公函。毛泽东同志接过公函，立即拆开，通过翻译师哲简要地了解了公函的内容。(公函说的是列宁逝世纪念日纪念活动程序)。他请求今天转告苏共中央，感谢给寄来消息。

然后举行了会谈，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他们来讲，面临的最迫切的就是党员干部与非党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问题。他说，中国大约有 500 万知识分子：其中 100 万是党员干部，150 万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100 万其他范畴的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学家、艺术家、建筑师、记者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很少。他们的脑子里完全是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在中国宣传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直接继承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顺便说一句，杜威1920—1922年生活在中国，在许多大城市讲过学。

中国现在胡适的继承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至今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处在他的影响之下，甚至党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例如，党的文艺报编辑部完全站在俞平伯一边。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也站在他一边。站在他一边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和共产党员教育家。

中共中央客观地分析了思想战线的形势，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当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唯心主义者公开进行自己的宣传时，许多党的干部尾随其后。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我们打算，毛泽东同志说，用一年的时间，天天在报刊上积极地系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为，他说，我们能够认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揭露各种科学之中的其中包括自然知识中的唯心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和提拔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如果不在知识分子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肃清历史唯心主义，不做大量工作使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那我们便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便不能带领全体人民克服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社会主义只有在党内、广大群众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科学原则的时候才能建成。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我们取得了诸多成绩。如果需要，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将继续下去。毛泽东同志说，最近他到过上海、长沙等一些城市，同工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工人眼里，比如私营商贩已没有声誉。工人不相信他们，说私商欺骗他们。与此同时，工人相信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一些省份的零售贸易中，国家和合作社占70%，私商仅占30%。这明显是超前行为。我们认为，必须限制一下国营零售贸易的增长，否则我们就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需求，挤压私人工商业者，此外，急剧收缩私人贸易还会导致失业。

会谈中还涉及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现在他正在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经济问题方面，在他们的报刊上已写过些什么和正在写什么。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说，如果我们党的干部和经济干部能够掌握经济知识，能够自觉地管理和领导经济。关于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我们将专门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我们很快就将译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予以付印，初版300万份。该教科书我读过一部分，毛泽东说，从我读过的这部分看，这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它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总理的雅加达会议。他说，会议开始有很大分歧。印度和缅甸代表发表意见赞成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会议，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则坚决反对，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毛泽

东同志说,在五国会议上,吴努[1]坚持了很好的立场。他说,如不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那缅甸也不参加这一会议。会议休会,休息期间印度尼西亚代表给巴基斯坦和锡兰代表做了积极的工作,同他们商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我说,吴努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志们给他做了大量工作。这使缅甸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近中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是的,我们消除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疑惑和偏见。"

然后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中国的朋友们赋予亚非国家会议以很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应大大降低美国在亚非人民之中的威信。美国人害怕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孤立美国,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中。他们(美国人)将千方百计破坏亚非国家会议。大概,巴基斯坦和锡兰将帮他们的忙。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在亚非国家会议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不把自己打扮成会议的领袖,而仅作为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建议尼赫鲁和吴努应充当会议领袖的角色。这从削弱美国破坏这次会议的立场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是大为削弱了。美国现在威胁中国,说要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发动战争,等等。但是美国人封锁我国沿海不像朝鲜战争时那么容易。现在他们这样做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开始采取或多或少比较独立的立场,不希望封锁中国,日本想同中国通商,想从美国的压迫下挣脱出来。如果再考虑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采取独立的立场,不希望美国在他们国内占据统治地位,那便十分清楚,不仅美国,而且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

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哈马尔舍尔德[2],说他是美国的走狗。看来,他(哈马尔舍尔德)前来的目的是不想同我们达成任何东西,而是反对中国,进一步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现在,毛泽东同志说,哈马尔舍尔德表现得很不好,带有挑衅性。也许,以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在以后而不是现在,才有可能回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上来。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说,说实在的,中国对美国承认中国和随之而来的现在加入联合国,兴趣不是太大。这些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明白,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中国有许多明显的好处,但我认为,美国现在不承认中国也有不少好处。这可以给我们自由,以反美的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为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做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再有8—10年不承认中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苏联当年比现在中国所处的形势还艰难。美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6年才承认苏联的,然而苏联并未因美国不承认而灭亡,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会谈中谈到了前不久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谈到美、英、法采取了准备原子战

---

① 吴努,时任缅甸总理。——编注
② 哈马尔舍尔德,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编注

争的方针，因此展开了原子战争的宣传。毛泽东同志从美英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的准备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形势。他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形势下不稳定。此时，在东方，他们没有日本不能进行战争，而日本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而且现在它也不想同中国和苏联打仗。在西方，没有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能发动反对我们阵营的战争，而德国也没做好战争准备。此外，像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形势也不稳定，摇摇欲坠。同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帝国主义分子当然知道这一点并非害怕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日都在颠覆着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国际共产主义成了巨大的力量。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国会会议，没有一次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会议不是大骂特骂共产党员。没有一张资产阶级报纸不在天天咒骂共产党。这一切，毛泽东说，表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分子害怕我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毛泽东同志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叫喊原子战争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虚弱。他们想以叫喊原子战争恐吓本国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但是关于原子战争威胁的这种叫喊应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反转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自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根本不害怕战争，原子战争的威胁反而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战争贩子。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将派郭沫若同志前去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扩大会议。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会谈时在座的有师哲同志和 T. Ф.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3，д. 9，л. 24 - 30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307，л. 5 - 11

№2388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

(1955 年 1 月 13 日)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向您提交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材料。

库兹涅佐夫

1955年1月13日

附件: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按照委托提交关于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建设的建议,我们认为有必要报告如下内容:

朝鲜同志在加快工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没能采取足够的措施发展农业,没有抽出应有的精力去关注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居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常有表露。朝鲜人民军内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由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薄弱,结果军事纪律和警惕性都下降了。战士和干部队伍中都存在背叛祖国、开小差和其他一些背叛行为的现象。

劳动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变得很无力。最高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政权地方机关的选举工作已经拖延了很久。

到目前为止,劳动党中央很少关注南朝鲜的工作,在那边合法的群众组织中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基础。

我们认为,同朝鲜同志讨论朝鲜局势问题是合适的,为此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

我们还认为,把这个事情通告给中国朋友是合适的,询问他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情况有没有什么意见,弄清楚他们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同朝鲜同事的商谈。

在此我们提交库兹涅佐夫、斯捷潘诺夫、费德林和苏兹达列夫同志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中阐述的内容基本正确。

附苏共中央决议案。

1955年1月

附件: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1. 认为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取代以前预定的日期——1955年4—5月是合适的,同他们在苏共中共主席团举行会谈。

2. 认为向中国朋友通报我们对朝鲜局势的意见,并了解他们的意见是合适的。

批准给驻北京大使尤金的指示。

附件：

机　密

北京

苏联大使馆

拜访周恩来，向他通报如下内容：

金日成表示希望来莫斯科，以便就起草劳动党党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商谈。

莫斯科对该建议持肯定态度，认为就朝鲜局势问题同朝鲜同志交换意见是合适的。

在这里将讨论如下问题：

制定恢复和发展朝鲜工业的措施，为此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部分农业生产合作化达到了很高速度。朝鲜同志打算近5—6年对所有的农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对此我们很担心。

要让他们自己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在预定计划和实行一系列措施时，朝鲜同志对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考虑不够。根据现在材料，朝鲜居民生活很艰苦。

朝鲜同志很少关注在南朝鲜的工作，在目前存在的合法组织中缺乏基础，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鉴于阐述的这些情况，想了解一下中共中央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国同志希望以什么形式参与在莫斯科的协商。

电报告知结果。

附件：

机　密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

受战争影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根据不完全资料，战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20亿元(14亿卢布)。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总产值，同1949年相比较，缩减40%以上。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燃料和化学企业的生产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交通瘫痪。农业遭受严重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

停战后，朝鲜劳动党花了很大精力用于国内经济重建工作。凭借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国民经济重建三年计划的任务。采煤、炼钢、制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企业已经开始运转。

但是，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严重不足，应该引起注意，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朝鲜朋友是以损害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

1954年工业品的总产量已达到1949年时的水平,以不变价格计算为297亿元,该年的计划是283亿元。1955年预计工业品生产达到480亿元,按照三年计划,预计1955年工业总产值为374亿元,1956年为468亿元。按照工业品的总产值,三年计划已经完成,并提前两年完成。但是,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以前一样困难。

与战前年代的1949年相比,1954—1956年以实物体现的基本工业品的产量如下:

			1949年	**1954年完成**	**1955年计划**	**按照三年计划预计1956年的产量**	**1955年的产量及与1949年的比较(%)**
	工业总产值	10亿	29.9	29.7	48	37.4	46.8
1	电力	百万/千瓦/小时	5 924	1 946	3 040	2 700	3 800(65%)
2	石炭	千/吨	4 005	1 872	3 450	2 670	4 020(100.3%)
3	生铁	千/吨	166	—	101	100	180(108.4%)
4	钢	千/吨	144.4	52.7	154.8	106.2	119(82.5%)
5	水泥	千/吨	537	231.5	550	455	650(121%)
6	砖	百万/米	44.8	334	799	663	722(16.3倍)
7	木材	千/立方米	1 601	1 841	2 853	2 000	2 300(142.8%)
8	矿肥	千/吨	401	21.3	80.2	59	82.6(20.5%)
9	棉布	百万/米	9.4	22	44.2	37.7	47.7(5.1倍)
10	纺织品	百万/米	3.2	0.8	2.9	1.8	1.98(62.2%)
11	鞋	百万/双	5.8	11.7	14.7	14.4	22.4(8.9倍)
12	肥皂	千/吨	9.2	1.9	6.3	3.8	4.4(47.5%)
13	成品烟	千/吨	6.0	4.5	6.0	5.2	5.7(95%)
14	捕鱼量	千/吨	273	269	552	418	550(2倍)

三年计划预计国民经济和文化生活建设总投入为790亿元(26亿卢布),其中工业投入374亿元(47%),农业和水利建设投入56亿元(7%),这其中的水利建设投入为22亿元,交通运输投入113亿元(14%),文化生活建设投入141亿元(18%),这其中的住宅建设投入为90亿元。

1954年国民经济投入总额为240亿元(占预算的26.3%),原计划为223亿元;1955年达到320亿元(占预算的36%),原计划为269亿元,1956年计划投入300亿元。

许多企业工程未经充分论证就建在地下。目前有10家地下企业,11家企业正在建设,其中包括大型汽车厂、机床厂、纺织厂等。

朝鲜同志对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打算。

在1958年8月召开的劳动党中央第六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指出,1954—1956年国民

经济重建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全面工业化打基础，打算在接下来的5年“武器等方面的生产要做到经济独立”。在这里关于农业经济恢复和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没有得到反映，以及没有考虑到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没有考虑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朝鲜同志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方针，在1953年9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宪永等)访问莫斯科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修正。

但是，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决议没有得到重新研究，这在金日成的声明中看得出来，这一方针在新党章和1957—1961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

此前一段时间，关于发展农业的问题在朝鲜劳动党的政策中处于次要地位，尽管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落后的领域，无法保障国内粮食和原料的需求。

同1949年相比，1954—1956年农业情况的特点如下面材料：

	1949年	1954年完成及与1949年的百分比	1955年(计划)	1956年(按照三年计划)及与1949年的相分比
播种总面积，二次播种(千町步)	2 386	2 337(98%)	2 443	2 235(96%)
其中：谷类	2 113	2 111	2 140	2 026(96%)
稻米	395	459	485	483(122%)
其他谷类	1 718	1 652	1 655	1 543
玉米	106	60.6	62	74(70%)
蔬菜	46	71.7	110	85(195%)
粮食总收成(千吨)	2 795	2 800(100%)	3 250	3 322(138%)
其中：大米	1 241	1 347	1 550	1 630(131%)
棉花	78	22.8	40	43(55%)
蔬菜	797	1 082	2 250	1 597(200)
水果	54	37	75	75(138%)
出栏牲畜(千头)				
大牲畜	788	480(61%)	640	694(88%)
其中：牛	0.9	0.7	0.95	1.2(134%)
猪	660	846	1 175	934(141%)
羊和山羊	18	48	63	55(4.2倍)

注：1町步=0.99公顷。

考虑到提高了二次播种和新开垦土地,1956年的播种总面积将大大超过计划。

这些材料表明,农业在许多领域都未达到战前水平,仍处于极其落后状态。

目前农业有15马力的耕作拖拉机800台,2/3的农业没有耕作牲畜。1954年得到约5万吨矿肥,1949年时为25万吨。为了掩盖不足,1953年从中国进口粮食20万吨,1954年为13万吨,1955年打算进口17万吨。1948—1949年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完全够供应,不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30%以上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需要国家不间断地援助,不仅需要种子、化肥、农具,还需要粮食。甚至最普通的农具都严重不足。

劳动党中央把在农村成立试验合作社的日期定为1954年1月。在实践中,该方针在1954年成立了超过9 000家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得到体现。整个农业经济的25%都合作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允许出现了过火行为——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自愿原则被破坏。按照金日成的话说,打算到1956年以前,大约有35%—40%的农业经济联合成立合作社。预计在5—6年时间内全部农业经济实现合作化。

在会议决议中还规定,在近一二年内粮食总收成同1949年相比较提高40%;依靠水利灌溉和土壤改良,播种面积达到32万町步;到1955年末,合作社和农户饲养的大牲畜达到63万头,猪达到100万头;改善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和采办机关的工作。

三、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改善北朝鲜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任务对于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朝鲜同志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战争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1954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提高了25%,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取消了农民的实物税。肉类计划交售也予以取消。三年计划提出了大力改善劳动人民住宅和文化生活状况,为取消票证制和从定量供给向全面贸易过渡的任务。

但是,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对广大居民来说仍是高不可及。商品价格比定量供应高出10倍多,市场价格还不断上涨。例如,非熟练工人的月均工资为800—900元,熟练工人的工资为1 200—1 300元,而一双胶鞋的非配给价格为400—450元,1米棉布的价格为380—400元,一套粗制衣服要2.5万—3万元,棉袄要2 000—3 000元,日用皂要300元。目前名义上维持着1949年的工资水平,而国家的非配给商品的价格比1949年提高了2—3倍。

1954年计划降低价格275万元,实际上只降低了850万—900万元。这笔款项被用在了工业建设上,超出计划20亿元(660万卢布)。

1955年财政计划预定为工业品和粮食降价拨款60亿元,32亿元用于1954年降价的补偿。这次降价对于三年计划预定的在近两年内为取消票证制和所有粮食和工业品过渡到按照国家价格自由贸易创造条件来说是不够的。

最迫切的问题是向居民供应粮食。工人主要靠定量供应生活,凭票每天得到600—900

克大米，每个家庭得到300—500克小米。肉、油和其他一些食品完全不发放，或者发放的数量不大，而且不经常发放。大米的商业价格达到60—70元/千克，肉——350—400元/千克。

计划预定从农民手中收购27万吨粮食，但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国家没有必备的商品进行交易，采购部门的工作也不令人满意。截止到1954年末只从农民手里收购到约5万吨粮食。朝鲜同志打算加速采购粮食，实质上具有强迫性质，因为不仅征集村庄的粮食，在很多时候还征集农户院子里的粮食。这引起农民的不满。

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个体买卖被禁止，但是，朝鲜当局没有防止粮食投机。为了同投机行为进行斗争，在平壤禁止按商业价格自由出售粮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困难的局面被敌特分子和间谍利用，他们四处散发匿名信和传单，号召抵制政府的粮食收购。

住宅数量恢复得极慢。战争期间有280万平方米住宅被毁，到1954年末只修复了200万平方米。大部分城市居民和近30%的农村居民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朝鲜同志没有利用国内现有潜力来扩大大众消费品生产。这样，国防部工业企业可能掌握着许多钳工、螺纹和切削工具，挂锁和暗锁，家用器具，小五金，炉具，钉子，螺钉等。在这个部有两个制钉机用于生产螺钉，但开工不足，仅仅是为自己所需生产。同时，手工业合作社也生产钉子和螺钉，以很高的价格出售，无法满足需求。这样，又从中国和苏联购买了钉子和螺钉。不过，重工业企业、通讯、化学工业、建材、电力和林木加工企业所需要的消费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组织起来了。这些部门的所属企业能够生产很多人民需要的产品，如：铁制器皿、电器、灯具、手用农具(镰刀、锄、铲等)、家具、黏土和瓷制餐具，等等。

经济重建，特别是提高大众消费品生产，允许在分散的手工业范围内进行，私人资本处在国家的监督下，还可以扶助同南朝鲜开展业务往来。但北朝鲜领导层急于推行彻底消灭私人企业的路线。例如，1949年私人企业占工业生产总量的15%，在1953年时缩减到3.2%，1954年时达到2.5%，而在1955年计划达到1.3%。贸易方面，1949年时私人资本占46.8%，1954年时缩减到22.3%。

四、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预算中，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到31.8%。

截止到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的设备、材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渔船、汽车、拖拉机、农业机器、火车机厢，矿业、纺织和能源企业设备、机床、建筑设备、修路机、电缆制品、检测仪表、试验器材、大学教具、矿肥、石油制品等。

苏联援建的22个工业项目都完成了勘察工作，其中的大部分设计方案均已完成，为开始建设打下了基础。

到1954年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建和新建的企业达到100家(其中大型企业30家)，在很大程度上装备了从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型设备。

依靠苏联供应的设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纺织企业的棉布产量，从1954年的221万米增长到1955年的442万米。

1953—1954年共建成20家拖拉机租赁站和113家马匹租赁站，由苏联供应拖拉机和马匹。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苏联给予的援助主要用于获取企业设备和原料，同时在大众消费品开支上节省了10亿卢布。这在其他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也能找到这种情形。

只是近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提出向苏联订购总额约为4亿卢布的棉布和其他一些大众消费品。

根据现有决定，预定1955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总额约为2.4亿卢布的苏联商品(包括成套供应)，其中包括：安瑞(Анжуйский)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所需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类加工厂、纺丝厂、鱼类加工厂的设备；火车机厢和起重机，采矿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设备、石油制品、电缆制品、钢材。

此外，苏联对外贸易部还研究了朝鲜订购总额为2.9亿卢布苏联商品的合同，其中包括8万吨矿肥、950万米棉布、2 300吨棉线、1 400台拖拉机、1 500台播种机，汽车、建筑和交通设备，以及其他一些工业设备。

苏联对外贸易部根据上述合同于今年1月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建议。

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根据核算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同中包含的设备和材料的价值，包括1955年的合同，苏联政府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10亿卢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考虑到中国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大地超出了苏联商品的出口价格，中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根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的材料，接近8.5亿卢布。

在供应工业设备和原料(织布机、火车头、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和豆类)、4 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套棉衣和其他一些商品。1955年将供应粮食和日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铁路修筑、铁路桥梁和机车库建设方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

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总额为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0.65亿卢布，民主德国0.45亿卢布，捷克斯洛伐克0.35亿卢布，匈牙利0.25亿卢布，保加利亚0.2亿卢布，波兰0.19亿卢布。

1953—1954年期间，这些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机床、交通建设设施、电力设备、电缆制品、检测仪表、钢材、……①、棉线和各种原料，总额约为1亿卢布。

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成套设备，在工业和其他一些工程的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译注

恢复和建设上提供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援建了砖厂和水泥厂、生产阿斯匹林的药厂。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染料厂、度量衡厂；波兰援建了3个煤矿和2个工厂：火车头和机厢厂；保加利亚援建了2个工厂：砖厂和木材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力设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捐献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羊皮。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取得的设备和材料并不能得到有效使用：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设备运来时(特别是机床)，没能适时地在受援者中进行分配，而是长时间地放在仓库里。

五、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劳动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处于低水平状态。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现象。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很薄弱。

在劳动党内和在全国同以前一样，极力宣扬个人崇拜，其中在领导层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不这样做就不行。到目前为止，金日成身兼劳动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职位，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机关。按照惯例，他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成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指示。有时金日成做出了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悖的指示，某些时候会给事业造成损失。例如，曾做出过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同私营企业同等课税的指示。他在没有经过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在江界建设军工厂，未经考虑就支配了多达4 600万卢布(2 300亿元)从中国收到的给志愿者的生活补充津贴，等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出现许多滥用权力、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现象，单纯的行政命令代替了教育。同贪污受贿和盗窃行为作斗争，以及同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作斗争，皆进行得很无力。贪污分子侵吞公家财产，在多数时候，既没有追究党内责任，也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在许多部门、企业的领导人员中间流行用国家财产组织毫无意义的庆典和宴会。没有抽出必要的精力去巩固对外贸易机关，那里混乱不堪，且无力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最后人民委员会的选举被推迟到不确定时间，它的任期在1952年就停止了。地方人民委员会也没有进行选举，这些委员会还是在1946年11月和1947年3月选出的。截止目前，大多数地方人民机关的领导人员都是上级机关任命的。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更是薄弱。纪律涣散、警惕性降低。将领和军官酗酒成风，目空一切，对下属粗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背叛祖国、临阵脱逃、自杀现象增多的事实，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队伍中都存在这些犯罪行为。

六、南朝鲜

关于南朝鲜的局势，我们有如下一些材料。

南朝鲜的经济恢复得很慢。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确定,为了恢复经济和保障消费,要求外国在5年内提供12.5亿美元的援助和6.5亿美元贷款,以南朝鲜的国内资源做担保。

1953—1954年美国向南朝鲜提供了2.8亿美元经济援助。此外,按照联合国的路线在上述年份提供了4 200万美元经济援助。

1953—1954年南朝鲜国内收入总额为1.7亿美元,而1954—1955年确定为2.5亿美元。其中1953—1954年用于自己的武装力量(75万人)开支就达到6亿美元。1954—1955年南朝鲜的军事开支确定为2.8亿美元。1953—1954年度财政赤字1.5亿美元,而1954—1955年度赤字确定为2.5亿美元的规模。

南朝鲜资金不足的问题被掩藏起来,主要是通过大量发行钞票的方式。从1953年6月到1954年11月,纸币流通数量增加了3倍(从130亿韩元增加到400亿韩元)。结果,纸币大量发行导致货币贬值,韩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953年的60韩元兑1美元,到1954年年初达到180韩元兑1美元,年末达到250韩元兑1美元。

在粮食价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对占人口70%的农民造成严重伤害。

由于工业企业投入不足,原料和电力无法保障,以及由于美国和日本大量大众消费品在居民购买力低下的情况下进入南朝鲜,在1954年时工业仍旧处于停滞状态。

在联合国总代表1954年10月12日关于南朝鲜重建的报告中承认,南朝鲜居民仍处于贫困状态。和以前一样,存在粮食、衣服、住宅和医疗服务的严重不足。失业人数超过100万人。

由于李承晚分子在1954年5月举行的南朝鲜国民议会选举期间采取了针对对手的警察措施,议会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李承晚自由党的变化。该党在议会203个议席中席位由93增加到120。利用右翼政党的势力,李承晚分子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工联、农民、青年和其他一些组织)中的反对派,使这些组织的活动陷于瘫痪。

分析北朝鲜在对南朝鲜工作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得出结论,朝鲜领导层没有认真地把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列为自己的任务,没有为此采取严肃措施。在南方建立劳动党秘密组织和在当地群众组织中建立基础工作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指出,在南朝鲜的政治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中央六届会议决定通过一年后,党在南方的工作仍没有得到改善。近来,劳动党向南方派遣了党小组从事起义工作,而没有从事争取南朝鲜民众站到自己这一方的工作,在工联和其他一些劳动群众组织中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牢固基础。

朝鲜同志在开展同南方联系的问题上给自己确定了宣传性的有限目标。但也不善于对南方开展宣传工作。放弃了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与李承晚区分开来,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方,放弃了就成立统一的、独立的朝鲜共和国问题进行商谈的路线,继续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进行攻击。由于没能正确地认识南朝鲜的局势,针对南方的宣传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达到目标，有时败坏了北朝鲜宣传者的名誉，没有摸清南朝鲜真实情况的能力。

在北朝鲜现有30名1952年被俘的南方著名政治活动家。其中有1919年反日起义领导人之一吴海永(О Ха Ен)，前上海朝鲜流亡政府首脑安久洪，前南朝鲜民政机关首脑和其他一些人。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一些将会被释放，利用他们同南方建立联系。

没能利用现在北朝鲜的一切社会和政治力量，去开展同国家南部地区的联系工作。为了同南方建立联系，祖国统一民主阵线组织利用的也不够。

七、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北朝鲜同志注意以下问题：

1. 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力主保持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确定的速度，在此要提高大众消费的比重。重新审议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的发展工业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条件以及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

2. 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劝告朝鲜同志目前要克制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要集中精力巩固已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要逐渐地进行农业合作化，要全面和精心准备此事。要让朝鲜朋友注意到，仓促成立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还会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1954年对25%的农业实行了合作化，这已经为国家对其给予援助花费了大量资金。

3. 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到迅速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相关问题的必要性：(1) 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生产；(2) 降低大众消费品的商业价格；(3) 为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现实条件；(4) 恢复住宅总量。

此时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向南朝鲜展示在北朝鲜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许多工作非常重要。这对南朝鲜民众争取统一的斗争来说是个有力的刺激因素。

4. 要让金日成注意到改进党和政府集体领导工作方法的必要性，要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应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是不妥的，这会压制其他工作者的主动性。

建议1955年组织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做好准备工作。

必须建议劳动党中央仔细研究军队情况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指战员的作战素质和道德修养。

5. 为了争取国内全体爱国者投入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运动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使该组织恢复与南朝鲜群众组织的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加强劳动党在南方当地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中建立基础，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同李承晚制度斗争。还应该恢复劳动党在南朝鲜的秘密组织。

对南朝鲜的宣传应该更专业化，放弃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都进行攻击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力量和反对分子，支持国家统一和成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国；为此要广泛利用南朝鲜政权高层、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方成立中立性质的秘密爱国组织是合适的,这一组织可能在南北朝鲜之间建立合作,以朝鲜人自己的力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组织不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否定意见,当开展合法活动时,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争取他们投入到在民主的基础上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库兹涅佐夫
斯捷潘诺夫
费德林
苏兹达列夫
1955 年 1 月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0,л. 24 - 46

№23892

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1955 年 1 月 28 日)

译自英文

英国大使海特转交给 В. М. 莫洛托夫的信函
1955 年 1 月 28 日

委托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以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的名义向中国政府通报如下内容: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出关于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的问题。联合王国政府完全支持新西兰的这一提议,联合王国的这两个政府均同意以下所述观点。

联合王国政府对在这一地区目前所出现的危险局势感到忧虑,并一直就缓和紧张的必要性问题与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深信,自己的目的只是希望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不过,正如安东尼·艾登伯爵在其前不久给周恩来的信函中所指出的,如果想推动紧张局势的缓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在当前形势的基础上,各方都准备齐心协力地朝着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努力。可是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并没有看到缓和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因此便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来自任何一方的觊觎活动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的经验,中国人一定会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不可能

凭借武力获得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通过武力方式只会使这些(中国)沿海岛屿的地位更加复杂化，而不会有利于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政府只是依据自己预想，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军队都不会对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民主主义盟友提供帮助的计划行事，那么情况就非常危险。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如果要缓和这一紧张局势，只可能通过和平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因此，其坚持建议相关各方不论是在自己的行动上，还是公开的言论中，都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全面军事冲突事件的发生。

联合王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与安理会的讨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打算。此外，联合王国政府将极力确保有关各方能够审慎而成熟地思考这一问题，而后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要求我们这样做。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论谁对谁错，但当前的局势事实上已对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一危险不再扩大。联合王国政府认为，新西兰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动议是希望在不对任何一方的企图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认真而严肃地谋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联合王国政府诚恳地建议中国政府，在收到邀请的情况下就应接受并参与安理会的讨论。

翻译：О. 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0л. 51－52

№10249

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

(1955 年 1 月 28 日)

机　密

周恩来总理与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纪要

北京，1955 年 1 月 28 日

杜维廉说，外交大臣艾登请他以女王陛下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的名义作一个口头声明。新西兰准备就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倡议。倡议将

在今天提出。联合王国的女王陛下政府完全支持这个倡议,因为它也对沿海岛屿地区的危险局势感到担心。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经常接触,两国政府都懂得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性。英国知道,美国希望这个地区安定。艾登想重申他最近所作的声明中的一点,他说,要想在缓和紧张局势中取得进展,只有大家都在现实局势基础上共同为此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英国认为,以为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会对某一方的要求造成损害是没有根据的。英国的观点认为,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意识到,用武力把台湾统一到大陆是不可能的。沿海岛屿的地位是另一回事。军事行动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艾登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美国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预,都不会在岛屿问题上帮助他们的盟国的假设上,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了。艾登还认为,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解,那就可能达成对这一问题的和平和满意的解决。英国政府请有关各方注意不仅在声明中,而且在行动中保持克制的重要性,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双方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行动。不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新西兰政府,都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讨论安理会的有关提案。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也准备同意这个建议。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以便在安理会仔细审议这一事件,正如它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当前的局势,不管谁对谁不对,已经构成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府认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应该努力使这一危险不要增大。英国政府把新西兰的这一倡议看作是不损害有关各方要求的解决问题的真诚而认真的尝试。英国政府坚定地请求中国政府接受安理会的邀请。杜维廉说,这一通报的内容与新西兰政府的观点是吻合的。他还声明,他想以自己的名义说几句话。这一通报是以最友好的善意发出的,这是为了敦请中国政府予以合作,而且这是为了和平而作的。杜维廉表示希望,总理阁下能理解这封信的精神。

周恩来总理在回答杜维廉的声明时说,在他上次回答了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后,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改变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①

尽管在杜维廉今天转达的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言辞,但是依据这一通报和外交大臣艾登在国会的讲话可以看出,自总理与杜维廉上次谈话以来,英国政府的观点一直没变。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和平”的说法,不仅应该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谈话的内容,而且还应该是他们行动的目标。和平应该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它应该是理智的和诚实的。

如果某个国家借助实力侵占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而要使人相信,承认这一侵占就意味着和平,中国人民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这正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希特勒曾经所持的立场一样,其结果只能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就正是这样行事的。这一点在美国总统致美

① 1955年1月5日,周恩来接见杜维廉,就其代表艾登通报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未变,目的是在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一事,驳斥了英国的立场,指出: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集团的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说这一切是不对的;而美国侵占台湾,帮助蒋介石集团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却说这一切是对的。英国这种“不公正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并希望中英关系能按日内瓦时候的精神,得到改善”。——编注

国国会的特别咨文①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美国总统的咨文——这是战争咨文，其目的是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事务，并强迫中国人民与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实现所谓的“停火”。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实现中国主权的事务。1950年1月5日，甚至杜鲁门也承认这一点，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人民与蒋介石进行停火谈判呢？事实上，这种谈话是被用来欺骗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是被用来迫使美国国会授予总统使用武装力量无限制的全权，以便用他们来吓唬中国人民的。有人对中国人民说：你们或者接受美国方面的战争挑衅，或者是同意与蒋介石停火，并同意经过台湾海峡划一道分界线。美国企图通过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道防线来分割中国的领土，妄图使美国侵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合法化，并获得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件。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这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威胁说，抵抗就意味着世界大战，换句话说，应该容许他侵占我国领土并继续他的恐吓。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和平。这不是什么别的，这正是战争。周恩来总理说，不仅中国人民，连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也指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相当多的美国国会议员赞同总统咨文，其中某些人被咨文的一些言词蒙蔽。但也还是有一些国会议员明白事情的本质。有一个共和党议员就曾宣布，总统咨文追求的是发动战争的目的，他不会同意将美国青年送到台湾去为蒋介石作战。另有一个参议员声称，这是先发制人的战争。第三个议员说，这是迈向战争的一步。显然，这些美国国会议员说出了真相。除此之外，甚至某些老牌的自由主义报纸，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就宣称，艾森豪威尔的咨文包含着美国进攻大陆中国的威胁。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真实情况是，在美国总统咨文发表之前和之后，美国使用了大批武装力量来对中国进行挑衅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以西派遣了4艘航空母舰及一些增补的驱逐舰，这些军舰驶近了中国的沿海岛屿，这难道不是战争挑衅？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过去任何时候也没引起过紧张。中国大陆就是这么解放的，海南岛、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等沿海岛屿也这么解放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解放台湾就会造成紧张呢？紧张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从1950年起美国就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相反，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有侵占过美国的领土。恰恰是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拥有一条自己的防线，而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把夏威夷群岛包括在自己的防线内。周恩来总理说，英国政府仍继续重复那种老调，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上谁对谁不对的问题放到一边，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

如果在国际事务中不分清真理与谬误，那就不可能有正义。这无异于承认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或者承认欧洲的慕尼黑协定。侵略者总是要求在事实发生以后承认事实。用承认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导致承认另一个事实。侵略者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加剧战争的威胁，直到最终维护和平变得不可能为止。比如，紧接着承认合并奥地利后就要求承认合

---

① 1955年1月2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台湾海峡正在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其中谈到，中共军队攻占一江山岛和炮击大陈岛是“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其认为必要时有权动用美国军队干涉台湾海峡事务。1月28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编注

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最终爆发了波兰的战争。现在英国政府所使用的论据,正好是张伯伦当时提出的同样的论据,而当时艾登和丘吉尔是反对张伯伦的论据的。反对慕尼黑的立场不是中国人民的发明。今天中国坚持的只是过去艾登和丘吉尔所持的立场,而反对的是艾登和丘吉尔重复的当年张伯伦的论据。周恩来说,中国尊重艾登和丘吉尔过去对慕尼黑所持的立场,但中国反对他们现在的论据。即使在当前,英国也还是有些人提出了批评。这一次是艾德礼和贝文了。这是英国自己的事,不是中国的事。但中国人民将说出自己的意见,将会对此加以谴责。

周恩来总理说,当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使中国人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真理已不在世界占统治地位,并且每个人都会受骗。台湾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在前50年中一直被日本侵占。在开罗宣言中,英国和美国与中国一起重申,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波茨坦宣言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日本投降书也是一个证明。1945年10月25日,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在台湾接受了日本投降,并在那里恢复了中国的行政权力。除此之外,杜鲁门总统自己也曾在1950年1月5日重申,台湾属于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不打算介入,他们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英国政府也承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的效力,也作过类似的声明。远的不说,1954年8月,英国外交部代表就承认过这个事实,宣称:"开罗宣言宣布,福摩萨应该归还中国政府,这一点已经实现了。"所有这些历史文件和外交文件及声明,都是执政当局的重要官员做出的。

对这些怎么能一笔勾销呢?为了强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承认美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占领,现在竟然说什么似乎台湾的地位尚未确定,台湾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尚无定论,甚至说开罗宣言已变为一团废纸。怎么能够批评中国新闻界,说它不该指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背信弃义呢?

至于联合国,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行使解放台湾的主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基本规定,联合国不应干涉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下的事务,而且联合国成员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事务提交联合国解决。一方面,美国使用武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一方面,联合国又容许美国利用联合国进行实际上是美国为达到侵略目的而采取的干涉活动。对此,中国人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如果联合国要进行干预,那就应该视为另外一种情况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最后的规定,第七章各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恰恰是美国正在威胁世界和平,所以联合国应该管管这件事情。以前苏联代表曾提交议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提出过指控,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这些侵略行径,并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可以解除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如果美国不占领台湾,台湾也会像某些其他沿海岛屿一样,早就被解放了,也不会引发任何战争。战争扩大的原因在于,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行动停止之后,美国不甘心失败,加剧了台湾的紧张局势,并唆使蒋介石进行针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地区的破坏战争,抓捕中国渔船,屠杀和骚扰近海中国渔民,追踪和扣留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进攻中国的沿海岛屿。联合国对蒋

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指使下所做的这一切以及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言不发，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却打算干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事务，其结果它将完全落入美国的控制之中，并将配合美国的战争挑衅行事。

周恩来总理宣称，现在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提案，但他还不知道提案的内容，所以他不能做出正式的评价或者表达正式的观点。如果提案涉及的是上述问题，就是说像过去苏联代表提交的一样，是关于美国侵略的，并提出的是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指控，那么中国就欢迎它。但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是为了适应美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行动，是为了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为了迫使中国同意与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实现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妨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迫使中国人民同意美国的侵略合法化，并容许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划一条自己的防线，如果该提案是以实现所有这一切为目的的话，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同意的。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希望和平。中国认为，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想反映本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愿望；但如果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所提出的措施是支持美国总统的观点的，那他们就不是为争取和平的目的服务的，而是相反，只能鼓励美国方面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

周恩来总理请杜维廉把中国政府的上述意见转告外交大臣艾登。

杜维廉称，他感谢周恩来总理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和政策。随后他又宣称，他想对英国的立场作某些补充解释。他说，在最近一次会见时他曾提到过艾登的意见，认为中国和英国不可避免地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远东问题。但是，为了使这些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应该以友好的方式理智地讨论这些问题。显然，中国和英国对某些问题的评价各不相同。英国认为，美国是希望和解的，而中国则持另外的观点。他宣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英国打算在安理会怎样评价这个提案。

英国不认为这个建议是敌视中国政府的，也不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指责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当前已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形势。所以最好的出路是联合国安理会在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杜维廉说，他请周恩来注意在他今天转交的通报中两次使用的句子："不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因此，谈不上英国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放弃自己的某些愿望或者不给中国政府提供按中国政府的观点讨论局势的可能性。杜维廉还请周恩来注意口头声明中的另一句话，这就是："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和，那么沿海岛屿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和平和满意的解决。"所谓"满意的解决"，就意味着是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解决。正像艾登公开声明的，英国政府理解中国的立场。英国懂得，中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内部性质的争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具有国际性质，并应该在安理会上与中国政府讨论。这个争论还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中国政府声明，这种争论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英国的立场在于，要注意到现实的局势，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和平解决的措施。这是真诚的努力，而不是偏袒某一方。做出这些努力并不是依据敌对的精神，而是合作的精神。英国认为，在安理会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支持某一种说法，而是要达到和平解决。杜维廉说，他不打算涉及台湾的地位问题。他指出，他上次就此问题所作的阐述，目的是解释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他说，周恩来应该注意今天通报中包含的声明。这个声明重申，沿海岛屿的地位是不

一样的。关于台湾的地位问题,按照国际法来衡量,台湾目前还不是中国的领土,除此之外,英国没有发表过任何其他的意见。他再次强调,不会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安理会现行的审议程序不会伤害中国政府的愿望。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理解英国政府支持安理会采取的步骤所依据的精神。英国希望中国政府也能依据这种精神行事,并参加和平谈判,以找到关于沿海岛屿的满意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说,针对杜维廉所转达的,并代表了他自己观点的意见,必须解释中国的立场,以便避免某种误解。

第一,关于沿海岛屿的问题。台湾也是一个岛屿,它与其他沿海岛屿一样,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将台湾岛与沿海岛屿分成性质不同的两类。英国政府的这种观点——可能安理会的某些成员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企图为美国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作辩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人民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实现自己的主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许联合国或者某个外国干涉。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如果联合国或某个国家要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那就是违背联合国宪章。

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此是绝不会同意的。

第三,杜维廉声称,当他讲到台湾的地位还待确定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国际法准则。但所有的国际协定,比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都已经确定了台湾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国际文件和国际义务。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国际法吗?如果连这些国际义务都不承认,那还能谈什么样的国际义务呢?所以,杜维廉的解释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是颠倒黑白的,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今天听了过去抗日战争盟友的这种意见,中国人民不仅充满了遗憾之情,而且是满腔愤怒。

第四,如果新西兰政府打算提交的决议是干涉中国内政和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那么它就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如果它是以这种方式撰写的,那么最好是不提出。

中国政府不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并对在这种层面上提出这一问题表示抗议。如果有人说,这是为了和平才这样做的,那这完全是谎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及其他岛屿不会为提出紧张局势问题提供借口。更谈不上威胁美国安全的问题,因为美国远离中国数千海里。真正威胁和平的是美国政策违背了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所作的声明,并且于同年6月侵占了台湾。这就造成了紧张。特别是在去年,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以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更加剧了。这种紧张是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引起的。如果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也就获得了解放,和平也就得到了维护。如果新西兰政府提交的决议是要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联合国谴责美国侵略行动的问题以及是为了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问题,那这将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周恩来总理最后说,不论是联合国还是哪个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

湾和澎湖列岛的事情。联合国只应该研究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根据宪章，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并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如果新西兰政府的决议是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目的的，那么中国政府将坚决反对它。如果它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侵略的问题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总理请杜维廉把这部分谈话内容也转达给外交大臣艾登。杜维廉声称，他相信，不论是新西兰还是英国都不打算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说，他甚至还没见到新西兰的提案，但是，提案将建议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现在的局势，因为那里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局面，而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是危险的直接原因。这不是干涉内政，而是与特别困难的问题有关。他希望中国政府在安理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且这是促进和平和圆满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还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明白，安理会采取这一步骤是抱着最良好的愿望，即希望这会导致公正的和平。

周恩来宣称，他仍然不能同意杜维廉所说的。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危险。蒋介石的军队侵入了沿海岛屿，中国人民打算解放他们。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涉及的是沿海岛屿问题，那么这就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周恩来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此事，他问，如果有某个国家把自己的海军舰队派到英国的沿海岛屿地区，然后宣布，从这时候起在英国沿海岛屿地区产生了紧张局势，应该把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英国政府能够同意吗？与英国沿海岛屿的情况完全一样，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紧张。紧张的产生是由于美国往岛屿地区派遣了自己的海军舰队。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什么问题的话，它就应该讨论关于美国入侵台湾海峡并占领台湾的问题，它应该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如果有谁妄图利用沿海岛屿问题与中国作交易，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这不是为和平事业服务，这是纵容美国的侵略。

杜维廉说，这次谈话十分有益，有助于他理解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细节。今天他通报的目的是说服中国政府必须让安理会了解它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杜维廉宣称，今天的谈话之后，他会照旧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在安理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在中国政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它就能够在安理会提出必须讨论的那些问题。

周恩来请杜维廉提醒外交大臣艾登，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至今都还未恢复。现在盘踞在安理会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但那里没有中国的代表。总理指出，不能忘记这一情况。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关于台湾的问题，这将是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中国无论如何不会容许这样做。

杜维廉说，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局势，中国大概会同意让中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参加讨论的。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的代表出席安理会怎么办？他强调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就没有蒋介石的代表。杜维廉说，日内瓦会议讨论的问题不涉及蒋介石，而蒋介石却与当前在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有某种关系。

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联合国无权干涉。

杜维廉说,他收回他刚说的话,因为他说这些的时候没考虑好。他说,安理会已经有蒋介石的代表,不必专门发出邀请,请他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周恩来说,这对英国是个难题。一方面,英国重申它不承认蒋介石,但同时,从另一方面,它又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一起在安理会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英国在美国之后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

杜维廉说,英国的唯一观点是,既然存在与中国有关的危险局势,中国政府就应该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美国是危险的根源。如果讨论美国侵略中国的问题,并且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军队,那么中国就赞成,但如果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那么中国就反对。

杜维廉说,他仍然希望中国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对这个问题无法给予答复,因为他首先必须知道要讨论什么。

总理指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不愉快的处境,如果英国政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分歧就总是会有的,这非常令人不快。

杜维廉说,中国和英国之间应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接近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事情。英国和美国也曾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斗争过,为什么现在,当中国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要干涉并且吓唬中国?中国不会忍受这一点。这已不是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了!

杜维廉说,英国没干涉中国的事务,也没吓唬它,而是努力与中国政府合作寻找一条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途径。中国可能认为,英国坚持的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但英国的立场就是如此,这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现在的政府不是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政府。[①]如果英国政府确实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它就应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不是期待中国方面做出让步。中国不怕军事威胁,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毫无疑问将抵抗到底。中国是说到做到的。

杜维廉对今天的谈话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

周恩来总理说,他感谢杜维廉今天的来访,虽然这次谈话是令人不快的。

翻译校对:B. 克里夫佐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1–14

---

① 爱德华·贝奈斯(1881—1939),1935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38年10月,在英法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将苏台德等地割让给法西斯德国的《慕尼黑协定》,随后辞职。——编注

№1341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

(1955年1月29日)

摘自Д. A.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年1月29日

今天11时30分我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谈话时我通知大使，根据我所拥有的情报，1954年12月26日，即还在茂物会议开幕之前，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那里举行了参加茂物会议的印尼代表团的预备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有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外交部长苏纳约、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尔加尼、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帕蒙恰克、亚太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和其他许多人。会议上讨论的正是印尼代表团在茂物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事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除了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外，全体与会者都表示赞成邀请中国。帕拉尔说，在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将会认为，印度尼西亚已归附于世界上现有的两大联盟之一。另一方面，他声称，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似乎是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将会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出面去取得有利于中国的让步。

在茂物会议期间，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坚决反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他声称，如果邀请中国，那么阿拉伯国家就会拒绝参加会议。

接着发言的缅甸总理吴努毫不客气地宣布，如果不邀请中国的话，那么缅甸就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在吴努的这一席发言之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再次发言，并在发言中宣布放弃他之前所提出的反对邀请中国的意见，却提醒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说，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那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事。

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决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请求阿里帮助，希望后者给予阿拉伯国家以影响。巴基斯坦人同意实现这一请求。

最后我对大使说，在会议期间，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赞成邀请中国，缅甸总理吴努也对邀请中国之事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却对此事犹豫不决。

黄镇感谢了我，并说，该情报是很有意思的。

我接着说,我收到了一个新消息,那就是:我国政府决定在伊玛目·邦佐利街(雅加达)上买房子用作苏联大使馆的馆所。因此我问他能否给我介绍一位能帮我们办理文件的可靠的律师。黄镇欣然同意去找一个可靠的人,并且还主动提议要替我去找一位好的建筑师,以便把买到的房子装修得适合于用作大使馆。

谈到 1955 年即将在雅加达举行的国际经济展览会的时候,黄镇说,看来中国将会参加展览会的。不过,暂时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有指示要求大使馆做好准备。我说,我暂时还没有从莫斯科收到关于苏联参展一事的回音。

谈话持续了 1 小时,并且是用俄语、汉语和英语进行的。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В. Д. 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0 卷,第 2347—2348 页

№0993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

(1955 年 1 月 29 日)

第 181 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纪要

1955 年 1 月 29 日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鉴于即将举行安理会讨论中国台湾及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问题,我拜访了周恩来,并向他预先通报了苏联的立场。

周恩来声明了以下几点:

一、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中国问题及邀请中国参加讨论此问题之事提交安理会审议。

二、如果此建议被否决,则中国政府只有在议题的表述使中国代表有可能发言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才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例如“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或“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的提法可以作为这一议题的表述。

三、如果议事日程的议题限定得很窄，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停火问题"或"缓和沿海岛屿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则中国政府将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而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应拿到国际组织中去讨论。美国现在尚未以其武力参加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国同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不能讨论关于中国和美国"停火"的问题。同时，安理会无权讨论中国与蒋介石"停火"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不准备在安理会上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争论，只有在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有可能遭到谴责和揭露的情况下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周恩来同志指出，如果议题是概括性的表述，对中国来说是适宜的，则中国政府将接受派自己代表的邀请，但是答复这一邀请时要作解释，带有保留条件，就像答复哈马尔舍尔德因美国间谍案访问中国的建议所做的那样。①

周恩来同志请求将上述各点通知莫洛托夫同志。

之后，周恩来同志说，他已经收到关于 B. M. 莫洛托夫同英国驻苏联大使谈话的塔斯社消息。周恩来十分赞赏 B. M. 莫洛托夫回答的内容。同时他请罗迈进转告莫洛托夫同志，中国不准备刊登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内容。② 对此，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与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苏联和英国都是安理会成员国，而中国暂时还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苏联过去也常常公布同英国的会谈内容和往来信件，而在中国至今尚无此先例。

在谈话过程中，周恩来的秘书交给他一份刚刚收到的新西兰关于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建议草案。周恩来指出，在这份草案中有两个严重的缺点：

一、草案未提及台湾和澎湖列岛；

二、在草案中使用了"停火"这一术语。

周恩来强调指出，敌方正准备撤出沿海岛屿，其中包括像大陈、马祖、金门这样一些岛屿，现正忙于自己海军舰队的基地转移。周恩来说，美国人特别害怕被困在远东无望的战争之中，从而失去整个欧洲。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感谢向他通报消息，并再次请求将中国政府对所谈及问题的立场转告 B. M. 莫洛托夫。

会谈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 Ф. B. 莫丘利斯基。

会谈持续了 40 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185 - 187

---

① 1954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司法机关对朝鲜战争期间捕获的美国 13 名间谍进行审判，并判处其中 11 人徒刑。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尔舍尔德为此要求访华，以从中调解。12 月 17 日中国政府回复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对处理间谍案的严正立场，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第二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意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并商谈有关问题。1955 年 1 月 5—10 日，周恩来与哈马尔舍尔德举行了 4 次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双方将继续保持接触。——编注

② 指 1955 年 1 月 28 日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参见以上№10249 文件。——编注

№09934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

（1955 年 1 月 30 日）

机　密

文本第__号

1955 年 2 月__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谈话纪要

1955 年 1 月 30 日

一、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台湾岛地区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的决定以及苏联代表将向安理会提交的有关此问题的提案文本。周恩来表示感谢。

之后，周恩来说，他们已经收到新西兰代表就提请安理会审议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给安理会各成员国信件的正式文本，他指出，看来从一开始就将在此程序问题上展开激烈斗争，对方将尽一切力量施展诡计，以阻挠审议美国侵略台湾问题。

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国民党分子尚未从这些岛屿撤退，而美国仍在继续集结其军事力量。他指出美国正采用此种办法恐吓中国。

二、我通知周恩来，苏联已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以下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 1904 年保卫旅顺的英雄：

（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

（2）在军人墓地建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

（3）在城里修建 C. O. 马卡罗夫海军中将①纪念碑；

（4）在二号炮台建方尖碑；

（5）在艾烈克特里陡崖上建方尖碑。

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将由苏联出资，并由远东军区司令部承建。

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他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① 斯杰潘・奥西波维奇・马卡罗夫(1848/1849—1904)，俄国海军统帅，海洋学家。日俄战争初期任旅顺口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因所乘装甲舰触水雷爆炸而阵亡。——编注

部副主任萧华同志的报告中得知。

周恩来说：我们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是建马卡罗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我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列宁同志及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我想再一次了解这些情况。现在我很难回答这一问题。我必须在中央委员会中商量一下。①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C.捷捷林。

担任谈话翻译的是周恩来的秘书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188－189

№24891

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

(1955年1月31日)

机　密

致国立重型工业电子设计研究所所长

B.A.格拉乔夫：

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第11852－pc号命令责成金属企业建设部和化学工业建设部在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关于在中国生产炮弹的工厂(228－32号项目)的轧钢基地而进行的建设设计、卫生技术设计和电力设计方面的工作。

该项目的建设设计工作和电力设计工作已经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ГССПИ－4)完成，因此，在得知政府在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命令之后，我们马上就在1954年11月10日写信(第871c号)给您，请求您把您的负责人派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来了解设计工作，以便准备完成技术设计。

1954年11月25日我们再次写信(第920c号)重申我们着手进行设计工作的请求，此外，我还

① 2月17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大使尤金，中国同意在旅大为1945年战胜日军修建纪念碑，但不同意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修建纪念碑。——编注

亲自告知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副所长纳扎尔别科夫同志和工业装备局局长克拉索夫斯基同志;邀请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和国家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来协调车间的设计计划(有来自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的克里沃鲁奇科夫等同志)。

在1954年12月10日的第871c号信件中,我们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阐述了完成228-32号项目轧钢基地电力保障设计和电力设备设计的任务;在1952年[①] 12月13日的第871c号信件中,我们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要求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所运送必需的资料。在1954年12月25日的第997c号信件中,我们再次请求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着手进行设计工作。

在得到政府责成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于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设计工作的决议之后,事实上,该研究所直到现在还没有着手工作。

该研究所管理处首先把该项工作委托给了工业设备管理局,然后把其转交给了有色金属局,而到现在,该项工作又被委托给了工业设备局。

该局的工作人员克拉索夫斯基、沃尔恰尼诺夫和沙皮罗通报说,他们还没有对材料进行研究,但是还不能够说,他们还不缺乏这样的材料。对于我提出的关于设计工作的期限问题,这些同志说是3—4个月,也就是大概在1955年4月。

可以认为,对于他们执行政府决议的这种态度完全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请求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技术设计工作。

有色金属加工研究所所长
C. C. 米罗诺夫
1955年1月31日

РГАЭ,ф. 9022,оп. 1,д. 3241,л. 16-17

№24892

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

(1955年1月31日)

致《中国建设》杂志发行全权代表刘平(Лю Пин)
亲爱的同志!

我收到了您的信件,您在信件中请求谈论一下我们对《中国建设》杂志提出的建议和批

---

① 原文如此,疑为1954年。——编注

评意见。我很乐意满足您的这一请求。①

你们的《中国建设》杂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以具体的事例展示了在人民政权时期6亿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令人对你们国家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发展有了鲜明的印象。

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兄弟般友谊的文章。杂志中列举了非常充分的事实材料，同时配以精美的插图。

《中国建设》杂志展示了中国人民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觉得，该杂志对这一题目的反映有点弱。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问题就更好了。

请允许我就《中国建设》在苏联订购数量的增长说几句。现在在苏联有各种组织订购你们的杂志，还有一小部分掌握英语的人士。当然，该杂志用英语出版这一事实阻碍了苏联订购用户的增长。此外，用俄语出版的杂志《中国》和《人民中国》在苏联有很大的发行量，这两本杂志也同你们的杂志一样，对中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建设》杂志引起了苏联读者的极大兴趣，很有希望使该杂志的订购者得到增长。

对于您送给我们的杂志，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致以深深的敬意！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1955年1月31日

ГАРФ，ф. Р-9539，оп. 1，д. 408，л. 18-19

---

① 1955年3月17日，发行杂志的全权代表刘平的信件被递送给了吉洪诺夫："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对您在1955年1月31日的来信表示感谢。您提出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够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意见，提出一些批评性的看法"(ГАРФ，ф. Р-9539，оп. 1，д. 408，л. 18-19)。——原注

№08839

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1]档案

（1955 年 2 月）

副 本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1955 年 2 月……[2]

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现保存着满洲档案，这些档案是 1901 年被俄国部队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

满洲档案共有 13 000 份。其文件资料至今很少得到研究，因为文件全是用古满文和汉文写成的。

根据原来的情报，该档案是 1662—1900 年间满洲各机关的行政、经济和财政问题文件。此外，还有满洲边防军行辕的材料，奉天政府同俄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俄国军队在满洲行动的资料。

苏联刊物(《档案》杂志 1928 年第 16 期)已经公布，在苏联保管着满洲档案。所以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对这批档案产生兴趣并请求归还这批档案。

因此，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即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在两个月的期限内详细阅审满洲档案文件，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苏联政府主动把这批档案赠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

附苏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苏联内务部部长
C. 克鲁格洛夫

① 满洲，清代满族自称，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这里指清朝和清政权。——编注
② 该档案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附件：

机　密

苏共中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决议

委托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和苏联科学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准备好关于把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所藏满洲档案材料作为礼物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妥善方案。

ГАРФ,ф.9401,оп.2,д.463,л.140－141

№23891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

(1955年2月1日)

机　密
第9号

罗迈进同志从北京以“高频通信”方式传递的报告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2月1日，我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其通报了如下内容：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新提案，并已向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发出了相应指示。

周恩来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提案的支持。他接着说，根据昨天安理会会议情况的最新通报，有一个新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即在安理会(昨天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同时包括了苏联和新西兰的提案。此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建议给中国政府发电报，以邀请中国代表参与讨论安理会议事日程中所包括的这两个问题。周恩来指出，苏联代表在对上述建议进行表决时所采取的弃权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接着说，在收到哈马尔舍尔德发出的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的电报之后，我们将研究目前所出现的新情况，并会把研究结果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

周恩来对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提出的提案——关于清除蒋介石代表参与并讨论安理会议事日程所涉及的台湾地区局势诸问题——表示非常满意。周恩来指出，这一声明更有利于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活动之外。

罗迈进(签名)
1955 年 2 月 1 日
北京时间 18 时

报告发送人——罗迈进
接收人——费琳娜
1955 年 2 月 1 日 13 时 10 分
第 160/M 号
共发出 14 份，文件送：布尔加宁、瓦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同志
第 112 - см 号
1955 年 2 月 1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120, л. 49 - 50

№09935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

(1955 年 2 月 2 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绝　密
文本第__份
1955 年 2 月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 年 2 月 2 日

北京时间 23 点，我应约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通知我，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会议详细

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向安理会提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向我转交了以下计划文本：

“一、哈马尔舍尔德发给我们一封电报，其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定，邀请我们派代表去参加审议新西兰的提议草案。这使我们更加容易拒绝这一邀请，以便采取准备召开远东会议的进一步步骤。

我们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项：

(1) 完全支持苏联的提议草案。

(2) 批评新西兰的提议草案，并坚决反对这一草案，因为这一草案旨在让联合国方面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3) 批评了联合国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不公正的立场，特别是在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和权利方面。在安理会中由蒋介石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参与讨论涉及中国的问题，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可能出席安理会。

(4) 综上所述，中国拒绝参加审议新西兰提出的议案。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安理会中的中国代表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安理会讨论涉及中国安全以及安理会通过这一问题的决议，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5) 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的议案，并且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安理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同意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6)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由美国占领台湾并干涉中国的内政所造成的。中国政府支持旨在缓和由美国在这一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所做的一切真诚的努力。

二、建议苏联在中国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后，主动向英国和印度暗示以下各点：

必须缓和并消除由美国造成的远东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目前在联合国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并纵容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走别的路。为了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最好是由那些与远东局势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苏联、印度和英国，倡议召开远东会议。这一会议可以吸收 10 个国家参加：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可以于今年 2 月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只有这样的会议才能有助于远东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

如果英国和印度试探我们对于苏联这一建议的态度，我们将表示同意并说服英国和印度这样做。

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视情况而改变，其成员可以扩大。但是必须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会议。

三、如果能够召开远东会议，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拟在谈判中遵循下述方针：

(1) 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

行使他们的神圣主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这件事。

(2)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应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3)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撤出武装力量之后,解放台湾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

四、我们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上述计划的意见。

1955年2月2日”

周恩来请求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通知他。

我答应将上述计划立即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并在得到莫斯科的回答后即告知周恩来。

该计划已用高频电报发往莫斯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203-206

№09936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6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2月21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章汉夫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2月6日

今日22时30分,章汉夫同志受周恩来同志委托邀请我到外交部,并以口头方式向我通报了下午3时周恩来同志同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章汉夫同志说,印度大使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约见了周恩来同志。在谈话时赖嘉文说,印度认为在台湾地区形成的局势是严重的,他受托转达尼赫鲁的意见并听取周恩来对此问

题的看法，赖嘉文转达尼赫鲁的话说，尼赫鲁身在伦敦，他一直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赖嘉文还通知说，尼赫鲁支持周恩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中的基本立场。尼赫鲁认为，美国不打算从台湾地区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的社会舆论不想关注中国的权利和要求。尼赫鲁说，当前应当避免战争，必须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

在支持中国对台湾立场的同时，尼赫鲁还主张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要求。尼赫鲁说：必须保留对台湾的权利并赢得时间。

赖嘉文说，尼赫鲁在台湾问题上暂时尚未找到任何措施和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但是他主张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还主张在这一问题上要取得某种进展。

赖嘉文说，身在伦敦的尼赫鲁不止一次重申他捍卫中国权利的论点，但是没有提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请求询问周恩来对此问题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回答赖嘉文说，他很高兴尼赫鲁支持中国的立场。

赖嘉文通报说，2 月 4 日尼赫鲁接见了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并向他转达了与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相同的内容。周恩来同志说，尼赫鲁在同宦乡谈话时讲了最好召开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的会议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中国支持召开会议的建议，并说苏联已经向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周恩来指出，苏联政府了解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中国政府支持为讨论整个远东的局势，包括台湾海峡局势问题而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周恩来说，很明显，赖嘉文大使知道苏联政府已同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进行了交谈。章汉夫同志指出，根据赖嘉文的话可以判断，在同宦乡谈话时，尼赫鲁还不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接见了驻莫斯科的印度和英国的代表。

在说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周恩来声明：

一、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能上圈套，不允许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指出，新西兰的建议就有这种企图，英国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并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自己愿望的声明，也是一个圈套，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存在两个朝鲜、两个德国和两个越南。中国的情况与朝鲜、德国和越南的情况不同，但是某些人企图混淆这一问题。

周恩来同志指出，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情况不同于朝鲜、德国和越南。

二、美国应当赞成召开国际会议的谈判，中国不拒绝进行这种谈判。由于美国是台湾地区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根源，他们对此应当担负起责任。想躲在蒋介石背后并将其推向前台的企图，不外乎是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周恩来同志说，美国打算从大陈岛撤出军队。美国在台湾及其他岛屿给予蒋介石帮助以及帮助他从大陈岛撤军，乃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证明美国在介入中国国内战争，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威胁中国的安全。这也说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制造者的角色已越来越明显。

三、英国不仅纵容美国对中国制造军事威胁，而且自己也参与制造这种威胁。但是这一

威胁吓不倒中国。如果他们想尝试一下,那就让他们尝试吧。英国人民不会替美国人流血的。

在概括上述各点时周恩来说:中国绝不会支持任何可能把中国诱入制造两个中国的圈套中去的行为;中国不会参加任何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侵占台湾就已造成并且还在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并以战争威胁中国。

中国不侵犯任何人,但是准备抵抗来自任何国家的侵犯。如果美国进犯中国,那么中国将给予美国以应有的抵抗。让他们试一下吧。如果美国真的愿意缓和紧张局势,那么他们就应该坐在会议桌前,就应当同意苏联和印度的建议,进行谈判。周恩来说,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理由,不怕坐在谈判桌前讨论这一问题。

章汉夫同志说,周恩来请赖嘉文将上述意见转告尼赫鲁。

之后,赖嘉文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是否允许美国帮助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自己的军队?

周恩来回答说,他没有看到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全文。他还说,大陈岛处在不久前解放的一江山岛上的炮兵控制之下,也处在空军的控制之下,他不知道美国怎么才能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冲突。周恩来说,据我们现有的消息,美国人有一个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接触的秘密命令。这可能是一个骗局,或许美国人还有其他的指示,我们尚未搞清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人发动进攻,那我们必定反击,我们的话会被事实所证实。

二、预计召开的国际会议何时何地召开,有哪些国家参加?

周恩来同志回答说,时间和地点问题,这是个技术性问题;苏联政府建议会议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至于参加会议的国家,中国支持苏联和印度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说,苏联政府建议,由印度、英国和苏联发出召开会议的倡议,我们希望苏联、英国和印度认真商讨这一问题。如果他们主动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倡议,这将是有益的。如果印度担负起倡议的使命,这将有益于整个亚洲。

周恩来表示,希望印度能更积极地承担起这件事。

谈到参加会议的国家,周恩来强调说,可以考虑缅甸、印尼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发表的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他同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我允诺立即将谈话的内容通知苏联政府。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外交部的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215 - 219

№09937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

（1955年2月8日）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

B. M. 莫洛托夫同志：

您的第230号指示已于2月8日14时完成。此外还告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看法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走出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二、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2月7日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说，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宦乡与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周恩来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够召开。那又有何妨，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三、周恩来通报说，今天凌晨，蒋介石分子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大型军舰都停泊在岛外边，只用小型舰船撤退。照蒋介石的计划，撤退工作将进行7—10天，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提前完成。他还通报说，大陈岛上有军队1.2万人，居民1.8万人。岛上从凌晨起就燃起大火，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烧毁所有的房屋，不能烧毁的则炸掉。

周恩来通报说，今天15时30分他应印度大使赖嘉文之约将接见他。

罗迈进

北京市

1955年2月8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222－223

№09940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

(1955 年 2 月 8 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 年 2 月 8 日

今日北京时间下午 2 时，根据 B. M. 莫洛托夫的指示拜访了周恩来，并向他转交了今年 2 月 7 日印度驻苏临时代办向 B. M. 莫洛托夫递交的印度对苏联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答复全文。我同时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意见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意见：

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他们想由安理会向 3 个国家提出，请求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他们还想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预先进行摸底，并搞清初步的、基本的条件。

周恩来说，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补充说，在宦乡同在伦敦的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他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会召开；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周恩来通报说，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空军部队参加了这一行动。但是美国的大型军用舰船都停泊在大陈岛以外，只有小型船只开近岛屿。

周恩来指出，有消息说，后撤工作将进行 7—10 天。我们认为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撤工作将在 5 天内结束。周恩来还通报说，在大陈岛上国民党军队共有 1.2 万人。此外，美国人打算从这些岛屿撤走全部居民共计 1.8 万人。蒋介石给军队下了命令——烧毁所有的建筑物，而不能烧毁的则全部炸掉。在大陈岛上已燃起一片大火。

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今天下午 3 时 30 分他将应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请求接见他。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谈话持续了30分钟。马列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233 - 234

№09938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8日)

机 密

文本第13份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1956年2月8日16时40分

致B. M. 莫洛托夫同志：

19时周恩来邀我去他那里,通报了他同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意见,例如,对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能否作修改。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以平等的权利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事先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讨论这一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与美国保持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嚣,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其他一些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谈话的最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大使海特给 B. M. 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罗迈进

分送以下同志:布尔加宁、葛罗米柯、伏罗希洛夫、佐林、卡冈诺维奇、库兹涅佐夫、马林科夫、费德林、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

第 184/M 号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224 - 227

№09939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8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　密
1955年2月
第18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谈话纪要

今日19时周恩来邀请我去他那里，向我通报了他同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请求将此次谈话的内容转告B. M. 莫洛托夫。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3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看法，例如是否可以改变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正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着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在同等的权利下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讨论一些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指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而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嚣,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一些其他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在结束同印度大使的谈话时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说,目前英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众所周知,丘吉尔在他不久前的一次发言中老调重弹,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原则,什么它不能进入联合国。周恩来指出,当美国对中国公开进行侵略活动时,英国视而不见。而当中国同侵略者作斗争时,英国却谴责中国。周恩来说,事实说明,英国是跟在美国后边跑的。

周恩来向赖嘉文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坚持这一政策,那么,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不可能解决。

赖嘉文回答说,不久前他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其中尼赫鲁说明了他自己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观点。尼赫鲁认为,口头上英国指责中国并支持美国,而实际上英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按照尼赫鲁的看法,英国人并不奉行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周恩来回答赖嘉文说,英国正在重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① 周恩来同意赖嘉文的以下意见:英国的政策有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地方。周恩来补充说,但是只要美国给英国一点压力,英国马上就同意美国的意见。

---

① 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1937年出任英国首相,在外交政策中一再采取对法西斯姑息、忍让的主张,以致希特勒德国对欧洲不断蚕食,步步紧逼。故张伯伦的政治生涯以推行绥靖政策而闻名。——编注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感谢周恩来同我谈话之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联大使海特给 B. M. 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马列担任翻译。谈话持续了 1 小时 15 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228 - 232

№23893

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

(1955 年 2 月 11 日)

副　本

1955 年 2 月 15 日

致 H. A. 布尔加宁同志(副本给 H. C. 赫鲁晓夫同志)：

鉴于您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外交部收到了许多贺电，其中包括：周恩来给您的贺电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照会。

苏联外交部认为理应做出如下回应：

1. 以您的名义向周恩来同志发出回电，回电草案参见附件一。(我们)建议电文不要对外公开。

2. 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发出回复性照会，参见附件二。

我们还收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给您发来的类似祝贺照会。

3. 如果收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和使团发来的相应照会，我们将向其发出答复性照会，照会具体内容参见附件三。

B. 莫洛托夫

1955 年 2 月 11 日

附件一:

北京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

在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收到了您的贺电,请您——总理同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接受我的感谢。

H. 布尔加宁

附件二:

草　案

第__号

致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

苏联外交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致敬。在布尔加宁同志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您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根据 H. A. 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Д. 阿吉尔必什同志及其使馆全体人员转达布尔加宁同志诚挚的感谢。

莫斯科 1955 年 2 月__日

附件三:

草　案

第__号

致使馆(使团)

苏联外交部向使馆(使团)致敬。在 H. A. 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你们的贺信(祝贺照会)。根据 H. A. 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你们转达他的诚挚感谢。

莫斯科　1955 年 2 月__日

1955 年 2 月 10 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

莫斯科,第 п-036/5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向苏联外交部致敬,并烦请苏联外交部把附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转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H. A. 布尔加宁。

在此,中国驻苏联使馆预先对满足我们这一要求的苏联外交部表示感谢。

莫斯科　1955 年 2 月 10 日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莫斯科市

译自中文

1955年2月10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H.A.布尔加宁同志的电报
1955年2月9日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在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在您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形成坚如磐石的统一和团结，并必将在伟大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全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5年2月9日

1955年2月9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莫斯科　1955年2月9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A.布尔加宁同志
1955年2月9日
无比敬爱的主席同志：

请允许我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成员和自己本人的名义对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表示祝贺，并衷心祝愿您在伟大苏联——各民族和平、友谊和安全的不可动摇的支柱——政府首脑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们国家与苏联不断增进的友谊将是我们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和繁荣的保证。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您——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桑德罗夫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派全权大使
Д.阿吉尔必什
1955年2月9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53-59

№24895

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

（1955 年 2 月 12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兹向您报告关于有色金属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的义务的履行情况。

抚顺铝厂。12 月份工厂建成投产。主要的指数超过设计时的指数。工厂的工作都很协调。1 月份发现北大楼的阳面出现了明显的裂隙。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现在消除了这些裂隙。考虑到用于生产阳浆多变的原料成分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完全不足，我认为必须在这方面进行另外的研究，委托在吉林电子厂的 M. Д. 格鲁济诺夫同志来做这项工作。

迄今为止，一些设备还没有供应，其中包括向其他工厂借用的用于保障该工厂按时生产的电子设备。这些设备的清单已经送给贸易代表处驻沈阳分部的对外联络处。

吉林电子厂。主要的建设工作在年底完成。锅炉厂投入生产，这就使得可以在冬季的条件下生产炼炉和燃炉的砌块。现在已经生产了大约 7 000 吨耐火砖。

对设计进行修改的设计资料的提交也被拖延了，这些修改的目的是为了改正原设计中的错误，并改善工艺。

由苏联提供的大部分设备都已运送到了工厂。但是，现在还缺少一些关键的设备，没有这些设备工厂是不能投产的。没有提供的设备的准确信息以附件列出。

检测仪器的供应过于滞后。到 2 月份向工厂提供的仪器仅占设计工作需要的总量的 50％。

为工厂配备的苏联专家小组也不齐全。在几个月内感觉到急缺锅炉装配方面的专家、起重机专家、压床专家、电力专家和通风装置的专家。为了避免延误建设，已经从其他的部邀请了一些专家。

由于起重机的装配工作已经完成，就不再需要这方面的专家了。

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正在完成一些附属车间的建设。锻造焊接车间、各组附属车间、车库和仓库近期将会被交付使用。钢筋结构的主楼的装配已经完成了 50％。

尽管提交设计资料的期限在 1954 年就到期了，一些设计资料迄今还没有收到，其中包括：铸造车间的设计、主楼机器大厅的设计、主楼变电站的设计、许多车间电子设备的设计。还缺少电炉的设计，该设计应该根据苏方的草图在中国完成。

设备供应得很慢；在规定的期限内，装配工作没有完成。为了保证建设装配工作计划在

1955年完成，就必须在一年的时间内供应不少于1万吨的设备。

根据合同，该工厂应有18名专家，但事实上专家小组仅有11人。监督小组专家的配备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仅到了1人)。

金属网制造厂。该厂的建设正在结束。总订货单位希望在1955年第一季度末开工，但由于缺乏部分设备，工厂的投产将要延后。缺少的设备是：拉长机器、圆盘刀、宽度为4米和5米的织布机床以及其他的一些设备。迄今为止一些图纸还没有得到。尚未供应的设备的完整说明以及尚未送交的图纸的清单由韦特卢日斯基专家送往对外联络处。为了准备使工厂投产就必须加速派遣专家小组，首先是专家小组组长的到来。

白银场(Байинчанский)硫化铜联合加工厂。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完成。制定了进行设计的计划任务，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批。进行设计所必需的大部分材料都被送往莫斯科。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正在进行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工厂建设计划和生产的产品的规格已经制定，并已提交供总供货单位审批。设计任务将会在3月份得到批准。由于收集初步资料的专家小组前往中国晚于预定期限而耽误了工作。

杨子张子(Янцзычжанцзы)钼矿。正在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数据对钼矿的储量进行计算。储量的计算预计在4月份完成。与已经得到通过的设计任务相比，可以期待B+C范畴的储量会大量增加，情况如下：

	通过的设计任务			预期		
	矿物(百万吨)	矿物的平均含量	钼的储量(千吨)	矿物量(百万吨)	矿物平均含量	钼的储量(千吨)
戴贝岭(Дайбейлин)	5.3	0.31	16.3	9.8	0.31	31.3
新城	2.5	0.28	7.1	5.9	0.30	17.4
百易(Бей)	10.8	0.18	19.8	18.3	0.16	28.8
共计	18.7	0.23	43.3	34.0	0.22	77.3

个旧锡联合加工厂。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情况，将会在4月份完成对储量的计算。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1954年夏个旧市的金属工厂被淹没，并停止了工作。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的决定正在进行设计工作，并开始了在个旧市进行新的工厂的建设，该厂的生产能力为每年生产1.65万吨锡。这样的决定使得在昆明市建设锡加工厂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设计小组由13人组成，他们在北京有色金属企业设计所工作，从1954年5月份以来该小组就没有常设的领导人，致使该小组的工作存在一些重大不足。请求您提供帮助，加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负责设计小组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以上谈论的只是目前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

关于建设状况和工作中的不足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提供的设计资料的不足，设备供应

的不足以及专家工作的不足，小组领导人在每月发往对外联络处的报告中都有阐述。

苏联有色金属部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C.扬申

1955年2月12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52-55

№21404

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

（1955年2月18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新闻局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处1954年工作报告复制件。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共计20页。

苏联新闻局局长П.波兹杰耶夫

1955年2月18日

第157号

归档。苏联新闻局接到指示，有必要就迅速派遣苏联新闻局代表处负责人赴北京问题提交一个提案。

И.谢尔巴科夫

附件：

机　密

1955年2月

关于1954年苏联新闻局北京代表处的工作报告

（一）

目前，中国正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该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间段内逐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施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工业化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发展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如能源、冶金和机器制造等。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是：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组、生产合作社，最后建立集体农庄以及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和信贷合作社。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最重要的合作方式。劳动互助组是这种合作方式的低级阶段，它是以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本身已具有了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这种互助组组织模式可以是季节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

如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随后的，生产合作社的更高级阶段。虽然，这种农业合作社仍是以土地的私有制为基础建立的，但已处于合作社管理机构的集中领导之下，其部分收入也是按每个社员的劳动来按比例分配。另外，合作社已拥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

私有工商业依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在于，在第一阶段鼓励其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并在第二阶段逐渐地最终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企业。

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的宣传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新闻媒介提供帮助呢？在实现政府为国家所提出的任务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政府提供帮助呢？中国新闻媒介究竟需要那些资料以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呢？

1. 目前，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在投入运营，新的工业仍在不断建设，大量引进新技术，许多生活和公共设施也在建设之中。

因此，最缺乏的是具有生产组织和教育工作经验的行政、工会和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熟悉专业和拥有一定文化的技术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首先需要我们提供的是关于生产领导工作的具体经验——包括从负责具体岗位的师傅到工厂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的工作经验。其次，我们主要需要关注的是组织方面问题，如新工人如何工作，如何帮助落后者，如何分配劳动时间，怎样维护劳动纪律(要毫不客气地表明，我们也同样存在不守纪律的工人)，等等。最后，生产过程组织的技术方面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三方面问题，如果没有这一项，生产过程便无法进行。在我们提供的所有这些资料中都应当说明一长制原则的实践意义。

在为工人读者提供的资料中，我们应当列举一些实例，如苏联工人在工作中发挥主动性，勇于改革创新，从而更多地展示苏联工人的思想境界及尽力为国家作贡献的目标追求。尤其需要提供的是关于工人通过自学方式提高自身技能的资料。

中国新闻媒介对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此，我们在宣传中应当鼓励人们多读报和文学艺术作品，多看电影。在宣传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展示苏联工会组织如何吸引工人阅读文学作品，组织文艺晚会，建立读

报小组,宣传员如何开展工作,等等。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会俱乐部工作人员会议。会议期间指出,许多俱乐部正在开展大量无益于工人思想教育的娱乐活动。因此请求我们提供苏联轻、重工业工厂中俱乐部活动的各方面情况。

2. 为了配合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报刊很需要苏联集体化时期的资料。《人民日报》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到》,被推荐为由此类资料中挑选并编辑而成的重要指导性参考之一。该文章比任何解释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各编辑部都希望刊登这样体裁的文章:向所有人展示苏联农民在赢得当前富裕生活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困难。但我们至今仍无法满足中国报刊的这方面需求。近期,我们开始从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文章中进行挑选,但所选出的文章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从组织集体农庄至实现农业机械化——苏联集体农庄社员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和劳动情况。

《人民日报》把上述文章直接发给了我们,认为我们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有能力帮助中国新闻报刊,并向中国农民解释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实际上,关于苏联人民(包括农民在内)目前生活状况的资料,中国报刊已刊登了许多,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得到补充。我们的报刊在关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劳动,以及党和工会工作的新方式,关于文化等内容方面,作了大量的报道,中国同志完全可以从这些资料中挑选适合中国实际的东西。但在如何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他们能从我们报刊中挑选并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东西却很有限,因为我们很早便经过了这一发展阶段,人们已记不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了。

问题很清楚,中国报刊为何会如此积极地向我们约定集体化时期的稿件,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而除了我们,他们根本没地方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从反面来看,我们也理解了如下一个事实的原因,即以前《人民日报》请求我们提供的都是关于工会组织实际工作情况的文章,而如今要求我们提供的已是关于工会的理论性文章——仅在10月份该报便从《劳动报》上摘取并刊登了8篇介绍工会组织在生产中各方面工作相关情况的文章。

今后在筹备农业方面资料之时,必须考虑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通报过的内容。例如,在一篇名为《如何正确对待整批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文章中,据《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对河北省26个合作社所作调查,约一半重新入社的农民都是"整批"加入的。这些农民过去主要都是中农,即农业改革之前的中农。他们掌握着相对比较多的生产资料。该文章继续道:"如何对待这些农民的问题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中农关系的问题。而这些'整批'入社的中农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还是从合作社退出,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合作社中开展很好的教育工作。"

如今,中国开展农村工作的口号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和逐渐消灭富农。"有鉴于此,我们在自己所提供的资料中也必须贯彻联合中农的思想。

在宣传联合中农的同时,中国农村还在开展提高对富农的警惕性的工作。1957年以前在准备全面实施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运动于1957年结束),(政府)建议不接收富农加入合作社。

3. 中国报刊针对青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中主要是向青年宣传: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学业,扩展自身的政

治和文化视野，掌握科学知识。而之所以要向青年宣传坚持继续自己的学业，是因为多数青年在小学毕业后便不再继续上中学，从而导致青年或中学生的数量明显不足。

在这方面，针对我们的要求是：以生动的形式展现在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共青团基层组织的活动，并介绍当前苏联共青团组织和个别共青团员的工作情况。虽然中国报刊在约稿中并没有涉及到关于在苏联集体农庄中共青团组织的情况，但我们仍应当向他们发送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4. 近期，在中国报刊、高校、科研和创作组织中广泛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反对的是国民党员——胡适在文艺学方面的巨大影响及其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哲学。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如下内容的文章来对这场斗争提供帮助：关于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以正确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文学的继承性问题，研究作者的阶级立场，反对盲目地崇拜老学者的“权威”；关于必须以爱护的态度培养和勇敢地提拔年轻科技骨干。

5. 由于城市人口和工人数量的增长，农业居民商品需求的增加，当前中国正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对商品分配实施更好的监督以及限制商人和投机分子的活动，中国国内前不久开始对面粉、大米、食用油和棉布消费实行定量配给。

中国报刊呼吁读者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自觉对待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以支持政府的现行举措。

作为克服生活困难和提倡节约的宣传范例，附件中收入了《新闻日报》这样一篇文章：《服从定量配给制度，卖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对中国新闻媒介的帮助，我们可以向其提供这样一些资料：展示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年代工人和农民们所经历的巨大困难和不幸，而只有在克服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才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除了我们，谁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此类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中国报刊目前最需要的。

当然，中国新闻媒介所需要的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方面。上面我们只是罗列了自己已收到中方的咨询而又没有完全满足其要求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中国新闻媒介依然需要与苏联有关的如下资料：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及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苏联人民目前的生活情况，关于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等。

（二）

苏联新闻局代表处或多或少地与位于北京的报社及其30个分社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我们从最重要的报社将收到其下半年所需资料的约稿。在与(北京的)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共同对这些约稿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再将其转交给国内负责这方面事务的部门。另外，各报社编辑部在全年任何时间仍可能向我们约订除上述约稿外的其他资料，从其他报社——主要是省级报刊，我们也会经常收到向我们索取类似题目资料的请求。对此，我们均会通过发送复印件和剪报的方式满足其要求。

去年，我们的代表处与新华社建立了关系，后者向所有报刊的编辑部均散发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甚至那些尚未与我们建立直接联系的报刊编辑部也有可能通过该社获得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从新华社的通报中我们并不能完全估算出我们资料被刊载的次数，这就是说，我

们现在所掌握的中国报刊信息仍很不完整。不过,通过所获得的信息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这种联系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例如,B. 拉古杰克的文章《1954 年莫斯科的住宅建设》便被 7 家大的省级报刊转载;B. M. 鲁缅采夫的《苏联社会主义农业》被 9 家报刊转载;Л. 奥帕茨基的《苏联——伟大的工业强国》被 13 家报刊转载。这些统计数据当然并不完整。在 1954 年下半年新华社会简报中共刊登了我们的 15 篇文章。

10 月份,我们与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无线电广播建立了联系,而在此之前,那里仅使用了 7 篇我们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7 周年的文章。

1954 年,我们与《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新苏州报》、《当代日报》和《抚顺日报》,以及几个专业性的杂志《美术》、《戏剧报》等建立了联系,随后,他们也开始向我们索取一些专业性的文章。

针对多数北京的编辑部,我们都是直接转交俄语文章,而对所有省级编辑部都是译成中文。在我们代表处工作的两位翻译仅去年便翻译了 420 篇文章。

1954 年,中国报刊共刊载了苏联新闻局的 819 份资料,其中中央机关刊物 338 份,地方刊物 481 份。而发表我们的文章共计 580 篇。

与 1953 年相比,1954 年中国刊物刊载我们资料的数量略有下降(1953 年为 856 份),但我们仍可以理由充分地说,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有所改善,其读者群也有所扩大。原因在于,1953 年仅 1 家小的私营报纸《哈尔滨报》发表了我们的 216 篇文章,占总刊载量的 25%,而其他报纸和杂志仅发表了 640 篇。1954 年初,该报(指《哈尔滨报》,为中国最后一家私营报纸)在成功发表了我们的 44 篇文章后被(政府)关闭。如果说,1953 年刊载我们 10 篇以上文章的省级报刊只有 9 家,那么到了 1954 年此类报刊已增至 19 家。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下情况:由于一些较大的行政区被撤销,这些地区内的 5 家以前的中央机关报被转为省级报刊。而这些报刊任务和规模的改变必然会对其发表我们资料的数量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不同题目,苏联新闻局资料的发表数量具体如下:

(1) 苏联建设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 167 篇;

(2) 文化、教育和体育 111 篇;

(3) 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的生活情况 90 篇;

(4) 工业、建筑和交通 126 篇;

(5) 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文章(包括第一项中未指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80 篇;

(6) 为纪念苏中友谊而组织的资料 74 篇;

(7) 农业 70 篇;

(8) 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30 篇;

(9) 大型建筑 26 篇;

(10) 其他45篇。

所有在苏联刊物上刊载的官方资料及其评论均被中国新闻报刊依据塔斯社、新华社所提供的资料发表。

使用我们所提供照片的主要是中苏友好协会。在拥有此类机构的北京和其他城市这些照片被用于举办流动和固定展览。

报刊通常情况下都是将照片和文章同时刊登，而很少只发照片。

去年，我们收到了穆卡诺夫的手稿《我的共和国——苏维埃哈萨克斯坦》，并将之转交给了《时代》出版社。后者对此反映积极，正准备出版该著作。

正如我前面已提到，中国各编辑部并不积极向我们反映其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看法。这可能与我们在他们眼中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有关，从而导致他们在与我们的谈话和通信中显得过于正式和拘谨。总之，我们从未收到他们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负面反映。

下面，我以《北京日报》为例，我们曾请求其就我们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该报在答复信中写道：

"请允许我们以《北京日报》编辑部及其广大读者的名义向您和整个出版部集体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近两年来为我们报纸所提供的文章。

由于你们的帮助，在1953—1954年间《北京日报》的读者们从由著名苏联作家、专家、工人和农民所写的文章中更多地了解了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从而促进了我们人民间兄弟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坚定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决心。两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来自你们的帮助，在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各报刊和杂志编辑部在交谈中也对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了个别、简短的意见，具体可归纳如下：

1. 在谈及关于苏联国内的先进人物时，中国报刊也提出自己的目标：提高劳动者的觉悟，使他们学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因而在关于工、农业先进者的文章和特写中，不仅应当展示其创新精神和劳动热情，而且首先应反映那些能够鼓舞他们为加强祖国经济实力而努力工作，增强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或团员及国际主义者的责任感的思想动机。我们苏联人通常可能会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却拥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2. 中国报刊的工人人员多次向我们指出，由于中国读者文化水平低，他们很难全面了解苏联的实际生活。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最好只论述一个问题，或一般只讲一个人物。这就要求我们所提供的文章对一个问题作更具体、详细地阐述，并相对减少文章的篇幅，从而适应文化较低的中国读者的需求。在那些为非专业出版物提供的文章中，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一些科技术语做出注释。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剪报，充满了大量的地理名称或人名，而没有这些是完全可以的。此类文章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中国读者的阅读难度。还有，在涉及苏联劳动者在经济等方面所获得的物质福利问题时，我们经常会罗列许多以卢布为单位的统计数据。这样的文章也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中国读者并不了解卢布的

购买力情况,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以元为计算单位的,他们对卢布的大小没有概念。因而,如果我们要列举苏联劳动者的收入数据,最好就立即做出如下解释:这些钱能购买多少商品。

3. 正如许多中国编辑部所提出的那样,多数中国读者还没有养成阅读严肃文章的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生动、引人入胜的特写、小短文甚至诗歌。各中国编辑部都希望在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中,除了标题和情节吸引人外,还要多一些用朴素语言写成的、没有长句式——中文难以组织的形象鲜明的对话和故事。

各编辑部针对艺术作品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教育意义。与此相关,他们经常要求我们提供抨击不良现象,如官僚主义、粗制滥造、不守纪律以及针对一些国际生活问题的讽刺类作品(如小品文、诗歌和带有插图的小短文)。中国报刊也经常会自己主动从我们的报刊和杂志中选择一些此类文章,但他们的选择余地有限,而省级报刊几乎无法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地方刊物来向中国的省级报刊提供帮助。

为了使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变得更吸引人,我们就必须扩展其问题的范围。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几乎未涉及一些新建筑领域(除了几座最大型的小电站之外)以及一些吸引人的职业,如地质学家、北极勘察人员、飞行员等,我们也很少写关于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等地区居民生活情况的文章。我们很少为中国一些拥有不高文化水平的读者撰写他们能够看得懂的,引人入胜的、关于苏联最新科技成就的科普性文章(我们也曾给苏联《科技新闻》刊物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4. 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用塔斯社的资料编写的。而中国报刊也能获得这些资料,而且能够比我们更迅速地译成中文。这样一来,我们的文章自然就不会被其采用。中国各编辑部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些由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撰写的、能够对一系列最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尖锐、透彻分析的原创文章。这里,时间因素并不发挥主要作用。作为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我们可以列举B.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文章:《美国在“反共”旗帜下对亚洲的侵略》。

5. 就我们所提供的关于苏联人民当前生活状况的所有资料的总体情况来看,其经常存在的不足在于:只展示好的一面,而极力避免提及其缺陷。在这些资料中没有涉及到好与坏、新与旧之间斗争的问题。这样一成不变的资料自然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只显示好的一面,人们自然是无所适从。

我们已经与《人民日报》编辑交流了意见,期间后者请求我们提供在我们刊物中刊登的一些展示中国不足和批评中国的资料。

我们发往中国的文章与那些发往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文章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苏联的实际情况编造了各种谎言,但我们所发表的文章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东西,只会提供一些实际的经验教训。

(三)

为了改善代表处的工作,我们打算做到如下几点:

1. 拓展作者范围。尤其希望吸引那些能够写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的小故事和特写等文章的作家;另外,在写当今苏联人民生活内容的文章时,并不只局限于明确一些事实,

而且要使作品语言显得生动、鲜明。换言之，我们必须与著名作家们建立合作关系。

2. 希望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力——对所收到的文章的一些地方做些修改、压缩，以便文章的表述能够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因为在以前，个别、很少的情况下我们已做过这样的改动，并因此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 为了促进所提供资料的刊载率，我们需要为这些资料配置一些照片。所有中国报刊编辑部都在自己的约稿和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许多以“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照片，但能够与所发文章相搭配的照片很少。

4. 我们还不知道，(国家)是否向我们拨付1955年的出差预算费用。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出差费用都不在预算费用计划之列，因此我们想再次事先指出为这方面活动费用制定预算的必要性。

5. 近期，出版部对我们所发出的质询的回复变得越来越迅速了。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联系。

6. 必须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像现在这样——代表处编辑拥有外交护照，而且代表处的主任也应拥有外交护照。各主要中央报刊的编辑经常会出席外交招待会。由于大家已知的原因，我们希望我们代表处的主任也能够出席此类会议。

为了规范代表处的工作，我们计划：

1. 经常就发来的资料向使馆出版部提出自己的评论和意见。

2. 与中国安徽、福建、江西等省级机关报建立联系。以前我们曾在这方面作过尝试，但一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3. 由于与使馆出版部建立了业务关系，我们现在获得约稿已不必提前半年，从而使约稿时间相对缩短。这样，我们也就有可能对中国宣传媒介的变化做出更迅速地反应。

4. 尽可能扩展与新华社的联系，并以之作为更广泛传播苏联新闻局资料的手段。

苏联新闻局驻北京代表处负责人

济金

属实。

特别部负责人

B. 杜比宁

附件：

《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

在对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这样说，“今天的苏联便是我们的明天”。大多数人都能听懂这句话。但是，苏联的“昨天”究竟是什么样呢？为了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苏联在“昨天”和“前天”又经历了哪些困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的人却很少。这

也是我们当前农村宣传工作中一个严重的不足。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是必要的,但也必须以这种宣传鼓励农民为实现这样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激励人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困难。

在向农民宣讲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些同志开口便是"随处可见——电(灯)和电话",闭口又是"照明不用煤油,犁地不用耕牛"。但他们从不以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其解释如下问题: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实施的这些措施对建设未来社会主义有何意义。而这样宣传所造成的结果是:农民们开始以为,幸福生活就在自己身边,只要伸手便可得到;但当遇到生活方面的困难时,又会对宣传中所说的一切产生怀疑,甚至出现思想上的混乱。

例如,计划采购和消费体系的实施,必然会伴随着一些对农民有利的社会主义的措施,但这些举措要求农民改变自己的一系列生活习惯。这种情况会引起一部分农民产生消极反映,并导致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发生动摇。

农村的部分领导干部不了解,农业的社会主义变革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作化;第二阶段——机械化。还有一些农村干部虽然听说过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其含义。在对农民宣传合作化时,一些人竟说:"拖拉机很快就会有了,到那时你们将不得不用自己分的地与合作社交换。"农民们害怕被迫交出好地,而自己单独又没有能力换取拖拉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加入劳动组合。在此类宣传的影响下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化就是最近2—3年的事。

在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农民们不仅不想购买新农具,甚至连旧的也不愿修理,并说,"没什么,一切都会好的!过两三年我们就有拖拉机了,谁还需要这些破农具!"因此,还导致一些农民对合作化的本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对当前农业技术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如在马匹的索具方面采用新工具等持轻视态度。

我们不能把未来的东西看作是业已得到的,因为未来的东西我们只有依据今天的条件并通过的辛勤劳动才可能得到。而没有经历今天的艰难困苦,我们就不可能建成明天的幸福。农民们应当根据国家计划全力发展合作化运动,增加生产,帮助国家的工业化。只有随着国家工业和拖拉机、汽油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工业才可能给予农民大量的帮助。这样,后者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只有到那时,美好的未来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只是坐着等待幸福的到来,那是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要想吃到好樱桃,首先得种好樱桃树。

《人民日报》

《服从定量配给制,卖什么就吃什么——姓姜的一户人家,如何准备过春节》

上海郊区朝阳小区194弄4号居住着的姜丽珍(Цзян Ли-чжэнь)阿姨一家已为自己如何过春节作了打算。姜阿姨与儿子、儿媳决定今年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不为过节买任何多余的东西,只吃市场上卖的。他们想把节约下来的钱存到银行购买国债,以帮助国家搞建设。

这个由成年人和孩子组成的家庭共有7—8口人。儿子和儿媳都在工厂里上班，他们每月都把一些工资存到银行里。他们完全有能力在过节时为家里买更多的东西。但今年，姜丽珍并不打算这样做。离过节只剩下三天了，但他们家只准备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如果不困难的话，他们还想再买一些肉和饼，但他们并不打算为此而去排队。

姜丽珍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决定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原因在于：这个家庭里的生活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使他们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放后，工人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家庭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说从前他们几乎见不到肉的话，那么如今他们每星期都能够买一些。去年下半年，姜阿姨一家吃了几只鸡。姜丽珍知道，现在许多家庭的生活都开始好起来了，目前国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重工业方面，而在食品生产方面的发展仍很有限，因而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尤其表现在过春节的时候，大家都想丰富自己家的餐桌，从而导致商品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与困难作斗争，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只吃市场上卖的东西。姜阿姨是小区代表、第四街区第一居委会主任，因而更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说服其他人尽可能地节俭，不去挤着排队，只买市场上卖的东西。

《新闻日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5, л. 128 - 148

№23894

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

(1955年2月22日)

机　密

致B. M. 莫洛托夫同志：

在2月21日的会谈中，中国参赞温宁通报道，中国大使刘晓有一封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建议信。与此相关，温宁询问我的意见：刘晓同志是在与H. C. 赫鲁晓夫同志会面时亲自转交这封信件，还是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由其他人来转交。

我答复温宁道，这首先取决于刘晓同志喜欢采用哪种方式。

温宁答，(中国)大使当然希望能够与H. C. 赫鲁晓夫同志面谈，但知道他很忙，因此无法做出决定。

我答应温宁了解这一情况并向其通报结果。
请求您的指示。

H.费德林(签名)
1955年2月22日

第337/ДВ号

手写批注:
请赫鲁晓夫同志审阅。

B.莫洛托夫
1955年2月22日

赫鲁晓夫同志于1955年2月23日接见了刘晓同志。
归档。

B.……①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60

№25968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

(1955年2月22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5年2月22日
第23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关于香港的报告

一、香港经济

香港是一个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

①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港资产阶级收入的主要来源。香港所需粮食几乎全部依靠从外面进口。对外贸易对工业企业的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它的产品主要是出口商品。

关于1954年度对外贸易的总结

香港的对外贸易的构成如下：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对西欧、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商品再出口服务，以及其他一些途经香港的贸易。例如，现在香港是中国同南海国家贸易的大型转运站。印度尼西亚的糖、咖啡、椰子油，印度萝藤等商品，过境香港输往中国。

香港是日本同英属北婆罗洲(婆罗洲的木材运到香港，随后由香港再出口公司运往神户和横滨)、菲律宾同泰国(主要是泰国大米)等的贸易中转站。

除了大量进口自己所需的商品(特别是粮食)外，还出口香港的工业品。

1954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同前几年一样)缩减至58.52亿港币，1953年为66.06亿港币。去年贸易总额同1953年相比减少了7.54亿港币，其中出口额减少了4.37亿港币，进口额减少了3.17亿港币。(《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1月27日，附件1)

去年中国同香港的贸易额急剧减少。同1953年比，1954年从中国进口数额减少了1.65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减少了1.49亿港币(1953年从中国进口额为8.57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为5.4亿港币)。

食品是香港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的商品部类，例如，去年从中国进口：

牛	1 814.7万港币
猪	8 635.4万港币
家禽	3 618.6万港币
蛋	4 749.6万港币
豆(黄豆除外)	3 362.5万港币
蔬菜	2 802.6万港币

香港从中国进口的其他商品部类有：种子、中成药、纸张、鬃毛等(参见附件1)。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农业肥料、染料、药品。去年中国从香港进口硫酸铵总额达1.087亿港币，煤焦油染料0.886亿港币(参见附件2)。至于机器设备，香港向中国出口的数量很少。例如，11月份香港运往中国的纺织机总额为0.036亿港币。

去年中国同日本经香港中转的贸易额增长很快。1954年11月，日本经香港向中国出口0.13亿港币，而1953年同期仅为0.045亿港币。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的绝大部分是西方的工业品。由于对中国出口减少，造成香港也缩减了从西欧的进口。

同1953年相比，1954年从英国进口商品数额降到1.05亿港币，从西德进口降到0.57亿港币，从法国进口降到0.17亿港币，从意大利进口降到0.46亿港币，从荷兰进口降到

0.35亿港币(参见附件3)。

同1953年相比,香港对南海地区的出口锐减:对印度尼西亚——1.47亿港币,对泰国——0.76亿港币,对非律宾——0.11亿港币(参见附件4)。

对南海国家出口降低的原因是这一地区严重的经济局面,由于出口订货额降低,这些国家在采取措施组织出口。

在同多数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及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降低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对香港的进口额出现增长。同1953年相比,1954年美国进口额增长0.57亿港币,日本进口额增长0.8亿港币。美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美国消费品需求的扩大,随后这种需求转到了南朝鲜方面。因此,去年对南朝鲜的出口额增长了3倍(从1953年的0.52亿港币增长到0.17亿港币)。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锐减,导致商品库存持续提高。根据香港报纸《华侨日报》披露的明显缩减的数据,同1953年相比,1954年商品库存提高了5%以上。

香港对外贸易额减少的原因有哪些呢?

1. 主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实施禁运导致对外贸易规模缩小。香港不能提供中国实施经济建设计划所需要的商品。

香港总督在美国逗留期间(1954年9—11月)就此问题谈到:"我们的贸易缩减了三成,香港无法生产中国需要的商品。我们能向中国提供的所有商品均来自其他国家。但是,任何一艘驶抵香港的船只,在到达之前我们无法确认它的商品是否是非战略性商品。如果有人想使自己的商品进入中国,这些商品就得绕过香港,很多人都害怕这里的贸易管制。"

由于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失去了自己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通常大量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需要经过香港,现在则直接驶抵中国的港口了。例如,所有被列入所谓战略性的商品(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玉米)都直接驶抵黄埔港、天津港和上海港了。

1月下旬,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出口香港的规定,香港报纸解读为"英国放松了管制"。根据这项规定,从1月17日起,除缩减的禁运商品和紧缺商品清单中列出的战略性商品外,所有向香港出口的商品许可证都被取消了。至于香港的许可证体制则没有改变。和以前一样,所有来自英国的商品都需要有进口到香港的许可证。

香港政府还同意参加商品转运许可证制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列入缩减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在商品出口国没有取得商品出口许可证时,不能在香港卸载或过境。

路透社报道说,新的管制体制是为了对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实施监控。新计划对所有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商品都实施监控,而其余的商品则无须监控。有如下一些国家加入了管制体制: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西德、英国和美国。加入这一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都在自己领土内对该集团国家输出的战略性商品的运输实施监控。(《南华早报》1955年1月15日)

新管制体制对香港同中国之间的贸易仍按照旧规则执行。

2. 香港贸易额的降低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严重萧条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

大众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内部市场缩小，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加剧。

现在，日本贸易公司在东南亚和南海国家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对香港的经济产生了影响。战后几年来，日本在香港的贸易网络开始恢复，10 多家大型日本股份公司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

英国资本家和香港商人之间的竞争加剧。近来一些英国企业主开始组织反对香港商品进入英国市场和英国的活动。前不久有人在下议院说："香港的针织手套造成利兹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失业现象。"去年香港向缅甸、马来亚、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出口了 31 万打帽子，成为英国毡帽企业联合会热烈讨论的话题。英国人说，他们不相信这些帽子是香港生产的，认为这是日本生产的经香港再出口的帽子。香港企业依靠高强度劳动生产出来的帽子，其低廉的价格令英国企业主非常不安。一位企业主说："我们的帽子每打售价 90—150 先令，而香港的帽子每打售价 26—66 先令。就算是我们不要利润，那我们也无法做到同香港一样的价格。"英国人采取措施给香港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制造困难。来自美国方面的竞争也在加剧。

3. 由于一些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贸易联系而无需香港服务，造成香港的贸易周转也出现了缩小趋势。这首先同对中国进行所谓战略性物资贸易实施禁运有关。结果，出售这些商品的国家不可能经香港中转来运送这些物资，而只能直接运往中国。此外，由于一些国家建立了直接贸易联系，这为他们节省外汇并以较低价格购买商品提供了可能。

工业情况

香港拥有相对发达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据香港 1954 年的官方资料，计有 2 418 家注册企业，大约有 1 000 家未注册企业。这样，根据官方资料，企业总数超过 3 000 家。注册企业共有 11.2 万名工人。大多数工业企业或作坊的工人数量为数十人。大型企业不是很多，主要是造船厂、纺织厂、轻工厂。

去年香港的工业生产总值比 1953 年增加了 15%，达到 10 亿港币，因为 1953 年的水平并不高。《华侨日报》在列举这些材料时指出，去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比最坏年份增加了 20%。(《华侨日报》1955 年 1 月 1 日)

香港当局提供了关于注册企业增加数量和这些企业中工人数量的资料：

	企业数量	工人数量
1950 年 12 月	1 752	91 896
1951 年 12 月	1961	95 207
1952 年 12 月	2 088	98 216
1953 年 12 月	2 208	100 776
1954 年 12 月	2 418	111 879

官方资料与夸大宣传的材料相一致，似乎香港企业的数量在大幅增长。但是，就算这些

资料也驳斥了香港工业高速发展的论据。

根据官方资料,在 4 年内注册企业的数量增加了 666 个,从 1950 年的 1 752 家增加到 1954 年的 2 418 家。工人数量的资料证实,新企业就其人数来讲都是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增加 666 个的条件下,工人数量增加了 2 万人。这样,如果现在每个企业平均有 50 名工人,那么,平均每个新企业有 33 名工人。不排除这种情况,一系列所谓的新企业事实上早先就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注册,而现在注册了。

香港的重工业主要是船舶制造和船舶修理。1950 年计有 18 家造船厂,工人 9 700 名。1954 年造船厂的数量增加到 20 家,但工人的数量减少至 9 000 人。最大的造船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和“太古船坞有限公司”能够建造排水量 8 万吨的船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造船厂的主要利润来源于海船修理。最近 2—3 年海船修理的业务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贸易禁运导致香港作为海港的意义有所降低。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许多业主宁愿去日本修理,因为费用低廉。船企利润逐渐减少。例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 1952 年利润为 0.054 亿港币,而 1953 年利润为 0.016 亿港币。去年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现在造船企业改变了生产重点——开始建造海船、渔船和驳船。不久前,“太古公司”建成了一艘排水量为 6 580 吨的新船。

香港有几家矿山企业从事铁矿、铅矿、钨矿和石墨的开采。1954 年这些企业开采出 6 053 吨矾土,90 800 吨铁矿石,60 033 磅精乌矿石,369 吨锡。(《华侨日报》1955 年 1 月 21 日)矿山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铁矿石出口日本、台湾,铅矿石出口欧洲,钨出口美国。

香港还有一些大型轻工业企业。最大的轻工业企业是纺织厂。

香港有 13 家纺织厂,每年消费 1.5 亿磅棉花。棉花从巴基斯坦、东非和南美一些国家进口。《远东经济评论》1955 年 1 月 27 日报道说,随着 3 家新厂投产和纺锤数量增加了 5 倍,香港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了 30 万纱锭。

香港的纺织工业主要是为出口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景气和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造成香港纺织厂的商品销售陷入困境。1954 年香港纺织品出售的数量比 1953 年要少,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要少。特别是对南海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出现了下降。1953 年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 0.56 亿港币的纺织品,1954 年为 0.33 亿港币;1953 年向巴基斯坦出售了 0.2 亿港币纺织品,1954 年为 0.1 亿港币。

对外贸易额的减少对其他轻工业领域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企业倒闭的现象。

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收入的减少,以及与军队和警察相关的开支增多,导致香港政府财政出现困难。从 1947 年到 1953 年,收入增长不到 2.5 倍,而开支提高了 3 倍。1954 年,无论是日常性开支,还是特殊性开支,主要是与警力相关的开支都在进一步提高。

现在,当政府正在编制 1955—1956 年财政预算方案时(香港的年度预算从 4 月 1 日开始到第二年 3 月 31 日结束),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的报纸开展了提高税收的运动,这不是偶

然的。例如，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发文呼吁提高税收。文章中指出，满足费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旧有税种和开增新税，重新研究税收体制（香港有10个税种，主要是地税，包括所得税、土地税和关税）。

香港当局试图依靠加大税收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

二、香港政治形势

香港政府认识到由于禁运导致贸易萧条所引起的经济形势严重，这在香港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他们首先担心的是由于对外贸易额的减少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根据反动报纸的消息，去年香港资产阶级的利润同1953年相比下降了，而“更为严重的是去年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赢利”。(《华侨日报》1955年1月22日)

由于贸易不景气造成闲置资本数量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其中的大部分被用来从事各种投机活动。黄金价格不断上涨。在香港资产阶级眼里香港越来越失去作为大型贸易中转站的意义，对解决经济领域的困难没有信心。

因此，香港政府对宣传当地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赋予重要意义，在香港报纸中能多次看到关于香港历史的“新阶段”——香港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大型工业中心、关于香港贸易的新方向——南海地区的观点。去年年末、今年年初举办了大型工业展览会。同1953年相比，展地面积增加了1/4，在展览会开幕前英国的许多报纸和杂志刊登了大量关于香港工业的文章，邀请各国代表团参展。

香港政府还大肆渲染香港建设的“宏伟蓝图”。香港政府建设了一系列行政大楼和工作人员住宅。英国贸易银行计划新建一栋14层的银行大厦，投资0.18亿港币。大量资金投入住宅建设。根据香港政府的资料，从1950年4月到1954年3月，建设新大楼的开支达到4.06亿港币。去年建设投资增长得最快。普通地段的土地价值增长了40%—50%，至于黄金地段则增长了60%—70%，有的地方增长了2倍。根据报纸资料，今年香港将建设1 000余栋新楼。(香港《大公报》1951年1月31日)

在广泛宣传工业领域和住宅“宏伟蓝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香港当局试图加速打造环香港资本主义圈，让与香港保持经常联系的那些国家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未来。葛量洪[①]在从美国返港途中答记者问时表示：“香港不存在紧张形势，也没有出现英国商人对投入的资本的安全感到担心的情况。目前在香港正在建设的一座14层高的大型英国银行就是证明。”(《香港和澳门形势》1954年第9期)

《远东经济评论》周报关于这家银行的建设问题写道：“这是英国和西欧国家关于‘香港的未来是有保障’的观点的新证据。”(《远东经济评论》1954年第14期)

大肆渲染本地工业建设的成就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商品产量有了一些提高，但在香港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对外贸易仍和以前一样逐年回落。香港的工业没有未来，香港没有必备的原料，同时与日本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香港对英国及其殖民地商品

① 葛量洪(George Herder Grantham)，1947—1958年出任香港总督。——编注

出口的增长招致英国资本家的抵制。英国企业主说香港利用帝国特惠体系不是把自己的而是把日本的商品倾销到英国,这种观点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关于香港对外贸易的新方向——南海方面——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同1953年相比,去年同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了下降。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存在一系列进口限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今后这一地区的情况将会向有利于香港的方向改变。今年初,香港报刊报道说,现在南朝鲜正在为进口香港商品设置障碍。

至于建设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香港资产阶级担心股票和货币贬值,把自己的资金用来建设住宅。

香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香港人口中的绝大部分——10万多人在各工业企业工作。建筑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也与此相近。

下列关于特大型企业数量和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数量的表格是依据1953年香港年鉴绘制的,这份资料证实香港的大型企业很少,工人分布在几百个小型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当中。

工业企业	企业数量	工人人数
造船厂	20	9 000
铸造厂	20	1 200
水泥厂	1	260
矿场	1	2 000
纺织厂	13	10 000
织布厂	160	10 000
装饰厂	46	1 000
针织品工厂	273	9 000
搪瓷制品厂	20	2 500
金属制品厂	253	12 000
油漆厂	11	400
食品厂	235	5 000
糖果厂	4	500
手电筒、电池等厂	71	5 500
烟厂	5	1 000
制鞋厂	51	6 000
制绳厂	40	800

续　表

工业企业	企业数量	工人人数
火柴厂	4	500
塑料厂	30	800
木材加工厂	30	1 400
印刷厂	30	5 800
化工厂	30	2 000
陶瓷厂	30	1 700
总计	1 257	89 360

特大型企业的工人总数中，妇女占1/3以上。1954年，登记注册的特大型企业共有工人111 879人，其中妇女40 529人(占36%以上)。近些年来，企业中女性工人的比例增幅很快。1954年，登记注册的企业共雇佣了11 103名工人，其中男性6 303人，女性4 800人。

香港有两家彼此对立的工联组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和反动的工团联合会，后者的工作主要由香港政府劳工处指导。工团联合会在工人中影响很小，因为他的领导层关心的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大部分工人加入了1949年建立的工会联合会，该联合会是30多个职业组织的联盟。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型工会有：电力工人协会、电车工人协会、燃气工人协会、电话工人协会。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部分工联组织都没有被香港政府登记，也不为地方当局所承认。

香港资产阶级的收入逐步降低，他们试图依靠企业工人的高强度劳动、增加工作日、降低工资来弥补。难怪香港当局就英国企业主对香港帽业涌现出来的不满在官方声明中说，香港人的工作时数每人每天比英国多一小时。企业主还广泛使用解雇工人的方法。1955年1月1日，有3 000多名船厂工人失业。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在下降。许多工人吃不饱，因为饥饿有时会选择自杀。

工人阶级加强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电车工人罢工在动员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培养他们的觉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7月1日，香港琼森电车公司借口“劳力过剩”裁员31名工人。事实上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被解雇人员的工作应由那些留下来的人员完成。这导致劳动强度增加和工时紧张，使劳动者筋疲力竭。

裁员消息刚一公布，电车工人立即要求恢复自己同志的工作岗位，要求管理机关同工联代表谈判解决问题。管理机关拒绝接受被解雇工人的要求，甚至拒绝就此问题同工联代表谈判。工联致香港政府劳动局的信也没有任何结果。劳动局表示，电车工人协会未注册，当局不承认该协会，不会向琼森电车公司提出关于解雇工人返岗的问题。

工人多次向劳动局和管理机关呼吁，但没有任何结果。8月31日，工人们宣布停止工作2小时，以此来抗议企业主的蛮横。但是，这无法改变企业主的态度。10月10日，工人全天停止工作。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谈判。电车工人协会就罢工问题发表声明说：“目

前事态的严重性正在加剧,冲突将会给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带来极大麻烦。琼森公司业主应该判明形势,立即同工人进行谈判。劳动局也应该承担起调解矛盾的使命,并正确地解决问题。”(《南方日报》1954年10月15日)工会联合会警告琼森公司和劳动局对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10月10日清晨,300多名工人纠察队齐聚在电车车库门口(有1 300多名工人参加工人纠察队)。一些加入资产阶级工会的工人试图进入车库,被工人纠察队挡在门外。(大部分电车公司的工人都加入了接受工会联合会指导的工人协会,也有部分工人是工团联合会会员,类似的情况在许多企业中都存在。)工人纠察队坚守了一整天。绝大多数电车厂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只有极少一部分蒋介石分子站在工人的对立面,极力挑拨工人之间的矛盾。

香港工人阶级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在10月10日停止工作15分钟。电力、燃气、电话、船舶制造和其他一些企业的协会建立了支援电车工人的委员会。委员会组织为罢工工人及失业工人募集粮食和资金的活动,还组织了要求接受被解雇工人返回工人岗位的签名活动。很快就有22万人在呼吁信上签名。这项工作是在民主的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的。

罢工展现了电车公司工人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展现了工人联合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在它的号召下,香港和澳门的许多工人都积极响应支持电车工人的号召。但是,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如愿。

11月,中国移民—香港工商界代表——也参加到支援工人的工作中来。11月9日,举行了关于尽快解决冲突的晚间集会,17个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型组织的代表、39位中国中等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工会工作人员、电影导演、神职人员、律师、医生等参加了集会。11月22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议上发言时,会长高卓雄提出了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要求,他说:“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将不仅影响到工业,也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南柏(наньбей)公司、香港法国商会等董事会主席在发言时也支持这一要求。

11月28日,电车工人协会在致城市各界的呼吁书中表示,如果当局不能满足电车工人的要求,他们将被迫发动第三次抗议行动。

工人的呼吁书令香港当局非常惊恐。11月26日,警察局长发表声明,在声明中恐吓说:“当局将采取强力措施防止社会安全和稳定遭到破坏。”(《香港和澳门形势》1955年第9期)

警察局宣布,从11月27日起香港和九龙的全体警员取消休假。同时,蒋介石分子也在积极活动,四处散播谰言,他们试图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使各企业工人之间互不信任。

12月1日夜晚,警察逮捕了8名工人。据香港报纸评论,有两名电车工人是因为散播传单被捕的。一名电车督察员发现了工人,并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警察。警察(100多人)立即赶到并驱散了围在工人外部的人群,逮捕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疑”的8个人。

稍后这个电车督察员在出庭作证时说,他在检查电车时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人在那里散发传单,当他走近人群时,人群中出现叫骂的声音:“看看这条狗! 让我们记住这个情报员!”督察员急忙上了电车,当时电车已经离开了,群众追着他叫喊:“大鼻子(华人对在

香港的欧洲人的称呼)，有胆你就过来。你可以看看你的脑袋是怎样搬家的。”

第二天，工人受到的指控是“未经香港政府华人事务局的许可非法散发汉语传单”和袭警。警察搬出了18名目击证人。审判持续了一天。根据辩护要求，交保证金释放工人。

现在，电车工人是香港工人阶级的先锋。在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开展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和被解雇人员返回工作岗位的斗争。工会联合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援电车工人，鼓舞他们，动员香港广大劳动群众以他们为榜样投入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为了帮助电车工人，工会联合会募集了25万港币，还向他们转交了34批各种商品。有10万多人参加了募捐。

新年前夕，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向电车工人寄慰问信的活动。纺织工人、煤炭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等向电车系统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四个大型工会的工人——电力企业工人、燃气厂工人、电报电话等企业工人，在自己的信中祝贺电车工人在6个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在信件末尾谈道：“你们的斗争符合香港和九龙全体工人的利益，符合全体居民的利益。因此，他们都支持你们。被解雇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期待，你们能站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巩固团结，支持工会及其委员会，时刻准备投入行动。”

同时，民主工联的代表来到了新年晚会现场，给工人们带来了礼物——啤酒、水果、香烟、唱片。工联代表和工会联合会代表发言后，电车工会主席陈要财(Чэнь Яо-цай)做了《我们半年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在报告开头陈要财就提出了电车工人目前面临的任务：

1. 同电车公司经常出现的解雇工人的现象作斗争。

2. 动员所有工人参加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挡住资本家进攻的道路。

3. 努力让31名被解雇的工人得到工作和粮食。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以前，琼森公司平均每两个月就以15人为一批地解雇工人，而不是一个一个地解雇。这一次，从1954年7月2日开始，琼森公司再没有成批地解雇过工人。陈要财说：“最近8—9年来工人不止一次地起来斗争，但斗争的时间从未像电车工人这样长过，也从未如此团结和达到如此规模。”在报告的结尾，报告人谈到了今年工人开展维护自身权利斗争的任务。

第二天，电车工人家属举行了迎新聚会，在聚会上强调了工人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强调了工人的家属向工会提供的帮助，明确了下一步的任务。在工会联合会举办的迎新年集会上详细讨论了电车工人斗争的经验。加入工联联合会的全体工会代表参加了集会，总共有300多人。

民主的工联对电车工人斗争的支持既表明了工会联合会影响力的增强，也表明了香港和澳门工人阶级的团结。由于广大居民支持电车工人斗争，许多企业主——华侨被迫表示自己赞同电车工人的斗争，反对解雇工人。许多企业主都被迫承认工人的工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在香港的共产党人处于秘密状态，通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领导工人的工会活动。饶彰风还说，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

想返回国内。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权以前,他们安于在香港工作,因为在香港工作甚至比在国民党专横的国内工作更轻松一些。中国解放后,他们提出了立即驱逐英国人离开香港的问题和关于自己回国的问题。对此饶彰风向这些同志解释说,必须继续在香港居民中开展工作,他们在制定计划时应考虑到工作的长期性。

根据电车工人在罢工期间提出的要求来判断,香港同志接受了这些建议。在这些要求中没有广泛的一般性的政治口号。所有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揭露琼森公司资本家的剥削手段来进行的。工人的工联领导人处处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的主要方法。"(摘自电车工会主席《半年来我们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工会联合会不得不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香港工人主要分布在上百个小企业中。香港存在大量国民党的组织——香港工人最为臭名昭著的敌人。

在动员工人参加反对企业主肆意妄为的斗争的同时,民主的工会联合会把香港工人团结在一起,揭露反动的工联领导层和国民党余孽。

帝国主义反动派积极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陆续发生的事件,使帝国主义分子越来越重视香港的重要性。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数十个特务组织云集在这里。现在香港有24个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和代办处。

从数量上来,美国和英国在香港的特务机构处于第一位。香港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从工作性质来看多数是英国的文化组织。英国在香港的政权的工作性质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样,葛量洪在美逗留期间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香港是我们获取中国情报的最佳场所。"(《南华早报》1954年9月26日)

美国在香港从事间谍活动的代表是美国总领事馆、美国各种军事和文化组织、"美国之音"广播站等。(详见:关于香港反动组织的会谈记录,发文号№109,1954年7月24日)美国领事馆共有280名工作人员,其中副领事29人。除了从事情报活动外,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监督香港当局实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执行情况。前工党政府贸易部长威尔逊去年在座谈会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传唤英国商人,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停止贩卖某类商品,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他们在美国的账户也将被冻结。

国民党的情报队也在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截止去年年末,香港共有54个美国的和国民党的情报组织(不算美国领事馆)。美国情报机关积极开展向中国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活动。(参见:美蒋特务在中国南部从事破坏活动的报告,发文号№140,1954年11月5日)

反动组织还加强了对香港居民的意识形态灌输工作,努力让他们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牢不可破的思想,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他们,用色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腐化他们。形形色色的反动组织——香港政府、买办资产阶级报纸、天主教会、名目繁多的所谓文化组织、国民党余孽,在这一活动中联合了起来。

香港当局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军事力量和警察队伍。根据官方资料，1954—1955年度警力的开支甚至提高了16%。去年年末，香港政府扩大了警用巡逻车的数量，准备建造6艘警卫船。警察学校扩大了招生人数。现在，启德机场(九龙)扩建工作已经开始。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把香港打造成军事基地。近来，英国和香港军队提高了军事演习的次数。11月，在九龙半岛毗邻港中边境处举行了为期8昼夜的军事演习。香港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香港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演习。步兵、炮兵、喷气式飞机参加了联合演习。12月中旬，在九龙再次组织了军事演习。

12月12日，在英国驻远东香港地区舰队司令的领导下组织了海军演习。

反动报纸在向居民报道军事演习的消息时，把它说成是检查"防卫部队"。但是，这些消息无法安抚英国商人和香港的反动派，他们清晰地记得，人数数倍于全体香港居民的国民党军队是怎样被击溃的。因此，反动报纸的主要题目一直是"共产主义危险"和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

香港共有90份报纸发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日复一日地开展反对中国和苏联的宣传，说中国用"恐怖"驱赶资产阶级，号召工人同资本家建立"兄弟"关系。香港民主派的报纸暂时还不多：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发行量4—5万册，《新闻报》和《周末报》，杂志《经济报道》。这些报纸主要是工商团体、知识分子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创办的。工人很少读这些8个版面的报纸，而香港政府不允许出版适合工人的版面较少的报纸。

香港反动报刊竭力搜寻中国和苏联报纸中刊登的批评性文章中的负面消息，对一些事实进行歪曲，把这些事实描述成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无法纪"的证据。不久前，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反动报刊对大多数居民的意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同反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南方的报刊刊登了关于这一运动进程的详细材料。香港报刊在转载了这些材料后，把它说成是在中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企业主和商人进行野蛮镇压。反动报刊欺骗了绝大部分香港居民。争取与中国统一的民主运动在这一时期受到打击。

去年香港当局强化了对教育领域的控制。当局竭力开除那些不适合他们心意的教师，并用自己人替换之。禁止华人学校的学生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今年2月末，香港政府教育厅发表了一项声明，按照这份声明，教师、大学生和所有学生都被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香港当局和各类反动分子在使用镇压和恐吓手段影响群众的同时，也使用了其他手段。当局赋予"街道慈善委员会"的工作以重要意义，目前有23万香港各阶层居民在这些委员会中工作。委员会开办免费学校，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和药品，安排儿童体育活动场所，向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紧急帮助，等等。当局和地方负责人通过这些委员会对全体居民实施监控，试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方来。

香港天主教会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通过自己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机构开展救灾(主要是火灾)的运动。从1951—1954年，据中国报刊报道，共发生了11起大型火灾，受灾人数达108 463人。例如，1955年2月21日就发生了几起火灾，烧毁了270间房

子,4 000 多人无家可归。香港警察局要么是没有找到纵火犯,要么是把火灾归咎于用火不小心。中国同志表示,火灾的原因是英国人想赶走九龙一些地段上的居民,用来建设机场。

反动组织通过四处活动努力从贫困居民中捞取政治资本,顺便摆脱自己与火灾的干系。据香港亲美报纸《星岛日报》(1955 年 1 月 22 日)的消息,美国慈善组织,主要是天主教会,在香港向 32.3 万需要援助的家庭分发从美国得到的礼物——2 000 吨粮食。每人礼物重 13 磅(1 磅奶油、1 磅猪肉、6 磅大米等)。

美国教会对巩固自己在香港的地位赋予重要意义。1 月初,香港接待了美国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斯佩尔曼特别关注因从事敌特活动被中国和越南驱逐或逃亡的神甫。他说,天主教会将全力支持返回故地。2 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基督教联盟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香港为从中国逃亡人员建设住宅和学校的决定。

香港有 250 万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和广西——迁移过去的华人。在香港常驻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有 14 500 人,其中英国人 9 500 人。此外,香港还有4 000 多美国、欧洲国家、南海国家、日本等国的侨民。

由于香港的主体居民是华人,当局采取措施让那些忠诚于他们的华人中的走狗牢牢地依附于自己。同 1953 年相比,去年有更多的华人得到了英国"为官方忠诚服务"勋章和奖章。

这样,香港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教化居民思想方面花了很大精力。广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马万驰(Ма Вань-чи)在委员会会议发言时对香港形势作了如下阐述:"我们的香港和澳门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中,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诽谤分子经常欺骗和吓唬他们,他们和以前一样对人民政府持怀疑态度。例如,一些人非常害怕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对一些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如对我们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南方日报》1955 年 1 月 31 日)

香港的民主组织——主要是工会组织,以一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情况的事实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散布的谣言。在这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的及一些来自中国的报纸和杂志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香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业主每天都在打探关于中国经济的成就,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兄弟援助,关于中国在华侨问题上执行的政策。

香港和中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香港居民同自己在广东、广西和其他省份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从广东进入香港的人数达 2 000 人,由香港前往广东也是这个人数。

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头目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压迫后,香港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说解放前,许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前往香港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专横,那么,现在越来越

多的居民离开香港，而不顾国民党分子散布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们只是想到要同自己的伟大祖国生活在一起。居住在香港的华人一直受到自己同胞的关心和关注。近4年来受灾的香港居民得到了48.1亿元的援助，得到了365吨粮食。(《南京日报》1955年1月30日)

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导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的政治地位开始恶化。因此，反动报刊一直在以各种借口讨论关于"红色中国占领香港"的问题。例如，1954年2月6日，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刊登了题为《台湾局势分析及其对香港的影响》的头版文章。文章中说："许多人认为，如果共产党中国不占领台湾，那么就会改变方针，转向香港。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关心英国方面保持中立。中国还关心美国和英国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因此，它希望削弱英国，同时向美国施加压力。文章的结论是，在"共产党中国占领台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稳固之后，香港今后将面临危险。

关于香港的未来问题，美国报纸一次也没提及过，特别是葛量洪在美国逗留期间。《南华早报》报道说："葛量洪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占领香港，即使他们想过这样做。"他说，殖民地的防务很"出色"，有空防也有海防。(《南华早报》1954年11月2日)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在香港推行的计划与他们对中国政府改变对外政策乃至全部政策方针的期待相关联。香港当局同英国政府一样，坚持宣传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努力制造中苏关系中的纠纷。去年11月葛量洪在美国的演讲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葛量洪说："中苏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彼此定会疏远。"按照葛量洪的观点，美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来加速中苏关系分裂。"俄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况且，俄国也无法满足中国所需的工业化设备和工业品。"

应该指出，在揭露这一欺骗性宣传方面，香港民主报纸做了大量工作，日复一日地刊登关于苏联无偿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的情况。例如，有一个关于访问中国归来的一些香港和澳门的华侨讲述鞍山钢铁公司新建三项工程的片段，他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激动，因为这三个工程使用的是苏联最新的、全部自动化的设备。据说英国自由党代表团团长艾德礼在参观后说：'目前英国还没有这种新型设备。'"(《经济报道》1954年第46期)

香港当局强调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为有效和巩固的政权"(《南华早报》1954年10月28日)，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政府的官方报纸《南华早报》抵制对人民政权的无理攻击。

香港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国民党分子的活动，因为国民党分子的公开言行可能会造成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同时，香港政府同意国民党分子出版大量报纸，不阻碍国民党分子在工联、工商团体等从事秘密破坏活动。

《南华早报》和亲政府报纸努力把英国说成是中国的朋友。例如，《南华早报》在头版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文章，开头的几句话是："同往年相比，今年中国共产党人庆祝民族节日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国家再次有了民族的宪法，二是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艾登先生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新制度光辉孤立的危险，重新打开了外交通道。"文章以香

港报刊所惯用的论证来结尾:“中国人选择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对整个亚洲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没有阻碍香港当局同其主人一样支持美国在远东的侵略计划,不过,他们努力论证香港的迫切需求,主要是粮食供应问题。据香港当局的说法,香港从中国得到所需粮食的一半,另一部分从泰国、菲律宾等地获得。据中国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张云里(Чжан Юнь-ли)说,香港自己的粮食仅能维持22天。(会谈记录,第41号文,1954年3月5日)

如果中国停止粮食供应,香港当局说,殖民地所需粮食几乎都得从其他国家进口。鉴于上述原因,他们说,西方对香港实施天空和海洋管制是必要的。香港总督在谈美国之行的印象时表示,相信美国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侵略中国的计划”。(《香港和澳门的形势》1954年第9期)

1954年香港政府对类似1953年9月9日的越境事件持克制态度(1953年9月9日,英国舰船和飞机开始对中国的战船施加攻击。英国的一艘舰船被击沉)。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和边境防务得到改善。1953年9月9日事件引起了殖民地华人群体对香港当局行动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为自己的祖国敢于对抗帝国主义分子的进攻感到自豪。

中国人民政府格外关注香港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立了一些机构,其中包括新华社,在中国资助下出版的民主党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等,这些出版物在宣传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和揭露帝国主义虚假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香港是中国获取外汇的重要来源。据中国同志说,解放后在美国、东南亚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侨通过香港向自己在国内的亲属寄钱达300多万美元。美国政府禁止货币由美国直接流入中国。

中国政府不为香港华侨回国制造障碍,也不阻碍他们生活在中国南部省份的亲属前往香港。因为中国人不认为香港是异国领土。在中国南部地区出版的地图上,看不出中国和香港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尽管地图的比例尺很大(1厘米=10公里)。中国各省之间的界限就很明显,每个省都用确定的色彩来装饰,但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界限就没有上述标识,在地图上香港和九龙半岛所使用的色彩与广东相同。

结　论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逐年缩减,香港的形势比较复杂。香港资产阶级被迫替自己的资本寻找新的出路。香港政府建议扩大工业投资,但由于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困难,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资产阶级试图依靠降低劳动者工资和强化劳动来弥补由于对外贸易缩减造成的损失,这个做法招致了工人阶级的反抗。电车工人罢工展现了香港和九龙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

结。这一事件还表明，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帝国主义分子在加强香港的地位，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基地，积极在该地区组织陆海军演习。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赋予香港重要意义，把它视为招募和向中国派遣间谍、破坏分子的基地。

香港当局和反动分子努力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居民，诱使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是，香港主要居民不理会帝国主义的宣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近来香港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是由于实行禁运政策造成的，这表明香港只有恢复同中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才能解决自己的困难。

附件：7 页(非机密)[①]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

Б. 卡沙洛夫(签名)

1955 年 5 月 22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408，д. 135，л. 16－45

№09941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

(1955 年 2 月 23 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2 月 23 日，我应章汉夫之约拜会了他。

章汉夫向我通报说，2 月 20 日下午他会见了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赖嘉文受尼赫鲁委托作了以下口头声明：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和我们仍在继续互致函电，我认为向您通报有关情况符合您的利益，即使您可能已经获悉有关情况。

在由伦敦回国途中，尼赫鲁总理在开罗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去一封短函，阐述了自己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附件。——编注

对几个个别问题的观点。我们征求了莫洛托夫对委托安理会呼吁苏、印、英三国提出和平倡议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他同意因问题复杂而需要预先交换意见的看法。他还说,对于他的建议,印度的答复与英国的答复不同,英国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参加。因此,苏联政府尽管意识到该问题的迫切性,但是它需要时间更加充分地研究情况。

莫洛托夫询问了关于英国广播公司一条报道的情况,这条报道说,尼赫鲁总理好像说有关各方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民党代表应当参加国际会议;莫洛托夫还问,对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还应提出什么进一步的倡议。

尼赫鲁回国后,又于 2 月 8 日指示我们的代办向莫洛托夫更加详细地通报我们总理的观点。以下是委托代办向苏联外长转达的主要内容:

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没有坚持国民党参加国际会议的主张。美国拒绝参加没有国民党参加的任何谈判。因此,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可能破产。有鉴于此,应当保持非正式接触,以便找到一条能摆脱目前僵局而且丝毫不损害中国尊严和利益的出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打算。我们力求:第一,采取能够引向和平谈判的最初步骤;第二,使中国的立场丝毫不受损害。

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国际会议应当召开。为了使国际会议能够召开,双方即中美应当参加,因为没有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未必能召开。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预先进行非正式谈判,以便为国际会议或者为中美直接谈判(如果这种谈判有可能的话)奠定基础。在非正式谈判中,苏联、印度和英国应当试图找到某种能使美国和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道路,并试图缓和两方的紧张状态。但是,不应这样理解我们的立场:似乎我们提出某种所谓“停火”的建议。

我们认为,应在缓和紧张状态和寻求协商一致的使中国和美国从现实考虑都能参加谈判的基础方面,表现出初步的谋求和平的主动性。我们的建议是:这种谈判应当很快引出召开国际会议的结果,不要搞无谓的拖延。

通过对形势的研究我们认为,如果不采取像我们建议的最初步骤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步骤,那么僵局和冲突就会继续下去。这样会使我们失去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如果初步的和平倡议的程序一商定,我们就应当通过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个别或集体向两方即中美两国呼吁。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现在所持的立场。

据莫洛托夫本人称,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些步骤不应局限于军事问题,也完全可以包括某些政治问题。至于莫洛托夫说英联邦国家会议上不可能制订出共同纲领,这是因为他对这一会议的性质有不正确的理解。英联邦国家会议不作决议,不作为与会国政府联盟表态。召开英联邦国家会议只是为了交换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印度、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就交换过意见。此外,还举行过多次谈判,有时是三国一起谈判,有时是单独谈判。

对整个问题以及对苏联的建议,印度与英国的立场无疑存在着明显差别。甚至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英国和美国也存在着重大意见分歧。看来,英国的一部分社会舆论也反对美国的立场。我们应当联合这些力量以及持中间立场的人士,使他们不要对中国的基本权利或者对和平解决方案持不愿和解的立场。美国现在的立场,例如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尽

管是含糊的，但是可能导致严重的紧张局势。因此，我们必须毫不退让，提出和平倡议，作为寻求解决方案的最初步骤。

从我们的观点看，没有必要将英国现在的态度或者英国对苏联政府的答复视为英国参与召开国际会议措施的障碍。

主要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正在等待莫洛托夫答复。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僵局，应当予以消除。总理提请苏联注意，而且在给我的信中也强调，他对找到某种能够消除僵局和避免武装冲突的出路非常关心(原文已通过高频电报传给 B. M. 莫洛托夫)。”

章汉夫向我转交了赖嘉文谈话记录的英文本和中文本，并请我将此上报莫斯科。我允诺照办。

在我动身去中国外交部时，莫斯科发来的关于 B. M. 莫洛托夫与印度驻苏联代办考尔谈话的电报已处理完毕，电报的部分内容我已经看过。因此，我在对章汉夫通报情况表示感谢后，随即告诉他，B. M. 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接见了印度代办考尔，考尔就这一问题作了几乎相同的谈话，稍晚些时候我会将他的谈话全文交给您。

章汉夫说，尼赫鲁回到新德里后感到轻松多了，已经不再坚持邀请蒋介石的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了。

我说同意这一看法，赖嘉文递交的声明与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声明有很大不同。

谈话进行了 25 分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0，л. 271 - 276

№23907

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

(1955 年 2 月 28 日)

机　密

苏共中央：

以情报的方式提交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察拉普金编写的《美国和苏联在原子能

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的报告。

莫洛托夫

1955 年 2 月 28 日

附件：

美国和苏联在对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

美 国 的 立 场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美国在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在所谓的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反映，这份计划是后者于 1946 年 6 月 14 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上阐述的。该计划规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成立国际管制机构，赋予其如下权利和权限：

1. 对一切形式的原子原料(铀、钍等)和制成品的所有权，以及对现存全体原子能企业的所有、管理和经营权。

2. 对各国在原子能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领导和监督权。禁止个别国家和人士从事国际机构认为是危险的原子能领域的实验活动。

3. 科学研究部门在完善原子武器领域的特权要予以禁止，并且个别国家和人士类似的研究也要禁止。这样，巴克鲁计划完全没有规定禁止出于军事目的使用原子能，正相反，规定了要把生产和完善原子武器的工作集中到国际管制机构手里。

4. 国际检查机构在所有协定参与国的领土上拥有畅通无阻的检查权。为了进行检查，国际管制机构将被赋予无阻碍地到达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利，包括一切国家的军事区和任何一个企业，以及一切可能形式的侦查权，包括对各国领土进行航空摄影及其他一些权限等。

5. 赋予其在协定参加国领土上的各企业拥有武装防卫权。

6. “既然有必要这么做……就有权过问各个国家原子能机关的活动，以及经济计划，私人、社会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7. 尽管美国在形式上不否定安理会的作用，并同意在安理会的框架内设立国际管制机关，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建议中却绕过的安理会，赋予管制机构对禁止核武器协定的破坏者以制裁权。在他们的表述中可以找到部分这种情况，按照美国的计划，赋予国际管制机构通过所谓制裁措施的决定的权力。在赋予国际管制机构这样权力的同时，美国还期待这一机构还拥有管制之外的功能。

二、管制制度

巴克鲁计划规定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管制要分段和分期进行。第一阶段要对原子能原料

(铀、钍)实行“严厉”管制。然后进入管制的第二阶段，按照巴克鲁计划，要按照协商次序进行。对生产原子能材料的企业进行管制被列为最后一个阶段的内容。

这样，巴克鲁计划包含的分段分期地建立国际管制的思想有其自己的目的，首先是想保障美国找到世界核原料(铀、钍)的大门。至于对核原料建立国际管制，巴克鲁计划把它推迟到不确定限期了。

三、管制开始的时间

美国及其伙伴们在管制开始的时间问题上的立场可归纳如下：首先要在各地设立、组建和部署好，国际机构才开始工作。随后国际机构要发表声明，它可以有效地执行禁止核武器及裁减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这样的活动程序为管制机构以自己的方式拖延执行保障禁止核武器和裁军的措施提供了可能。

至于对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措施的监督，在美国的建议中规定在国际管制机构中成立一个裁军部。授权这个机构“监督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半武装力量、安全部队和警察部队，各种形式的武器，包括原子武器，还要监督这种迹象和检查工作”。该机构将确定裁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的期限和程序，并对这些措施进行监督。

美国“管制”计划的最重要之处在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展现。这些内容不要求改变现状，从美国代表团于1954年5月29日提交给伦敦裁军委员会分会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文件涉及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利、权限和功能。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建议赋予国际管制机构通过关于对破坏协定的国家采取制裁的权力。此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禁止向破坏者供应核原料和关闭这个国家利用核燃料的工厂。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美国人提议的国际管制机构具有超国家性质。在巴克鲁计划中赋予了该机关广泛权力和权限，与联合国宪章相对抗，允许它干涉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巴克鲁计划没有提出国际管制机构体系，以保障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任务。该计划旨在保障美国在原子能的生产和使用领域及科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巴克鲁计划旨在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屈从于美国的命令，这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方针。

苏联的立场

美国关于管制的建议事实上是赋予国际管制机构对所有国家开采原子原料和生产原子材料的企业拥有所有权和管理权，与美国不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实现禁止目标建立严厉的管制。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苏联关于对原子能国际管制的问题向联合国提交的建议内容如下：

1. 对一切从事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的企业及核能建立严厉的国际管制。

2. 为此目的，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常设机关，该机关有权实施监督，“包括日常基础性的检查”。

在苏联的最初建议中规定要对各地的原子能企业定期核查和专门跟踪。1952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同意由国际管制机构进行常规检查，但无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关于常规核查的细则，苏联在向1954年9月3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会议提交的建议中得到明确。该建议规定，常规核查的范围，必须保障使所有国家都执行关于禁止大规模杀伤武器和裁军。

上述关于常规核查的建议可这样理解：将在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国际核查机构，拥有自己的检查队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无阻碍地到达一切监督对象。

3. 国际管制机构有权跟踪正在经营的开采核材料和生产核能的企业，检查他们的报告，目前核原料、材料和半成品的储备情况，收集和整理关于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及核能的材料，在核查过程中如果出现怀疑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协定被破坏时，将组织专门调查。

4. 国际管制机构的代表有权进入任何一家开采、生产和储存核原料和材料，以及经营原子能的企业，在任何一个原子能企业都有权了解为监督原子能的使用和原子能所必需的生产流程，向任何一个国家索要和检查各种性质的关于原子能企业生产的信息和报告，以及与原子能企业活动相关问题的各种说明。

5. 国际管制机构还有权提出对禁止核武器协定和原子能管制协定的破坏者给予警告和制止的措施供安理会研究。机构的决定要多数票才能通过。在这一机构中不设否决权。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苏联支持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和支持赋予国际管制机构以非常广泛的权力，包括检查、跟踪等。同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还坚持这样的观点，管制机构的活动不能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按照苏联的管制计划，通过对某个破坏禁止核武器协定的国家实行制裁的决定权只能交给安理会。

二、管制开始的时间

苏联的建议与美国的立场不同，在苏联的建议中规定在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对氢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也要建立管制。

美国在自己的建议中规定，国际管制在禁止核武器的措施生效之前就开始进行。

三、关于国际管制临时委员会

在就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苏联持这样的立场：禁止核武器和裁军这两项措施彼此相关、不分分离，应该一起进行。但是，根据策略，苏联在1954年9月30日的建议中同意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纲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部分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第二阶段禁止核武器和进一步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在此，苏联同意管制机构在第一阶段就开始工作，但是，该机构——临时管制委员会——只是有权从各国得到关于执行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的必要情报，而没有去各处进行检查的权力。至于国际管

制机构的常设部门，它的权限更大一些，它只有在第二阶段，当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它才能开始工作。

国际组织司司长

察拉普金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6，л.15－22

№11803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

(1955年3月1日)

Н.С.赫鲁晓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驻中国的《真理报》记者В.奥夫奇尼科夫就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所做的情况报告的摘录。

我觉得，В.奥夫奇尼科夫的情况报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Д.谢皮洛夫(签名)

1955年3月1日

证明材料

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已经使用了В.奥夫奇尼科夫的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10日

文件送：Н.А.布尔加宁同志和В.М.莫洛托夫同志

附件：

《真理报》驻华记者根据中国报刊撰写的通讯摘要

据报刊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1)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2)实行统

购统销制度。

前不久,中国仅有1.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已有20万个,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目前已经成立了40多万个合作社,到春季大约会有60万个合作社。其意义不仅在于合作社数量的增加,从各地的大量报道可以看出,新成员开始“潮水般地”加入已有的合作社。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大部分合作社,前不久“潮水般”加入合作社的新社员达40%—50%。由此看来,农村的群众性合作化运动已经开始,而且像《人民日报》指出的那样,可以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合作化的主要形式。报纸提醒党的干部不要冒进,不要成立社会主义类型的联合合作社(集体农庄)。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是,逐步减少合作社中按土地股份分配收入的比重,扩大按劳分配产品的数量。社会主义类型的农业经济单位仅是作为例外成立,用作试验。

数十万个新合作社的成立,大批新成员加入已有的合作社,使正在农村工作的中国同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合作社的巩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报刊现在十分重视为农民劳动联合体培养干部问题,十分重视从组织上巩固新老合作社的问题。

在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日渐尖锐和复杂”。

《人民日报》的新年社论专门谈了当前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和党的农村政治路线。《人民日报》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占总农户50%—70%的贫农。这一数字包括约占贫农2/3的“新中农”和约占总农户20%的中农,即“老中农”。党对他们仍然实行同盟军政策,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政策。

至于富农,党对他们的政策由土改时期实行的孤立政策改为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

正是被消灭阶级的残余,或者像报纸所写的“最近应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现在积极地反抗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就在农村大规模合作化的条件下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在省级的各项报刊上被广泛评论。

这篇社论说,最近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地富分子偷偷宰杀牲畜、破坏农具、烧毁粮食和饲料,杀害干部积极分子、散布谣言恫吓农民,迫使他们退社。河北省昌黎县的一个合作社就是由于富农的这类活动而解散了。报纸还指出,坏分子竭力打入合作社,爬到合作社的领导岗位上,破坏组织工作,动摇合作社结构的基本原则。报纸还批评有的工作人员歪曲党的方针,有意吸收富农入社(“他们有好牲畜,工具多,有经验,能写会算”)。

社论指出,农村公安和司法机关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合作社与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农村成立治安委员会,组织民兵昼夜严守合作社的财产。

党的其他文件还指出,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加重了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困难。在新解放区,40%—50%的村庄至今没有党小组(党提出了从积极分子中培养党员的任务,使每个村

至少有10名共产党员)。

还在上个冬季就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最重要的环节，是切断城市资本和农村市场联系的强有力的工具。现在，中国的报刊仍在评述实行这一政策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今年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哪些特点呢？第一，征购范围大大扩大。去年征购范围仅限于粮食，现在已经包括棉花和油料作物。第二，收购余粮不是在农民完成公粮缴纳任务之后进行，而是与其同时进行。第三，组织计划供应不是在收购之后进行，而是与收购同时进行。整个运动是在以下三个口号下进行的："支援工业化，支援灾区，支援解放台湾！"

对最重要的农产品的贸易实行国家垄断，是对原有的小商品经济制度的急剧变革。考虑到实行过程中的困难和阶级敌人的必然反抗，党派出了数百万工作人员向农民解释这一措施的目的和好处。现在，积极分子在县工作队的领导下在各地搞这场运动。每户的余粮在会上讨论确定。这项工作今年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许多户是在互助组和合作社领的粮食，互助组和合作社留有相应的记录。自己消费所需的粮食数量也进行核算。中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计算标准是：成年人每人每月30斤粮食，每人每年3斤棉花。剩下的则为多余数量。今年的困难在于许多农民去年超定额卖了粮食，当他们需要粮食时，供应部门不能保证他们的需要。因此，报刊一再提醒地方工作人员不要夸大多余数量。这一运动中的另一个困难是，国家还无力向农民供应他们需要的商品以换取他们出售的粮食(购买的主要物品布匹也是定量供应)。因此，在进行宣传时要求农民将卖粮棉换回的钱存入储蓄所或者向合作社投资(年收入的2%—3%)。为了避免犯去年的错误，在征购的同时准确确定缺粮的户数。每户领一张购粮证明，在根据计算自己的粮食吃完的那个月，凭购粮证在国家粮库按固定价格购买所需数量的粮食。

报刊广泛宣传统购政策的巨大成绩：尽管遇到大灾，全国粮价稳定，国家得到了所需数量的商品粮。

现在正在做大量的工作，安排粮贩在国营商业部门工作，或者安排他们在国家粮库为国家征购粮食。中国有七八百万人在私营商业中就业。今后他们的就业问题将越来越尖锐。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把利用和改造粮贩、棉贩的措施作为改造整个商业资本的道路来研究。

在述评的最后我们谈一谈中国现阶段进行的节约运动的特点。《人民日报》的一些社论多次指出，1954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生产的速度不可能仍然像过去那么快，因为能够恢复的生产能力已经恢复，而新的大型企业现在投产的还很少。此外，原料基地落后于加工工业发展的状况最近越来越严重。重工业某些部门的发展受到金属材料(钢铁，尤其是铜)的限制。而轻工业部门则越来越感到农业的落后。

许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靠节约原料增产。节约是通过降低单位产品原料消耗、利

用废料、采用代替品来实现的。因此,报纸对那些流行的保守观点,如节约似乎与质量相矛盾、"好材料做不出差产品",进行了批评。报纸上称节约是工厂党组织的头等大事。

《真理报》记者
奥夫钦尼科夫
1955 年 2 月 12 日
于北京市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07, л. 25 - 33

№13017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

(1955 年 3 月 8 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3 月 12 日

绝 密

我今天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在询问和回答了一个协议中的用词之后,我向他通报了关于 1955 年 4 月 22 日举行纪念列宁诞辰 85 周年的指示,在提到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将为这个纪念日写文章之后,我说,中央恳请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写文章,并在《真理报》上发表。

毛泽东欣然同意写一篇文章,并说文章的题目可能会是"列宁与中国革命",大概有 6 000 或 7 000 字。他谈到,他将在 4 月中旬动笔。他最近无法动笔,因为他在整个 3 月的后半个月都将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谈到这次大会,毛泽东告诉我,将会从各省、地区和市级党组织中选派约 300 名代表参加。正如毛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意义将和党的代表大会一样重要,会议将讨论诸如五年计划和高岗——饶漱石事件这样一些重要问题。1945 年以来还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党章,代表大会应该每三年举行一次。事实上,党章允许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提前或推迟举行。在 1948 年举行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仍在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紧急重大的事情也使得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召

开，如国家重建工作，朝鲜战争，制定及修改五年计划，等等。下一次(第八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在1956年召开。今年的这次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问题做出决议，将会减少在1956年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在这里，毛泽东暗示说，高岗可能曾和贝利亚阴谋串通，贝利亚的代表曾来到东北并与高岗会过面，而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提起这件事。毛泽东还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联系过，他将严肃地调查这个问题。

谈到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30周年时，我说《真理报》的主编谢皮洛夫同志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怎样纪念这一天。毛泽东说，计划在这一天大力进行宣传纪念活动，如各城市将举行集会，报纸上将刊载文章。毛泽东说，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情况，我应该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

毛泽东回想起前一段时间我表示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很感兴趣。他说，我应该就这事和陆定一同志谈一谈。我回答说我已进行过这样的交谈。他说，他要交给我们三个中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反对唯心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协调粮食供应紧急措施的指示)，他请我转交苏共中央。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局已经讨论了苏共中央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因巴黎协议(大概是指1954年10月的巴黎协议，这些协议恢复了西德的独立主权并为西德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所采取的措施的信。他说，所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和必须的。他还谈到了这样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再爆发一场战争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将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和这个条约草案给一个书面答复。

毛泽东还谈到苏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他说，苏共中央已经对南斯拉夫事件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他是充分同意这个分析，他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其他人正在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行事，总是高喊他们支持列宁，却反对斯大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不认可斯大林。在卡德尔的演讲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

毛还说，他已经形成坚定的看法，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待它必须基本上像对待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对铁托和卡德尔是不可能信任的，他们已经把自己和帝国主义国家牢固联系起来。当南斯拉夫人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裂的时候，我决不会赞同他们。即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对待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么我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只能被抛弃。

在这里，毛提到了列宁与第二国际和考茨基的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战争以后，列宁才最后与第二国际决裂。尽管考茨基犯了很多错误，列宁也批评过他，但是，列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把他看作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而没有与他决裂。

毛泽东说，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中共中央已经写了一封信通告各级党组织。他说，我们慎重地谈到了可能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解。在信中我们还写到，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南斯拉夫人在愿意同苏共、中共和各人民民主党和解的道路上走多远。

关于停止指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苏共中央在这个事件采取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在会谈中提到了考涅楚克与瓦西列夫斯卡娅同志访华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问新德里和出席和平大会。听到考涅楚克的名字,毛泽东回想起他的剧本《前线》,并说,剧本第一次在中国上演的时候,那是在延安,这个剧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中国同志帮助很大。①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的旧军官当中,仍然有一些刚愎自用的人。因此已经下达了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可能的地方都组织上演这个剧本。毛泽东说,他愿意在考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从印度返回后与他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师哲和 T. Φ. 斯克沃尔佐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Φ.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79,д. 9,л. 46 - 49

№13413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1955 年 3 月 9 日)

摘自 Д. А.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第 82/сс 号

1955 年 3 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 年 3 月 9 日

今天 16 时,我按预先约定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在互相问候后,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好

① 《前线》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 1942 年 8 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剧本。主要剧情: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思想守旧,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最后由熟悉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取而代之。该剧在当时苏联军队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注

久没有见面了，因为他离开了雅加达。大使回答，他访问了日惹和泗水，因为要在这两个城市里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品和手工业品展览会。他说，展览会在泗水闭幕后将被转移到棉兰(苏门答腊岛)去，他也打算到那儿去。他补充说，展览会既受到社会人士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地方当局的热烈欢迎。

接着他告诉我，在去日惹的时候，他与美国大使卡明及印度尼西亚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班朋·苏根乘的是同一架飞机。大使说，美国大使在旅行时竭力设法突出自己与苏根的友谊。例如，在飞机起飞前，美国大使走到苏根身边，并想要同他谈话，但苏根根本就不理睬他。同时苏根却走到黄镇身边，并客气地同他打了招呼。在飞机即将在日惹机场降落之前，欢迎参谋长苏根的仪仗队排好了队。美国大使试图同他一起从仪仗队面前走过去，但被士兵们挤开了。

我问，美国大使的日惹之行与当时正在那儿举行的印尼军队高级军官会议有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问题，黄镇回答，这关系是完全不能被排除的。

接着他告诉我，美国大使是正式应马斯友美党①第一副主席苏基曼请他参加他(苏基曼)女儿婚礼的邀请抵达日惹的。黄镇说，根据他所拥有的情报，出席婚礼的有300—400个客人，大部分都是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其他一些党的成员，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总书记西迪克·佐约苏加托在婚礼结束前就离开了。黄镇说，因此婚礼是安排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与美国大使之间谈判的一个合适的幌子，根据他的情报，婚礼后就有过这种谈判。黄镇同时还说，遗憾的是他无法确定谈的是什么内容。

返回雅加达时，黄镇与马斯友美党的主席纳席尔同乘一架飞机。飞机在三宝垄迫降时，黄镇与他有过一次谈话。纳席尔在谈话中对中国评价甚好。黄镇说，他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马斯友美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到底是争论哪些问题，大使也没有弄清楚。

接着我简明地向大使通报了自己因苏联红十字会和新月会联合会向援助洪灾难民的基金会提供4万卢比一事在今年2月23日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话的内容。转达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话，他说的是他高度评价苏联政府邀请科伦坡计划的国家参加有关台湾问题的十国会议的提议。我指出，我曾问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是否想要因这一提议而向苏联政府转告一些什么话，后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对黄镇说，这一情况，还有我已经向大使通报过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的摇摆立场，都使人能得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实行对外政策时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结论。我问大使，他能否解释一下印尼政府持这种立场的原因。

黄镇说，依他个人之见，印尼政府在实行自己的“积极和独立的”对外政策时完全是以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为目标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寄很大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

---

① 马斯友美党(Masyumi)，1945年建立，20世纪50年代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伊斯兰教政党。——编注

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它的结果将会给予政府的地位以很大的影响。

黄镇接着说,印尼的经济和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印尼的广大的社会人士赞成扩大与民主阵营各国的经济交流。他们看得到中国的国民经济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苏联的关于在印度以对印度有利的条件建造大型冶金工厂的提议给印尼的社会人士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同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几乎完全处于外国人的掌控之中。

就连当地的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着比印度尼西亚人更大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不考虑社会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因为政府有要保住政权的意图。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了,所用的方法正是签订短期的贸易协定和就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进行谈判。的确,印度尼西亚政府暂时还没有对中国政府所表达的要派中国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去继续进行关于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的谈判的意愿做出回应。

印度尼西亚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只要在工业企业的建设工程中得到短期的援助。这是因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并不指望长久地守住政权,并担心长期援助的成果会落到另一个政府的手里去。

大使说,在他在日惹逗留时,当地的苏丹布瓦诺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以便在日惹地区建造纺织厂和鞋厂的意愿。黄镇补充说,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提出请求,中国政府是会给印度尼西亚提供贷款的。按民族而言是华裔的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也表示了想要得到中国援助的愿望。

大使说,日惹苏丹布瓦诺多少有点进步的观点。特别是苏丹在 1954 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拒绝了尼克松发出的访美邀请。

黄镇说,有趣的是,要指出,苏加诺总统在尼克松在印尼国内巡行时精心安排了对他的监督,不让他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或其他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会面。只是在离开之前尼克松才得以会见了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

然后黄镇在涉及印尼对中国的态度时说,印尼政府担心日本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变得强大起来。因此它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与日益强大的日本"相抗衡"的强国。

大使说,他于 1955 年 3 月 2 日拜会了外交部长苏纳约,特别是后者说了,印尼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永远也不会承认台湾政府。黄镇补充说,他原本打算在这次会晤中弄清楚印尼政府对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代表会议讨论台湾问题的提议的意见,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苏纳约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黄镇则认为自己不便首先开口问。

接着黄镇说,他与国会礼宾组约定了拜访国会各派别的主席。他已经作过几次这种拜访了,特别是拜访了社会主义党的主席,后者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

最后我说,最近我已经买好了用作大使馆的房子,因此请大使给我介绍一位好的建筑师来改建这些房子,同时还感谢了他在寻找一位办理文件的律师时所给予的帮助。黄镇说出了一位建筑师的姓氏,并补充说,他有自己政府的要给苏联大使以一切可能的协助的指示。

我感谢了大使的很有意思的谈话，并表示希望今后也要举行类似的会谈，以便相互交换各自拥有的信息，大使同意了。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В. Д. 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会谈持续两个小时，并且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А.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1, оп. 11, п. 8, д. 4, л. 68 - 72

№21424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

(1955 年 3 月 12 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1955 年 3 月 12 日

第 252 号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

В. М. 莫洛托夫同志：

兹发给你们如下文件：

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2.《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3.《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①

转交给你们的前两份文件，是依据毛泽东发给苏共中央的指示转交的。

第三份文件——“情报”是由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以便苏联专家了解其中的内容。

① 所附文件顺序与此不同。——编注

该文件很有意思,因为它从整体上详细阐述了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附上述内容共计35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手写批注:

说明:这些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5月10日

附件:

译自中文,机密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1955年2月17日

当前,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对民主活动家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联盟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的宗派倾向。该倾向的突出表现如下:

1. 许多省、市的党委组成都是依据很久以前的任命方案,由省、市两级政府的部、局负责人及其副手担任,无党派活动家任职太少,尤其是领导职务。一些省的所有局长,一些市的所有部长都是党员。在个别省份局、部级的正职和副职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中不但没有民主活动家,而且连来自劳动者的无党派人士也没有。

2. 一些地方党组织不重视政治协商机构的工作,不很愿意考虑民主活动家的意见。导致后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协商机关或许不会继续存在。虽然他们已看到,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开幕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就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章程、主席团组成和政协常务机关等问题主持了意见交流会,并赞同民主人士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全会开幕式;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自始至终主持和领导了会议;虽然人们明白,中共中央赋予政协和统一战线重要的意义,但依然担心地方党组织会忽视政协机关的工作。一些民主活动家说,中央很重视政协工作,但地方上却对之持完全漠视态度。很少召开或根本不召开地方政协机关会议。各地方党组织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很少或根本不与民主活动家协商。地方上的民主活动家很难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事实表明,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不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厌恶与民主活动家会面,担心这些会见会招惹麻烦;一些同志则害怕民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同志不明白,我们目前仍处于阶级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

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处于台湾尚未解放、帝国主义一直试图颠覆我们国家的严峻环境中。因而，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依然极其尖锐而复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团结资产阶级分子并对之进行再教育，而且应坚定地继续联合那些放弃了以前的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并与我们合作的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对之开展再教育工作。民主活动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都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为民主活动家均拥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依据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可判断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从而及时出台和灵活地把党的政策落实到实践中，而通过与民主活动家的合作我们还可对这些人和受到他们影响的相关群众进行再教育。

忽视统一战线和迷信一党制的倾向不符合当前党的总路线、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以及我们目前的历史条件。这种倾向是对我们赢得多数人支持估计不足的冒险主义倾向，是放弃盟友和自我孤立倾向，是忽视现存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观主义倾向。有这种错误倾向的同志在开展工作时依据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主观情绪。他们忘了，我们要依据总路线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论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们都应拥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在过渡时期我们就会遇到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困难和不便。国内外经验都告诉我们，迷信一党制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瑞金时期我们所有的机构都是由清一色的我们党内人士组成，结果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苏联如今已消灭阶级并在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但苏共中央依然强调在国家机构中共产党和非党人士联合的重要性，反对这些机构均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构成。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许多领导同志依然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省、市级政府的部、局职务均应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担任，这无疑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

我们党只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理应永远与非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结成紧密联盟。这个联盟便是劳动者自身的联盟。另外，在当代中国革命斗争条件下劳动者也应始终保持与非劳动分子，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尤其是共产党和非党劳动者的联盟是我党的基本政策。在解放战争和农业改革时期，不论是非党劳动者代表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上层，以及拒绝加入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阵营的那部分人，只要他们拥护或不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就应坚定不移地继续团结和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永远也不应极力使我们国家和经济机关(除了一些特别保密机构外)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党员。我们的机关必须根据其组织和工作性质配置相应数量的民主活动家或非党劳动者。那种关于这些机构只能配置共产党员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伪装的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我们当然要无条件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只用纯一色的共产党员来配置我们的各种机构，甚至为此而放弃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尤其是不能为此而放弃共产党与那些诚实工作的非党劳动

者，与那些以同志式态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全部事业的无党派工作人员的结盟。

基于上述方针，所有省、市党委均应以适当方式挑选省、市局、部级职务候选人和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加强各地方政协委员会和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

1. 国务院各部委、委员会等领导人共计 35 人，其中非党员 13 人，比重为 37.2%。国务院的 47 人中非党员 13 人，占国务院总人数的 25.5%。①在各省、市局、部级担任领导职务及其副职的非党员比重可能会低于国家各部委、国务院各委员会的比重，但也不能过低。最合适的比例应在 25%—20%左右。②如果对工作有利，就可任命著名民主活动家担任领导职务。即便那些对工作不太有利，但也不会妨碍工作的非党活动家也可被任命担任领导职位或其副职。总之，在利用这些人时要把握如下原则：或者对工作有利或者使其不会成为我们工作的阻碍。

2. 在全国政协委员会 559 名委员中，党员比重约 27%；在政协常设机关 83 位成员中共产党员占了 1/3。各地方政协委员会中党员与无党派活动家的比例也应这样或大致如此。只是此时，对党有一个要求，一方面党要使自己成为领导核心，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持自身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格界限，理应尽量使自己成为(全社会)更广泛、更全面的代表。接下来，各地实际负责党务工作的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一般情况下应被任命为各地政协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党)能够与非党活动家保持必要接触，并与之进行必要的协商。

3. 政协是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它是联系国内各民族、各民主阶层、社会组织、海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纽带。为了强化政协的作用，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相应会议上就一些最重大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人大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地方政协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展开协商。就最重大问题召集的此类协商会每年至少四次，即一个季度开一次。此外，还有必要就一些个别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会议开幕式应由党的主要领导主持，相关负责人须作内容丰富的报告。还必须提前告知委员会委员们，以便他们能够准备相关草案或提案，并给予其就工作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的自由。须重视他们的正确意见或建议，要给他们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不对，我们则必须向其做出解释或开展相应的批判。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所有批评和建议做出回应，那么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因此而获益。绝不允许不让非党活动家说话，以及拒绝其批评和建议的做法。

必须始终重视对地方政协委员会委员的学习的领导工作。

4. 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会应邀请居住在当地的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参加自己的相关会议，并在征得其同意的条件下使其参加一些学习班，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以必要方式

①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编注
② 原文如此。——编注

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5. 各地应始终重视那些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民主活动家、非党劳动群众代表的培养教育问题，并在国家和经济机构以及社会组织机关中保持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应比例。再者，一般情况下不应吸收那些著名的民主活动家入党，即便其已符合入党的条件，但必须培养和帮助他们，并可跟党员一样吸收其参加一些与其工作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党内讨论活动。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再就本机关的工作计划和方针，以及一般政治问题组织讨论时，可邀请本机关非党骨干或相应次要工作人员参与会议讨论活动。

6. 必须信任各机构中那些忠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非党工作人员，给予其工作上的行动自由，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全力帮助其在各自工作中取得成绩。

7. 必须指出的是，在强调强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有必要分析民主活动家的错误思想和政治倾向，并在适当时机用相应方式指出其错误所在，在一些情形下还要批判和讨论这些错误以帮助民主人士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改正错误。那种关于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只有团结而不应斗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既要与左倾宗派主义作斗争，也反对与错误思想和平共处的右倾倾向。

8. 在得到上述指示后，各省、市党委应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对政府、政协委员会和其他相应机构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并在4月底之前把检查结果上报中央。

(该文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属实：A. 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文件)发出4份

第367号

1955年3月12日

译自中文

机　密

文本第1份

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

致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机关，各省、市党委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国家机关和部委党组负责人，中国境外使、领馆负责人，政协委员会，军队和各省军区负责人等。

在我们解放了一江山岛后，美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慌作一团。美国政府一方面加紧军事挑衅，另一方面则极力试图通过联合国抛出一个阴险的所谓“停火”计划，以阻挠

中国人民的解放台湾大业。

周恩来同志在1月21日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的声明中已严厉而公正地阐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另外,中国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2月3日来电的答复中也重申了自己的上述立场。

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大家通报与该问题相关的主要内容,以便大家向省级(在中央机关为部级负责人)和县级以上干部作出口头解释,不得作记录。该文件阅后即行销毁。

1. 一江山岛的解放证明了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在没有美国支持和援助的条件下,蒋介石匪帮既不能幻想守住沿岸诸岛,未来也不可能保住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一事实暴露了美国在台湾的弱点。一方面,美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使其成为自己扩大对中国侵略和在东方准备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基地之一;另一方面,他们既无法把守住台湾的希望只寄托在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援助上,又不能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又狂热叫嚣世界大战的威胁,想与我们正式开战。

这一矛盾促使美国及其走狗积极制定一个侵略台湾和干涉我们解放台湾大业的全面计划。该计划包括:一方面,加紧军事威胁,以便恐吓我们,迫使我们屈服和放弃解放台湾的斗争;另一方面,提出所谓"停火"建议,企图通过"停火"继续占据台湾和积极为一场新的战争作准备,极力把自己占领台湾说成是"为了和平事业",而把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侵略行径"。与此同时,美国采用这种模糊方式的目的就是想恐吓和欺骗各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其与美国一起对我们施压,以便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为了实现这一阴谋,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在采取如下步骤:

(1) 当总统向国会递交了特别咨文后,美国众议院给予艾森豪威尔总统动用武装力量干涉中国解放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权力。

(2) 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周边诸岛屿部署军队,举行挑衅性军演。

(3) 帮助蒋介石集团从一些位置较远和独岛(目前此类岛屿为大陈岛)撤离,以防在争夺这些岛屿的战斗中部署在那里的蒋军被歼。

(4) 利用自己所制造的紧张局势,迫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帮助美国和支持其所谓"停火"计划。

(5) 利用恐吓手段把印度、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拉到自己一边,以便后者承认美国占领台湾的事实;以恐吓和欺骗手段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对中国的同情,并进一步向其灌输如下思想,即中国不愿和平。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都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上置我们于不利地位。

2. 针对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持如下三种不同立场:

(1) 美国被迫暂时放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提出的所谓积极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实施"反攻大陆和准备复辟以前制度"等计划;他们基本恢复了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所执行的政策,即企图在台湾海峡"划定火线",以保护蒋介石和继续占据台湾。他们准备以所谓"撤离沿岸诸岛屿"作为"交换条件",造成"两个中国",以便自己永远霸占台湾,以伺机进一

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发动新的战争。

(2) 英国及其类似诸资本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对我持敌视态度的同时，他们也害怕被卷入当前美国正试图在东方挑起的战争。他们尤其担心美国在台湾海峡部署军队的事实，因为后者可能导致美军与我们的武装冲突和引发世界大战，而东方爆发的这场战争必然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力量。这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都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拥护维持远东地区现状的政策。美国提出的所谓"停火"计划符合了英国及其类似国家的要求，所以后者都积极拥护。只是与美国相比，他们所采取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背信弃义地宣称，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主权归属尚处于未定状态；不过，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均跟美国一样主张台湾主权属于蒋介石的所谓"自由中国"。他们公开表示，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不仅有大陈，还包括马祖、金门等)均归还给中国，支持把台湾划为中立区或经联合国授权临时交由蒋介石集团管理。未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两个中国"。

(3) 印度、缅甸等国"拥护和平与中立"，害怕战争，保持中立立场。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承认，沿岸岛屿也属中国领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由于我方解放台湾和美方占领台湾而引发战争，因此要求我们暂缓解放台湾，在经过一定时期的"中立"或"保护"后再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或直接把台湾转交中国或通过公民表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美国利用这些害怕战争的"和平中立"国的软弱，试图继续以威胁和欺骗手段迫使其放弃同情中国的立场。

由此可见，上述三类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解放台湾问题上所持的三种不同立场。具体表现为：

(1) 台湾主权问题。

(2) "两个中国"问题。

但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 他们希望"停火"；

(2) 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屿最终归还给中国；

(3) 希望，台湾岛问题和澎湖列岛问题分别解决(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其意见不一)。

3. 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主要方式可作如下归纳：

(1) 制造社会舆论，把我们的内政——解放台湾问题视作"威胁和平"的国际问题，呼吁"国际解决台湾问题"。

(2) 为"国际解决(台湾问题)"他们提出四种模式或同时采取不同模式：

① 美国和英国挑唆新西兰提出建议并在联合国进行讨论；顽固地断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的正义斗争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坚持要求我们与蒋介石之间"停火"；邀请中国与蒋介石代表一起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并讨论新西兰提出的建议，建立平等讨论模式使"两个中国"合法化，为未来美国以联合国旗帜为掩护的军事干涉作准备。

② 利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上次在北京谈判期间与我们建立的关系进行所谓的协调冲突。

③ 试图借助英国或者印度，或者英、印和加拿大共同协调冲突，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资本主义“和平、中立”国均对此类方式寄予着幻想(无法实现的希望)。

④ 举办类似日内瓦会议那样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台湾问题。

(3) 如果上述方法没有产生效果，他们便会把“不愿和平”的负责推卸到我们头上。最终当美国把蒋介石匪帮的所有军队都从离台湾较远的岛屿和独岛撤离并集中到台湾本岛之后，可以说，他们就可能采用如下方法，如“积极划定停火线”，“积极终止战争行为”等；在高喊和平的同时，加紧军事行为，策划新的政治阴谋以阻挠我们解放台湾的大业。

4. 我们的立场——方针和基本策略。如果我们哪怕对美国教唆的所谓“停火”卑鄙计划寄予丝毫的幻想，或者在其不断加强的军事威胁面前有一丁点恐慌情绪，那么敌人便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他们的胃口便会更大，就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侵略。只有采取果断、坚定和百折不挠的立场，我们才可能迫使敌人退却。

我们的行动纲领：台湾属于中国，不解放台湾我们绝不罢休。我们不可能允许“两个中国”并存，也不会答应联合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需要和平，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但也不允许我们国家受到侵略，不会用我们领土和主权为代价来求得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不会对别国挑起战争，但不怕战争威胁，如果战争冒险家们胆敢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必将奉陪到底。总之，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允许第三者加以干涉。如果美国急不可耐地想进攻我们，我们将不怕与之对抗到底。我们不怕原子弹，因为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再说美国也并非原子弹的垄断者。

我们的方针：(1) 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国阴险的“停火”计划，也不可能同意所谓台湾的“中立”或“托管”。被六万万中国人民打倒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必将被我们消灭，其现在占据的台湾也终将被中国人民解放。我们与蒋介石匪帮之间根本谈不上停火的事；我们与美国之间尚未发生战争，因而也不存在所谓“停火”的问题。那些实施此类阴险计划——如“停火”——的人们，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都违反了联合国章程，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均无权干涉解放台湾问题，因为后者本质上属于中国内部问题。

(2) 当前台湾方面的紧张局势完全都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略中国的结果。这种局势对远东和亚洲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应停止美国针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只有美国军队全部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才可能消除。

基于上述基本方针，我们应对的主要策略如下：集中力量打击美国，揭露其旨在教唆“停火”和武装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阴谋；抨击英国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主要如“台湾地位未定论”和“两个中国”，指出此类背信弃义和不公正要求的真正目的在于不择手段地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他们这样做，只会纵容美国侵略和扩大战争危险，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怒；尽力赢得印度、缅甸等和平、中立国家的同情，及时向其解释事情的真实现状，展示我们公正的立场；指出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走狗的阴谋和卑鄙计划只能导致侵略和战争，而绝不会是和平。

5. 1月3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议事日程中就台湾局势问题列入如下两项提案：其一，

苏联提出的“关于美国对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屿的侵略行动”；其二，新西兰根据美国授意提出的“关于在中国沿岸附近一些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两份提案明显彼此矛盾。苏联的提案旨在消除美国在台湾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威胁；新西兰的提案则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美国控制下的安理会如今邀请我们参与讨论新西兰的提案，但条件是由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的席位。

美、英和其他与“停火”相关国家的这一卑鄙伎俩的目的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

有鉴于此，2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的复电中坚定而公正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派代表参加新西兰提案的讨论；只有当讨论苏联的提案且蒋介石集团代表被驱除出安理会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才会以中国名义前往那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可能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声明，中国人民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支持国际上旨在消除和缓解美国在台湾地区和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形势的各种努力。

当前，苏联提议召集由十个国家——中、美、英、苏、法、印、缅、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参加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内、外进行这些外交活动的目的：支持我们的公正要求，粉碎美国及其仆从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计划，促使全世界人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6. 围绕台湾问题在各条战线——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展开斗争。这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只有坚持不屈不挠和谨慎的立场，我们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关于这场斗争未来的发展动向，有如下四种可能：

(1) 美国单方面确定“停火”线。对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加紧解放台湾的斗争。

(2) 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目前尚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3) 进一步紧张导致局势陷入僵局。但美国要一直保持这样的紧张也有巨大困难。

(4) 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实现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解放。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和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线不断取得胜利，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解放台湾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全力为此前景而斗争。

目前，美帝国主义尚未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好充分准备，世界和平力量与日俱增、不断加强。我们未来的顽强斗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目前，我们应自上而下地向全党和所有非党干部，以及民众积极分子说明提高警惕和时刻准备反击一切意外事件的必要性。

应向人民说明，帝国主义者的镇压政策不会实现和平。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和慕尼黑阴谋就是这方面最直观的实例。因此，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我们一定要坚定立场。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应作好意外事件的准备。只有对意外事件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才可能防患于未然或遭受少量损失；只有我们作好准备，敌人才不敢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我们不作好准备，到时就会惊慌失措并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敌人万一胆敢冒险,必将加速其灭亡,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卒必将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不排除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会继续证明这一点。这样向人民解释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任何危害。

7. 我们必须清楚,维护和平和反对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一场需要动员和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复杂而长期的斗争。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工作。

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侵略台湾属于国际问题范畴。我们必须把这两个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否则我们便会轻易地落入他们所编造的圈套,即所谓"由于台湾主权未定,所以只能停火"。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善于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以促使全世界人民奋起捍卫远东和平、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我们必须遵照周恩来同志的1月24日声明及其2月3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的精神,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其间,我们须注意如下四点:

(1)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涉。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与被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卖国集团进行所谓的"停火"。

(2) 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中国大陆及其诸多沿海岛屿不会引发远东局势的紧张。台湾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尖锐,都是因为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而占据台湾,与蒋介石匪帮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部署美国军队。紧张局势都是美国造成的,而非中国。只有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才可能彻底消除该地区的紧张。

(3) 美国抛出所谓"停火"计划用心险恶,目的就是想永远占据台湾,进而继续扩大和准备新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目前进行的旨在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行动,加剧了远东地区的紧张,并对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所有真正爱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都应与美国的这些军事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

(4) 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新西兰提出的违反联合国章程并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案。

当然,中国人民仍会始终不渝地致力于缓解远东紧张局势,支持苏联和国际社会为缓和和消除美国在台湾及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的努力。

中共中央

1955年2月21日

属实:**A.** 诺维科夫(签名)

译自中文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1955年3月3日)

1. 今年2月召集的全国财经问题会议专门研究了农村的现状和国家粮食采购与供应等问题。过去两年间,党中央制定的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这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有必要且理应继续坚定落实。但从各地反映上来的信息显示,当前农村的形势比较紧张,一些地方上的农民开始大量杀猪、屠宰牲畜,积肥没有热情,对春播准备不积极,生产情绪不高。必须指出,虽然目前农村的严峻形势无疑与富农和其他异己分子的破坏和负隅顽抗相关,但从总体形势的性质来看,还是对我们有所警示,即农民——尤其是中农对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有不满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如一些地区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速度太快、工作过粗,所采用的个别举措不完全合理,农村供应工作存在一些不足。中央各机关目前就是要积极地消除这些不足和缺陷。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导致农民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是集中式采购:农民感觉此类采购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无论他们生产多少粮食,国家都会采购得一点不剩,且不给农民任何好处。农民认为,国家采购的数额过多,而留下的粮食根本不足以满足农民自身的实际需求。另外,农民们还对许多商品的集中供应不满意:这些商品在城市过剩,而在农村却不够。农民是讲究实际的,如果不亲眼看到好处,就会对增加生产丧失积极性。未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就可能对农业生产、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进造成严重影响。

还必须指出的是,粮食战线的紧张形势一定程度上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出现这种紧张形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将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加粮食生产,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粮食紧张问题。因此,我们在农村的所有举措均应围绕这一核心环节,理应以增加生产、促进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重心,而不应以任何方式丝毫影响农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必须清楚,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联系的具体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得到粮食,同时也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确保国家需要,也要让农民满意。这里,关键是要把我们政策的界线搞明确,即正确地确定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数额。如果集中采购的数额过高,农民所剩的粮食就不够吃,就会没有粮种和饲料,就无法满足他们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不仅会引起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也将对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如果集中采购数额定得过低,就不仅无法确保国家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而且势必无法保证近五千万农民的粮食消费——因为这些农民的粮食产量

不够,所在地区主要生产经济作物;另外,我们还有上千万农民分布在每年都会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混乱,破坏市场价格稳定,并对国家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国家在确定粮食集中采购额和集中供应额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实际的可能性。政府应确定生产额、采购额和供应额,即要在每年春播工作开始前以乡为基本单位确定总体生产计划,向农民公告国家在该乡的采购和供应规模,以便农民明白:他们得给国家上缴多少公粮,得向国家出售多少粮食,自己可以留下多少粮食,多少农户需要国家的粮食供给。总之,农民将明明白白地知道国家所标注的这些数据;当他们心中没有了疑虑,农村的紧张形势自然就会缓解;农民也可以有计划地从事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从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国家对粮食采购和供应的监督。

2. 依据上述原则,全国财经会议确定了本年度(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粮食收购和粮食税额度为900亿斤。该额度仅仅超过去年(自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指定的粮食收购额20亿斤,也就是说本年度的粮食税和粮食收购增收数量仍基本与去年持平。

与此同时,鉴于如下情况:其一,1955年广大农民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了200多亿斤;其二,1955年那些曾在1954年遭受了自然灾害的省份天气条件正常,从而能够额外向国家交纳近30亿斤粮食,因此实际上今年的粮食采购任务的完成要比去年容易些。依照既定计划,多数省份今年的公粮征收和余粮采购任务有所减少;少数省份——仍维持去年水平;只有那些去年曾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省份和其他个别省份——任务相应有所增加。有鉴于此,中央认为,既定的公粮和粮食采购额度是符合实际的。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向农民征收900亿斤粮食的数额并不大,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群众作了让步,是我们党和国家强化与占农村人口60%以上新、老中农的团结的进一步举措。这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但仍需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就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与2亿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无法拥有充足的粮食保障。我们一定要坚决避免出现此类情形。

当前,粮食集中采购任务已传达到各省,各省份应细化这些任务,并把任务逐级细化到各乡镇。必须详细地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收成正常,那么在收割结束后粮食税和粮食采购将会依照所公布的相应数额进行。无论农民的生产增收多少,政府既定的公粮和采购额度都不会再发生变动。当然,同时也要向农民说明,如果某个省份或全国范围内整体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那么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粮食税和采购粮征收额度则会相应降低,且受灾农民仍将获得有保障的粮食供应;只是收成好的地区得在这方面提供支持,即国家将会在收成好的地区采购更多粮食,以确保必要的粮食供给。1954年曾遭受严重灾害的一些省份的经验表明,如果其他收成好的地区不出售更多的粮食,国家就无法得到粮食来帮助受灾省份,数百万受灾农民就无法克服困难,那么就可能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最后,必须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出现严重自然灾害情形国家就要在收成好的地区额外采购一定数量粮食,而这额外采购的粮食也将列入900亿斤的采购总量中。关于收成好地区的农民,每户额外采购任务以其增产总量的40%计;增产粮的其余60%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既可以将其作为粮食储备,也可出售,或用作牲畜饲料。农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支配这些粮食,国家不

会干涉，也不会以农民有余粮为借口而增加采购任务。总之，农民增产的粮食越多，自己剩余的可归自由支配的粮食也就越多，这是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切实手段。

3. 在缩减农民粮食税和给国家出售粮食数量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制定合理的粮食供应和分配数量，以及相应的监督举措。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今年(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粮食供应量确定为753亿斤。中央认为，该数量是切合实际的。该数量比去年——1954—1955年的计划少了20亿斤。应当承认，该粮食供应计划是相当紧张的。但由于无法再扩大粮食采购规模，压缩预定用于出口、财政保障和其他必要目的的粮食数量，国家掌握的计划用于供应的储备粮数量已很难根据地区、季节和粮食品种的不同来充分满足与日俱增的正常粮食供应和调节的需求。因为这已是国家为满足向城、乡居民供粮而能够调拨的最大粮食数额了。如果再增加这方面的数量，就将导致政府无力确保国家的整体供应需求。当然，如果把农民增产的粮食数量考虑在内，那么农户所需粮食数量倒可能减少。另外，去年为了确保遭受了严重水灾地区的粮食供应，国家还额外划拨了30—40亿斤粮食。如果1955年我们未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那么这方面的粮食支出自然会相应减少。如果再把粮食消耗的节约举措和粮食正确供应保障工作的改善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原定的753亿斤粮食供应总量则完全可满足需要。

必须指出的是，粮食供应领域的工作调整和粮耗节约的宣传将在我们粮食战线的未来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两年来，在落实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举措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采购领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如下一个不好的结果，即我们对城、乡粮食集中供应的工作不够重视，因而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在各城市均存在对粮食集中供应工作马马虎虎的情形。在机关、军队、企业和学校等地方都可看到不爱惜粮食现象，浪费粮食的情况相当普遍。此类现象已然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必须通过政治教育方式促使城市居民真正了解节约粮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以便其坚定地与浪费粮食的恶习作斗争；继续探寻有效的相应压缩城市粮食供应的可行性举措。在过去两年间，国家在农村出售的粮食占到其在全国销售粮食总量的35%—40%。由于我们对粮食供应工作不够重视，导致依然存在如下情形，即并非所有地方的粮食供应和组织问题都能尽如人意，从而引起一些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的劳动者的不满。另外，在很大程度上仍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不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得到了粮食，而那些本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却得到了最少的粮食供应。据群众反映，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滥用职权，以及针对农民的经济制度宣传不到位等现象。上述情况表明，只有我们组织好粮食供应工作，消除目前粮食供应工作中的不足，农村的粮食供应才能够变得公正而合理。

国家的粮食采购和供应计划业已确定，供应额度已不可能增加。而增加这一额度势必令我们作茧自缚，引发严重的动荡和混乱。因此，我们只能缩减，而无法提高粮食供应计划。而确保我们不违反供应计划的保证，就是在公正、合理基础上全面地组织好我们的供应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 确保所有必要的供应计划不减少；(2) 对有可能缩减或节约粮食供应的各地区和消费领域，采取缩减举措。这样做，既可保障消费，同时又可

防止浪费。我们还可改善粮食供应体制和工作，动员全国各地区，尤其是国家机关、企业和军队的人们共同与浪费现象作斗争，节约粮食，这样我们就完全能够在不违反供应计划的情况下节约几亿斤粮食。

由于 1954 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收入减少和粮食供应量增加，我们 1955 年的粮食供应已开始出现紧张苗头。为了控制 3—6 月间的粮食供应，未来我们必须重视粮食的集中供应工作。我们注意到，去年许多地方的粮食集中供应工作并非依照应有的方式加以组织。鉴于此，我们必须依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再就粮食集中供应问题作出整齐划一的解释。这是一项我们必须完成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坚决杜绝任何违反粮食供应计划的行为。

4. 在农村合作化速度放缓的同时，上述举措的实施无疑对缓解当前农村紧张局势，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具有重要意义。春播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立即落实上述指令性举措。中央要求各省、市立即研究中央的这一指示，并在收到指令五天内将其连同采购、供应计划下发到各区县；各区县在收到指示十日内则应将相应的采购和供应计划，以及中央的政治方针传达到各乡镇；各乡镇应以最快速度把相关内容告知每个农民，以便其能够积极投入春播工作和安心家庭经营，全力夺取 1955 年粮食丰收。

(该文件可在党的机关报上刊登，并下发到各区县；附表将分别发送到各省、市)。

(1955 年 3 月 3 日)

属实：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共发送 5 份

1955 年 3 月 11 日

第 359 号

附表

1955—1956 年度国家粮食收入和支出复审计划(计算单位：亿/斤)

省市	收入			供应			收入和供应之差(已修订)	财政保障(已修订)	出口(经修订)	支出总额(经修订)	收入和支出之差	
	原始计划	复审计划	减少	原始计划	复审计划	减少					经修订	包括交通不便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计	929.7	900.00	29.70	772.81	753.81	19.00	+146.69	34.00	40.00	827.31	+72.69	43.08
华北	60.70	58.55	2.15	102.50	99.78	2.72	—41.28	4.00	0.30	104.08	—45.58	
北京	0.60	0.50	0.10	16.00	15.50	0.50	—15.0	0.51	—	16.01	—15.51	

续 表

省市	收入			供应			收入和供应之差(已修订)	财政保障(已修订)	出口(经修订)	支出总额(经修订)	收入和支出之差	
	原始计划	复审计划	减少	原始计划	复审计划	减少					经修订	包括交通不便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天津	1.60	1.55	0.05	14.00	13.61	0.89	−12.06	0.80	—	14.41	−12.86	
河北	35.00	33.80	1.20	55.00	58.61	1.39	−19.81	2.42	0.20	56.28	−22.43	
山西	28.50	22.70	0.80	17.50	17.06	0.44	+5.64	0.27	0.10	17.48	+5.27	0.80
内蒙古	29.50	28.60	0.90	9.70	9.45	0.25	+19.15	0.35	1.20	11.00	+17.60	1.00
东北	168.00	162.50	5.50	180.70	127.39	3.31	+35.11	7.65	24.17	159.21	+8.29	
辽宁	32.00	3.10	1.00	59.00	57.50	1.50	−26.50	4.15	3.50	65.15	−34.15	
吉林	54.00	52.20	1.80	28.60	27.88	0.72	+24.32	1.65	7.60	37.13	+15.07	
黑龙江	71.50	69.20	2.30	37.90	36.94	0.96	+32.26	1.80	12.82	51.56	+17.64	
黑河	10.50	10.10	0.40	5.20	5.07	0.13	+5.03	0.05	0.25	5.37	+4.73	0.40
西北	48.63	47.35	1.28	33.50	32.65	0.85	+14.70	2.50	0.20	35.35	+12.00	9.00
陕西	23.63	23.00	0.63	16.20	15.80	0.40	+7.20	0.60	0.20	16.60	+6.40	
甘肃	16.00	15.60	0.40	11.20	10.90	0.30	+4.70	10.0	—	11.90	+3.70	
青海	1.90	18.5	0.05	1.60	1.55	0.05	+0.30	0.40	—	1.95	−0.10	
新疆	7.10	6.90	0.20	4.50	4.40	0.10	+2.50	0.50	—	4.90	+2.00	
华东	238.17	280.55	207.62	220.91	214.00	4.91	+14.55	10.00	3.80	229.80	+0.75	
上海	0.50	0.45	0.05	27.50	37.50	—	−27.05	0.60	2.50	30.60	−30.15	
山东	53.00	51.30	1.70	50.00	48.73	1.27	+2.57	4.00	0.20	52.93	− 1.68	
江苏	73.50	71.10	2.40	61.00	59.45	1.55	+11.65	1.30	0.40	61.15	+9.95	
安徽	50.67	49.30	1.37	36.91	35.97	0.94	+13.33	0.60	0.50	37.07	+12.28	
浙江	40.50	89.20	1.30	29.50	28.75	0.75	+10.45	1.80	0.20	30.75	+8.45	1.00
福建	20.00	19.20	0.80	16.00	15.60	0.40	+8.60	1.70	—	17.30	+1.80	1.20
华中、华南	250.50	242.80	8.20	187.00	182.27	4.73	+69.08	7.00	10.13	199.40	+42.90	
河南	52.00	50.80	1.70	44.00	42.89	1.11	+7.41	0.90	0.68	44.47	+5.83	
湖北	41.00	39.70	1.30	36.50	35.58	0.92	+4.12	1.60	0.40	37.48	+2.22	1.00
湖南	44.50	43.10	1.40	30.00	29.24	0.76	+13.86	0.60	2.70	32.54	+10.56	2.00
江西	32.00	31.00	1.00	20.50	19.98	0.52	+11.02	0.40	—	20.38	+10.62	1.00

续　表

省市	收　入			供　应			收入和供应之差(已修订)	财政保障(已修订)	出口(经修订)	支出总额(经修订)	收入和支出之差	
	原始计划	复审计划	减少	原始计划	复审计划	减少					经修订	包括交通不便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广东	51.00	49.20	1.80	39.50	38.50	1.00	+10.70	2.85	4.30	45.65	+3.55	
广西	30.00	29.00	1.00	16.50	16.08	0.42	+12.92	0.75	2.05	18.88	+20.12	2.00
西南	134.20	130.15	4.05	88.00	86.77	2.23	+44.38	2.50	0.20	88.47	+41.68	23.68
四川	94.00	91.00	3.00	58.50	57.02	1.48	+33.98	0.87	0.20	58.09	+32.91	
贵州	16.70	16.15	0.55	12.20	11.89	0.31	+4.26	0.28	—	12.17	+3.98	
云南	21.00	20.50	0.50	15.00	14.62	0.38	+5.88	1.20	—	15.82	+4.68	
西康	2.50	2.50	—	2.30	2.24	0.06	+0.06	0.15	—	2.39	+0.11	

1955 年 2 月 27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34－70

№13414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

(1955 年 3 月 14 日)

摘自 Д. А.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1955 年 3 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 年 3 月 14 日

今天 11 点 30 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在相互问候以后，大使通知

我，埃及驻印尼大使阿里·法赫米·阿尔·阿姆罗乌西不久前礼节性地拜访了他。埃及大使在会谈中对黄镇说，埃及的商务代表团应该到印度尼西亚来，它的任务之一是要达成一份关于埃及商品(棉花和大米)转出口到中国去的协议。接着阿姆罗乌西说，据报纸的报道，以色列打算派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去。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中国与以色列的谈判将会给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国家留下负面的印象，这一点可能会在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上表现出来。

按黄镇的话来说，他回答埃及大使，中国是在实行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及主权为基础去建立和发展与各国之关系的政策。

黄镇对我说，他向自己的政府汇报了这次拜访的情况，并收到了政府支持结识埃及代表的回音。因此黄镇决定以礼节性拜访的方式回访埃及大使。在查问埃及大使国能否接见中国时，埃及大使馆里的人通知说，埃及大使因公务繁忙而无法在向他提出的那个日子里接见黄镇。不久阿姆罗乌西本人却打电话来请求转告黄镇，身为伊斯兰教代表大会秘书长的埃及不管部部长安瓦尔·阿斯-萨达特现在就在印度尼西亚。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重要事情要找中国大使谈谈，并问，中国大使能否在3月20—25日这段时间里访问不管部部长。

黄镇对我说，他拜访我，就是为了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我向黄镇提示了我在印度大使的招待会上与埃及大使的那次谈话，当时埃及大使就表示过要与中国大使见面的愿望。接着我说，指出埃及大使不顾礼节地先来拜访黄镇(埃及人早已在雅加达了，而黄镇不久前刚到)这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我补充说，或许埃及政府想要利用黄镇与阿姆罗乌西之间的老相识关系，因为他们两人都曾作为自己国家的外交代表而同时在布达佩斯待过一段时间。我说，在考虑到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坚决要与大使会晤的意向的同时，可以推测到，埃及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途径。然后我说出了自己的猜想，这次联系是不是为安排预计都会出席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周恩来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之间的会晤而采取的预备步骤。

我说出了自己的设想，根据我所说的原因，对他——黄镇而言，与埃及人见面是合理之举。

黄镇表示担心，生怕这次拜访的情况可能会被人在报纸上刊登出来。针对这一点，我对黄镇说，看来应该预先同埃及大使约定，希望他们暂时别提他们之间的这一会晤。我补充说，此外，如果报纸上真的出现一些报道的话，那么这也未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因为拜访的性质将是礼节性的，而不是正式的。

大使感谢了我的主意。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会谈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А.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81 - 82

№21425

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

（1955年3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会谈期间通报，中共中央打算在1955年3月下半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据毛泽东说，会议将讨论的问题包括：1.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五年计划。2. 关于高岗和饶漱石的事。毛泽东还说，这次会议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意义等同于党的代表大会。

关于即将召开的此次中共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最好询问尤金同志。

附件是给尤金同志的电报草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 波诺马廖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3月19日

第25-c-520号

手写批注：

苏联外交部已给尤金同志发了电报。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23日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指示，将通过外交部的渠道了解情况。库兹涅佐夫同志已经同意。

……①
1955年3月24日

归档。

В. 戈尔布诺夫
1955年3月26日

---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附件：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H/Ваш 第476—477号

请向我们通报此次中共所召开会议的日期以及与举办会议相关的其他问题。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71－72

№16665

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

（1955年3月19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H. 布尔加宁（签名）

1955年3月19日

副　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 A. 布尔加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刘晓会谈记录

1955年3月19日

刘晓说，当他动身赴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他转达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全面援助，向苏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很高兴能有机会亲自在这样的场合完成这一指示，并转达对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问候和感谢。

刘晓感谢苏联政府和布尔加宁同志个人在他的工作中给予大使馆的一切帮助，特别是给大使馆提供莫斯科附近的别墅，并准备今天去看这栋别墅。然后刘晓说，最近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指的既有欧洲也有东方发生的事件，对所有问题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走在一起的。

布尔加宁同意刘晓的意见。布尔加宁也问大使是否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实际问题。

刘晓说,大使馆现在没有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有曾一时拖延未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大使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关相互供货的问题。但随着贸易协议的签订,所有这些问题都已顺利解决了。因此,刘晓说,他想向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刘晓说,实践表明,为了准备苏中双方有关主管部门间的经济协议,在预先的准备工作中花去非常多的时间。谈判本身有时也拖得比需要的时间长。他本人以及北京的领导同志完全归咎于中方部门不会准备问题。负责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中方领导人往往不知道中方的可能性,有时甚至不知所措。北京自己作出结论,中国的工作人员要学习,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准备签订任何一个经济协议前,应当研究自己的可能性。负责经济组织的苏联同志从自己方面管理经济业务中更有经验,应当不客气地提醒中国同志,指出他们的缺点,提出忠告和实际的建议,如何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刘晓说,总的结论是,中国和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实施两国全面合作的工作人员,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交流他们必须解决问题的意见。苏联同志应当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并教导他们。

布尔加宁:我们觉得,我们的同志有时认为可能过于积极,因此只好制约他们。

米高扬:直到现在,我们只好制约我们的同志。

布尔加宁:想知道大使是否有关于台湾地区的任何新情报。他说,最近外国报刊报道,蒋介石将从金门和马祖岛撤退。

刘晓说,他也看到报刊上的消息,最近蒋介石开始撤退这些岛屿上的居民。他说,据现有资料,金门居住约5万人,马祖的居民约1.5万人。

米高扬:我们的情报也是来自报上的消息。

刘晓说,他认真地学习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的资料,他明白了苏联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方针,他想知道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后发生的新情况。

布尔加宁:现在摆在苏联各组织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春播。赫鲁晓夫同志在萨拉托夫召开中伏尔加地区农民大会,大约有2 000名党政积极分子参加。关于农业形势,布尔加宁说,去年乌克兰严重歉收。因此,在国家总平衡表中粮食、油类作物、甜菜等缺额。因此,今年我国经受一定的困难。布尔加宁继而着重地说,我国在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方面也面临重大的任务。

刘晓:中国也经常遭遇歉收。

布尔加宁:众所周知,现在对外政策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是:在西方的德国问题,在东方的台湾问题。其次的大问题是裁军问题。关于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强调指出,这一政策永远是积极和主动的,而美英集团只好自卫。例如,在批准巴黎协议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就是这一证明,在今天各报公布苏联政府致法国的照会中,阐明了苏联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现在,大家知道,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分会在伦敦开会。去年在联大第九届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在采纳英法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裁军建议。但是,美国拖延了对苏联建议的审核,决定把这一问题转给正在伦敦开会的裁军委员会分会审核。

苏联政府建议销毁核武器，停止生产核武器，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我们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世界会议。我们同意进行监督。大使可能会产生问题——怎能让侵略集团的监督人员进入苏联？

刘晓：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其他国家的这些代表抱有怎样的目的。

布尔加宁：美英集团不会销毁核武器和禁止生产核武器。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他指出，策划奴役别国人民的美国侵略者不会放弃自己的阴谋，不会同意销毁核武器储备的建议。

布尔加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远东的政策也是主动的，我们对台湾问题共同立场就是这个范例。这样，布尔加宁得出结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执行完全证明是正确的、积极主动的政策。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刘晓说，由于苏联采取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对外政策，美国不得已而自卫并企图摆脱困境。因而苏联的建议得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英集团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刘晓再次感谢布尔加宁的谈话。

布尔加宁：关心刘晓在外交使团的状况。

刘晓说，他已逐步熟悉了自己的新任务，现在他要熟悉其他国家的大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想成为他的真诚朋友。例如，英国人在谈话中向他表明，英国同情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站在他的方面。

会谈持续 1 小时 15 分。

记录：И. 库尔久科夫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16，л. 27 - 32

№10191

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

（1955 年 3 月 19 日）

机　密

致 В. М. 莫洛托夫同志：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比内在今年 3 月 17 日的法国国民会议外事委员会会议上

宣称,关于召开印度支那问题的三大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会议的问题已经决定。

从比内的声明中得知,该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与会国在贯彻日内瓦协议过程中将产生的问题”,包括撤离海防的问题和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即将举行的大选问题。

根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这次会议将于今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例会期间在巴黎举行。

美、法、英之间达成协议单独开会讨论海防问题和越南的选举问题,无疑是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

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应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指示,让他们分别拜会艾登和比内,请艾登和比内对举行这次单独会议作出解释是适宜的。

这种做法可向法国和英国政府显示,苏联政府对他们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表示警觉。

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的指示草案附后。①

请予审议。

B.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4

№13018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

(1955年3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4月7日

与毛泽东同志1955年3月30日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我们的讨论是从一些礼节性的寒暄开始的。毛泽东抱怨说,因忙于党的会议,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他累坏了。他说,在会上他不得不听很多人的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发言。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他必须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说，我们正在考察干部，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毛泽东说，我想要到南方去休息两三个星期。

接着，我说有一封苏联共产党给他的信件，并把赫鲁晓夫的信交给毛泽东，信中邀请毛到苏联去过1955年的五一节。他很快了解了信件的内容，然后说，政府里的一些情况可能让他无法在今年接受邀请。在这一问题上，他还提到在他和赫鲁晓夫同志讨论访问苏联问题时，访问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我回应说，苏联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其政治意义是异常重要的；毛泽东访苏的政治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但再次说国内事务可能会妨碍他访问苏联。他请我不要误会，认为他不想接受这个邀请，并补充说，访问苏联的问题会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讨论，最后的决定会通知我们。毛泽东说，他很想借访问苏联的机会，在苏联一些地方旅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然后从摩尔曼斯克到苏联的南部城镇。而且，在他离开苏联后，他还想要访问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

回到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会上对高饶事件和五年计划草案的讨论非常活跃。

我问他，会上是否有反映高岗和饶漱石看法的观点。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落后，由于缺乏适当的通讯手段，不同的地区之间彼此隔绝。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俄国差别非常大。在俄国，革命在大城市爆发，由于大城市有工业无产阶级，这就为共产党提供了最容易取得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出现后，被迫在乡村开展基本的工作。人民解放军是在乡村建立的，它的干部基本上来自农民，也有一些来自旧军官。那些在各自封闭的地区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人们，开始彼此接近；在他们中间滋生并发展出一种派别或家族的观念。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由很多这样的派别构成，而且这些派别中有很强烈的狭隘地方主义情感。这些地方主义情感致使少数派别开始抗拒中央委员会。张国焘集团反抗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抗拒。类似的情况还有李立三和王明的无原则派别。甚至在国民党被赶出大城市而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以后，派系之间的联系仍然保留下来。这些派别已经习惯于自治性更强的农村地区，在解放军进入大城镇后，中央委员会开始试图对此进行控制，他们就表现出不愿接受中央的控制。这种情况发展得如此过火，以至于那些彼此相互支持的人在宴会上或其他集会上，从他们所属派别的立场出发，可以谈论关于本派在党内的地位等广泛的问题。如果不属于该派别的人在这些集会上出现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会立刻停止。

高岗、饶漱石和其他一些在内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指使那些来自解放军的党员(当时这部分人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来反对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员。高岗和饶漱石并不把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员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归入此类。根据高、饶的划分标准，我本人也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开始做党的工作时也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进城以后，那些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很好武装的党员，被城市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

倒。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观点,滑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些人很多是嘴上高呼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做的是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事。在革命时期,这种人还可以同党走在一起,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革命阵营。这就是在高岗和饶漱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说,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教育干部,所以我们党才会基本上保持团结。虽然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远远不够。目前召开的会议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不仅正在考察和评估这些干部,而且利用这次会议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以期在建立一个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真正团结的党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并克服种种自治和狭隘地方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还谈到,即将举行的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他说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为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他说,由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织工作,事情进展很顺利。虽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可他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有任劳任怨的国务院在开展各种实际工作和治理这个国家。

毛继续说,目前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是很久以前选出来的,主要是由军人构成的。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考虑到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需要认真考虑选举新的领导层。毛泽东说,我可能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我们得找到一些可以领导党的人,这些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取代我的主席职位。可能我们将不得不选举一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或者设置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谈到了过去5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我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可以使用以往任何中国政府所没有用过的语言来和美国人谈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力量,激发了印度、缅甸和印尼在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勇气。

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交锋,这可以让印度、缅甸和锡兰不至于卑躬屈膝,而是挺直腰杆”。那些促成并召集亚非会议的国家并未提到要与共产主义抗争,反而提到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准确地反映了上述说法。

我补充说,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共产主义。在进一步的会谈中,我口头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3月12日信件的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意见表示赞赏。

想起我们曾经在一次会谈中讨论过写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毛泽东说,很可能他不能写了。我告诉毛说,我已经向苏联共产党报告说他同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问,能否让刘少奇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有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但至于让谁来写则会由中央委员会讨论,而且他会告诉我们。

师哲和T.Φ.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Φ.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71-75

№25583

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①]

(1955年3月30日)

摘自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　密

……

张闻天同志重新谈到我们在3月22日商谈的关于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大会的话题。他说，中国朋友暂时不发表官方的意见，如果科伦坡会议参加者决定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这很好，如果同意邀请，那要看当时的局势。但是中国朋友的立场是最好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会议。接着张闻天同志说，尼赫鲁和吴努已问过周恩来，问他是否亲自参加亚非国家的代表会议，如果他要参加的话，请他开会提前两天来万隆，以便与他一起预先商讨会议的工作。

……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3，д. 9，л. 69－70

№13417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年3月31日)

摘自Д. А.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便宴上

1955年3月31日

今天13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为了对Н. С. 吉洪诺夫同志表示尊敬而举办了便宴。

---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除了 H. C. 吉洪诺夫同志外,我方受邀赴宴的是我和我妻子、扎布罗金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外交工作人员乌拉内切夫、尼基京、库罗奇金和绍尔莫夫同志与他们的妻子。

吉洪诺夫同志和黄镇互致了简短的欢迎词。

黄镇对我说,报纸上的许许多多报道,也包括情报部长托宾的正式声明在内,都说胡志明将会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这消息是不对的。他得到了一个通知,范文同将担任代表团的团长,他们已经在替他寻找必要的住所了。

武官毛升(Мао Шень)上校在同我谈话时说,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和警察当局正在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去组织对将要举行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那些场所以及紧邻它们的地区的保卫工作。不过,保卫工作的情况是不可靠的,受托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军区指挥部拒绝作出任何保证。这情况同样也与雅加达-万隆公路有关,这条公路在许多地方都要穿越“伊斯兰教的达鲁尔”匪帮的活动地区,这些匪帮近来加剧了自己的活动。

毛升的意思是,他们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去保护中国代表团。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1, оп. 11, п. 8, д. 4, л. 112 - 113

№1341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 年 4 月 6 日)

摘自 Д. А.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1955 年 4 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 年 4 月 6 日

今天 16 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会见了我。

他在会谈时向我通报了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他说,代表团将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列入代表团的有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外交部副部

长、外交部的两位参赞以及伊斯兰大会的副主席(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等，一共是24个人。

我说，据我看来，把著名的伊斯兰教活动家列为代表团成员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

我问，中国代表团何时到达印度尼西亚。对此黄镇回答，周恩来将于4月15日乘飞机从云南省(中国)飞往仰光，在那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缅甸总理吴努会面，并且将与他们进行会谈。第二天早上，周恩来将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加达。

我问大使，他是否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确保与会者的安全而采取了哪些措施。大使回答，他收到了亚非国家代表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的保证，说是印尼政府认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接着他说，为了保卫开会的会所和紧邻这些会所的地区，现在全部警察和在卡维拉兰上校指挥下的第三军区的部队都动员起来了。此外，有一个营正在从第七军区转移到万隆来，而且还在用前抵抗运动的战士组成两个营。他补充说，中国大使馆已经在万隆租下了两幢位于保护区的大楼以供开会期间使用。一幢供周恩来使用，另一幢是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范文同用的。

黄镇说，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不久前向他查询，中国政府是否打算提交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初步提案。大使回答阿卜杜尔加尼，中国政府没有这类提案，因为按照茂物会议的决议，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日程将在会议上得到讨论。

我说，就我所知，不久前印度向联合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关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情况的报告，遗憾的是我并不了解它的详情。因此我问大使，他有没有从联合秘书处收到过类似的文件，大使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补充说，或许秘书处的文件是直接发到北京去的。

最后黄镇通知说，中国大使馆仿效其他大使馆的实际做法，在辛丹拉亚区的多山地区(茂物市东南方20公里)租下了两幢好的别墅，共有8个房间，还有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和冷热水淋浴设施。他说，由于雅加达的恶劣气候条件，他打算在一周的中期派自己的几个同事到那里去住两三天，自己则在周末出行。他开玩笑地补充说，附近有一家很好的中国餐馆。黄镇邀请我到他的别墅里去做客，并请我偶尔派苏联大使馆的职员到那里去。我感谢了他的这一盛情邀请。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1, оп. 11, п. 8, д. 4, л. 121 - 123

№20515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

（1955 年 4 月 7 日以前）

机　密

1955 年 4 月 7 日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

经同谢尔巴科夫商议后，我们把苏共中央关于即将同朝鲜同志举行协商问题的报告草案呈交给您。

И. Ф. 库尔久科夫(签名)

第 946/ДВ 号

1955 年 4 月 7 日

机　密

文本第 5 份

苏共中央：

鉴于即将同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举行协商会议，我们把《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发给您——这份报告依据近来收到的密码电报材料作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发给您的还有《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的报告草案。

1955 年 4 月__日

第__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

由于战争的结果，朝鲜的经济处于极度混乱和破坏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达 4 200 亿元(140 亿卢布)。国有和集体所有工业的总产量同 1949 年相比缩减了 40%多，黑色冶金业和有色冶金业，燃料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生产设备几乎完全没有开工，交通瘫痪，农业经济也遭到重大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降到了极点。

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劳动党在国家经济恢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借助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三年恢复计划任务。采煤、钢、水泥、化肥、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工业品生产企业均已恢复生产。

但是，在工作中，朝鲜劳动党中央仍有许多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这需要引起关注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①

二、农业

……

三、居民生活水平

……

四、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对朝鲜经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在朝鲜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31.6%。

截至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提供的设备、原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捕鱼船，汽车，拖拉机，机器，火车车厢，矿山，纺织和能源工业设备，机床，建筑制备，铺路车，电缆制品，测量设备，实验设备，大学参考书，矿物肥料，石油产品。

苏联援建22个工业项目，勘查工作已进行，其中大部分已完成建设所必需的设计工作。

截至1954年10月1日，朝鲜重建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到100个(其中30个是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新的设备来自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依靠从苏联运来的纺织工业设备为朝鲜提高布匹产量提供了可能，从1954年的2 210万米到1955年的4 420万米。

1953—1954年，建立了20个汽车出租站和113个马车出租站，拖拉机和马匹主要由苏联补给。

应该指出，朝鲜政府利用来自苏联给予的援助，拥有了工业制备和原料，避免了用于人民消费品的100万卢布的支出。后者的支出约330万卢布。这一形势必须考虑利用其他国家的援助。

按照现有协定，1955年苏联向朝鲜提供的商品(包括商品供应)总额达到3.5亿卢布，其中包括安州水利系统的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联公司、皮革厂、鱼品罐头厂、印染厂、矿物肥料厂的设备、材料，火车车厢和起重机，矿业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器材，石油设备，电缆制品，黑金属和有色金属，以及1 600万卢布的大众消费品(布匹、线、药材、棉制品等)。

此外，根据朝鲜对外贸易省的请求，苏联准备满足在1955年向其额外供应商品的揭底，援助数额为2 600万卢布。这些商品的清单目前正在同朝鲜方面进行协商。

考虑到朝鲜政府将掌握剩余的货币(来自向其提供的10亿卢布贷款)，允许其向苏联新订购300万卢布的商品。

---

① 该文件有大量涉及朝鲜经济情况的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提供了8万亿元援助。考虑这一情况,中国向朝鲜供应的商品价格远远高出购买苏联商品的价格,按照苏联对外贸易省的资料中国提供的8万亿元援助约折合8.5亿卢布。

在提供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织布机、内燃机、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提供了大众消费品。例如,1954年中国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大豆),4 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件服装和其他一些商品。粮食和日用工业品中国将在1955年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向朝鲜提供了铁路修筑、建设铁路桥梁和机车库方面的援助。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总额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6 500万卢布;民主德国4 500万卢布;捷克斯洛伐克3 500万卢布;匈牙利2 500万卢布;保加利亚2 000万卢布,波兰1 900万卢布。

1953—1954年,这些国家向朝鲜供应了机床、建筑和公路设备、电力设备、测量仪器、钢材、医疗器械、棉絮和其他各种原材料,总额约1亿卢布。

注意到,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成套设备援助,在一系列工业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中给予了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在砖、瓦和水泥厂的建设中提供了援助;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印染厂、度量衡制造厂;波兰援建3个煤矿和2个工厂:砖瓦厂、森林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气制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人民共和国依靠蒙古人民的牺牲与奉献,1954年向朝鲜提供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兽皮。

应该指出,朝鲜没有很好地利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设备和原料。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到1954年10月1日,国家拥有的11 500台机床中有3 500台没有装配;1 699台锻压设备中有490台没有装配。以及还有大量其他工业设备没有得到利用,这些设备存放在仓库里,或者露天摆放而自然损坏了。

同时,一些朝鲜领导同志没有对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给朝鲜提供援助产生依赖倾向,他们把足够的精力用于充分利用国内现有资源上。

五、朝中关系

战争期间,朝鲜和中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战后这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朝中两国同志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在朝中两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反映。

据来自我们驻朝鲜参赞的消息,朝鲜同志不善于同被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建立持久稳固的联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成员也很少同朝鲜同志打交道。

有这样一件事,一些朝鲜同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表达了不满,说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似乎

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还有这样一些传闻，说苏联在利用朝鲜人来对抗中国。例如，今年2月在莫斯科就军事分界线进行谈判期间，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昌玉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他不想同中国同志就与军事装备修理相关的工作打交道。

朝鲜的实践工作表明，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低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抗美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的作用。在这样一件事中看得更为清楚，在平壤的对抗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中国志愿军战士1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与此同时，中国驻朝鲜军事司令部也举行了展览，在展览中，中国的解说员按照自己的方案作了解说，击溃武装干涉分子和解放北朝鲜的功勋都属于中国志愿军。

在朝鲜，有一些领导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在朝鲜人民军服役。这一领导集团同担任领导职位的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的关系不太和睦。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为了把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排挤出领导岗位，对金日成施加了影响。朝鲜著名的活动家之一朴一禹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52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内务相的职务，尔后改任通讯相。朝鲜军事科学院院长方虎山也被解除了职务，他也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按照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的证据，指责这些人似乎表达过对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担任朝鲜军队和国家机关职务和金日成完全指望苏联军人和其他顾问的不满。

根据大使馆的情报，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这可能会对朝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有根据认为，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有这样一件事引起我的关注，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自己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今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六、朝鲜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朝鲜劳动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开展的政治和组织工作都处于较低层次。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有官僚和命令主义作风。集体领导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都非常薄弱。

在朝鲜劳动党内和在整个国内，和先前一样极力进行个人崇拜宣传，在党的领导层中有一种观点，不这样做目前就很难过。到目前为止，金日成同时兼任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是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机关。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按照惯例，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人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命令。金日成经常做出一些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反的命令，有时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例如，他曾指示要减轻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的赋税，使其同私营企业处于同一水平。他在未经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要在江界建地下兵工厂，没有考虑高达4 600万卢布(230亿元)收支预算，就支配从中国得到的给中国志愿军的补充开支款项，等等。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在国家政权机关选举工作中实施民主监督原则。他们把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推迟到不确定的时间,最高人民委员会到 1952 年任期已满。1946 年 11 月和 1947 年 3 月没有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截至目前,大部分地方人民委员会机关的领导同志都是指派的。

国家机关进行了部分改组,摆脱了现行政治、经济问题的决定常常导致国民经济管理体系复杂化的局面。1954 年 3 月,取消了公用事业部,把它的功能转交给国家建设委员会。1955 年 1 月上述命令停止执行,此外,重新组建 1953 年取消的建设部。与此同时,负责建设事务的国务委员会继续保存下来,显然,这一功能已转交给建设部了。在对工业企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后,现在建筑材料工业企业被划归四个部门,认为建筑材料工业企业不能归属地方人民委员会管辖。

同时,各部门的领导人员也实行了大规模更换,这破坏了对有经验干部的培养。例如,1954 年有近一半的副相被撤。在 1954 年 9 个月的时间里,国家计委负责财政和成本问题的副主任被更换了三次。大部分新任领导都来自某个其他领域。

改善国家各机关领导工作风格和方法的问题总体上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没有为深化集体领导和为巩固国家机关同群众的联系而斗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中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很普遍,行政命令代替了培训工作。近来,在各部、部门和一些企业的领导同志中盛行设立小金库,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举办各种宴会。巩固内务省机关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内务省机关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的能力还很弱。

由于财政登记不好、财政纪律松散和没有国家监督造成局势复杂化,方便以各种名义盗用、挪用国家财产。例如,贸易系统就出现了明显亏空,仅在 1954 年第二季度就支出 1 929 万元,相当于商品流通总额的 4.7%。1954 年上半年,被盗用消费掉的公款就达到 2.809 亿元,当时,同一时期消费合作社的总利润总共是 4.348 亿元。在平壤开设的一些商店几乎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因为店员把商品偷光了,把它拿黑市出售。

上述违法行为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非常普遍,在劳动党成员中也是如此。据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材料,从 1953 年 6 月到 1954 年 6 月,有 22 000 名党员因盗窃国家财产而被除名。

一些各部、各部门领导同志对上述行为无动于衷,认为侵吞国家财产、职务犯罪的现象在朝鲜的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通讯相朴一禹就作出过书面指示,侵吞国家财产数额不大的人属于这种情况,不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和要求他们补偿损失(内阁取消了上述不正确的指示)。

在这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1952 年,财政相崔昌益,他纵容这种行为,极力反对财政监督和曲解朝鲜的赋税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在褒扬资本主义中的某些要素,却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甚至还被任命为朝鲜副首相。

对国务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对财经纪律进行监督的责任委托给内阁附属人民监察委

员会(崔昌益被任命为执委会主席，1954 年 11 月再次被解除财政相职务，据大使馆的消息，原因是越权和挪用公款)。上述委员会没有开展活动。劳动党中央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积极促进其开展工作，结果，在朝鲜事实上不存在有效的国家监督。

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非常软弱。军事纪律和警惕性下降了。在将领和军官中酗酒成风，对下属高傲和粗野。有一些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中，都存在叛国、逃兵、自杀等各种犯罪行为。

七、南朝鲜

……①

八、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以下一些事情。

1. 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所确定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 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 年 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 我们认为，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 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 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 为在 1956—1957 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 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 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是合适的。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5. 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

---

① 此段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人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1955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和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6. 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问题是合适的,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现在,朝鲜同志制定了劳动党纲领草案,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纲领中提出了在北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和解放南朝鲜的任务。按照我们的意见,在朝鲜目前的形势下,不适宜发表这种性质的纲领和暴露劳动党的最终目的。取而代之,应该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基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美国占领南朝鲜的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H. 费德林、Б. 波诺马廖夫

1955年4月__日

第__号

机　密

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1. 要让朝鲜同志注意,朝鲜制定了太多的重建和发展工业的措施,鉴于此,大部分财政拨款都用于建设投资。要表达一种观点,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

所确定的速度，此时要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 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地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 年 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 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 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 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 为在 1956—1957 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 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对南朝鲜居民将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 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 1955 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并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5. 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可能性，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建议朝鲜同志目前不要提通过劳动党新党章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基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对美国占领南朝鲜的

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6. 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的问题。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用于关于朝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И.谢尔巴科夫,1955年5月30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

№13419

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

(1955年4月9日)

摘自 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4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上

1955年4月9日

今天晚上偕同妻子参加了中国大使黄镇举办的午宴。

出席宴会的有埃及大使阿里·阿姆罗乌西、锡兰公使萨拉瓦纳穆图及其妻子以及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

中国人是在4月6日在我们大使馆里与我们最近的一次会面时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

的。当时他说，他要在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举办一连串这样的宴会，以便更亲切地结识与会国的大使和公使。这次宴会他是专门为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举办的。他收到了大家同意参加的回音，并请求我接受邀请，好让我同他的这些客人一起谈谈。

第一位到达的阿富汗大使在宴会开始前说，他很高兴能与中国大使建立个人联络，尽管中国与阿富汗之间并没有任何条约，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最好的。他补充说，可以期待，这些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正式的协定加以巩固的。

宴会席间和宴会结束后的全部谈话都是十分自然的，话题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全体赴宴者，其中也包括我，向筹备会议的联合秘书处成员、锡兰大使萨拉瓦纳穆图提了大量的问题。

他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

1. 联合秘书处根据许多代表团送来的提议制定会议议程的草案。这份草案将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交给各个代表团去研究和讨论。这份议程含有10个问题。

2. 议程的主要问题想必将是：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领域的合作、共存、原子弹和氢弹、和平利用原子能、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和其他许多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而且锡兰人并没有这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

3. 最难以讨论的将是共存问题。这个问题大概将会按讨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五项原则的方式来讨论。锡兰人说，共存问题是以与联合秘书处在最终方案中所采用的措词略有不同的措词提出来的。以"发展共产主义和共存"为标题的问题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萨拉瓦纳穆图没有说，但这个问题在联合秘书处所提交的议程方案中被命名为"国际紧张局势和共存"。同时锡兰人解释说，在以联合秘书处的措词提出来的问题的标题中避免了它的明确的指向性。

此时许多交谈者都说，在讨论共存问题时可以预料到，像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许还有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仆从国的代表团将会增添许多困难，并且将会试图推翻它。

4. 几乎对在联合秘书处会议上得到讨论的每一个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团都会争论很久，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

5. 所有关于将会有观察员(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观察员)出席大会的报道都是不对的。根本就不会让任何观察员出席大会的。达成的协议只有一个：将会接受个别代表团或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联合代表团出席大会。同时将只准这些非洲人发表自己的声明，然后就要离开会场。

6. 大会工作的开始程序如下所述。4月18日上午9点，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主人的身份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大会揭开序幕。苏加诺总统致词，并正式宣布大会开始。这次会议将会邀请许多客人，其中也包括外交使团的头头们。然后将宣布休息。休息后，会议继续进行，但不再有被邀请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上将会选出大会的

主席和讨论议事日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大概将会当选大会的主席。

4月18日晚上以苏加诺总统的名义举行招待会。

在上午(9—12点)和晚间(16—19点)的会议上拟定各代表团团长的纲领性发言的内容。这些会议也将是公开的。

最后一次会议大概也将是公开的。

大会闭幕后,4月24日将以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为大会的与会者、外交使团的团长们、印度尼西亚的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广大社会人士举办一个大型招待会。

7. 组织问题全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代表团成员住的饭店客房也通过抽签的办法分配好了。

大会的开销初步定为500万印度尼西亚卢比,即大会的每一个发起国各承担100万卢比。此时锡兰人开玩笑地说,印度尼西亚在支出方面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大会的其余发起国都只好按印度尼西亚人的被人为地抬高的官方汇率把自由的外汇转到雅加达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132-135

№13312

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

(1955年4月11日)

(请尤金同志代发)

苏共中央:

关于给日共经费援助问题的来电收到。

我们同意由国际基金中给日共20万美元,给30万美元也可以,请你们决定。

如该笔经费你们别无其他方法转递,可交我们设法送去日本。

中共中央

1955年4月11日

РЦХИДНИ,转印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3420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 年 4 月 12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 年 4 月 12 日

今天白天，从报纸上得知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失事和搭乘此机前往万隆开会的中国同志罹难的消息后，我拜访了黄镇，并向黄镇表示我对此事的深切同情。

大使表示感谢。

我问大使，他们是否知道失事的原因，因为报纸上列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推测。

谈话时在场的大使馆参赞钟庆发(Чжун Цин-фа)说，他们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保持着联系，根据后者的通报，失事的情景被简单地作了如下的描绘。

飞机在飞到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旧称)岛的海岸附近时在空中烧了起来，并坠入海中。报告这一情况的是出事那一瞬间正好位于这一地区的一些渔民。根据遇难飞机发出的信号，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救护飞机飞往了出事地点。飞机驾驶员们看到了水面上的巨大斑点，并数到斑点地区有 100 多条鲨鱼。暂时还没有收到别的详细消息。

大使补充说，中国驻雅加达的总领事赵仲时即将飞往失事现场去。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1, оп. 11, п. 8, д. 4, л. 136

№13313

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

(1955年4月18日)

摘自1955年4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问题。

1. 满足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北京局关于给予财政援助的请求，在1955年度从“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援助给日本共产党。

2.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之后，通过它向日本共产党转交这笔资金。

3. 批准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文本(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关于同意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款，给予日本共产党以财政援助的电报。

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用于援助日本共产党是适宜的。

请你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交纳给国际工会基金的数额中，划拨出这笔款项，并利用你们现有的渠道，把这25万美元的款项转交给日本朋友，并告之这是“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给予它的财政援助。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H. 赫鲁晓夫

1955年4月__日

РЦХИДНИ，转印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342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

(1955年4月20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0日

今天13时，当我在万隆机场等待飞往雅加达的飞机起飞时，中国大使出乎我意料地赶到了那里。他说，他受周恩来的委托要与我商谈一个紧急问题。

黄镇告诉我，今天14时30分将要开始讨论关于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于1948年12月通过的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的问题。黄镇补充说，周恩来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对下面三个问题的看法：

1. 为什么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上表决人权宣言时弃权了。
2. 苏联政府今后会不会在自己的声明中引用上述宣言。
3. 如果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这一宣言的基本原则，苏联政府的意见如何呢。

同时大使说，他们希望尽快地得到回答——最好不要迟于明天白天。

我说，抵达雅加达后，我会立即向自己的政府请示，并请求尽快地给予回答。在这之后，大使请我说说我个人对上面所提到的问题的看法。

对此我声明，我难以作出任何回答，因为我并不十分了解这个问题。接着我指出，据我所知，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表决人权宣言时的确是弃权了，因为宣言的有些条例订得不十分清楚。但是什么地方不清楚，我就不记得了。

大使感谢了我，并说，他将等候回音。

我问，他对大会的印象如何以及有什么新的情况，对此黄镇回答说，一切都进行得不错。

谈话时在场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0－141

№13422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

(1955年4月22日)

摘自 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2日

今天14时抵达万隆后，我立即从机场出发赶往中国大使黄镇那里，并在他的寓所里遇见了他。

我收到了莫斯科对他以周恩来的名义在今年4月20日我与他的谈话中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答复。

我按照我所收到的指示向大使通报了下面的情况：

1. 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里曾指出，人权宣言在有着公认的优点的同时，也有许多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下述几点：

(1) 宣言的有些条文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规定。例如，第13条和第19条。

(2) 宣言里没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苏联坚持要把这种条文列入宣言之中。

(3) 宣布可以自由传播"信息和思想"(第19条)的宣言并没有包含旨在反对传播法西斯思想和反对鼓吹战争的规定。

我说，考虑到上面所列举出来的宣言的缺点，苏联代表团才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坚持要继续对宣言的草案进行加工，以便把它制订得更好。然而，苏联代表团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所以它在表决通过宣言草案时全面弃权了。

2. 后来苏联政府并没有反对过援引宣言中的那些在联合国的许多文件里都含有的条文。例如，在苏联于1953年所批准的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公约中以及在苏联投票赞成的其他一些联合国文件中。

3. 根据苏联政府的看法，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应该反对赞成宣言的原则，因为基本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可接受的。由于宣言毕竟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所以在基本上赞成宣言原则的同时，再对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作一些相应的说服工作是合理的。

黄镇感谢了我的通报，并说，他将立即向此刻正在开代表团团长会议的周恩来转告我们的答复。

大使补充说，尽管大会已经通过了赞成人权宣言的原则的决议，但我们的答复的许多条规定还是可以被周恩来同志在正在进行之中的、将要讨论共存问题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加以利用的。

然后我通知大使，据我所拥有的情报，已有一个名叫萨耶德·沙米尔和一个名叫尤素夫·阿利捷金的人从土耳其经过卡拉奇被派到万隆来了，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大会上传播一种说苏联和中国似乎有着压迫突厥和鞑靼民族之情况的污蔑性声明。

大使同样也感谢了这一情报，并当场就派自己的翻译到正在开会的那幢楼里去，并吩咐他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我们的答复。

我趁会面的机会问大使，他是如何评价大会工作的，同时我还指出，周恩来的发言在场外得到了很大的好评。人们纷纷指出，他用自己的声明彻底动摇了诸如伊拉克、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团的立场，这些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打算破坏这次大会。

黄镇在回答时说，他是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今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重大的分歧。工作的结果是准备好了一份相当不错的报告，它对中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基本上是由共同的宣言规定所组成的。

对我的关于经济问题委员会的问题，大使回答说，他不熟悉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也不了解它的任何一项决议，因为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上了。

对我认为日本代表团是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大使说，日本人对关于和平和经济合作的事宜谈得太多了。

我继续问大使，可以如何评价报纸上关于会上正在进行八国(五个大会发起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以及中国、泰国和菲律宾)首脑之间的谈判的报道。黄镇断然声明，根本就没有讨论台湾问题。

接着我问大使，他是如何评价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关于解决共存问题的、由七条规定所组成的提案的。同时我还说，第 5 条规定中所包含的关于“个体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的提案显然是打算为一系列像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侵略性条约的存在作辩护的。

大使说，巴基斯坦人的提案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拖延了政治委员会里的关于共存问题的讨论，并且是个别代表团团长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同时他指出，锡兰总理卡塔拉瓦拉在这个委员会昨天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涉及殖民主义问题时，锡兰人对苏联进行了正面攻击，宣称殖民主义有两种：旧的一种已一去不返，而苏联所代表的新的一种是现在的主要危险。黄镇接着又说，就在这次会议上尼赫鲁总理驳斥了卡塔拉瓦拉。大使同样也指出，缅甸总理吴努在大会上采取袖手旁观的中立立场。

因此我提醒黄镇说，在去年 12 月召开的那次解决参加万隆会议的受邀国家这个问题的茂物会议上，缅甸代表团，特别是它的团长吴努的立场是有点与此不同的。据现有的情报，当时在把中国纳入大会并决定寄给它们邀请信的那些国家这件事情上，缅甸总理吴努起了

主要的作用。

大使补充说,在讨论几乎是所有的问题时采取最反动的立场的是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

在谈话结束时我问大使,报刊上关于大会看来将会延长2—3天的报道是否准确。他说,对此他一无所知。

出席会谈并在最后把谈话内容从汉语译成俄语的是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2-145

№13423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

(1955年4月2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亚非国家万隆会议闭幕宴会

1955年4月24日

今天晚上,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的闭幕会结束后,在万隆的"霍曼"大饭店以大会发起国的5位总理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招待会。

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说,阿富汗代表团十分满意已结束的大会所取得的结果,特别是涉及保卫和平和安全的那个部分的结果。他宣布,今天白天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已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份条约中就有一条规定要缔结关于领事工作、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有关协定。

中国大使黄镇说,周恩来请我采取措施,让我们的记者十万火急地转发大会的最后公报,而且要求从公报的最后一部分——即"促进全面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部分开始转发它

的文本。

黄镇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证实了一种传闻，它说的是，大会的闭幕会之所以延迟了几乎4个小时才开始，是因为在讨论大会的最后公报的上述最后一部分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突尼斯驻印度尼西亚的常务代表阿米尔在与我交谈时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观察员代表团对公报中支持给它们以独立的要求的那部分里的决定感到满意。不过，阿米尔补充说，这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并且也无法保证法国会同意这些要求。尽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代表都表示同意的大会的最后公报里对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国际冲突的必要性谈得很多，但看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了取得完全胜利而重新开始同法国人进行武装斗争。

应该指出下面的事实：无论是在闭幕会上，还是在这个招待会上，都没有法国和英国的大使的出席。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148－149

№13424

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

(1955年4月26日)

摘自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

1955年4月26日

今天19时30分，出席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而举办的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副总统哈塔、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全体部长、军队的高官们、外交部的领导人员、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除了中国

大使黄镇和我之外,外交使团的团长中受邀赴宴的有印度大使蒂亚布日、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缅甸代办米亚·谢恩和南斯拉夫代办拉特科·布尔齐奇。

当礼宾司司长库苏莫·乌托约发给我一张上面指明我的席位的卡片时,他告诉我,今天的宴会他们只邀请了今天人还在雅加达的、已结束的万隆会议的参与国的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

捷克人指着南斯拉夫代办对我说,包括政府机关的正式官员在内的印度尼西亚人,也包括外交部的一些官员,都不了解南斯拉夫与民主阵营各国之间现有的真正关系,因而经常犯类似于今天的把南斯拉夫列入与中国特别友好的国家行列之中的错误。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说,据报道,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报刊对万隆会议的结果的反应基本上是很好的,同时问我,苏联报刊上是如何阐述大会的进程的。

我提醒总理说,在会议开幕前,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B. B. 库兹涅佐夫就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大篇声明说,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对巩固国家之间的和平和合作的事业来说以及对与殖民主义的斗争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祝愿大会取得成功。我同时还指出,总理想必是知道这一声明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证实说,他知道这一声明。

我继续说,苏联的报刊和电台过去和现在都很关注这次会议。同时我指出,我们的记者的许多报道都是通过电报才耽搁很久地从万隆转发过来的,因此都来不及准时送到报纸的编辑部里。

总理在回答时,对此深表遗憾。并说,他们听到了各国记者对电报误时的许多抱怨,他们曾试图根据大会的进程去扩大万隆的电报通讯能力,但是直到大会结束时他们也无法纠正这种情况。

外交部长苏纳约对我说,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万隆会议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 29 个与会国一致要求荷兰恢复西伊里安岛的谈判的那个事实。同时苏纳约说,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上对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一切事情这一点抱有坚定的立场。从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一开始出现时,部长继续说,我们就做过很多尝试去说服荷兰。最初我们在圆桌会议上直接向荷兰提出我们要解放西伊里安岛。然后,在第一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时,我们试图通过联合国来说服荷兰,委托我们的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九次会议上把西伊里安问题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然而,在联合国里,在许多殖民主义强国的压力下,这个问题被否决了。现在,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上,西伊里安问题被提出来供其他许多国家讨论,并通过了一份必要的决议。

部长继续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功地与大会参与国之一的一个代表团商定好了一件事——即这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提交西伊里安决议的草案。部长总结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用这种方法顽强而又和平地在为西伊里安与印度尼西亚的恢复统一而斗争的。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时，苏纳约证实了会场外所流行的传言，这些传言说，今年4月24日的大会闭幕会议之所以推迟了将近4个小时后才开始，是因为不得不对最后公报草案中的涉及促进全面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那个部分作许多修改。据说，中国提出的方案遭到了相当多的修改。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简短谈话中，他告诉我，万隆会议上没有举行过关于台湾问题的正式谈判，但是在许多小范围的招待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用餐时，周恩来在同苏加诺总统和坐在对面的哈塔副总统谈话时对他们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尽管年事已高却仍在为建设新中国做很多工作。他指出，她所有的亲戚基本上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内在联系的，但她却独自一人始终不渝地进行着革命工作，并坚定地遵守着丈夫的遗训。

在席间的公共交谈时，苏加诺总统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喜欢我们的电影《在印度尼西亚》时给了这部电影以好评，并宣布要把它放给印度尼西亚的观众们看。接着他感谢了我，因为我使他有机会观看了一部关于列宁的优秀电影。总统指的是，在去年12月在国民党大会上，我按照我们的协议呈送给他的影片《列宁在1918年》。

我说，我们还有另一些介绍列宁的电影，例如《列宁在十月》等。对此，总统说，他会很高兴地看它们的。

我答应去搞到这些影片并寄给他。

用过餐后，全体赴宴者都到宫殿的另一个大厅里去了，在此之前那里已经为印度尼西亚舞蹈家的音乐舞蹈会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受邀出席这场音乐舞蹈会的有各种国家机关的许多政府官员，还有许多大使馆及使团(特别是我国大使馆)的代表。

在音乐舞蹈会后同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简短谈话中，我说，要是用彩色电影胶片把许多印度尼西亚舞蹈拍下来，以便国家的广大社会人士了解它们，那想必会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因为遗憾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剧院很少。同时我对他讲，我们国家里广泛采用放映歌舞音乐会电影的方法。

亚明认同这样做会是很有益的看法，但又指出，他们的电影工业(部长更明确地指出，顺便说一说，它是归新闻部管辖的)还很薄弱。印度尼西亚根本就不会生产彩色电影。接着他请求道，如果我有的话，那就把他作为帕拉尔小组的成员于1950年待在莫斯科时所看过的我国电影《西伯利亚大地的传说》寄到他家里来，好让他放给朋友们和家里人看看。

我答应满足他的请求(影片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真的，我们只有一套俄语录制的拷贝)。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152－155

№13426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

（1955 年 4 月 27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欢迎周恩来宴会

1955 年 4 月 27 日

今天 20 时，中国大使黄镇为欢迎周恩来举办了一个招待会。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的整个时间里，苏加诺总统第一次出席了驻雅加达的外交代表机构的招待会。

谈话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内容。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1955 年 4 月 27 日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159

№13427

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

（1955 年 4 月 28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离开雅加达

1955 年 4 月 28 日

今天 9 时，作为印度尼西亚客人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逗留两天后离开了雅加达。从周恩来所居住的总统府到机场的整条路线上，都站着夹道欢送周恩来的人，多半是中国人。

机场上有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许多位部长，还有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许多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除英国与荷兰大使之外。

周恩来在登机之前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订了一份共同声明。周恩来没有读自己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贺词，而是以书面形式把它转交给了报界。

周恩来通过翻译为他因太忙而无法接见我一事向我致歉。他补充说，他已委托大使向我通报一切情况。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附注：

5 月 6 日在中国大使馆里，有人转交给我们一份万隆会议的材料选集，里面含有公开会议和非公开会议的简短记录、许多代表团所提交的决议草案等。

Д. 茹科夫(签名)

1955 年 5 月 10 日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160－161

№13428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

(1955 年 5 月 3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钟庆发会谈纪要

1955 年 5 月 3 日

今天 18 时 30 分我应中国大使馆参赞钟庆发的请求接见了他。

钟庆发首先提起了今年 4 月 25 日我们与他在沙特阿拉伯使者的招待会上的那次谈话,然后说,他来见我是为了继续进行上一次的谈话内容——是否有可能把中文学校的礼堂让出来供观看电影《在印度尼西亚》用。他说,印度尼西亚当局对这所学校的存在持不大赞同的态度,因此,中国大使馆在这方面是特别小心谨慎的。有鉴于此,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为别人的任何措施去使用过学校的建筑物,包括用来放映中国电影。因此很遗憾,他们不能同意校长对格洛莫夫同志的许诺。同时,钟庆发说出了雅加达另外两幢大楼的名称,它们是特价租给任何组织去供放电影、举行大小会议、开展览会等等用的。他还说明,中国大使馆不止一次地为类似的目的租借过这些大楼。

我为自己给他增添了麻烦而向他道了歉,并感谢了他出的主意。接着我要了解一下,为了使大厅里的人既不显得太多,又不显得太少,可以邀请多少人到这些大厅里来。

钟庆发回答,据他的实际经验看来,大约要邀请比大厅的座位数多一倍的人。作为例子,他指出了中国大使馆为欢迎周恩来而举办的那个招待会。这个招待会大约邀请了 600 个人,而来了 280 个人,即来了将近 50%的受邀请者。

对于我的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受邀请者中有许多人没有出席像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这样重要的招待会,参赞回答道,对于当地的情况来说,受邀请者的数目与接受邀请者的人数之间的这种比例(将近一半)并不是低的。实践证明,来参加招待会的通常是三分之一的受邀请者。

接着钟庆发说,受邀请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党员一个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此外,英国大使、荷兰大使,甚至连印度大使和缅甸代办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

在谈话结束时,参赞告诉我,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于今年 5 月 23 日出访中国,并将在那里逗留两周左右。

出席会谈和进行中译俄翻译工作的是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1-2

№23056

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

（1955年5月6日）

机　密
第一份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B.瓦里科夫同志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附件共计3页。（1955年5月9日第198号）

B.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5年5月11日

第2689/480号

附件：

摘自B.A.瓦里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1955年3月9日
第198号

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5月6日，我应邀接待了中国临时代办。

会谈伊始，周秋野便感谢我建议其参加铁托总统于今年5月5日举行的招待会。周秋野对参加此次招待会很满意，因为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南斯拉夫的外交代表，如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如缅甸大使、埃塞俄比亚公使、日本公使、以色列公使、缅甸使馆武官，等等。

随后，周秋野向我通报了关于他与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在这次招待会上的会谈情况。

周秋野把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所谈内容作了如下归纳：

1. 作为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的任务是:稳固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2. 在美国敌视中国的人的数量正在下降,这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有着重要关系。

3. 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曾三次访美,其间签署了大量南斯拉夫与美国协议,但在主权问题上南斯拉夫没有向美国作出过任何让步。波波维奇还说,他们——南斯拉夫人可以给中国代表看这些协议的内容。

4. 美国统治集团不喜欢南斯拉夫的制度,并希望在南斯拉夫建立另一个政府。但是,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宣称,美国人又不得不与现状妥协,甚至给予南斯拉夫帮助。

5. 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南斯拉夫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如今随着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南斯拉夫的情况已有所好转。

随后,周秋野询问了我一些问题:美国给予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梅捷列斯来访南斯拉夫的目的等。

关于"援助"问题,我向周秋野通报了一些情况。

至于梅捷列斯来南斯拉夫的访问目的,我说,目前仍很难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但依据土耳其和在背后支持土耳其的美国的政策来看,可能预测,梅捷列斯此行是想使美国人的观点在巴尔干联盟获得通过,尤其是在该联盟的军事发展方面。

在接下来的会谈期间,周秋野说,他们的(中国的)大使将于5月16日从中国起程来南斯拉夫,并将居住在目前由波波维奇居住的别墅内。

据周秋野说,南斯拉夫人已答应向其提供办公设施和为期两个月的居住设施,南斯拉夫人已展示了即将竣工的住宅楼,那里拥有10—12个单元,每个单元拥有1—2个房间。至于办公设施,周秋野说,中国使馆请求南方提供一座不少于30个房间的建筑。

在会谈结束时,周秋野请求我就一些礼节性的问题提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他请我建议,他是否应当去拜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因为后者曾在5月5日会谈期间邀请他(周秋野)去自己的别墅。

我对周秋野说,我认为这样的拜会是有益的。

周秋野说,他会这样办。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B. 瓦里科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佐林 B. A. 同志、欧洲司、情报委员会和档案室

1955年5月9日,第 аб/290 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342, л. 172 - 175

№10192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

(1955年5月18日)

绝　密

北京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胡志明同志并将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①]同志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已另电发给您)。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要使他知道，从比布罗夫斯基消息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霸占越南南方形成的局面，以加强那里拥护民主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坚持反帝国主义立场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是适宜的。同时询问胡志明同志，越南同志认为还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补充措施，需不需要我们方面的某种援助。

请转告胡志明同志，因为越南朋友具有在越南南方开展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尽可能完整的有关越南南方的情报。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正采取措施，准备在一些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揭露美国人在越南活动的文章，揭露他们的活动破坏日内瓦协议，支持反人民匪帮，反对越南南方的爱国反帝力量。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已得到指示，向周恩来同志通报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

电告谈话结果。

АВПРФ，ф. 079，оп. 10，п. 9，д. 8，л. 12

---

① 比布罗夫斯基，时任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波兰代表。——编注

№10193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

(1955年5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近来，美国人加紧了在南越把法国人排挤出越南的活动。美国人极力破坏法国的经济地位，积极开展把法国人排挤出军队的工作，同时把自己的顾问安插到最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广泛使用收买政策，不仅收买个别的政界人士，而且收买整批的组织，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国内各政治集团间内讧的加剧，突出表现在南越政府的军队和各宗教派别的军事组织之间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军事冲突事实上。

南越形成的局面可以被利用来加强南越那些拥护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坚持反帝立场和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从南越的局势出发，劳动党中央今年4月1日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议中对越南南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下达了指示。

然而，在南越实际执行劳动党中央指示的事情上存在着严重缺点，从拉夫里谢夫①同志的报告中以及尤金同志与波兰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中即可见一斑。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揭露很差，而且前后不一致。但同时，美国进行的反共、反苏和反华宣传却声势浩大。

我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朋友还远没充分利用越南南方形成的局势在国家的这部分开展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当前正面临1956年7月的大选。

鉴于以上情况，建议越南朋友对在越南南方开展活跃的工作以团结爱国反帝力量予以更大注意是适宜的。

苏联外交部还认为，授权尤金同志与中国朋友、授权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与法国朋友就此问题进行会谈是适宜的。授权波诺马连同志与波兰朋友会谈，以便通过他们驻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获取经常的并尽可能充分的关于越南南方局势的情报。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17日

第747/M号

---

① 拉夫利谢夫，时任苏联驻越南大使。——编注

附件：

机　密

第__份　草案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通报他以下内容。

……①

АВПРФ，ф. 06，оп. 14，п. 12，д. 170，л. 1－2

№138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5年5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5月19日会议第12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基里琴科、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

第49项　关于萨布罗夫同志提出的问题。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的结论）②

委托萨布罗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进行审批。

РГАНИ，ф. 3，оп. 8，д. 388，л. 35－39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② 1955年4月18日，毛泽东致函苏共中央委员会，请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给予结论性的意见。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准备了这样的结论。1955年5月27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了这个结论，此后连同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一并发出。——原注

№2075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5年5月19日)

1955年5月19日
绝　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鉴定结论”

第120号记录第49项

委托米高扬(召集人)、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而制定的苏联政府计划的鉴定结论，并将自己的建议提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

附件：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不晚于1955年5月19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①

在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交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我们认为，在计划草案中所采取的方向和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生产产品的速度与水平是正确的。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个别领域的计划草案需要作下列说明：

有关工业方面

① 这里很大篇幅用于介绍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略去未译。——编注

一、根据工业燃料部计划草案规定的，转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总生产能力为4 280万吨的新矿井的储备量不能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所需要的煤的开采量。到矿井建设的中期，即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半至四年里，在储备量方面，矿井必须达到一个大的生产能力，来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增长的煤的开采量的需要。

二、应该采用新的探测方法来加强在石油方面的地理勘探工作。在1956年至1957年扩大钻探的深度来超过预定的水平，从而到1957年使勘探的深度达到350千米。研究高速度勘测和使用钻探可能存在的潜力是合理的。

三、在所有的发电站方面，为了在进入下一个五年起作用的生产能力的储备量要达到1.1兆千瓦。

为了在下一个五年的前几年保障正常的国民经济电力供应，在电力生产储备方面合理地规定在1956—1957年的主要工作量，从而使基本的电力生产储备在1958—1959年保证发挥作用。

同时我们认为，为了合理地规定初步计划，使其在下一个五年的前3年的生产能力发挥作用，检查总的储备的生产能力的充足是必要的。

四、由于在中国生铁、钢材和轧材方面生产的不协调将会在近来的3年里使生铁过剩达到大约46万吨，钢材大约78万吨。

同时为了满足特殊需求，计划通过进口获得大量的轧材。

以缩减进口黑色金属的轧材为目的，最好是检查扩大生产轧材的可能性以及放宽轧材的规格来依靠在鞍山钢铁公司和太原工厂的新的初轧车间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利用现有的初轧机和通过小钢锭来补充增加轧材比较好。

五、考虑到铝的意义的提升，因而应合理地加紧氧化铝和铝的生产企业的建设。

六、计划草案在一些机械制造业方面预定了很少的生产产品和利用生产能力低。

这里所说的是应当尽可能地更充分地利用机械制造企业的生产能力，合理预定未来增加生产仪器的品种和开发新的产品种类(专业的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床等)，甚至可以扩展到生产农业机械和农具。为进口的拖拉机组织生产农具，这为后来自身生产拖拉机(作准备)。

七、由于根据制定的计划草案到第五年末在硫酸方面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不协调的，因此应合理地规定硫酸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同时希望研究在生产石碳酸时所消耗硫酸的正常值时硫酸的现有储备。

八、由于必须发展棉纺织企业来保障中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布料的需求(1952年人均生产6.8米，而到1957年则为9.0米)，而且也考虑到棉花资源的局限性，因此应合理建议中国朋友采取措施在棉纺织企业节约棉花(提高中等规格的纱线、扩大棉布的花色品种等)。

以增加纺织原料资源为目的，希望能制定出组织和发展在纤维素基地通过如芦苇、水稻和禾本科植物秸秆、竹子等资源来生产粘胶纤维的措施。

有关农业方面

九、在当前农业产品的生产开始限定在保障口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方面。这其中制定了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在五年内粮食作物的生产总量增长17.6%，或者平均每年增长3.3%，而这并不能保障实现人均增长的需求。

研究增补农业耕地的流通的有关问题，研究扩大灌溉田地的双季种植，通过垦荒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在这地方成立国营农场的有关问题以及研究在垦荒地区更加广泛地采用现代技术(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新的农业机械)的有关问题是合理的。

因为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条件下，在计划草案中所列的一系列农作物玉米、高粱、谷子是比较耐旱和比较高产的农作物，而这些被计划缩减播种面积，将会导致谷物收成总量的减少，所以这样做未必合适。

十、研究专门的措施来保障制定的计划草案中增加农作物的收成是合理的。其中包括，加快矿物肥料加工工厂的建设，扩大农药的生产规模。

十一、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制定在1957年黄麻种植要比1952年减少12%。而由于民主国家阵营对黄麻有需求，因此希望与麻的种植面积一起扩大，建议恢复黄麻种植面积，这里指的就是增加黄麻出口。

十二、茶叶预计增加生产35%，产量达到11.2万吨，这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地提高恢复茶叶生产的速度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的需求和扩大出口量。除此之外，适当地研究改善一些茶叶的等级的措施。

十三、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预定了合作化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易于合作化的农户的数量和每个省每五年的合作化的百分比。制定这样的计划可能导致加速生产合作化的进程和破坏自愿的原则。在五年计划草案中，适当地限制有关进行农户合作化的指令。合作化的水平的制定应根据上一年实行合作化的经验来编制年度计划，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有关铁路运输方面

十四、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和近年来运输大量增长的事实，因此合理地研究有关加大运输任务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

预定到五年结束时缩减资金投入总量将为第二个五年新的铁路建设打基础的建立必要的半成品储备形成困难。有必要检验一下在五年里一些增加铁路运输的资金投入的可能性，这既有加强现有铁路运输网络的作用，又有能投入到新铁路线的建设。

有关基建和地质勘探工作方面

十五、在整个1957年全国的投资总量相对于1956年缩减了3%。投资总量的减少将可能导致在第二个五年建设中半成品储备在无形中下降，而建设安装工程总量的下降又将会导致建设工作的缩减。

有关1956年和1957年的投资总量的问题使得多年的计划更加明晰，因此有必要检验一下在煤炭、钢铁、化学领域的工业、勘探工作和铁路运输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的可能性。

十六、在计划中所制定的勘探工作的总量不足以保障必要的工业矿物原料储备(A2+B等级)的增长并有可能阻碍企业设计所要达到的规模水平。

以协调勘探工作总量为目的，适当地补充审查勘探工作的计划，这其中包括计划增加矿产资源储量的机械钻探。

十七、希望使以依赖增加钻探来确定的煤炭勘探工作以及首先在煤炭匮乏地区的采矿工作的总量更加准确，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及时维护矿井区域。

十八、有关铜和铅的计划预先制定的勘探水平是低的，这不能保障企业的规划和它们的资源基地的可靠性。希望能规定提高勘探水平和增加铜与铅的储备量的A+B等级的任务。

十九、也还希望提高钨、钼、硫黄铁矿储备量的增长，制定勘探工作以增加铌、锆、铍、天然硫黄等矿藏的储备量。

有关国内贸易方面

二十、适当地补充检查规定的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它的商品保障供应，也就是说，在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居民的购买需求之间的充分平衡。商品保障供应的估算应该进行到比较广泛的商品种类方面来。

有关军事工业方面

二十一、由于在所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的材料，也没有关于在战时利用民用机械制造工厂为军事技术生产的材料，因此，不能确定有多少在军事技术方面新建和改建工厂能够满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要求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适当地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共同审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业生产发展前景的问题，从而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在武器和军事技师方面的需求，同时要注意到在战争时期能将民用机械制造厂转为军事技术生产。

附上有关转交给中国朋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

M. 萨布罗夫

K. 科瓦利

决议案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B. 马林

1955年5月19日

РГАНИ, ф. 3, оп. 10, д. 142, л. 14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385, л. 27 - 44

№0994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1955 年 5 月 21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1955 年 6 月 2 日
第 598 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5 月 21 日 15 时 30 分，我拜会了周恩来，向他转交了 B. M. 莫洛托夫与杜勒斯在维也纳关于远东局势问题的谈话材料。周恩来请求就通报情况一事向莫洛托夫同志转达谢意，他还表示，希望苏中两国政府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接着周恩来说，他在万隆时与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会谈。周恩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1955 年 5 月 9 日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已向尤金大使通报过这些会谈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还通报说，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在北京时，主要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谈判。梅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周恩来说，我们方面也制订了关于该问题的反计划。周恩来将这两个计划的文本交给了我，并请求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第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计划

第一阶段：缓和紧张局势

一、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 释放美国空军人员，包括 4 人(费希尔等人)和 11 人(阿诺德等人)，还有多尼和费克图。

(二) 宣传方面的措施。对此梅农没有详谈。我们估计梅农可能指的是减少对美国的抨击。

(三) 发表关于中美可以友好合作的声明。

二、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 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梅农同时建议，中美两国委托第三方具体研究双方侨民的回国问题。梅农还称，印度和英国可以承担这一委托。

(二) 不侵犯中国大陆的领水和领空。

(三) 关于禁运问题的一些措施。

第二阶段：维持缓和的局势

整个这个阶段应持续5—10年。它分两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为“停火时期”，这一时期需要3—6个月。

(一) 中国不进攻金门和马祖岛，不将自己的前线向前推进，即不加强金门和马祖岛附近岛屿上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国和蒋介石也不加强自己在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武装力量，以保证实际的停火。

(二) 通过像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等这样的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影响，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和马祖岛撤出。

(三) 可能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

(四) 中美两国驻新德里和伦敦的使馆建立直接接触，以解决侨民问题、侵犯领水和领空问题、海上交通问题以及“停火时期”有可能产生的其他所有问题。

二、第二个时期——谈判时期

(一) 中美两国谈判。谈判时间：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后6—12个月。谈判地点：最可能的地点是伦敦。苏联和印度等特别有关的国家在谈判期间可以派出自己的顾问。谈判的议题仅限于台湾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基础上，中国同意台湾非军事化；中美两国可以签署互不进攻条约。不过，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撤出还要取决于中国与蒋介石的谈判结果。

(二) 中国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可与中美两国的谈判平行进行，但不在一个地方。可有两种谈判方式：正式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际上将受美国控制；或者非正式的秘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影响，让他们不要干扰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中国同意对台湾当局实行人道主义，不迫害他们，同意台湾在5—10年内自治，同意通过选举在台湾成立民主自治政府，并任命蒋介石为省长。

第三阶段：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5—10年自治期满后，中国对台湾实行控制。

第二部分，我们的反计划

从亚非国家会议后东西方形势的发展看，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外交途径与苏联、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接触，主要是中印之间的接触，努力促进中美紧张关系缓和，使美蒋力量首先从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撤出，然后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谈判。要解决台湾问题，即撤出美国军队和解放台湾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在美蒋力量从金门、马祖撤出以及准备和开始中美直接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有可能进行接触和谈判。但实际上，在我们完成福建省的公路和机场建设之前，在完成我们部队的部署之前，甚至在我们未能解放马祖附近的一两个岛屿之前，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不会从金门、马祖撤出的。至于说中美谈判，它不仅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且即使开始了谈判，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没有任何结果，甚至中美谈判根本不能实现。这意味着，在形势进一步发展的5—10年中，一是由于中国实力增强，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化和中国保证对台湾非

军事化,美国有可能从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这样就能使台湾和平解放;二是美国有可能让出沿海岛屿,换取暂时的没有协议的停火,以保住它在远东的所谓威信,并继续扩大它的武装力量,准备新的战争。

根据形势发展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认为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缓和紧张局势阶段,它包括中国收回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我们估计为此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第二阶段为谈判阶段,这一阶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撤出美国军队,解放台湾;二是谈判出现僵局。这一阶段完全有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停战阶段或者战争阶段。如果谈判成功,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和平状态。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没有进行谈判,那么爆发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谈判过程中出现僵局,那么既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也存在战争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制订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方案如下:

第一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我们积极进行备战和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条件下,我们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我们可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出的话,我们将不对他们进行军事进攻,但是必须保证不强迫岛上的居民撤离,不破坏民用市政设施和人民财产。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撤出军队,那么我们就以武力解放这些岛屿。此外,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如果美国撤离沿海岛屿,那么中国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承认美国占领台湾和存在“两个中国”的局面。

我们也同意中国和美国在对等的原则下各自采取某些措施,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必须声明,这些条件不能视为交换条件。我们主张中国和美国各自采取下述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释放美国飞行员,以迫使美国取消对中国的禁运,这些措施是:

一、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我们起码应当力争使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今后不阻挠海上交通,并压缩对华禁运货物清单。

(二)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建议中国委托印度处理与旅美华侨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有关问题。如果美国也建议由第三国处理在华美国侨民回国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这一建议。

二、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释放美国飞行员。在与梅农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拟表示同意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同时暗示,是否释放其余13名飞行员,取决于美国在其他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取消禁运方面采取的措施。

(二)中国准备接待美国公众友好代表团。

为了准备拟于第二阶段举行的谈判,中国和美国在第一阶段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保持接触:一、中美通过莫斯科、新德里和伦敦保持接触;二、梅农继续在中美两国之间行使调停人职能。

我们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可以有两种谈判。一种是中美两国间

的国际谈判，谈判内容将涉及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而不涉及停火问题，因为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另一种是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的谈判，谈判内容是解决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但是这丝毫不排除在必要时以军事途径解放台湾。中美两国之间最有可能的谈判形式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这样可使美国摆脱蒋介石集团不参加谈判所造成的困难。但是现在我们不打算向梅农谈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肯定的意见。我们可以表示准备研究一切可能的谈判方式，其中包括苏联提出的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至于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能不能实现，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取决于美国在第一阶段的表现。

在双方于第一阶段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后，尤其是在和平解放金门、马祖后，紧张局势会大大缓和，因而谈判的迫切性有可能减弱。但是另一方面，金门、马祖和平解放后蒋介石集团内部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可能增强。因此，过一定的时间，实现中美两国谈判和我们与蒋介石谈判的可能性会增加。我们同意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谈判在不同的地点平行进行。

（一）中美谈判。在这一谈判中我们将提出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武装力量的要求。至于梅农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后的非军事化方案，我们可提出美国武装力量从日本撤走和美国宣布冲绳群岛为缓冲地带的反方案。但是我们在和梅农的谈话中不应涉及这一反方案，只是谨慎地试探这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谈判地点可以是新德里、仰光、万隆或者日内瓦，但不能是伦敦。

（二）中国和蒋介石的谈判。在与梅农的谈判中必须再次重申这一谈判的内政性质，但是应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力求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时，我们希望研究对蒋介石和台湾的待遇措施，不过，我们只能同意台湾为一个省，而不是一个自治区。

梅农在与我们会谈时的策略是：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让我们同意第一阶段的计划措施，尤其是同意规定我们首先释放美国飞行员的那些措施，但是回避具体讨论其他阶段的计划措施。我们的策略是：先与他讨论前景计划，尤其是比较详细地摸清他对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全部武装力量这一问题的意见，然后再提出我们的缓和紧张局势方案，只是在会谈的最后才通知他，我们同意在一定的时间内释放 4 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这将是梅农在以后调停活动中的资本。

然后，周恩来对以上文件作了口头说明，并请求将这一说明通报莫洛托夫同志，他的口头说明如下：

（一）与梅农的谈判是根据 3 月给 H. C. 赫鲁晓夫的有关电报中阐述的方针进行的。

（二）中国政府在与梅农会谈时没有披露它解决台湾问题计划的详细内容。计划中的几点是含糊其词地对梅农讲的。

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时，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台湾问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但是我们对梅农说，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他关于台湾问题将在 10 年内解决的建议。中国政府提出不同意的理由是：在这 10 年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在大选中被更换，此外，美国会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我们对梅农声明，中国主张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周

恩来说,我们明白,解放金门、马祖后将有一个很长的解决整个台湾问题的时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军队。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蒋介石集团的内部情况和美蒋签订的条约。

(三)在与梅农谈判中,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了采取旨在缓和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状况的措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向梅农声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以下步骤可以作为这样的措施:中国方面释放美国飞行员,美国方面取消或者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禁运。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拟于5月底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对他们的指控仅是侵犯边界,而不是进行间谍活动。周恩来开玩笑说,美国政府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手段解救这些飞行员,替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向中国政府说情的有:哈马尔舍尔德、艾登、尼赫鲁、泰国外长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代表,甚至艾森豪威尔就一名苏联中学生"越境"进入西柏林一案给朱可夫元帅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些美国飞行员。

(四)我们向梅农指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从金门、马祖撤出它的军队,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临时停火,给国民党军队提供能够撤退的机会。但是,这不能认为是实际停火。梅农称这是中断军事行动阶段。

(五)为了准备与美国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通过苏联、英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一般外交渠道的接触。中国政府还同意之后建立中美驻莫斯科、伦敦和德里大使间的直接接触,或者中美驻这些城市大使馆参赞间的直接接触。中国政府认为,B. M. 莫洛托夫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时可就台湾问题与美国官方人士联系。

(六)我们在与梅农会谈时强调指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应是中美谈判的主要目的,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在万隆曾经声明过。关于这一谈判可能采取的形式问题,我们向梅农指出,中国政府支持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拒绝其他形式的谈判。

(七)我们对梅农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这一谈判直接取决于美国军队是否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周恩来说,美国政府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有可能背着美国达成协议。周恩来说,为了不使美国打消这种怀疑,原国民党政府的所有知名人士都应邀参加了为梅农举行的招待会。梅农对这一情况十分关切。

(八)在与梅农谈判时周恩来表示,希望他(梅农)回到印度后向艾登和加拿大外长皮尔逊通报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内容。梅农向中国政府保证说,这些人士会支持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还说,现在希望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人越来越多,相反,主张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人越来越少。梅农称,美国官方人士中有人说,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时代,台湾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梅农还谈了这样一种看法:美国支持蒋介石,但同时并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自己收复台湾的要求。据他的看法,美国有人认为如果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故,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同意停战,条件是蒋介石留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宣布台湾为非军事化缓冲地带,这样一来,台湾问题就会解决,美蒋条约就会失效。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不相信梅农的这些话,实际上他反映的不是美国的观点,而是英国和印度的立场。

周恩来说,日本代表在万隆也说过与梅农这番话意思相同的话,他们称,摆脱目前状况

的最佳出路是台湾和中国联合，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关于日蒋条约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了。

周恩来最后说，在与梅农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已经深信，印度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应当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正如与梅农的谈判所证实的那样，印度人主张台湾问题有待长期解决。至于说美国，它坚持保留“两个中国”，不同意台湾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比较偏向于美国一边。

周恩来将哈里·波立特①的讲话记录交给了我，要我转发给苏共中央。

周恩来还将一些中国朋友的一封信交给我，也要我转给苏共中央。

我将关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口和大连联合公报草案转交给周恩来，并告诉他，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希望于 5 月 26 日在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上同时发表这一联合公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助理何伟、使馆二等秘书 Н. К. 切卡诺夫和翻译马列。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Я. 罗迈进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8, п. 394, д. 11, л. 125 - 134

№13429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

(1955 年 5 月 23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6 月 16 日

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 年 5 月 23 日

今天 19 时 30 分中国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

---

① 哈里·波立特(1890—1960)，1929—1956 年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文件中所指其讲话记录，内容不详。——编注

相互问好后，黄镇通知我说，5 月 25 日他将偕同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邀前去访问中国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所率领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一起飞往中国。

大使接下来通报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组成人员。除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及其夫人外，列入代表团成员的有：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及其夫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阿尔诺利德·莫诺努托、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欧和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国家计划局主席拉登·朱安达和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司副司长哈尔索诺·列克索阿特莫佐。列入代表团成员的还有 2 个摄影记者和 5 个记者——“安塔拉”通讯社、执政党的报纸《宾坦·铁木尔报》(人民民族党)、《杜塔·马沙拉卡特报》(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苏禄报》(国民党)和进步报纸《印度尼西亚别里塔报》各派一个记者。包括总理的医生、私人秘书和副官在内，代表团的总人数一共是 19 个人。

在谈话过程中，援引一些出现在报刊上的报道后，我问大使，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出面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大使回答，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还补充说，这是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意向中的一个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打算是想要中国给予印度尼西亚以财政和经济上的援助。

黄镇继续说，现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而且并不排除这次危机甚至可能会导致内阁辞职的后果。指出支持政府的那些党中间的缺少协调，特别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对政府政策的严厉批评后，大使援引了三个依他之见是有损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稳定性的因素。

第一，国家的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黄镇说，当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上台执政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已经是摇摇欲坠的了，政府无法使财政情况得以巩固，相反，它继续在恶化。国家预算的特点是存在着巨大的赤字。按大使的话来说，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请求印度尼西亚银行向政府提供 25 亿卢比的贷款，以便平衡国家预算。

第二，居民不满意，因为政府无法因伊斯兰教“勒巴兰”节①的来临而保证向居民供应纺织品(按照宗教传统，伊斯兰教徒在这个节日之前会购置新衣服)。这一情况被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用来攻击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

第三，不久前的燃料涨价导致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引起了居民的不满。按黄镇的话来说，燃料涨价的措施是财政部长朱安达提出来的，目的是想要一年多收到 5 亿卢比。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为了确保处于政府管辖之下的汽车运输业的用油，政府自己就应该缴纳这笔款项的 50%。

我说，从提高燃料价格中获得好处的是那些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石油工业的外国公司。然后我补充说，财政部长朱安达虽说是国民党党员，但根据他的观点来看却是与“马斯友美”

① 即开斋节。——编注

党非常相似的，所以提高燃料价格的措施或许是他为了破坏政府的威信而故意采取的。大使同意我说的意见。

给财政部长做鉴定时，黄镇说，朱安达收受西德公司的贿赂，因此后者享有他的特别关照。大使为此还把下面那件事拿来作为例子：财政部长制止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实施的日惹糖厂的建设工程。

黄镇指出，反对派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困难重重之机正在竭力反对政府，这样做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即将举行普选了。

接着我问大使，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否全都回国了。

大使回答，大家全都顺利地抵达了。他补充说，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原本希望一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会乘 5 月 5 日起航的轮船离开印度尼西亚。它怀着这一目的把轮船的一部分指挥人员招徕到了自己一方，并与一艘正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的美国航空母舰建立了联系。特务机关希望在公海上截住轮船，劫走船上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把他们送到台湾去。然而，它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因为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乘飞机回到了中国。

黄镇接着告诉我，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使者赛义德·哈桑·法基对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大使也对他进行了回访。按大使的话来说，在与使者谈话时，后者说，沙特阿拉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伊萨尔王子想要访问中国，如果他得到中国政府发的邀请，他一定会访问中国的。大使补充说，他已经发电报向北京汇报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黄镇说，泰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琅·拉塔纳迪布不久前在一个招待会上第一次走到他面前，并同他握手问好。

我说，在万隆大会以后，中国在亚非国家中间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有鉴于此，我向黄镇通报了我与荷兰的商务参赞卡托尔的会谈情况。

黄镇问我，买用作大使馆的房子的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我已经买了一幢房子，而其余的两幢房子将在 6 月初买下来。

大使对我说，他已经买了一幢供军事参赞用的房子，现在正在物色一些供自己用作私人府邸的、供商务参赞和大使馆情报部门用的房子。他补充说，大使馆职员共同驻扎在一个地方会给开展工作造成许多不便。

谈话结束时我对黄镇说，我一定会到机场来送他的。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林利阳(Линь Ли-ян)、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1, оп. 11, п. 8, д. 4, л. 15－18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

（1955 年 5 月 25 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6 月 17 日

绝 密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纪要

1955 年 5 月 25 日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 5 月 23 日给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信件的文本。毛泽东对这封信和来自苏联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说，这些措施是原则性很强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委员会送来上述信件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党内性质的问题。关于反动人物胡风的行为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清楚，胡风是反动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曾经获得来自国民党或日本秘密机构的支持。毛泽东说，胡风 1925 年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年，胡风告诉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陈毅说，他从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困难很大，也很危险。那时，胡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荫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与云南军阀的部队在一起。这些军队名义上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们在云南省独立行动。在那里，胡风负责政治工作，身居云南部队政治指挥部门要职。① 国民党两次逮捕过胡风，不过他很快便重获自由，他对此解释说是他逃了出来。在日本政府严厉压制进步势力和人士的那段时期（1928—1937 年），胡风在日本。②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白桦子（中文发音）——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易边（中文发音）即胡风的妻子。③毛泽东暗示，在这个时期，胡风可能参加了国民党或日本的秘密机构。

目前对胡风的斗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对他展开的持续调查表明，在一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工作，胡风过去有、现在还有他的代理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他的支持

① 1928 年 2 月胡风经人介绍在滇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处任科长，任职不到一个月，因不愿宣讲“三民主义”而被撤职。——编注
② 胡风于 1929 年 9 月到日本，因宣传抗日于 1933 年 6 月被驱逐回国。——编注
③ 原文如此。——编注

者，他的一名主要顾问在北京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系当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主编也是他的支持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他都有代言人，这些人过去（现在仍有一些）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战线工作。据我们估计，在胡风的比较有名的支持者中，有200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人。胡风及其支持者控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比例可能达5%。在我们呼吁胡风的支持者承认错误，站到党一边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胡风的一些不寻常的支持者，在党的面前认罪后，却跑到胡风那里忏悔，声称他们的坦白认罪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应该这样做：或者融入党内，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最近党员干部的坦白中，有35万党员（在700万中共党员中）被审查出有罪，他们反党反人民，道德败坏，或受某野心和其他动机驱使而入党等。然而，党内仍存在一小撮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在展开。所有的这些证明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利用胡风及其支持者的例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进一步谈到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反党行径中采取两手策略。高岗这人没有道德，企图夺权。高岗在他的支持者中说，毛泽东周围已产生两个不值得信任的集团：一个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另一个则由周恩来领导，包括很多人。另一方面，高岗却说，要公开反对这些集团来捍卫毛泽东。

毛泽东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8次晚场舞会：什么时候他想要跳舞，他就下指示召集女人。毛泽东提到高岗在政治上非常无耻。他说，高岗与一个幕后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高岗让张明远作为他和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张明远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张重新获得党的认可，并进入党校接受再教育。在东北解放后，张被高岗调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高岗在捷沃相同志访问中国期间，寻找各种手段要参加捷沃相同志访问东北的行程，尽管当时中央已经派李富春陪同捷沃相同志。由于李富春感冒病倒，高岗得以与捷沃相同行前往东北。我回应毛泽东说，我也与捷沃相同志前往东北，可在行程中，高岗只和我们谈过两次话，谈话主要是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接近我们。

毛泽东提到高岗与捷沃相同行这个问题后，明显暗示高岗想要亲近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政府要员，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信息。

毛泽东说，饶漱石曾经从事地下活动，为国民党和外国秘密机构服务，而同时在党的面前假装忠诚。潘汉年与美国的、日本的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联系，饶漱石就插手任命他做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一切情况。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于1950年1月至2月送到台湾。苏联的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地区的消息就是由潘汉年传给台湾的。在潘汉年的要求

之下，国民党的飞机于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由于潘汉年为蒋介石集团所做的贡献，他四次获得蒋介石的授勋。关于这些授勋的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证据已经掌握在中国相关部门的手中。

毛泽东说，1953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年12月24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其中一个行动公开、为克服困难奋战；而另一个指挥部则行动诡秘，利用困难向正式的指挥部——党的中央委员会发难，并散布各种谣言。据毛所说，当时他并没有点出该地下"指挥部"领导人的名字，但在那次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显得十分沮丧。如毛所说，当他们听到宣读贝利亚反党行径的资料时，垂头丧气。

转到国际问题上并提到梅农①访问北京一事，毛泽东说，在梅农访问北京10天的过程中，梅农谈论到中美就台湾问题直接谈判的问题。梅农会见了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根据预先商量好的，中共的政府官员向梅农做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回答。一些政府官员给梅农的答复让他感到很乐观，而另一些人的答复则让他感到十分悲观。比如，朱德就宣布"如果美国人想要战争，那我们将奉陪到底"，这让梅农战栗不已。中方向梅农讲述了中方在中美直接谈判的态度问题上的一些大体情况。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有意充当中间人的国家得知了告诉梅农的一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除了印度，那些有意充当谈判中间人的国家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梅农被告之，印度将被优先考虑作为谈判的中间人。毛泽东说，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印度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在北京听到的一切告诉英国人。毛泽东提到，(英国首相)艾登自己想从新加坡赶到中国作中美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在曼谷会议后，中国在对艾登访问北京的提议的回复中，故意说艾登可能拒绝来华。中国政府给出这样的答复，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而艾登从新加坡和从伦敦(从新加坡返回到英国后)分别发给中国的两封信中，基调彼此相差甚远。从新加坡发出的信件中，艾登恫吓中国，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而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则没有这样的恫吓。目前，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还是有点差别的。

毛泽东还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飞往北京的事。他说由于担心在香港引起众怒，印尼总理没有在香港停留而直接飞往广东。

此次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师哲和T. Ф. 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Ф.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3，д. 9，л. 107－112

① 这里说的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克里什南·梅农。——编注

№10148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

(1955 年 5 月 27 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同志并将拉夫里谢夫同志与范文同同志今年 5 月 23 日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内容另电发给您)。

请通知周恩来同志，就说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达成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的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以有利于进行 1956 年 7 月的普选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准备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南越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保证法国企业能在越南领土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之间的协议范围内无阻碍地活动。

至于涉及诸如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的联邦，其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南越保留一段时间部分法国远征军的问题，那就要劝告越南朋友，当谈判过程进展到彻底弄清法国人关于协议条件阶段时再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因为，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显示的，法国人自己是不会提出关于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的。

请告诉周恩来同志，莫斯科想知道中国朋友对上述考虑的意见。当我们得到中国朋友的答复后，将指示苏联驻河内大使把我们的考虑通知越南朋友。

谈话结果电告。

АВПРФ, ф. 079, оп. 10, п. 9, д. 8, л. 28

№10196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

(1955 年 5 月 28 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越南朋友请求就他们关于越-法关系的初步考虑发表我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已拟

订了为回答越南朋友给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的指示草案。

苏联外交部认为就此问题预先与中国朋友协商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①

请予审议。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28日

第820/M号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

№10147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

(1955年5月28日)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向他通报以下内容。

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为了在1956年7月举行普选,准备与法国人达成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将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越南南方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并保证他们的企业可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他们与越南签订的协议的范围内,在越南领土上无阻碍地经营。

至于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联邦,在这一联邦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越南南方保留一段时间法国部分远征军的问题,请建议越南朋友在谈判过程充分弄清法国人关于达成协议条件的立场之后,再回头来研究。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出发点是,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所显示的,法国人自己不会提出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

请关注越南朋友就此问题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还能坚持多久。

电告谈话结果。

АВПРФ,ф.79,оп.10,п.9,д.8,л.29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作为附件的决议草案,可参见以下№10147,但不能确定这就是该附件。——编注

№11440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

（1955 年 6 月）

附件一
机　密

关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①]

与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注意向越南朋友在其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际地位，在民主和完全履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基础上统一越南，迅速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的事业中提供援助。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自日内瓦协议签署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实现日内瓦协议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执行协议的军事条款，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表示满意。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强调，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斗争一贯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团结的感情，并宣布，苏联政府将与中国朋友一起，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独立和统一国家的斗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给予必要的援助。

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某些问题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执行日内瓦协议

指出协议关于实现越南停火的军事条件已经胜利完成。同时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准备全力动摇越南民主共和国准确执行日内瓦协议的政治部分——1956 年 7 月准备举行全面选举，1955 年 7 月 26 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当局代表协商会议，讨论准备选举的有关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在即将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打算提出几个大国必须支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依据日内瓦协议，政治解决的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了解越南朋友准备的“关于在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党的总路线、策略和政治纲领的口号”。它认为，这些口号中所指出的在南越斗争的目标和策略总体上都是正确的。

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打算为在南越成立政府而斗争持肯定态度。政府的任务是执行日

---

① 所收集的档案是某文件的附件，未标明文件时间、作者和呈送对象，其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内瓦协议,举行全越南选举。

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关系有关的问题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打算在南越尽可能与法国人和亲法国分子建立更加广泛的反美联合阵线给予积极评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政府为此目的而制定的一些措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保障法国企业和种植业在南越的活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进行文化合作。

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越南朋友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社会和实业界人士的联系。

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拟发表声明,为了便于统一国家,在南越统一之后,有可能保留某个时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经济、慢一点实行民主改革的共和制度)。这样做是否合适?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与北越的速度相比,就策略上考虑在一定时期有所减慢,原则上是允许的。

三、关于反对美国的印度支那计划

由于美国针对印度支那国家的行动是破坏日内瓦协议,要发表意见,必须建立印度支那进步力量的广泛阵线,进行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国家事务的斗争。应当强调,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朋友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对南越所有阶层居民的工作,抵制美国的影响。建议广泛地利用印度支那宗教流派。考虑到宗教界领袖人士对美国傀儡吴庭艳政策的不满,要加强他们的反帝,首先是反美情绪。

四、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柬埔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强调老挝政治解决最正确的途径是王国政府与寮国直接谈判、互相让步。

考虑到1955年5月16日美国和柬埔寨缔结的军援协议明显对抗日内瓦协议,受到柬埔寨某些政治集团的反对。建议越南朋友采取措施,组织柬埔寨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军援协议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违背印度的利益,建议采取措施,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反对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扩大影响。

希望越南朋友们考虑以上所指出的形势,并从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形势出发,加强对这些国家民主力量的工作。当然,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行动,即为别人提供口实,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违反日内瓦协议。

五、关于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广泛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与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并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闭幕公报第一章第11节——建议各国政府向该会议的参加国派出代表,交换信息,千方百计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六、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联系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及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在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越南同志更应当经常地求得中国朋友的协商并征求他们的建议。主要考虑是中国朋友更了解越南的形势，越南政府现在致力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不久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立苏-中经济和军事使团，那就可以向胡志明解释这一做法欠妥。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越南和中国朋友合作机制已经形成并且行之有效。

当然也不排除，苏联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

七、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将拥护越南和平、统一和独立纲领的各阶层居民团结起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给予积极评价。不仅在解放区，还应在南越，依靠成立民族统一战线新组织的方法使其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提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广泛地使用统一祖国的思想是适当的。建议胡志明同志考虑成立群众性的为越南统一而斗争的组织是否适当，有无可能这一问题。该组织能够吸引南方和北方广泛的爱国和民主力量，同时在形式上与民族统一战线又无联系。从策略上看，成立这一组织的倡议应由南方提出，首批这样的组织先在南方成立较为有利。

八、关于土地改革

发表这样的意见：进行土地改革，是在民主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斗争胜利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对劳动党关于在1956年7月的选举前结束土地改革的决议表示欣赏。告诉越南朋友，劳动党中央关于进行土地改革有可能将越南大多居民团结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周围、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想法与我们的意见吻合。

九、关于天主教徒撤至南越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将天主教徒从越南北方撤到南方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也许越南朋友最好不要阻挠个别的后撤事件，即使是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敌对宣传，称在难民问题上搞投机。我们认为，与此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当致力于与南越当局，在居民从南方撤到北方问题上求得类似的解决方法。

建议越南朋友在天主教徒中间多做解释工作，对天主教会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对抗敌对势力在天主教徒移居南方问题上的宣传。

苏联关系问题

1. 关于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

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需要迅速恢复，苏联政府在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之后，决定提供无偿援助，在1955—1956年使用3亿

卢布,恢复共和国的经济,根据越方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将3亿卢布用于:

1.25亿卢布用于恢复和建设25个工业和公用企业,其中包括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年产10万吨的超大型磷酸盐厂,年开采能力6万吨的黄铁矿,年产3 000部各种机械产品的机械厂,总发电量18—22.5千瓦的发电厂6座,2个鱼类罐头厂和2个茶叶厂。

列入以上项目开支的还有通过派遣苏联专定给予技术援助的费用。专家们将从事地质勘探工作,沙眼、疟疾等疾病的防治,组织气象水文部门及其他援助。

1.25亿卢布用于提供国民经济和居民急需的商品。

5 000万卢布留作备用,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货。

同时应当通知胡志明同志,下列协议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1) 关于苏联提供无偿援助,恢复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协议;

(2) 关于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支付条件的协议;

(3) 苏联和越南政府就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条件的协议。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草案,那就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A.И.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个协议。第二、第三个协议,由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K.И.科瓦利同志签署。

2. 关于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已经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署贸易协议。贸易协议的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3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为此,苏联政府愿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苏联商务处。关于这一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于今年5月18交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那就请他发指示将其签署。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И.Г.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议。

3. 关于向越南人民军提供物资和提供贷款

通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同意向越南人民军提供所需的物资和用品,决定为此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在1955—1956年使用的长期优惠贷款3 000万卢布。其优惠条件是:只偿还提供产品的一半价格,年息2%,从1960年开始分8年还清。通知胡志明同志,如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苏方将授权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K.И.科瓦利同志签署有关备忘录。

4. 关于提供在苏联训练越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援助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1955年苏联的教育机构可以收300名越南公民。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由无偿援助费支付越南大学生1955—1956年的学费,可以同意这一要求。

5. 关于俄语顾问的教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从苏联派遣 6 名顾问，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学校组织教学，还同意派遣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5 名大学俄语教员。

6. 军事问题

由于胡志明同志要求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给予援助并为此而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会议，可以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这种援助，并按以下程序实施该援助：

(1) 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会同中国军事顾问，制定出初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必要时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给予帮助。

(2) 苏方向北京派遣 2—3 名担负领导职务的苏联军事专家，与中国和越南军事干部一起讨论在越南准备的初步国防计划。

7. 关于联合公报

就发表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公报需阐述苏越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国保持和巩固和平的愿望，执行日内瓦协议的重要性，特别是涉及政治解决印度支那和平的部分，还要提到苏方为恢复越南经济提供的经济援助，苏越贸易协议等。

АВПРФ. ф. 022, оп. 8, п. 117, д. 30, л. 12 - 21

№23054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

(1955 年 6 月 1 日)

致苏共中央：

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中共组织书记任友(Жень Иё)同志和中国新民主青年联盟组织书记王……①，以中共党组织全体大会的名义正式地发出如下请求，责成高校苏共党委会对各高校内的中共党组织实施领导，并将中共党员分配到各系相应的苏共党组织中，从而使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能够直接参与高校党组织的工作，并在其监督之下学习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中国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已就此问题达成既定协议。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人名字迹不清。——译注

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有 1 183 人,其中中共党员 482 人,中共预备党员 96 人,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 577 人,无党派 28 人。

目前,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已组成了统一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并归中国驻苏联使馆大学生司属下成立的中共党委领导。中国使馆下属的该党委与中国大学生各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并及时了解其活动情况。

1954 年初,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曾请求苏共中央研究关于将由在苏联各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组建的中共基层党组织,移交苏联各高校和技术学校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苏共中央研究了该问题,并于 1954 年 4 月 17 日通过如下决议:"满足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建立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党组织,并委托各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党组织机关)履行联系和帮助这些中共党组织的职能。

各高校和技校党委应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解决与学习有关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吸引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去完成个别公共义务,向其解释苏共的国内外政策,邀请其参加公开的党的会议,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苏共中央在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中确认了上述内容,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提请苏共中央研究关于把由在苏联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共党组织,转交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请通知刘少奇,苏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并已责成苏联高校和技校党组织肩负如下职能:联系和帮助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基层党组织,给予实际帮助以解决中国大学生学习方面的相关问题,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但是,从苏共中央的上述决议中还无法得出如下结论,即关于同意将中共党组织转交苏联高校党委直接领导。

我们请你们向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内的中共党组织书记任友通报这一情况。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И. 赫利亚彼奇(签名)

1955 年 6 月 1 日

第 25 - c - 1167 号

手写批注:

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已经同建筑学院的党委书记及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商谈过。

И. 赫利亚彼奇,1955 年 6 月 14 日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282,л. 23 - 24

№1019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

（1955 年 6 月 7 日）

B. A. 佐林同志：

回复第 551//ЮВА 号电。

在河内建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问题，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中已有中国军事顾问，他们熟知这个国家及其军队的特点，在武装力量建设、军队的训练和教育等问题上具有援助越南同志的长期经验。

至于说到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军队训练的援助，那么越南同志永远都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获得我们必要的建议，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

大将安东诺夫

1955 年 6 月 7 日

АВПРФ，ф. 079，оп. 10，п. 9，д. 8，л. 32

№13433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

（1955 年 6 月 12 日）

拜访中国大使馆别墅

1955 年 6 月 12 日

今天早上，在中国人的多次邀请下，我与大使馆的秘书 M. A. 克罗帕切夫同志和商务参赞部门的工程师 H. E. 博加蒂同志一起，带着我们的妻子到了中国同志们的别墅。别墅位于

离雅加达100公里远的山区里。我们在别墅里受到了我们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在那里待了将近5小时。

原以为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杨琳这一天会在别墅里的。因此我请了博加蒂同志与我一起去了。然而,商务参赞这一天并没有在别墅里。

中国代办钟庆发告诉我,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出访中国期间,陪同他的5名印度尼西亚报纸的记者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还将像他所推测的那样做大量的工作。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传播、介绍中国发展情况的真实报道,对大使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写了一些介绍此行情况的优秀的报告文章,并且根据他(钟庆发)的情报来看,他们打算发表一系列较为像样的作品来介绍自己中国之行的感想。

我说,想必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和此行所带来的那个成果,将会在目前已进入关键阶段的选举运动中大大地有助于他(总理)的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钟庆发同意我的见解,并指出,按照他们的观察,一些主要的反对党——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在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顺利地举行过万隆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后,正在大大地丧失自己的作用。这一点是可以看得出的。钟庆发继续说,即使是根据下面这种事实来看也行:许多长期置身于马斯友美行列之中的政治活动家现在都竭力想要退出这个党并加入到别的亲政府联盟的随便什么党里去。

钟庆发把外交部参赞苏巴尔佐的行为作为例子举了出来,后者前不久还是马斯友美党的党员,而现在已转入了“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按黄镇的看法,苏巴尔佐只是出于要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行列中,并事先得到被委任担任国家的某一职位的机会的愿望才这样做的。

我向黄镇转达了我昨天与苏巴尔佐的谈话(参阅1955年6月15日的第217/c文)的一部分内容,那一部分讲的就是:他(苏巴尔佐)说,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并且打算凭独立人的身份参选立宪大会的会员。对于这一点,黄镇说,苏巴尔佐是个反复无常的大政客,他很了解苏巴尔佐的政治面目,所以可以向我保证说,在昨天与我的谈话中,关于自己的政治归属问题,苏巴尔佐肯定是说谎了。

代办并没有多谈细节,只是告诉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观察得到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有一种逐渐扩大的趋势。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1-2

№08862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

(1955年6月15日)

机　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为学习苏联本土防空经验，中国政府请求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防空学院学习，学习期限2年。

第一批学生(22名学生、3名翻译、2名机械师)拟于1955年7—8月派，第二批30人拟于1956年8月派。

学生学习费用，中国政府将根据1952年8月9日签署的苏中关于中国公民到高等地方院校学习的协定支付。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政府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受中国52名学生到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请求。

附决定草案。

请审阅。

C. 克鲁格洛夫

A. 葛罗米柯

附件：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机　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决议草案(附后)。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5 年　第__号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 1955 年和 1956 年接收 52 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本土防空学校学习事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按照苏中 1952 年 8 月 9 日关于中国公民到苏联高等地方学校学习的协定,接收中国 52 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其中 1955 年派 22 人,1956 年派 30 人。

二、满足中国政府关于随同本决议第一条所指留学生,一起派 3 名翻译和 2 名机械师来苏的请求,但指出,此 5 人到苏联的费用由中国方面承担。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65,л. 102 - 104

№08861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

(1955 年 6 月 15 日)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现正在莫斯科的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率领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于今年 6 月 3 日按照苏共中央所预定的计划,参观了莫斯科州内务局布特尔斯基监狱。

布特尔斯基监狱满额为 3 000 人,是审讯监狱。现在监狱关押受审讯犯人 1 660 人,已判刑犯人 140 人(在狱中进行生产劳动)。

监狱为 3 层石结构楼房,建于公元 1800 年,卫国战争后重修,设施齐全,状态良好。

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蔡学舟同志,中国司法部办公厅主任王怀安(Ван Хуай Ань)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何兰阶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林亨元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厅长王立中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王战平(Ван Чжан Пин)同志,中国司法部宣传司司长王汝琪同志,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毛铎同志，华东政法学院教研室主任曾汉周同志，中国政法学会《政治研究》杂志主编郭纶同志。

他们在8名翻译陪同下于上午10点来到布特尔斯基监狱。

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到监狱长办公室，应代表团团长的请求，给他们介绍了布特尔斯基监狱的一般情况，介绍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作为审讯监狱的任务以及所押犯人的生活条件。

然后代表团成员表示愿到监狱里面看看，观看一下主管人员认为可以给看的一些监狱勤务。

给中国法律工作者看了监狱接收处，那里正在对被捕的犯人进行接收和遣押工作，办理犯人文件手续；他们还参观了卫生站和监狱医院，而且顺便还到几个病房看了看。卫生站长和布特尔斯基监狱的一名外科医生还介绍了监狱的医疗组织和总的卫生工作状况。

然后代表团参观了食堂，那里正在给犯人做饭。代表团成员对犯人伙食很感兴趣，尤其是看到了犯人的菜肴各式各样，饭食质量很佳。司法部长史良同志还亲口尝了尝，对饭食表示满意。

参观了食堂，中国法律工作者又观看了3个关押受审犯人的房间和5个关押判刑犯人（在监狱内服刑做工）的房间。

代表团成员提了以下问题：

“他们能否同亲属见面？”

“能否收到亲属转来的东西？”

“被判多长时间徒刑？”

……

对提出的问题犯人们都有礼貌地作了正确的回答。

随后代表团成员们观看了审讯办公室和监狱犯人图书馆，内有藏书12 000册，主要是文学作品。应代表团成员的请求，图书馆主任介绍了犯人们借阅图书的程序。

观看了犯人散步、关押和做工的院子之后，代表团来到警卫人员俱乐部休息喝茶。

在喝茶时，代表团成员又提了许多问题，如苏联的监狱是否一直在内务部管辖之下；监狱管理机关同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机关相互是什么关系；按照什么程序解决这些机关同监狱管理机关间的相互要求。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会谈之后，代表团成员在俱乐部观看了电影。

最后，史良同志给陪伴代表团的监狱工作人员每人赠送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

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的有苏联内务部、检察院、司法部和对外文化协会的负责人。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 克鲁格洛夫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65，л. 86－89

№21429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

(1955 年 6 月 17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我们协助收集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期间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 1928 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 1929 年 9 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同时大使馆请求通报一下邓中夏儿子的所在地，邓中夏的儿子出生于 1928 年 5 月或 6 月，他和刘瑾(Лю Дин)、黄斌(Хуан пин)、曹元(Цао Цюань)和夏景光(Ся Цзинь-Гуань)的儿子一起被送入红色工人国际儿童院。邓中夏儿子的名字叫董斯蒂尔(Stell Don，董吉，Дондик)，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Ли Гуй-синь)，原名夏明(Ся Мин)。

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备忘录。

A. 葛罗米科(签名)
1955 年 6 月 17 日

第 256 号

附件：

中国大使馆请求：

协助提供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 1928 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1929 年 9 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如果能找到上述材料的手稿，中国方面将表示感谢。

邓中夏的儿子生于 1928 年 5 月或 6 月，他有一个英文名字董斯蒂尔。1929 年 3 月或 4 月被送入红色工会国际儿童院。他的教导员管他叫董吉。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刘瑾、黄斌、曹元和夏景光的儿子。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原名夏明。

1955 年 6 月 9 日
于莫斯科

文件目录
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

1. 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17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2. 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5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东方殖民地分部会议上的发言)

3. 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工人运动。(报告提纲,1929年1月)

4. 上海黄色工会的末日。(论文)

5. 广州起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术。(论文)

6.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的关于红色工人联合会代表的工作的报告。1928年5月28日。

7. 中国农业工人联盟的组织问题。(论文)

8. 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提纲,为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准备,1929年。

9. 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工会运动。

10. 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会运动历史的小册子。

11. 1930年邓中夏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上报告速记记录：关于中国工会和游击运动以及托派分子等一系列问题。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83－85

№13434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

(1955年6月2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7月6日

第236/с号

机　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钟庆发

1955 年 6 月 22 日

今天 12 时 15 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临时代办钟庆发参赞按预先约定访问了我。

代办说,他是来为自己无法接受我的赴宴邀请而当面道歉的,因为他今晚没空。

我在谈话时说,据报刊的报道,各党最近都在加紧展开旨在建立党的联盟的活动。尤其是,我指出,一些伊斯兰教的党不久前作出了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要相互攻击的决定。我补充说,由于今年 9 月底即将举行普选,所以这项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马斯友美党来说。我问钟庆发,他对马斯友美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立场和机会有何看法。

钟庆发说,雅加达市里一度流行过一些传言,说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访中国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全体人员将会进行改组。根据这一改组可以想到,共和国的总统将会解散内阁,此后国会也将会宣布自己的解散。钟庆发接着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之间举行过一次会晤,会晤时讨论了因即将来临的选举而进行合作的问题。

我说,不久前报纸上报道过这次会晤的消息。接着我补充说,报刊上刊登过关于新内阁人员组成的几种方案的报道。我又问钟庆发,各政党对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机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回答说,现在共产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是拥有最大影响力的主要的党。马斯友美党在西爪哇和北苏门答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则在东爪哇和中爪哇以及巴厘岛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钟庆发说,在他从日惹(中爪哇)出行到泗水的时候,他几乎只看到共产党的选举标志,并且很少看到国民党的选举标志。

我补充说,据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声称,该党期望得到新国会的全部席位的 40%—50%。

钟庆发告诉我,在与一位具有进步思想情绪的国会议员——国会副主席(他就是基督教的帕尔金多党[1]的主席)坦布南的谈话中,后者对他说,如果反对党在选举中获胜,那么重新组成的政府的地位将是不牢靠的,因为反对派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国内现存的困难,特别是该如何解决杜绝武装匪徒的活动和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接着我援引了以前与钟庆发有过的一次关于马斯友美党在国内的影响正在日见衰落的谈话,这是与他今天关于这个党有机会获得 40%—50%的票数的声明有点相矛盾的。代办回答道,他是在向我转达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实际上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现在还很难说。

然后我请钟较为具体地向我说明,伊斯兰党派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以前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我指的是这些党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进行相互攻击的约定又是什么意思。

钟庆发说,现在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并答应在收到关于该问题的消息后就向我通报。

接着钟庆发告诉我,他已向教育文化部长亚明转交了请他于今年 8 月中旬访问中国的邀请

---

① 帕尔金多(Parkindo),印度尼西亚基督教政党,1950 年建立。——编注

信，后者同意了这一邀请，并收下了邀请信。亚明在举行会谈时说，他想随身携带自己的夫人和20岁的儿子，因为“他们留在家里是无人陪伴的”。因此钟庆发只好也邀请了他的一家人。

我问钟庆发，亚明想访问中国的愿望是通过谁说出来的。他回答说，这个愿望是通过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托转达的。

我说，亚明形式上是个无党派，但他似乎是接近“穆尔巴”[①]的。钟庆发对此予以肯定，并补充说，亚明写了一本书，但它并没有被准许放到市场上去出售。我问，为什么书不准放到市场上去出售。他回答说，上述书籍是献给在1948年的战斗行动时被打死的托洛茨基分子坦·马拉卡的。他补充说，亚明在自己的书中高度颂扬坦·马拉卡，把后者称作印度尼西亚之“父”。

然后钟庆发通知说，由78个人组成的中国演员团将于6月24日抵达印度尼西亚，该团将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两个月左右，并将在该国的各个城市里演出。这个团是应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邀请到印度尼西亚来进行对印度尼西亚演员团去年访问中国之行的回访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承担中国演员团在印度尼西亚逗留期间的一切费用。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4，л. 46－48

№24899

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

(1955年6月23日)

机　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保密—密码处处长

Ф. П. 马利舍夫：

一些前来接受培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家到了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些专家应该通过在各个车间进行的实践，熟悉工厂的技术资料，掌握工厂的整个工作

---

① 穆尔巴(Murba)，印度尼西亚民族共产主义政党，1948年建立。——编注

流程,这将使上述专家可以了解工厂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生产。但这些信息都是绝密,根据保密清单属于国家级机密。

根据您在1955年4月9日发送给我的第507c号指示,“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的第五项条款,根据给工厂下达的指示,“只有经过部的特别许可”,我们才能够向国外专家介绍情况。

根据上述所述,请求做出相应的许可。

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厂长

拉兹尼钦

1955年6月23日

РГАЭ,ф. 9022,оп. 1,д. 3241,л. 107

№23913

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

(1955年6月23日)

1955年6月23日

第1—610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苏联科学院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的筹备情况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向您报告,今年7月1—5日,苏联科学院将在莫斯科召开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

会议定于7月1日上午10时开幕。

会议日程

上午会议

1.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发言
2. 苏联科学院在铀—石墨反应堆方面的工作情况

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主任富尔索夫作报告

3. 高能条件下加速器里的核过程研究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梅谢里亚科夫作报告

晚间会议(17时开始)

4. 高能粒子轰炸下核裂变产物的放射化学研究

维诺格拉托夫院士作报告

5. 放射性同位素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应用与前景

恩格尔哈德院士作报告

会议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礼堂举行(列宁山)

7月2日、4日和5日，举行科学院分组会议：物理材料科学组、化学组、生物科学组和工程学组。

苏联科学院代理院长

И. Г. 彼得罗夫斯基(签名)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代理学术秘书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Н. М. 西萨基扬(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6，л. 77－78

№11547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

(1955年7月4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254/с号

出席美国大使的宴会

1955年7月4日

今天16时出席了美国大使卡明为庆祝美国的国庆节——独立日而举办的招待会。

根据我的计算，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数超过了1 000人，对于这种招待会来说，这在雅加达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招待会。

在出席者的行列中有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外交部长苏纳约和其他许多内阁成员，还有外交代表团的领导人，政治、文化、社会组织和实业界的代表们。

在与大使的简短谈话中我问他，他是否知道一队人数众多的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现在正在莫斯科，他们正在同苏联的国际象棋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

大使回答说，他不仅知道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到达莫斯科的消息，而且还知道，苏联国际象棋运动员已经战胜了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

接着谈话转入了不久前也有一队举重运动员到过莫斯科的话题，而且卡明有点苦涩地告诉我，他们的这队举重运动员也被苏联运动员战胜了。

我则说，尽管他们的举重运动员遭到了败绩，但我还是为他们的那位能在这些比赛中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安德森所取得的那些好成绩而向大使表示祝贺。

应该说，出席招待会的许多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想要在我们谈话时给我们拍照。

我还与赫尔曼·弗雷德里克·艾尔本大夫谈了话，他是雅加达"丹戎不碌"港的主治医师，我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那一时刻起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是这位医生检查我到雅加达来所乘的"大洋号"轮船的。

他在我与他的谈话中说，现在看得到外国医生纷纷离开印度尼西亚的一种大趋势。这情况说明，无论是在医院里工作的，还是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例如，付给医院里的医生的工资是4 000卢比左右，他当然无法靠它谋生。艾尔本继续说，私人开业也不会带来高收入，因为就连报酬很高的印度尼西亚人也不大愿意到欧洲医生那儿去看病，而且一般都是去找别的医生看病的。

接着他说，他听说，现在有机会可以签订到中国去当医生的合同。情况果真如此的话，他倒是很乐意到那儿去的，因为他很了解中国。他在1930年代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在上海港做港区医生。他问我，这一消息是否正确。

对此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问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5，л. 67－68

№08864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

(1955年7月6日)

副　本
机　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今年7月4日，以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为首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州希姆金斯基区的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

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现关押945名犯人，他们因贪污、侵吞社会财产、偷盗、流氓、交通事故和其他不太严重的罪行被判1—10年有期徒刑不等。所有犯人都被安置在2层宿舍楼里；大部分房间都带生活设施，有双层床。在劳改营里，有食品和日用品商店、食堂、卫生站和病人床位、俱乐部、图书馆。全部犯人都在生产车间劳动，生产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产品。

参观劳改营之前，同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国家的劳改政策原则进行了座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内务部在犯人再教育事业中的总的任务，还介绍了犯人的生活制度、劳动使用和政治教育等许多实际工作问题，详细讲述了劳改营教育工作和生产劳动的特点。

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是从生产铝制品、浇铸器皿和拖拉机滤油的车间开始的。

然后代表团参观了犯人生活区：宿舍、公共食堂、付费食堂、犯人食品和日用商店、犯人个人东西储藏室、卫生站以及个人会见室。

代表团详细了解了劳动营政治教育部门和犯人自己独立组织(积极分子和群众社会活动理事会)的政治教育工作。代表团参观了图书馆，那里除其他文艺和政治书籍外，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和人民中国诗人和作家作品的俄译本。

代表团对组织犯人读者代表会和文学晚会讨论古典文学和现代作品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中国法律工作者对吸收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讲演人在犯人中组织宣传讲座也表现出了不小的兴趣。

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运动场、墙报、光荣榜以及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图片展览和标语，了解了犯人文艺活动小组、提高文化小组和为教授犯人各种专业知识而成立的技术办公室的工作，代表团成员还观摩了学习司炉知识的犯人小组的课程。

根据代表团的愿望，在俱乐部，犯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参观完克留科夫劳改营，邀请代表团成员到劳改营首长办公室吃了早餐。

在参观劳改营和座谈的过程中，代表团成员感兴趣的问题是：提前释放犯人的程序，工作日计算，犯人同其亲属见面的条件，犯人是否经常要求看医生，犯人同某亲属和熟人通信是否有什么限制，是否给犯人提供住院治疗，为什么参观时劳改营医院里没有病人，检察员是否经常到劳改营来，在视察囚禁地时他们的职能是什么，犯人劳动津贴制度，有多少钱落到他们手中，发给犯人的获得专业知识的证书在其刑满释放就业时有多大效力，商店里所卖的食品和日用品哪些是犯人最需要的。

对代表团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作了相应的回答。

在座谈结束时，史良同志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并以全体代表团员的名义说，在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时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了解了苏联国家对劳改政策的实际运用以及对犯人们所做的大量的教育工作，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才能做到。史良同志还表示，他们在苏联学到的经验将被运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工作中去。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C. 佩列韦尔特金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465，л. 239－242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 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

（1955 年 7 月 9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И. 谢尔巴科夫同志：

向您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 1954 年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的情况报告”及其附件。

附秘密文件 86 页，非秘密文件 45 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
A. 列多夫斯基(签名)
1955 年 7 月 16 日
第 1114/ДВ 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说明。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 年 11 月 17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1955 年 7 月 9 日
第 611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B. 库兹涅佐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 T. 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 Ф. 库尔久科夫：

向您们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 1954 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其附件，即 1954 年 11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的报告，1955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过程的报告，《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提出的八点要求》。

附秘密文件 83 页，非秘密文件 45 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罗迈进

附件：

机　密

关于 1954 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千百万人的战斗组织，实现

了对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1954 年中国共产党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活动，以便顺利实现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党的统一的措施，发扬党内民主，提高组织和思想工作水平，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党的领导工作，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阶级异己分子和退化变质分子开除出党。通过这些措施使党能够完成去年制定的一五计划任务。

依据远不够充分的资料——中共中央党内报告和文件、报刊和其他来源资料，下面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及其组成、党的机关结构、组织和思想工作，以及 1954 年至 1955 年初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加以简要评述。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及其组成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发展得非常快。现在中共计有 700 多万名党员，比 1949 年时多 250 万人(1949 年——450 万，1950 年——580 万，1954 年初——650 万)。

农民党员有 400 万人，其余的 300 万人分布在军队、工业企业、交通、机关、学校等部门。

根据 1954 年初的资料，在党员总数中妇女——70 万人，25 岁以下的——173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的——250 万人，农民党员中富农占 7.6%，贫农占 61.6%。

根据这些材料，共有 33.5 万个基层党组织。

1954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增加了近 50 万人(根据官方材料，一年内接收 140 万人入党，同时被除名的党员有 90 万人，不过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结论)。

按照 195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议，计划到一五计划末(1957 年)，仅农村党员人数就达到 600 万—700 万人。打算此时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扩大到 30%，以及极大地提高职员、林业工人、学生的比例，等等。这样，在未来三年内，也就是一五计划期间党员人数将快速提高，达到 1 000 万—1 100 万人。

未来几年党员的社会成分将会发生某些改变。如果以 1953 年 5 月为基准(中共党员人数为 610 万人)，党内工人党员比例为 7.3%，而现在打算提高到 10%。

关于逐渐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提高到 30%是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决定。从而，党在工厂和矿山的党组织建设速度极大提高。到 1953 年 6 月(同 1950 年相比较)，这些企业的党员增长了 100.8%，而在各级学校增长了 30.8%，在农村增长了 8.7%。大规模招收工人入党的转折点是 1952 年下半年，当时各企业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造，开展了旨在抵制资产阶级向工人阶段进攻的“五反”运动。

现在党的组成中无产阶级工人占 10%。在东北大型国营企业比重更高(12%—15%)，

而在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南方、西北)比重较低(5%—8%)。这是由于工人集中程度不平衡，以及党组织在各地区建立的时间不同造成的。

党员-工人在各城市和企业的分布极为不平衡。不是在所有的企业，甚至是国营企业中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或者存在党员。例如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到1954年6月，那里的工人共产党员仅占工业企业工人和职员总人数的5%，36%的相对的大型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这一地区两年时间里(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接收入党的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和职员占入党总人数的13%，农民党员——58%。提出来的任务是到1957年末，这一地区工人党员的比例要达到20%—25%。

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党员中工人和职员的比例占6.5%，但是，在大型国营企业和铁路运输业党员比较集中，达到了60%。

在北京，1954年接收的15 224名党员中(除了服务部门)，工人占到2/3(5 795人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2 350人在资本主义建设企业，438人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在大型工业中心上海，80万名生产工人中共产党员约有75 000人(10.6%)。在1954年接收的46 996名党员中，工人占80.2%。在大的党组织中计有党员40 000名，工人党员占70%。

如果说在绝大多数大型国营企业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那么，在许多相对较小的从属于地方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设企业和林业企业，不仅没有党组织，甚至没有党员。例如，根据截止到1953年11月的资料，在北京有76%的相对大型的私人企业中没有党员，而在其他企业中党员人数仅占这类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1.73%(1954年，在私营企业有438人被接收入党)。在上海，截止到1953年6月，14.3%的私营企业有党组织(雇佣工人不少于30人)，而党员人数占这些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2.4%。在新疆，根据截止到1954年2月的材料，123家私营企业中(雇佣工人不少于50人)，有党员的为37家(总共有287名党员和17个党支部)。在东北的资本主义建筑业中固定工人中的党员人数不超过3%—4%，在其他地区不超过1%—2%，而在季节性工人中几乎没有党员。这些情况部分说明了，现在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在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摧毁后查明，饶漱石在上海时就极力压制工人政治觉悟的高涨，阻碍大规模接收工人入党。高岗甚至指示延缓新成员入党的合理要求。

在农村，在22万乡中有17万个村建立了党组织。但是，在地理上分布不均衡。如果说在解放较早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组织，并且人数众多，那么，在解放较晚地区只有70%的村庄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也很少。农民党员占农村居民总数的0.8%，但在个别省这个比例极低(广东0.17%，广西0.18%，湖南和湖北0.27%，河南0.56%)。在这五个省中，人数不足10人的村级党支部占党支部总数的85%。在中国东北地区党员成分占农民总数的0.4%，62%的村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党支部平均有4—5名党员。在解放较早省份(河北、山西等省)党员成分接近农民总数的1%。

在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和其他农村国营企业中,党员人数更少。因此,为了巩固这些企业,一些地方提出了1955年在工人和职员中党员成分比例达到15%的任务。

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成分比例最低。截止到1954年,在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学校等单位中存在着轻视党组织作用的现象。此外,接收生产战线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也极为薄弱。

北京是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计有23所大学。1953年各大学中接收了977人入党(其中教师112人)。教授党员占教授总数的14%,而在两个国防学院比例为5%。在北京大学的67个教研室中有26个没有党员。1954年北京各大学中党员人数增加了1 143人(其中不足接收计划的37%),但是,那里的党支部规模也不大。工作重心放在了接收大学生和青年老师入党工作上。国内各大学面临的任务是到1956年争取毕业班的党员人数比例不低于毕业生总数的15%—20%,而在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中达到10%。

党中央还指出要谨慎而积极地接收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入党。例如在北京,中学教师中的党员比例为3%,而初级学校教师中党员比例更少(80%的初级学校中甚至没有一个党员)。在四川省(居民总数为6 200万人)各大学和中学中共有1933名党员,其中668人是1954年接收的(教师485人,大学生183人)。尽管在四川的一些学校存在使党员数量增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超过62 000人),但1954年接收党员计划只完成了任务的10%。各省市大学和中学也都是这种情形。

在科学和医学、文艺和艺术工作中的党员极少。

在主要国家机关中党员比例相对较高,但在分支机构,特别是在财经和贸易机关,党的力量还很薄弱。

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各条战线进一步壮大党员队伍的纲领,必须强化党在那里的领导作用。为了"研究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接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积极性的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加入党组织,来巩固党的力量"。在这个指示的基础上,地方党组织打算在一五计划后三年期间大规模招收党员。

党的组成在总体上是好的。在各企业主要是接收技术熟练工人、先进生产工作者、积极分子入党,他们具备了明确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准备为实现党的政策而斗争。在农村,近一年来接收入党的主要是贫农和所谓的新中农(土地改革后由贫农发展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或者愿意在生产合作社中联合起来。党在农村推行的所有措施主要是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在职员和知识分子中也吸收那些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参加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士入党。

与此同时,由于党内存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因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经常会在党内表现出来。尽管提高了入党条件(特别是从1951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工作问题提出了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所谓的"八点要求"),还是有阶级异己分子或觉悟较低的人入党。据评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约有5%—10%的党员不符合上述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觉悟较低的人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剥削他人劳动，不想完成党的工作，等等)。这些人将逐渐被开除出党。

例如，中共抚顺(东北)市委对青年党员进行的检查表明，其中只有92.4%的人符合党员要求。其余的8.6%要么是阶段异己分子，要么是觉悟较低的剥削他人劳动的分子。对广东的一个县城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20%以上的青年党员不符合要求。在绵阳(四川省)地区4 700名党员中出身雇农的有22人，从事放高利贷的有104人，从事收购土地的有111人，从事投机倒把的有205人，打算做生意的有327人，对党持消极态度的有685人，其他的有1 454人(占党员总数的30.9%)。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中有许多党员，包括部分干部，在剥削他人劳动。此时还应补充一下，到1954年末，在较早解放地区有20 000个农村党支部，还没有对这些党支部进行检查，没有从中肃清敌特分子和变节分子。

在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下层的领导干部中，旧的剥削阶级的习俗、个人主义、自高自大、损公肥私的恶习仍没有清除。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思想政治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现在，当党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给党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共产党不断清洗自己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和消极分子。1951—1953年在对农村基层党支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自愿退党或劝告退党的有41万人。1952年在城市党组织中开展的“三反”运动期间，许多变节分子和敌特分子被清理出党。1954年在农村抗拒统购粮食和合作化的人，或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分子被开除出党(在河南省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2%)。在进行检查工作的薄弱的一些农村党支部中，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7%。1954年被开除党籍的一系列党员有：地方党支部中搞颠覆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干部，腐败分子，破坏党的纪律的人员。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后，党把反党集团的主要组织者清理出自己的队伍，以及把集团的同伙——前中央山东局书记向明和前中央东北局领导层工作人员张秀山、张明远、郭峰、赵德尊、陈伯村和其他一些人——撤职。

综合上文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过去一年来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尽管对党的组成成分调整得更为严格，但党在各领域的建设并不平衡。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通过的党的章程中确定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对章程内容作了某些修改。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组织按照地区或生产部门为标准进行建设。

党的组织体制如下：(1) 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2) 在各省、市、地区、县、区(城市和农村)——代表会议，党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可以代替党员代表大

会);(3) 在各基层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根据党的章程,党的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但这个程序只是在部分党组织内有效,因为截至目前,党的代表会议还不能在所有的党支部召开。

党的最高机构。党的最高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按照党章每3年召开一次,随后应该是中央全体会议和党员代表会议。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1945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高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死亡或牺牲的有:任弼时、王若飞、关向应、秦邦宪,由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有:陈伯达、廖承志、黄克诚、王稼祥等人。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陈云,书记处书记是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董必武、陈云、康生(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彭真、周恩来、张闻天、林彪和邓小平(后2人是1955年4月4日中央全会第五次会议选举的)。政治局负责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党的所有工作,而书记处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下设一系列分支机构:组织部、宣传和鼓动部、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负责统一战线的部门、领导各经济领域的部门等。195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组后予以扩大,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第一次组建了干部局。去年在取缔中央地方局的过程中,中央机关补充了大量新的地方机关撤换下来的领导干部。中央书记处也得到巩固。

1955年3月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是董必武),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从1949年起就存在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在各地区建立了局和分局,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执行工作,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目前存在一个上海局(辖江苏省和浙江省、上海市)和4个分局(华南分局、山东分局、新疆分局和内蒙古分局)。1954年,中央委员会裁撤了国家解放过程中建立的东北局、西北局和西南局。执行这些措施是为了进一步集权化和巩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以及根除某些地方领导干部中的自立倾向。

现存中央局和分局不能直接领导各省和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及其机关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由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党委会领导。

省和市党组织。省和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省和市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是——省、市委员会,再后是省、市党的全体会议。根据党的章程,代表大会每2年召开一次。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一年至少召开2次,代表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党的省级委员会(在全部25个省内建立)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领导本省各项工作。在此需要指出,目前大型市级党组织(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不从属于所在地省级党委,而这些城市的市委与省委同级,并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

在党的省级委员会组成中有数十名委员和相应的候补委员(例如,在山东省——37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在上海——19名委员),有1个第一书记和2—4个副书记。省级委

员会几乎都有类似中央委员会的各部，以及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人员编制(例如，辽宁省委员会计有800人)。它领导地区、市(地区级的)、县和区委员会。

党的市级委员会有类似的结构，区党委及生产单位的党组织从属于它。

党的地区级党组织。那里建立有省属地区党委(地区——临时行政单位，不是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一个行政区平均有8—15个县，还有一些不大的城市。总共计有150余个地区。党的地区委员会也有自己的工作机关，但它相对来说不太大，因为地区委员会是临时性的党机关，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省级委员会对县级委员会的领导，是省和县委员会之间的环节。目前地区委员会得到巩固，干部得到补充，在实现对党的基层机关的领导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县级和区级党组织。县是主要的行政单位之一，一个县平均有5—10个区。总共有2 000多个县。乡镇——临时性行政单位，非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党的县级委员会是党在农村最重要的机关，直接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党的县级委员会有1名书记和2—3名副书记。县委常委[①]由10—15人组成。从江苏省一个最好的县委员会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其结构。这个县委有4个县组织、32个乡组织、1个国营农场组织、3个负责日常供应的集体农庄组织和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总共计有513名党员(其中县机关和组织中有190人)。县人口——80 000人。县委有5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县委常委——14人(书记1人、副书记3人、4名县委工作人员、4名国家机关代表、1名群众组织代表和1名财政经济机关的代表)。县委下设组织、宣传、财政和贸易、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研究室等部门。每个部门有6名工作人员，在农业合作社部门有10名。县委的主要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合作社，文教工作和卫生，财政和贸易，法律。每个部门都独立对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负责。工作人员按照工作而不是区域划分职责。县委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把指示和任务传达给基层党组织，并组织他们完成，因此，县委的工作人员平时要经常到基层蹲点，较少在县委。县委组成中没有基层积极分子，县委和县委常委的所有人员都是领导干部。

所有的县委员会都有这样的结构和组成，根据某县的特点和党的县级组织的人数可以有所区别。

按照惯例，党中央允许自己的指示和决定、各种党内的解释性文件与资料下达给党的县级委员会。

在各城市建立有党的区级委员会(市属)，各区委从属于该市委员会。它是比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更具强力的机关。

在各县建立有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在许多省，农村区级委员会只是在1953年才建立，因此，他们还未稳固。许多区委没有工作分部，而只有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他们主要是乡(镇)级委员会同村级支部联系的纽带。每个乡(镇)党委大约有8—15名工作人员，其中部分是半脱产性质的，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营生。此外，区委书记

① 原文为бюро，直译为局，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委员会。如苏共中央主席团局，即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编注

经常同时兼任区长的职务。

生产单位的党组织。

各大型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生产单位来组建，其党的委员会从属于上述按照生产部类划分的党的委员会。例如，北京中央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北京市委不能领导它的工作。这些党的组织有统一的党委，有相应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力。各省直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本省的省委员会，而各市直机关绕过党的地区委员会从属于本市的市委员会。

这样，这个市的许多企业、机关或学校的党支部经常不是同地区委员会，而是同市委员会联系，并直接从属于这个部门的党的委员会。

现在还没有关于改变这个结构的正式章程，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突破，生产单位的党委从属于基层地区党委会。

现存城市党委的这种结构妨碍了对党的各支部的领导，降低了党的地区委员会的作用，使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

最后应该指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党的机关是在国家解放的过程中或解放后建立的。这期间党组织的数量急剧增长，工作的范围也扩大了，而且党的成分也变化很大。鉴于此，必须逐渐扩大和巩固党的各级机关。在改变工作方法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党的机关要逐渐由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党的机关应该专业化，面向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变得更为专业。另一方面，党的各级机关之间的联系应该加强。尽管党的机关仍然是按照各种体制(中央、地方局、省(市)、地区、县、区委员会)组建的，但党中央、省(市)委员会应该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在各工厂、矿山、农村、机关、学校、武装部队等建立党支部，每个支部的党员人数不少于3人。

现存人数多的基层党组织都将建立党小组。在农村党员人数不少于5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在各工厂、机关和学校党员人数不少于1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都将建立基层党支部。在市镇居民居住点、在各大型工厂、在大的机关都将建立党的委员会。在重要的大型企业，如果党章没有要求，甚至可以建立有5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党的委员会。

截至目前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是按照区域特征，也就是按照乡的规模来建立的。随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在农业合作社，也是按照生产特征来建立党支部。他们都纳入共同的乡级基层党组织。在各企业党支部数量在快速增长，已经逐渐按照车间、部门来建立党支部。

组 织 工 作

1954年中共中央主要关注了以下组织工作：举行省、市和县级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代

表会议以及基层党组织会议，接收新党员和巩固基层党组织，改善干部管理工作，对党务工作者进行培训和组织进修。

代表大会、党委全体会议、代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根据1954年2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的决定，要求认真关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会议。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从这时起召开了5次中央全体会议和1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5年、1949年、1950年、1954年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鉴于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活动而巩固党的统一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统一的特别决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党的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这个决议成为各级党组织今年活动的基础。会议宣布在党内坚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表现——首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高自大和骄傲情绪、本位主义的表现，反对变节分子和挑拨离间分子——的斗争。会议还要求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同群众的联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强化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水平。

第四次全体会议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广泛反响，对加强他们的思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5年3月21—30日，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3个问题：1. 关于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陈云作报告)，2.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邓小平作报告)，3. 关于召开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会议就讨论的3个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召开经过精心准备。在召开会议前，各省和市党委都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党的工作问题。因此，有100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他们就党和国家的工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和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其中刘少奇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

会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进行，展现了党的思想统一。党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看作是自己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之一。

在解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时，会议关注了党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四个方面：1. 坚定履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威胁党的统一的言行的决定，这不仅是现阶段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党内讨论应该在党的组织内公开进行，应该坚定地开展反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密谋活动。2. 党应该坚定地推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全体党员都应该克服骄傲和自满情绪，坚定地开展反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崇拜的斗争。3. 党应该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地对每个地区、每个机关和每名党员进行严格的、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监督。4. 党应该加强思想工作，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系统地在党员中、知识阶层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评。

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会议决议,并选举林彪和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

现行的党章是1945年在开展人民解放斗争的局势中通过的,其中的一些条款已经过时,要求对党章进行修改。因此,下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和通过新党章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次会议预定在1956年召开。

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后,各省、市、地区、县和区(市属)党组织都就召开代表大会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对于大部分党组织来说,这样的代表大会都是首次召开。在此之前仅仅召开过代表会议,而且还是由党组织安排的。所有主要的问题都在全体会议或者由领导干部会议解决。这样的实践已经成了惯例。

1954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在某些党组织召开,其中包括3个省、10个市、197个县、32个地区(市)和23个其他(生产单位)组织。比如,在河北省各党组织,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计划在1956年春举行,地区级党组织——在1956—1957年举行,县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市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这样,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某些地方召开两次)只是打算在接下来2—3年内举行。

地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它在重整党的工作、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一些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只是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举行,一些党组织在这方面还没有必备的经验。同时,许多党务工作人员,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没有理解代表会议的重要性,或轻视它。他们拖延会议的召开,借口是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代表大会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准备会议需要花大量时间,因此,最好是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党的报刊多次强调,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是党内民主的基础,要求把遵守民主原则,在代表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首位。但是,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些指示未得到遵守。最为常见的两个缺点是:会上批评的火力由上至下,领导工作人员很少开展自我批评,不想接受下面的批评;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容忍各种违反纪律现象: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没有遵守自由讨论的原则,存在领导工作人员向代表团施加压力的问题,等等。在一些代表会议上这种情况引起代表团不满,最后给中央写抗议信。

在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党组织中,迄今为止,章程中关于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的规定完全都没有被履行。用领导干部会议或没完没了的常委会议来替代党的会议也是普遍的做法。近来,党让自己的基层组织注意逐渐克服这种错误做法。1955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在各重工业企业党组织内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问题的文章,其中指出:广大党员很少参加组织生活,对党的领导层的工作几乎没有监督。党员全体会议尽管偶而也召开一次,但流于形式,没能动员起党员,没有提升他们的政治水平。

在广大农村,党支部会议没有每年举行,甚至有的党支部2—3年也没有举行过会议。

结果，在农村党支部，许多党员根本就没有参加党的生活，逐渐落后下去，丧失了党员的品质。一些重要的问题通常由一个人或不大的一伙人就解决了，党组织总体上没能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接收党员和加强基层党组织。1954年，无论是城市的党组织，还是农村的党组织，都在积极接收新成员入党。根据不完全资料，一年时间内全中国共接收了140万人入党(其中农村接收了70万人，军队接收了15万人)。同过去一年相比，农村接收党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大部分基层组织，把接收新党员看作是他们一贯的职责，而基层党组织直接从事这项工作。以前接收新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有党的工作方法可遵循。县委或区委的工作队有计划地前往农村，以突击的方式接收新党员。现在这种方式已经不用了。基层党组织挑选积极分子，并做他们的培养工作，此后再接收他们入党。县或区工作队现在只是被派到没有基层组织的乡或企业。

其他时候，在许多地方接收党员同经济政治任务完成情况相挂钩，而不是孤立的，不是脱离群众斗争。

与此同时，在接收党员工作中也有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加入了党组织。在一些地方，完全轻视党员数量增长的重要意义，没有完成党员接收计划。几乎所有区都有一个典型的缺点，就是对接收党员工作持肤浅的态度，主要是重视数量，不注重质量。结果，许多党组织：1. 没有认真地选拔可以入党的人，没有对他们的履历和政治面貌进行审查，允许一些可疑的人，甚至是敌特分子混入党内；2. 对打算入党的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很薄弱；3. 违反接收程序、党的章程和中央的指示，很多人没有经过推荐，没有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讨论过就接收入党，等等，而党委会批准就是采取口头确认的方式，而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这一系列缺点严重违反了入党要求。例如，根据安徽、山西、四川、贵州省和上海市的资料，1954年接收的新党员中有5%达不到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求。根据四川省委的材料，在农村党支部领导层中有10%的人是地主和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异己分子。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出，如果不采取严格遵守确保质量和入党程序的措施，那么，一些党组织不仅不可能发展，甚至可能成为敌特分子的匪窝。

党格外关注农村党支部数量增长和巩固的问题。在1954年11月，中央就农村党组织工作问题专门召开了全国会议，要求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当时党中央指出："如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建立牢固的党组织，若无必要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就不能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一往无前地实现社会改造的伟大任务。"党中央要求各省、地区和县党委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检查，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工作，制定今后3年党员接收计划，以及把计划通报给基层党组织。

农村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和状况不符合现在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领域的任务。与此同时，农村存在党员数量增长的有利条件，以便在1955—1957年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农村普遍建立党组织(除了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游牧地区)，使每个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平均达到10人，而在目前已经建立的拥有党员人数不多的党支部，党员人数要达到该

村居民人口的1%。计划在这一时期在农村总共接收党员200万—300万人。

在农村党员发展计划中指出，到一五计划末应该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建立基层党组织或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要在国营农场、拖拉机工作站、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农村教师中组织党员接收工作，等等。应该首先接收贫农(包括从贫农中发展起来的新中农)，以及一些老中农入党。

近一年来，随着农村党组织数量的增长，党内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有待加强，提高他们的领导作用。但是，在总体上目前农村党支部建设仍处于低水平。鉴于此，要认真对待党内民主生活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及县委和区委要加强对农村党支部的领导。

去年一年内对老解放区比较薄弱的农村党支部不断进行了检查和整顿。这项工作从1951年开始，总共对13万个党支部进行了检查，还剩下3万个党支部没有检查。检查工作应该在1955年结束。中国同志称之为薄弱的或落后的党支部——这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建立的相对较老的党支部。后来，这些党支部没有成立起来，其中大部分脱离了党的机关的控制，结果这里聚集了许多阶级敌人、变节分子，等等。这些党支部逐渐变成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的工具或支柱，党的威信受到破坏，阻碍了党的政策的实施。鉴于此，完成对这些党支部的整顿工作的意义就非常重要。

为了改善农村党支部的组织工作，上述中央11月会议强调要制定“中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规范”，经中央批准后传达给这些支部。

城市党组织接收党员的问题，党的公开出版和不公开出版的报刊给予了较少的关注，因此，现在只有关于城市党组织的不完整的资料。各重工厂和矿山企业在党员接收工作方面组织非常好，态度积极。接收工人入党计划在很多地方都超额完成了。同时，在科学、文化教育和其他类似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党员接收工作。1954年计划没有完成。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多次下达过关于接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但各级党组织仍很少关心这项工作，和以前一样轻视党在科学机构、大学、学校等单位的作用。

干部工作。鉴于从1953年开始的国内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在最短的期限内从农村调动和选拔最优秀的干部转入城市，以便加强基本建设和工业，以及使用干部来加强其他领域的工作。

在195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党员代表会议上，党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就组织工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中央打算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对旧的技术工作人员的团结和再培训的政策；大规模培训和干部学习(1953年11月)；关于公布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1955年1月)，等等。

中央组织部和地方党委成功地把上述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付诸实际。

多年来，党的领导干部除了在军队中任职外，就是处于在中央组织部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党的委员会中。这种体制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现在劳动分工更细、干部数量快速增长、专业部门干部逐渐加强，这个体制阻碍了干部的学习、培训和提拔。据此出发，党中央决定：1. 在保持组织部对干部集中管理的前提下逐渐把对干部的单独管理体制变为由中央

和地方党委分别管理的体制。为此把领导干部划分为9类。2. 在中央和基层党委下建立干部部门，对相应类别干部进行管理。3. 组织部和先前一样负责制定对干部的集中检查和配置的计划，负责干部在党校的培训和学习，由各机关对干部的培训和学习实行监督，并承担起对干部进行统一考核的责任。4. 在市政、交通、建筑、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单位，那里党的力量薄弱，要建立政治部或批准设立分管政治工作的单位领导人的助理一职。党的这些工作机关在自己的单位内从事党务、政治和组织工作及干部工作。5. 划分中央和地方党委会之间管理干部的职责。制定干部名册。6. 建立对干部进行管理的科学体制，在干部的培训和选拔工作中要坚定地遵守按照道德、政治和业务素质挑选干部的原则。

上述9类领导干部如下：1. 军队干部——归军事委员会干部管理总局或总政治部管理；2. 在文化和教育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党的宣传部门管理；3. 在计划和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计划和工业部管理；4. 在财政和贸易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财政和贸易问题的部门管理；5. 在公共事务和交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公共事务和交通部管理；6. 在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管理；7. 在政治法律机关工作的干部——归政治法律部管理；8. 从事党务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归组织局管理。归属第9类的有：少数民族上层的非党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和华侨人士、贸易—工业团体，以及在统一阵线机关工作的党务人员——归负责统一阵线问题的部门管理。

贯彻中央制定的新的干部管理体系已经考虑了几年，因为党在挑选大量工业所需的干部时不可能同时为管理干部的机关也配备足够数量的干部。现在这个新体制首先在中央机关实行。其中，1954年5月，中央调整了组织部，强化了组织在干部管理方面的职能。起初建立的部门考虑了上述对干部的7类划分。在中央组织部1954年的工作计划中还反映出对干部审查、学习和提拔工作的加强。1955年1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和中共中央关于刊登这份官名录的决定。进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有：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工厂和企业的领导人，科研机关、大学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等。在中共中央决定中指出，列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领导干部的一切有关任免和调动的问题都应经中央批准。

在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团结和对旧的工程技术干部再培训的问题上，关于组织大规模培训和学习问题的决定中(1953年11月)，中央决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选取和培训为新建、重建和扩建企业所需的足够数量的干部，加强对旧工程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工作，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使用，以及用5年时间培训30万名新的工程技术工作人员。但是，在干部的安排和提拔上还远没有根除狭隘的本位主义态度、保守主义思想、任人唯亲和其他一些错误倾向。鉴于此，党多次注意到了根除这类错误倾向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一年中，党的各类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把大量军队干部安排到国家和经济工作岗位。

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党内存在一个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体制和机构。现在存如下党的教育机关：1.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对党的中高级干部、党的理论工作人员、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等进行培训；2. 隶属于省(市)党委的中

级党校——总共有7所,对县、区级别的党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3. 隶属于地区、县的初级党校(学习班)——对区和乡的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这类学校(学习班)很少,也不经常开办。不久前决定,高级党校和中级学校划归中央组织部,而中央宣传部将承担领导教学的责任。至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以及各政治类学校和普通学习班的培训期限和学习纪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规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干部培训的问题,中央将在今年2月专门研究。

现在打算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的网络。其中包括,打算在3—4年的时间内建立各省(市)党委中级党校。地方党委打算开办一系列学习班,争取在1957年末对工厂和农村党支部的书记和委员,以及其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培训,而党员将在这些学习班进修1—2次。例如,1955年2月,河北省委指示在各县委建立党课学习班,主要接收各党支部书记和农村党务工作人员——党员来学习。培训期限——半个月,每期200—300人。计划举办4期。在其他一些市和地区(城市)也开办类似功能的学习班。

进一步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网络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得到马列主义理论系统培训的机会。

意识形态工作

在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加强了用社会主义理想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决斗争。在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纲要》(1953年12月)的基础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这个转变的开始。

在国民经济重建阶段,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进各种民主改造方面,因而,民主任务的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在党内外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程度角度来讲,都具有局限性。由于上述原因,意识形态工作落后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还存在对意识形态斗争采取姑息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现象,轻视理论工作,对党的理论专业干部培训不够,在宣传领域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缺点,对党员教育工作关注不够。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注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要求把这项工作提升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高度。

据此出发,党中央在1954年5月召开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宣传工作的现状,就加强宣传和进行党员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根据中央的指示,1954年10月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斗争(批判胡适、胡风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而在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宣传的决定(中共中央1955年3月1日指示)。

中国共产党3月会议的决定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赋予了重要意义。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学习可划分为党员干部学习和普通党员学习两类。

关于党员干部的系统学习问题是1953年根据中央关于1953—1954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的决定组织开展的。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旨在让领导干部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为学习第9—12章内容，建立了党员学习体系，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班，以及政治学校夜校。理论学习的这些形式囊括了200多万名党员干部。高级班还把原著增补到简明教程教科书中，在高级班学习的干部人数极少，在中级班学习的较多些。初级班学习的是最基础的政治理论课和一点经济建设的课程(党的总路线、现行政策等)，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初级班学习。这一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理论素养和足够的基础知识。在党的各种学习班中总共只有1 000名脱产的理论教师，其中多数理论素养很低。在理论学习体系中没有由初级到高级过渡的明确机制，结果许多领导干部几次学习都是那些资料。通常党员学习都是在工作期间组织的。

预定为期一年半的在1953—1954年学习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的计划没有如期完成，被拖到了1955年，这是因为在1954年期间全体领导干部都要额外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央四中全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一些材料。此外，也没有建立对学习的有效监督机制。

今年4—5月在简明教程第12章内容学完和休息两个月后，领导干部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从第三章学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独立学习、经过较高培训的人从第一章开始学习。对于没有接受政治经济学培训和学习的人，要安排他们从第一章开始学习苏联党史简明教程。第一次学习理论的领导干部，和以前一样，将学习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关于经济建设的基础知识。

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同时还希望提高自己的普通教育水平或生产技能，就颁布了一个章程，每个干部都可以进行任何一种方式的学习。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政治学校夜校和学习办公室来代替学习班。

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在大学里开设了马列主义夜大。本学年有2 300人在北京的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习。

普通党员和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他们的学习同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同。多数基层组织暂时还没有系统的党员学习。目前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要定期同党员会谈，或就党的纲领、章程或现行政策给予指导(通常以党支部为单位)。与此同时，在一些党组织内逐渐形成了党员学习机制，即党支部在讲课人(从党务工作者中挑选出来的人或具有相应水平的党员)的主持下全体党员每月学习1—2次，每次2小时，学习内容主要是宣传部撰写的提纲和材料，这个体制目前在大多数党组织得到推行，因为党委建议把它作为基本的党员学习模式。应该指出，超过一半的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独立地进行学习。近来中央

和各级党组织在党员学习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精力，把这个任务看作是本职工作重要内容之一。

宣传。现阶段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中央在1954年就宣传工作问题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

在对过去3年的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后(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是在1951年5月召开的)，会议强调了宣传工作中的一系列不足和错误，主要是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效率不高，思想水平低。在各级党委及其支部存在轻视宣传工作的倾向，在某种程序上对资产阶级思想向党内渗透的警惕性不高，无视错误宣传和错误观点的泛滥。报刊对党的生活问题、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的问题关注不够。1951年建立的基层宣传网络中的大多数环节都断裂了，而在群众中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也陷于瘫痪。

从党提出来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和坚定地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的任务出发，会议指出，现阶段党的宣传应该是关注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和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会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执行情况。

上述党中央会议后，1954年7月通过了两项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和关于改善新闻工作，这两份决议中规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任务。

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现阶段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具体任务是在如下领域对农民群众进行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1. 党在劳动互助和合作社领域的政策；2. 合作社农业生产高涨；3. 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4.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5. 普及科学知识，同迷信及其余毒进行斗争。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应该追求把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觉悟的水平，为在农村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稳固的思想基础。

为完成这些任务，中央要求首先要加强对农村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包括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础知识，农村党支部的党员教育和活跃党内生活，通过活跃基层宣传网、小组读报活动、农业俱乐部、文艺活动和借助其他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和改善对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普及工作。党中央还要求运用组织措施加强各省、地区和县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力量。

尽管1950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报刊工作的决定，但这项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在1954年7月17日的中央新决定中指出，许多报纸党性和思想性不强，同群众生活关联不够。存在这些缺点是由于各级党委对自己的报纸关心不够。在这份决定中中央要求报刊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介绍党的生活，宣传经济、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倾听来自下面的批评。

现在党的报刊工作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人民日报》和党的地方机关报开始每日刊登关于党内生活的文章，开始越来越尖锐、全面地批评党务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开始刊登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为了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不久前开始出版专门杂志《政治学习》。

1953年末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的访问对于改善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付诸实际相对较慢。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消除轻视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现象，宣传工作领域干部配置不够，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局面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在1955年3月作出了关于宣传材料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别指示。党现在赋予这项工作以重要意义。同年2月份，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各省和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会议除了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总形势外，还讨论并制定了为执行这一指示在改善理论工作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目前唯物主义理论宣传最主要的形式是由专门的讲座机构组织授课。在中国所有的省和大城市都建立了这种讲座机构，并开始活动。每个讲座机构每月组织1—2次授课。为组织讲课活动，安排了党内最好的理论工作者。例如，在北京，从4月到6月组织了4次讲课，题目为："为什么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和宣传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思想"。关于唯物主义的讲稿和文章在报刊上刊登和通过收音机广播。听讲座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从今年5月起，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后，全党被动员起来开展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多少排挤了思想战线上正在开始的斗争。）

1954年10月，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青年中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报刊上刊登对资产阶级的堕落道德进行严厉批判的文章，青年同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斗争也得到了加强。

党加强了对数量众多的私人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以便对他们进行改造或取缔。国内共有97家私人出版社，700多家印刷厂，3 500多家书店，近1 000个书亭，平均每天出版100万—150万册图书，上演2 000多场戏，105场电影，657场话剧，还有为数众多的娱乐场所——舞会、滑冰场和游泳池等。在这类场所和组织内娱乐的人达到20万人以上，在这里工作的服务人员有数百万人。其中的大部分是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中心和传播点。

与此同时，对如下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的利用工作也在显著加强：报刊、电影、文学、戏剧等对大多数居民有影响力的传媒。

党在若干方面的工作

1954年党组织的所有活动旨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执行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着力于巩固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改善党的机关的领导方式，增强党对思想政治的领导，同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总体上增强党在各建设领域的领导作用。党坚定地在适应新任务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工作，与过时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及现有的缺点作斗争。

去年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如下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上：1. 在自己的队伍中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关于党的总路线的解释工作；2. 实施工业建设计划；3. 农业合作化和完成主要农业作物的征收计划；4. 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5. 对私营工业、贸易和林业等进行改造。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显露出党的机关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许多党组织没有能够动员起一切力量来完成党和政府的任务。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这种现象流行甚广，具有危害性，最主要的是高岗多年活动给东北工业企业造成的恶劣影响。1954 年 6—7 月中央对东北进行检查时查明，在许多重工厂和矿业企业中党组织没有进行思想政治领导和对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轻视党对生产的领导作用，甚至其中一些人持有取消主义的观点，似乎“企业可以执行计划和工作，而无需党组织”。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具体表现在对企业党员干部的错误配置上。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当中，担任企业经理及其助理职务的人就比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人具有更高的水平和素养。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完全没有书记。东北 190 个特大型企业的党组织中有 75 名书记及副书记(23.2%)不能胜任本职，书记还缺 53 名。领导干部认为从事管理工作要比从事党务工作更好。在许多企业中都有这种情况：党委或党委书记从属于企业经理，经理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凌驾于党委，把党委变成自己的管理机关的附属品。相反，某些党委取代了企业管理，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完全放弃了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变成了管理机关。

在许多企业的党务和管理工作人员中书记和经理之间不团结，相互拆台和钩心斗角，导致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日报》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社论中(1955 年 3 月 27 日)指出：这个现象极具危害性，妨碍了在每个企业建立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在今年 2 月通过了关于在国营工厂和矿业企业清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倾向的措施的决议。党中央在这份决议中指出，东北一些企业中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问题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存在，是工厂和矿业企业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中共中央建议各省、市党委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状况进行认真检查，批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这一危险倾向。作为一项实践措施，中央建议，从加强企业党委的角度出发，如果有必要就在个别企业内部或在与其有协作关系的企业中调换干部。

轻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的倾向在一些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和机关中也存在。迄今为止，许多地方认为，大学的党组织不应该，甚至似乎没有权力深入教学过程和关心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没有权力在整个集体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党组织被集体孤立，陷于自己的小圈子。截至目前高校党组织发展很慢，没有起到应有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他们这样的工作实践造成的结果。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和非党领导人之间没有联系，不团结。

近来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大学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

在许多农村党组织中也存在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情况。

关于农村党组织的工作。同城市相比较，农村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工作经

验，但是，他们在缓慢地改进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农村民主革命(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领导方法。在土地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所有工作都建立在依靠大多数的基础上。数量极少的乡有基层党组织，而且地方政权机关还很软弱。现在形势已出现了根本变化，基层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践被党的机关代替的情况随处可见。例如，县委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多数时候不是经过和依靠乡委，而只是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吸收乡委的积极分子(支部书记和乡长)参加工作。每个县委向各乡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那里几乎常驻，并努力独立做各种事情。在他们那里广泛流传这样一种观点，独立执行任务比召集党支部会议，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动员他们完成任务要轻松得多。

同时，乡级组织也替代了乡人民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没有吸收他们参与解决各种任务，常常认为不需要他们协助来完成任务。

农村的党组织机构以业务繁忙为由，很少关心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轻视这项工作。对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理解不够。

县级党委在向各区和各乡下达任务的时候，没有好好地向基层干部解释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方法，不解释党的政策，由此导致基层干部出现严重的命令主义行为，破坏了党的政策，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党内存在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应引起重视，要宣传优秀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经验。

许多地方党的机关和基层组织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这些经验已成功地向其他党组织推广。各党委对各党组织进行了专门分类，进行直接监督和领导，以便得到和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到落后的党组织中去。

党的报刊系统地刊登了关于一些党组织，主要是基层党组织的先进经验的材料。

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党内渗透作斗争。1954 年党组织在党内开展了同个人主义、自高自大和道德堕落进行斗争，同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运动。各省、市党委按照中央的建议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揭露出一系列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私利、歧视妇女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事实。这次检查把大量蜕化变质分子和见风使舵分子开除出了党。不久前，《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2 日)公开号召在党内开展反个别共产党人蜕化变质的斗争，增强共产主义觉悟。

党内有部分党员以雇佣贫农、放高利贷、承租土地、商业投机的形式剥削他人劳动。例如，在一些老解放区剥削问题较为严重的一些农村党支部，15%—30%的党员在从事这样的活动。在一些工人共产党员中也存在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在中国底层的剥削现象一向很严重，因此，一些党员很难立即克服它。此外，直至目前党没有认真关注共产党人剥削他人劳动的事实。农村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合作化表明，若不严厉谴责和清除农村党员中的剥削倾向就很难实现党在农村的政策。现在一些最为险恶的不知悔改的剥削分子被开除出了党，对一些落后分子进行了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了合作社等。

实行集体领导。中央四中全会后，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在报刊和党支部的议程中话不离口。根据一些材料判断，在建立集体领导和坚定不移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绩。去年,许多党委根据具体事实和依据一些党组织推行集体领导的例子展开了宣传和解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例如,河北省委的报纸《河北日报》在1954年10—12月刊登了29篇关于集体领导问题的文章和材料。许多省市县党委从集体领导的角度出发最先调整了自己的工作。在宣传和解释这项原则时其立足点是在集体领导中除了集体讨论和解决各种重要问题之外,个人首先要对所负责的那份工作承担责任和提出倡议。许多工作人员是这样理解集体领导问题的,试图摆脱个人责任,甚至一些最为微小的问题也要通过集体讨论。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

结　论

1. 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其队伍人数一年增长了50多万人,总人数达到了700万。接收入党的主要是产业工人和贫农(其中包括新的中农),以及注意更积极地接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在绝大多数农村和城市中的主要生产单位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2. 党铲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加强了自己队伍的政治思想统一。反党集团的清除是中国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一,表明党坚定地在自己的队伍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斗争。

3. 为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措施。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宣扬唯物主义的运动。在组织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

4. 中国共产党对巩固基层党组织、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集体领导赋予重要意义。在许多县和上一级党组织都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基层党组织开始定期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5. 党批评了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采取了一系列清除这一有害倾向的措施。

6. 党中央强化了自己的机关,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组织和思想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党的干部工作,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监督。

7. 地方党的机关改进了领导方式,从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使自己的机关专业化。

8. 总体上,党组织成功地承担起了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去实现生产计划和各项政治任务的责任。

9. 党持之以恒地关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消除。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秘

A. 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5月24日

附件一：

机　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马明方同志1954年11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中央批示：

中央批准马明方同志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

有计划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后3年内，继续在农村中发展200万至300万党员，使全国经过土地改革的乡都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并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内部的生活和在群众中的工作，是十分需要的。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没有适当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要团结和组织农村人民群众，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各级党委必须经常注意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忽视或者放弃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

各省市委、地委、县委，应在最近期间对农村支部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订出加强农村支部工作的具体办法和今后3年内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并在支部内进行认真地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委讨论农村支部工作的情形和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应在5月以前报告中央。

(1955年2月)

马明方的报告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农村的组织，必须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奋斗。这就是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

有制,使农业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农村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去进行。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就是党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

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要通过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团结与领导农民群众来实现的。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战斗堡垒,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展的速度和成效。党必须从以下各方面积极加强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

一、认真做好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我们党的组织,在农村中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0.8%。党员的成分一般是好的,1953年底统计:雇农成分占7.6%,贫农成分占61.6%,雇农和贫农成分合计占69.2%。

我们的党依靠着农村中党的组织,组织与领导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对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建设;目前正在领导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多年来的各种斗争和工作中,党在农村的组织,培养了大量的干部。现在,在党的、国家机关的、军队的、经济的和群众的组织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是农民出身的。

我们的党,在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领导下,在农村党的建设事业和各项工作中,是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的。

但是,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程度还不高,资本主义思想在不少党员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有的党员只埋头个人生产,不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或者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处处为个人打算;有的不积极执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甚至发生对抗行为;有的还有放债、雇工、出租土地等剥削行为;不少党员阶级观点很模糊,对地主、富农缺乏应有的警惕。农村支部的生活一般还不健全。有的支部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树立起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制度,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发扬,支部负责人骄傲自大,不接受党员的监督,甚至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有的支部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涣散和不团结的现象;有的支部组织成分极为不纯。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全国还有5万个乡没有党的组织,在晚解放区,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的乡仍有30%左右;老解放区也有若干乡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尚无党员。在一些建立起党组织的乡,因为党员很少,难以发挥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这些情况,是和目前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相适应的。

党必须经常注意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纪律和党内团结,从各方面改进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以不断提高党员的社会

主义觉悟和党的战斗力量。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来，老区农村的整党工作已收到显著的成效，约有13万多个支部经过整顿，提高了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支部工作和党员作风。现在还有近3万个老区农村支部，尚未完成整顿工作，必须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完成。

各地农村经过各项社会改造和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并已涌现出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积极分子，我们党的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就给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必须依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3年内(即1955年到1957年)，在农村中继续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党员。在现在还没有党组织的乡(未经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除外)都应建立起党的组织来，每乡争取发展到有党员10人左右；在已建立起党的组织而党员很少的乡，则应争取党员人数发展到占全乡人口的1%左右；在老解放区党员较多的农村中，亦应接受一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增加党的新生力量。农村党员到1957年应发展到600万至700万人。

党首先必须注意结合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积极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发展党员，吸收社员、组员中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争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逐步做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党员，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建立起党的组织。

党还应注意在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中进行建党工作，有计划地在职工和技术人员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争取这个时期内在这些组织中党员人数达到职工人数的20%左右。

党还应注意在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中，在农村学校教职员中，在军事、经济重要地区中，在沿海、沿江、沿湖和偏僻山区党的工作薄弱的地区中发展党员。

发展党员时，应着重在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农(包括原为贫农的新中农)中去发展；旧中农中个别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分子，也应注意吸收他们入党。选择党员对象，应从阶级成分、阶级立场、斗争历史、政治觉悟程度、和群众的联系、工作表现等方面加以慎重的考察，经过教育之后，将那些确实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并自愿接受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分子，接收入党。

发展党员必须和各项工作、各个运动结合起来去进行。离开群众的各种斗争孤立地进行发展党员，是不妥当的。

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党委，均应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发展党员的具体计划。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县委、区委应派遣具有建党工作经验的干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党应加强对新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教育。对于候补党员，在候补期间应继续加强对他们的考察，帮助他们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最根本的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做好，不许做坏。

二、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相适应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有些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在过去,农村党员都是个体劳动者,农村支部只能按照地区为标准来建立。现在,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个体农民正在逐渐地联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进行生产。这个情况就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有必要按照地区和生产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加以改变。这里就各地存在的问题,拟作以下一些规定:

1. 乡是基层行政单位,农村中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乡为单位来进行的。因此,在一个乡的范围内,除了国营农场和供销合作社中的"乡联社"等组织可以单独成立党的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党委领导外,全乡只应建立一个乡支部,统一领导全乡的工作。

2. 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的乡村,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可建立党的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党的分支部,以加强党在这些生产组织中的工作。如果全乡农户差不多都已加入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支部就同时是乡支部,负责统一领导全乡的各项工作。

3. 党章规定: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50人的乡村,得成立党的总支部。但是有些乡已有必要在合作社中设立党的分支部时,则全乡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亦可成立党的总支部。

有些乡村庄过于分散,或党员大多数集中在一二个自然村内,只建立党的小组,不便于党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也可以在某些村庄建立分支部,以乡为单位建立总支部。

4. 基层供销合作社中的"集镇社"和以几个乡为范围建立的"乡联社",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可以单独成立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但应与所在乡的乡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并经常注意听取乡支部的建议和批评。如果区委以上的党委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不便于领导时,则只成立党的分支部或小组,受所在乡的支部领导。至于"乡社"中党的组织,一般地应受乡支部的领导。

5. 国营农场、牧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是目前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3个以上党员时,均应成立支部,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并与所在乡的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如果党员不足3人时,应加入邻近的支部组织过党的生活。

6. 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只有个别党员时,可暂时与社内的青年团员编成党团小组,以便进行工作和学习。

上述这些规定,各地应按照当地党和合作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用。

三、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全支部民主生活

农村支部必须经常注意加强和改进支部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和党的小组的生活和工作。把党的生活和工作与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生活和工作混同起来,实质上乃是降低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作用的表现,党必须注意克服目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

支部委员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支部委员会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应正确地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有专人掌管,又都能及时地得到支部委员会认真的检查和讨论。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应经常受到党员的监督。支部委员会

必须定期向全体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倾听每个党员的意见和批评，经常注意集中全体党员的意见和智慧，以丰富和健全自己的领导。全体党员大会可以随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支部委员，选举最优秀的党员到支部委员会中来。

支部的最高权力属于党员大会。一切工作中和支部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应在党员大会上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每次党员大会议题不宜多，时间不宜长，但都应有政治的、实际的内容，要确实收到提高党员觉悟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支部委员会对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解决，应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在会议上要善于启发和引导党员进行讨论，保证每个党员都能够充分地发表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借以发扬党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党员大会的决议，支部委员会要组织和领导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任何人不得违反。现在，有不少支部长期不召开党员大会，用一揽子会议、积极分子会议代替党员大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支部在召开党员大会时，还可视工作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非党积极分子参加，这对于联系群众、教育积极分子和取得群众的监督，都有很大的好处。

支部委员会必须密切指导党小组的生活和工作。党小组是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通过每个党员直接组织群众贯彻和实现党的决定和指示的组织，也是每个党员生动、活泼的学校。支部的许多工作要通过党小组来进行。许多重大问题，先经过党小组的酝酿讨论，就可能使支部委员会或党员大会开得更有准备、更成功些。党小组的这种作用，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在一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支部委员会如果忽视了对党小组的领导，就会使支部生活变得软弱无力和没有生气。

支部委员会和党的小组必须加强对党员经常的管理工作，克服对于党员不进行管理和教育的现象。党的组织应按实际情况和可能分配每一个党员以一定的工作，并经常进行检查，给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每个党员都能够逐渐地锻炼成为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战士。

党的组织还应经常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不断地向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党员，要给以应有的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党籍。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标志。现在，不少农村支部是能够比较正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些支部一般地说来，党的生活是活跃的，党内是团结的，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各种工作也完成得比较好。但是在更多的支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能很好地开展，因而使党的生活不够正常，党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甚至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农村支部必须向党员经常地进行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工作和克服缺点的最好武器，即使是最好的党员，如果没有党与群众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党的组织要支持正确的批评，对于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人，应给以严厉制裁。

党内应进行团结的教育，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人和事都要予以严格的批判。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

实现集体领导，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和严肃党的纪律，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要的原则。农村支部必须坚决为贯彻这些原则而奋斗。

个人包办，家长式的领导，党的负责人不受党员监督，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

和批评，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农村支部必须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坚决向这些倾向作斗争。

四、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

农村合作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农村党员更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懂得党的政策，提高工作能力。

近几年来，各地党委一般地都已重视了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不少地区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党课教员，建立了一定的教育制度，提高了党员的觉悟，推动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对于农村党员的教育还不经常，缺乏必要与实际可行的制度，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党员的要求，有的甚至还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情况亟待改善。

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农村支部经常教育的基本内容，应着重关于党的总路线的知识、关于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知识、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这里需要指出，对农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时，应当注意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加强关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的教育；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教育；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关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关于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教育，以及关于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政策和各项政策的教育，借以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对于候补党员还应注意进行关于党章的教育。党的省委和地委应根据上述内容编写一些简短通俗的课本或教学提纲，以供教育农村党员之用。

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配备党课教员，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是加强农村支部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各地经验，建立党课制度，每月固定向党员上党课一次或两次，是可行的。目前解决党课教员来源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指定县委、区委委员或县、区机关中有讲课能力的党员干部兼任，并且尽可能地把他们教课和工作的地区统一起来，使教学和工作能够互相补益；一种是从支部中选择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支部委员或党员担任。有些地方并由县委、区委指派负责干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党课教员传授教育内容，再由他们回去进行讲解。采取了这些办法的地方，一般地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各地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仿行。

地委和县委应经常了解党课教员的教学情况，帮助他们解答疑难，并定期召开教员会议和举办轮训班，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交流经验，使他们把教学和自己的学习统一起来。

对于农村党员进行教育，必须和当前的中心工作相结合，深入研究党员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课文内容进行分析和批判。经验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党员学习文化的要求普遍在增长着，各地应注意有计划地满足党员的这种要求。

五、建立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目前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40余万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将有半数以上

的农户和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迫切地要求建立和加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正确贯彻党关于互助合作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产量，增加合作社和社员的收入，保证执行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团结和引导周围的互助组和个体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

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大体上应注意如下几点：

1. 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农业密切结合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国家伟大光荣的前途等。

2. 经常反复地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教育，以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克服现在有些合作社中存在的那种不愿意服从国家的计划生产，隐瞒产量，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等倾向；进行老社员和新社员、社员和社外群众团结的教育，克服有些社员排斥、歧视单干农民的现象；进行爱护社内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勤劳生产的教育，克服现在有些社员中存在的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产、损害别人利益、损害合作社利益的现象。

3. 向社员进行党在过渡时期农村工作中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根本路线的教育，进行贫农和中农亲密团结的教育。因贫农土地少、生产工具少而排斥贫农的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因中农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多而在生产分红中降低中农应得的收益也是错误的。必须教育社员懂得：没有贫农和中农的亲密团结，我们在农村中各项建设与改造事业都不可能胜利前进。

教育社员懂得：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不满和仇视的。为了防止富农对互助合作组织的影响和破坏，为了在经济上限制和在政治上孤立他们，目前不能允许富农入组入社，将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发展和巩固时，再根据条件，分别吸收已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入社，加以改造。有些人误认为“现在富农老实听话了”，说富农“有文化”，“有管理生产的经验”，因而过早地吸收富农入社，这些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有些合作社因为富农分子混入，从中操纵以致变质的事例，应引为教训。

4. 指导和监督合作社正确地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合理分红、逐步扩大公共财产的积累等项原则。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实行正确的生产经营方针，反对雇工等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公平合理地将商品粮食卖给国家，反对隐瞒抗拒。

5. 支部要经常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派遣优秀的党员干部帮助合作社做好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培养合作社的骨干，正确地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社员的劳动竞赛，保证和监督这些计划的实行；组织社员学习文化和技术，培养劳动能手和技术人才，表扬先进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并注意发挥青年和妇女的力量。共产党员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要

起模范作用。

现在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墙报、广播组织等,各地都可以仿行。

六、整顿落后支部,加强对于落后支部的领导

目前农村支部约有15%左右处于落后状态。落后支部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组织严重不纯,支部领导被地主、富农、坏分子篡夺或暗中掌握,他们站在群众头上,统治压迫群众。第二种是支部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闹宗派纠纷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由此造成群众间的不团结,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第三种是党员作风恶劣,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第四种是支部缺乏领导骨干,党员觉悟程度很低,党的组织涣散无力,不能起领导作用。第五种是由于领导上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有偏差(例如有些地区在整党中的偏差),损伤了党员的积极性;或者长期放弃对它的领导,致使逐渐落后下去。

对于这些落后支部,各地党委应定出计划,结合中心工作,加以整顿。在整顿工作中,大体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先将落后支部的情况,切实加以研究与分析,然后针对支部中存在的问题,对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培养积极分子,依靠支部内在力量进行整顿,并注意征求非党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意见。

2. 对于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要发动党内外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和罪恶,把他们驱逐出党,犯法者要依法制裁。对于党员中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清除出党,民愤甚大者,应给以法律制裁。对于犯有一般性质的错误的党员,则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诚恳检讨,愿意改正,均应留在党内,继续予以教育。

3. 处理党内的不团结问题和宗派纠纷,要特别慎重,必须深入了解情况,从原则上辨明是非,切忌偏听偏信;并应从团结出发,经过酝酿讨论,由双方自觉地进行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闹不团结的主要负责者,既要严肃批判,又要热情帮助。对问题的处理一定要公正和有原则,否则不仅不能解决不团结问题,还可能使纠纷扩大与加深。要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教育党员深刻认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党内不团结对于党的事业的危害的严重性。

4. 对过去领导上处理不当的问题,应作适当检讨,启发党员进行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改正。如因时间已久,不便处理者,也要讲明道理和原因。

5. 工作中要十分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整顿结束时应经过民主选举,使优秀的党员组成支部委员会。县委、区委并应经常在工作上给以具体指导,巩固已得成果。

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乡人民委员会和各种组织的作用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切非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农村支部应统一领导农村中的各种组织,使其步调一致地去进行工作。

农村支部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上,有些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有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偏向,一种是党的支部对各种组织的工作缺乏统一的安排,甚至放弃了领导,致使步调不能一致,力量分散,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再一种是党的支部包办代替了各种组织的

工作，不能发挥各种组织应有的作用，结果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

为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党的支部应定期讨论各种组织的工作，提高和统一它们的思想认识，帮助它们建立业务，开展工作，发挥它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对于各种组织的决议，党员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群众一起予以贯彻。

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党的支部应当善于通过这一组织，吸引和组织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各种活动，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保证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党的支部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对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加强领导，保证它们真正行使自己的职权，巩固和提高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支部要通过民主选举，使作风正派、有办事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到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中去。有关全乡人民的重要问题和各项工作，党的支部作出决定后，还必须通过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并在执行中随时给人民委员会以具体支持。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现在有些党的支部不重视乡政权组织，不认真执行乡政权的决议和它所布置的各项工作，包办乡政权工作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力量，是党在各种工作中的有力助手。党的支部要定期讨论和检查青年团的工作，指导青年团动员团员和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学习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使青年团在各种工作中发挥它的先锋作用。党的支部要加强对青年团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不断提高青年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并接收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党的支部对于乡村中其他组织，如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妇女团体等，也必须加强领导。

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都是党向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党的支部要有计划地使这些组织健全起来，使它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

八、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作，反对强迫命令

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是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

经过党的不断教育，经过整风整党，农村党员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在某些农村干部和党员中还很严重，近来甚至有所发展。继续向强迫命令作风进行斗争，仍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强迫命令作风最普遍的表现，就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对群众的说服教育的工作，或以"不接受任务不散会"、"开熬夜会"等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各种任务。更恶劣的是讽刺、训斥甚至打骂群众。结果造成党员严重脱离群众，使工作受到损失。

产生强迫命令作风的原因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影响；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高；上级布置工作时交代工作办法少等等。

克服强迫命令作风的办法是教育党员相信群众，说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要领导群

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以实例打破某些党员干部认为群众落后,不强迫命令不能完成任务的错误思想。教育党员善于团结和组织积极分子进行工作,使他们懂得:没有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经常团结在支部的周围,支部就不能很好地与广大群众取得联系,率领他们前进。教育党员善于等待群众,对某些一时还不觉悟的群众,要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教育和帮助。在推行各种工作中要运用培养典型、实例示范的方法,因为农民是最务实的人,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和新的事物,只有经过他们亲身观察和体验,才会自觉地接受。向农村干部和党员布置工作时,必须交代工作方法;检查和总结工作时,不仅要检查和总结工作任务完成的程度,还要检查和总结用什么方法完成的。对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完成各种任务的支部和党员,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对犯有强迫命令错误并屡教不改的党员,要适当地进行批评,严重者应给以处分。

反对强迫命令,采用说服的方法进行工作,这对农村支部和党员来说,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教育过程,农村中党的组织应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必须了解:我们的党所以取得今天的胜利,乃是党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说服了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切进步的人们的结果。

九、县委、区委必须加强对农村支部的领导

县委、区委加强和改进对农村支部的领导,对于提高农村支部的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是带有决定性的一个环节。

近几年来,各地县委、区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仍有一些县委、区委对农村支部的工作包办代替,缺乏正确地适当的领导方法;有的甚至长期不过问支部工作,放弃领导;也有一些县委、区委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或因干部调动频繁,对于情况和业务生疏,影响了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经常领导。这些情况必须迅速改变。根据目前各地已有的经验,县委、区委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县委、区委必须把管理支部工作列入经常的工作日程,在布置各项任务时,对支部如何进行工作应作具体交代,使支部能够根据这些布置和指示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主动地去进行工作;并须有系统地定期讨论所属支部的工作,经常进行检查和帮助。

2. 每个县委、区委都应选择一定的支部,作为重点,亲自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指导一般。帮助重点支部工作的干部,必须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包办代替的做法是绝不能提高支部工作、取得任何有用的经验的。

3. 县委、区委应有计划地选择和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采用召开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联席会议、总结工作经验等办法,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地委和县委还应利用农闲季节,定期轮训支部书记、委员、小组长,争取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普遍地将他们轮训一次到两次。

4. 区委应按期制订支部教育计划,帮助支部建立学习制度,培养党课教员,供给教育材料。

5. 有些县委、区委机构尚不健全,应适当地予以调整和充实。县委的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或生产合作部)等,都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指导农村支部工作。

加强农村支部的工作是全党的责任。这里所以强调县委、区委应加强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是因为县委、区委更接近农村支部,是直接领导农村支部的。地委、省委对于农村支

部的工作，也必须列入工作日程，予以极大的注意。

翻译：A. 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11月

附件二：

机　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

1955年3月1日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6亿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顽固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该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

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因而就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作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和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 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 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作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 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等行为。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 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作出结论或总结。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作出结论的作结论，对尚不能作肯定结论的就作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 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

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 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 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 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有些出版发行

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 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

(1) 执行中央1955年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 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 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 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 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 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 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2. 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

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化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委自行规定。)

校对：B. 克里夫佐夫

附件三：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

译自中文

秘密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分局及各省市党委、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党组、各中共中央所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委：

中共中央批准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

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发送给你们。同时建议你们对中共中央就宣传唯物主义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示进行讨论，根据这两份报告对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进行讨论。

本决定及其两份附件可以在党的报刊上发表。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日

关于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针问题

(陆定一在1955年2月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

……①

附件四：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内部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

(1955年1月4日)

兹将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发下，并对有关这一职务名称表的若干事项，作如下的决定：

一、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第八条中所规定的“凡属担负全国各个方面重要职务的干部均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原则制定的。这一职务名称表颁发后，中央负责管理干部的各部门应与上海局、分局、省(市)委、国务院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取得密切联系，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对属于这一职务名称表范围内的干部，从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考察和了解，并根据考察和了解的结果，来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

今后，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干部的任免和调动，均须报经中央批准。今后，由于机构变动，而应增减这一职务名称表中的干部职务名称时，由省、市以上党委或中央一级的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请中央决定。

二、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各级党委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对各级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上海局、分局、省(市)委管理的干

①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部职务名称表,由上海局、分局、省(市)委根据管理干部的需要和建立这一工作的条件,参照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自行制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自行制定,报经中央分局、省委批准后颁发施行。地委、省属市委、大市区委及县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则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统一制定。

三、加强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是当前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职务名称表的"附件二",对国营工业中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已经作了具体规定。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中央分局、省(市)委应协助中央做好对这一批干部的管理工作。

由于国营工业是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集中管理的,所以在国营工业的干部管理工作上也应该建立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因此,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应该逐步地把管理干部的一系列工作建立和加强起来。但这并不是说,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可以减弱。相反地,在建立和加强工业行政部门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的同时,地方党委必须也把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按照这些干部所任职务的重要性,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工业部的总管理局(管理局)和各工厂(矿)分别加以管理。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总管理局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拟定,报请中央审查批准后颁发施行。各工厂(矿)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统一制定。

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监督管理,这些干部中之担负较重要职务者,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范围,由各地自行规定,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

凡列入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两方面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干部,国务院所属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均有对其进行考察、了解、培养、教育的责任。但在进行工作时应有适当分工:干部的调配、提拔和专业训练等,应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负主要责任,地方党委则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对这些工作加以监督;审查干部、对干部的鉴定,应由地方党委负主要责任,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则应加以协助。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双方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及时交换这些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在任免、调运这些干部时,应事先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地方党委亦应主动提出建议。双方如有不同意见,应尽可能商量解决,但在必要时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可以单独作出决定。

国营工业中的党、群工作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重要的省属市委、大市区委等分别加以管理。

地方党委对于地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办法,可以参照上述原则自行规定。

四、在颁发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同时,应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管理干部的原则,重新加以确定。

根据目前情况,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在干部管理工作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地方工业部除外)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属于

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干部的管理，也属于这一类型。

除各工业部门外，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林业部、农业部、对外贸易部所属的海关总署、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总社及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亦应仿照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建立对这些干部的管理制度。这就是说：这些部门除协助中央管理干部外，还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主管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这些下级机构中的其他干部，则由这些下级机构自行管理，但其中比较重要者应列入当地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机构中的党、群工作干部则由地方党委管理。

这些部门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由这些部门自行管理。

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该部门拟定，报经中央审查后批准颁发施行。这些部门的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这些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如在目前全部自行管理有困难时，可将其中一部分暂时委托地方党委代管。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第二机械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因已基本上具备自行管理其本系统干部的条件，因此也可按这一办法管理其本系统的干部。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拟定，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审查后报中央批准。其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干部的管理工作和上述部门多少有些类似。但外交人员分布在国外，不可能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外交部亦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一职务名称表由外交部拟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

第二种类型：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公安部、邮电部，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等部门，全国合作总社，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民主妇联，对其下级机构中的干部的管理，属于第二种类型。

邮电系统，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系统，新华书店系统和合作社系统，在上下级机构之间是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的。但因这些系统的机构很大，分布很广，人员比较复杂，而管理干部的力量又比较薄弱，所以在目前阶段还不宜采取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来管理干部，而应采取一种过渡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这些系统的中央一级机构只协助中央管理本系统中属于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和自行管理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他们应协助中央对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进行考察、了解和培养教育，并可对干部的任免、调动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属于中央。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中的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以内的干部，由各级地方党委分级(分层)加以管理。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和中央一级的机构一样，也只协助同级党委管理干部和管理本机关中不属于上级和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

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工会系统、青年团系统和妇联系统的情况与上述几个部门虽然不同,这几个系统之间的情况也不相同,但在目前阶段,亦均以采取这一管理干部的办法为宜。

采取这一办法管理干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可对中央管理以外的一定范围的干部进行了解工作,并可对这些干部的任免、调动,向主管这些干部的地方党委提出建议,地方党委在任免、调动这些干部时应考虑中央有关机关的意见,但决定权仍属于主管这些干部的下级党委。

第三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部门,除公安部门外,对不是由其直接管理而是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部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不担负管理的责任。这就是说:内务部不负责管理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的干部,司法部不负责管理省司法厅的干部,监察部不负责管理省监察厅的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计划委员会的干部,财政部不负责管理省财政厅的干部,粮食部不负责管理省粮食厅的干部,商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商业厅的干部,对外贸易部不负责管理省对外贸易局的干部,建筑工程部不负责管理省建筑工程局的干部,地方工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工业厅的干部,交通部不负责管理省交通厅的干部,农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农业厅的干部,林业部不负责管理省林业厅的干部,水利部不负责管理省水利厅的干部,劳动部不负责管理省劳动局的干部,文化部不负责管理省文化局的干部,教育部不负责管理省教育厅的干部,卫生部不负责管理省卫生厅的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干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担负管理下级人民法院干部的责任。这些机构中的干部,除由中央管理和由这些机构自行管理以外,统由地方党委负责管理。这是第三种类型。

上述中央一级各机关,在干部管理工作上,有些兼有第一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兼有第二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则只有第三种类型的特点。凡属最后一种情形的部门,只协助中央管理本部的司、局长一级干部和管理本部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不再管理其他干部。

五、这一职务名称表中未把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包括在内。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俟中央制定后另行颁发。

翻译:拉扎列夫、孔德拉季耶夫

附件五: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局、中共中央所属各分局、各省党委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

报告”，现把该报告发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地区开展好这一运动。

1955年5月16日

……①

附件六：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摘自中国共产党就整顿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工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组织队伍。中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将来会逐步消失。因此，只有工人才是最有前途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这一阶级的真正代表，也是这一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也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地开展革命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在困难面前退却，不应背叛党，投降敌人。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

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六、每一个党员都应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改正。一切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又不愿改正，骄傲自满、固执己见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所有党员都应诚实而自愿地为人民服务，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以便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保证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除了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

①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地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备注:这八项条件既适用于对基层党组织的党员进行考核,也适用于接收新的党员。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对打算吸收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开展教育工作。

在中共中央1954年11月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问题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来自一些地区的工作人员认为,八项条件的标准太高了,应当降低。中央委员邓小平对此的回答是,八项条件仍然有效,应在考核党员和接收新党员时被严格遵守。

第二项要求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到1953年底,中共中央对这一点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87 - 218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

(1955年7月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M. C. 费多托娃,1928年出生,居住在莫斯科列维塔第2大街2栋220房间,办公电话:Д-0-00-24,转分机47。

申 请 书

当我还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我和大学同学允斌·克里姆结婚,他生于1925年,1939年来到苏联,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我丈夫的父亲刘少奇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今年我和丈夫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并通过答辩获得了化学副博士学位。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他将回到中国去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了很多年,时常相互帮助和支持。这种相互帮助将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我希望与丈夫一起去中国工作,并考虑到

中国非常需要专家，请您协助把我作为一名苏联专家派往中国去。我会竭尽全力，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关于请求组织委派我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一事，我还有这样的考虑。我们有一个女儿索菲亚，1952 年出生，我们将要把她留在莫斯科交给我父母照看。我的父亲费多托夫·谢苗·伊万诺维奇，生于 1896 年。母亲 Е. И. 帕夫洛娃生于 1903 年，作为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应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如果我以允斌妻子的身份去了中国，我将没有能力保障我留在莫斯科的家人的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

有关办理去中国的手续的文件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在今年 5 月底交给了苏联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和红新月会。

费多托娃

1955 年 7 月 9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240－242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

（1955 年 7 月 9 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同志：

今转交给你们毛泽东同志 7 月 3 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邓小平和王稼祥同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和贝戈维奇等的会谈纪要信件。信的内容通过电报转给您。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

1955 年 7 月 9 日

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感谢您 6 月 25 日关于 5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苏南会谈结果的通报。

我们认为这次苏南会谈已经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苏共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对南斯拉夫所采取方针和步骤的完全正确性。我们还认为,今后继续采取对南斯拉夫进行耐心的和有分寸的争取工作的方针,是非常恰当的。

此外,中共中央愿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把我们与两位南共中央委员的谈话情况向您通报。1955 年 5 月 26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会根据当时访问中国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要求,指定邓小平、王稼祥两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两人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现将谈话纪要一份送给你们。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5 年 7 月 3 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印鉴

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
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谈话纪要

谈话时间在 1955 年 5 月 26—27 日,南斯拉夫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贝戈维奇。

谈话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答对方事先用书面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六个问题以及他们临时提出的一些与此有关的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交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及其政策问题。

第一部分谈话不甚重要,故从略。

在第二部分谈话中,主要环绕着下列三个问题:(1) 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2) 关于美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3) 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他们认为,1948 年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主要是由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在国家关系上搞坏了,而不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者思想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他们认为情报局决议所根据的绝非事实。他们说,当情报局决议发表后,南斯拉夫的党进行了讨论,但讨论时拥护情报局决议的仅是少数。他们还说,自决裂以后,南斯拉夫的政权始终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手中,并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他们的上述说法,我们给予了适当的批评。我们首先指出,把 1948 年事件归结为国与国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想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团结的基础,首先就是建立在思想的一致性上。正由于南斯拉夫在思想路线的许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才引起情报局的批判。共产党人在接受批评时应该采取郑重的、欢迎的态度。在国际援助和苏联援助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援助,所以情报局的

批评按理说应该产生好的结果，但结果却不好。从结果不好这一点看来，情报局的批评，可能在方式上有缺点，但这个决议的原则本身我们认为是正确的。7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个决议的正确。因为在这7年中，南斯拉夫背离马列主义观点的地方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例如南党机关报《战斗报》认为现在世界一体，任何国家都无基本区别，即没有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是人为的、多余的划分。我们指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英美也有社会主义，苏联也有资本主义；同时把两大阵营的划分说成是“人为的”，“多余的”，而不是社会现象，不是客观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观点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如果用这种观点去影响人民，那么，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兴趣，什么信心呢？

又例如在今年1月的《战斗报》上连载的一篇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关系本身”，这种说法是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专政性质和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职能。

这篇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不是一个政党”。当然，这是与列宁的建党原理相违背的。

这篇文章还指出南斯拉夫“企业在它的活动中是独立的，它在市场上可以自由竞争”。当然这种观点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理相违背的，如按自由市场的法则去管理经济，结果必然导向资本主义。

我们指出，上述这些错误的理论，不可能在党员和人民中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和风气，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风气。

我们还指出，在对待国际援助问题上，应该珍视苏联援助的意义。我们列举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各种援助来证实毛泽东同志的下列一段话：“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人民的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党与党之间，因彼此具体情况不同，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从国际主义观点来处理我们大家庭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就弄不好。我们觉得南党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党与党的关系上，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

最后，我们又指出：在南斯拉夫目前仍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基础，南斯拉夫公共财产是保存下来了，南斯拉夫党一再声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人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愿望，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批判各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思想。

他们在听了我们的上述意见后，就对我们所指出的事实作了一些解释和辩护，并声称南斯拉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说，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可能是把卡德尔的文章翻译错了，他根据马克思的话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产生官僚主义。他们说

关于企业的自由竞争,乃是指执行一定的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竞争。他们说南斯拉夫也重视国际援助,但当时只笼统地说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不谈南斯拉夫自身的内部因素,他们认为是不对的。关于《战斗报》评论两个阵营问题的社论,他们说,这一社论发表后也有争论,但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南党中央是同意的,这个思想就是积极发展各国间的合作,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他们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也有要求社会主义的成分,如英国工党中有许多人是想着怎样才能从资本家中夺得更多的东西。把两大阵营截然划分开不好。最后,他们又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原则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但马列主义只规定一般原则,未给各个国家规定具体道路,南斯拉夫解放后的第一阶段,在国家形式上走的是苏联道路,但以后他们说发现别的道路更好些,于是就选择了别的道路;生活证明这种选择是对的。他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列宁是对的,但斯大林就不对,而且各国工人阶级各国党都可以发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解释,不能由一个党来垄断。

对于他们的这种看法,我们表示了反对意见。我们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对把世界分成军事集团,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必须问一问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阵营,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怎能抱有坚强的信心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来不讳言我们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至于说到垄断马列主义的解释问题,这样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解释,有列宁、斯大林的解释。我们还知道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也讲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对待苏联,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模范,它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与修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党要高得多,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苏联学习。向他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是不可分的,他们对于斯大林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他们说到苏联过去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说,同是一个苏联,中国和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都不感觉到苏联对待他们有什么不平等的问题,唯独南斯拉夫有这种感觉,这难道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觉得南党内部思想上有混乱,应从思想上找原因。认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伟大作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重要问题。

关于今后的南苏关系,我们表示希望南斯拉夫能重返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至于过去的问题,苏联会说他们要说的话,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南党说过合乎实际情况的话,中共觉得南斯拉夫总是把责任推在苏联身上,好像自己没有责任,这是我们不相信的,所以建议他们慎重考虑一下。

关于美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被迫承认美国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并说欧洲大多数人并不愿跟美国走,欧洲广大

人民特别不喜欢美国在欧洲搞军事基地。关于美南关系，他们也认为美国对南斯拉夫是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但南斯拉夫遵循了三个原则：(1) 保持南斯拉夫独立；(2) 建设社会主义；(3) 美国不能干涉南内政。所以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野心阴谋并未得逞。

对此我们会提出下列两个事实问他们。第一，1951 年 11 月 4 日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美国对南军事援助协定，协定中规定"南斯拉夫须为自由世界的防卫提供南斯拉夫人力、资源能力"；第二，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申斥过美帝国主义，但南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却说"苏联是新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些应作如何解释？他们说记不得有军事援助协定，但南斯拉夫接受过 5 亿以上的美元军事援助可能是事实，因为南斯拉夫需要美国武器，也曾说过在联合国范围内，某国家受到侵略时将给予帮助。至于说苏联是侵略国，那是 1952 年的事，现在情况变了。

我们指出，所谓在联合国范围内承担义务，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承担了义务，还与上述军事援助协定的条文所说，实际上是相同的，现在美国垄断着联合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还指出，南斯拉夫与希腊、土耳其缔结三国军事联盟一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注意，因为这个条约实际上把南斯拉夫和北大西洋公约联接起来了。我们提醒他们说，对于美国，我们中国人是十分了解的，因而我们对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深切的关怀。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极力表示他们也了解美国，不会上美国的当。关于侵略的问题，我们指出，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才是世界的侵略者，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侵略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们表示现在希望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表示，希望中南两国关系能有好的发展，希望中国多多派人到南斯拉夫各地去什么都看，可派政治、经济、管理、计划各部门人去，南斯拉夫对中国门户开放。也可以交换资料。他们还说，南斯拉夫对中国历来是很友好的，只是过去没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条件。

我们说，彼此增进了解很有益处，我们也希望南斯拉夫多派些人来，南斯拉夫的党也可以派人来。交换资料可考虑。对于过去南斯拉夫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关于台湾的权利问题的立场，我们表示感谢。最后我们坦白地告诉他们说，过去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交，我们未答复，这是因为当时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很坏的缘故。我们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将来以至永久，都是同苏联站在一起的，对于一切国际重大问题，不可能设想中国会同苏联采取不同的态度。去年艾德里来中国访问时，曾批评我们和苏联"一个腔调"，我们回答他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莫斯科和北京相隔甚远，但因思想共同，目标共同，故能一个腔调。艾德里又曾称赞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地方，我们回答他说，中国比苏联落后得多，需要采取适合具体情况的步骤和方法，但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原则都是同苏联一样的。总之，艾德里批评我们的正是我们好的地方；艾德里赞扬我们的正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在我们大家庭里，希望包括南斯拉夫在内，应保持一个腔调，但今天我们谈话还不是一个腔调，希望将来能有一个腔调。

最后,他们表示这次谈话很有益处,因为从谈话中知道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并且很了解这些意见就是中国党的意见。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342,л. 207 - 236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

(1955 年 7 月 9 日)

机 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 Ф. 洛马科:

1955 年 4 月 20 日,20 名中国专家到了阿克恰套矿务局喀山机车头修理总厂进行实习,这些专家是矿山工人、选矿工人、机械工人、地质学家和矿山测量专家。

从实习工作的开始到结束,上述前来实习的专家对阿克恰套矿务局的工作有了总的了解。但由于不太可能允许中国专家接触关于我们生产的秘密的和绝密的情报,今后实习工作的进行遇到了困难。

这些秘密情报是:对矿工和选矿工厂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评价,矿山技术的加工条件,对投产的矿体地段的评价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信息。在此方面没有必要让这些前来实习的人了解类似的绝密情报,比如,了解产地的储量,了解产地和产区的开发前景,了解企业的生产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信息。

根据"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苏联有色金属部在 1955 年 4 月 9 日的第 507c 号信件),请求您把可以允许中国专家使用的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的清单通报给我们。

阿克恰套矿务局总工程师

Н. 伊利亚什

1955 年 7 月 9 日

РГАЭ,ф. 9022,оп. 1,д. 3241,л. 118

№1154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

（1955 年 7 月 14 日）

摘自 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第 273/cc 号
1955 年 7 月

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 年 7 月 14 日

今天 16 时，我与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一起按预先约定拜访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相互问好后，我对大使说，根据报刊上的报道来看，中国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受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官方人士的欢迎。

大使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他们的演员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既在雅加达的总统府又在他那座位于茂物的夏季公馆里进行了演出。

在继续谈话时我对大使说，我来见他，是为了谈谈内政性质的问题，是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事件有关的，今天我们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证人。同时我说，我们与他很久没有谈话了。

大使感谢了我的来访，并说，他很高兴与我谈谈。

我说，最近的一些事件是与高级军官们不同意让班朋・乌托约当陆军参谋长的任命联系在一起的，并导致了极大的麻烦。众所周知，反对派会利用任何一个借口去使国内状况恶化和使内阁倒台，它们就利用了这一点，并且正在做一切可由它们做主的事情去造成政府的危机。根据报刊上的报道和我与许多人的一些谈话内容来看，政府方面也不能迅速地克服这一种情况，只得同意国防部长伊瓦・库苏马苏曼特里的辞职。接着我指出，政府同盟的内部缺少支持政府的党的必要的团结，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下面那个事实："帕林德拉"党的许多国会议员要求该党主席、社会保障部长苏罗索退出内阁。"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的领导似乎已宣布要让自己的代表——卫生部长李嘉坚和社会工作部长莫赫・哈桑退出政府。

接着在国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也将按反对派的要求讨论关于不信任财政部长朱安达——国民党党员的问题。

上述种种情况正在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造成一种紧急的形势，并且可能会引起政府

将被迫辞职的结果。这在国会选举即将来临时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特别是国民党的势头衰退。

大使回答我说,现在他暂时还不拥有关于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冲突有关联的问题在于任何具体的资料。他还不能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有可能辞职一事发表任何看法。然而,他认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未必会在举行选举之前辞职。

然后,黄镇讲了下述有关国内的外交政策情况的一番话,同时还指出,他从各种知情人那儿,主要是从常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那儿收到了许多材料。大使同时着重指出,目前他还没有完全收到好让他对今天的形势得出最终意见的全部情报。

反对派前不久还对他们可以借助于军事政变,主要是借助于陆军(众所周知,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是很强大的)取得政权一事抱有希望。然而,现在看来军事政变未必会发生,因为军队里的势力分布情况,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政府的势力以及追随反对派的势力大致上是一样的,甚至还是总统方面大占优势。这一情况使苏加诺总统有可能显得有点乐观,因为作为对忠于他的陆军力量的一种补充,他还控制着雅加达的警察力量,警察是完全忠于总统的。

陆军与政府之间因班朋·乌托约的任命而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存在于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与副总统哈塔之间的分歧的反映。众所周知,苏加诺总统和哈塔副总统按规定是本该彻底解决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的问题的,但他们却无法达成协议,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完全转交给内阁去处理了。因此,从 6 月下旬至 7 月初的婆罗洲之行(或许是故意安排的,以便在预先策划好的冲突发生时不在现场,冲突是与 6 月 27 日的事件有关联的,那一天代理参谋长卢比斯采取了各种措施去破坏班朋·乌托约就任参谋长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典礼)回来后,哈塔在与为了报告而来拜访他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阿里芬副部长的谈话中被迫向他们声明,他看不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中有什么错,因为正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是苏加诺和哈塔委托政府按它自己的裁夺亲自去解决新的陆军参谋长的问题的。这一情况使哈塔此时此刻不可能在冲突中公然站在反对派和武装力量那一方(虽说反对派的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催促哈塔迈出这一步)。

大使补充说,苏加诺总统同意政府方与军方之间举行谈判去解决已形成的局势,生怕政府的单方面行动会导致军队的分裂,或许还会导致内战。

为了证实上面所说的现在不可能发生军事叛乱的意见,大使详细地介绍了存在于全国七大军区的军官们中间的情绪。

第一军区(北苏门答腊)受辛博隆上校的指挥,他是坚定的马斯友美党的反对者,在其编制中有 5 个团。

第二军区位于南苏门答腊,是完全忠于苏加诺总统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军区在班朋·乌托约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之前是处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如果发生军事叛乱的话,这个军区的部队将会挺立在第一军区的部队向首都挺进的道路上。此外,第二军区的部队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和设备就能越过巽他海峡出现在首都附近,那时候第一军区的部队就必须或是完成一次穿越整个苏门答腊岛上的艰难行军和战胜第二军区部队的抵抗,或是完成一次长长的海上航程,但他们并不具有足够数量的浮动装备。

报刊上和私人谈话中经常谈论和警告政府的话题是，雅加达列入其中的第三军区（西爪哇）处于卡维拉兰上校的指挥之下，他毫无疑问是对政府抱有敌意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组成第三军区的5个团中有2个团是完全效忠于总统的。关于另外3个团的情绪方面的情报还没有收集到。此外，应该注意到，军警和民警是完全由总统所掌控的，并且是忠于他的。再说，许多人还没有考虑到，驻扎在万隆的军队是完全效忠于政府和苏加诺总统的。许多人同样也不知道下面那个事实：雅加达卫戍部队的长官阿基尔中校曾经是像“10月17日事件”这样尽人皆知的军人阴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但又是一个得到过总统“青睐”的人，所以他现在未必会站出来反对总统。反对党在自己打算进行武装起义的如意算盘中寄希望于他们可以利用（这想法也是完全正确的）活动于爪哇的中部和西南部并受马斯友美党所控制的、人数多达一万的土匪部队。

第四军区。虽然现在还没有关于这一军区的情绪方面的资料，但是众所周知，列入这一军区编制的4个团中有一个部署在苏拉卡尔塔（梭罗）的团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第五军区据初步资料来看是完全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

这样一来，编制人员最多的第三、四和五军区在发生武装起义的情况下能在力量分配上起决定作用，它们有许多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部队。

余下的第六和第七军区并不效忠于政府，而且部署在婆罗洲的第六军区完全处于哈塔的控制之下，并且是忠于他的，关于部署在西里伯斯岛和马鲁古群岛上的第七军区的情报的数量还不足以能让人完全判断出它对苏加诺总统的态度，但已经知道的是指挥这个军区的瓦罗乌夫持骑墙的态度。

然后，在我的请求下，黄镇给代理陆军参谋长卢比斯上校作了一个小鉴定。他说，卢比斯在1952年10月17日事件发生时持绝对亲政府的立场，并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政府很大的帮助，因此听到政府决定任命班朋·乌托约当参谋长，而不是任命他担当此职的消息后，真的是感到大为震惊。众所周知，卢比斯上校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严重了。据有些资料看来，卢比斯上校亲近于“穆尔巴”党——“无产者的党”，该党被国内的许多政治活动家评定为托洛茨基派的党。

在对班朋·乌托约少将作鉴定时，大使对我说，他非常亲近于国民党，如果他不是按一个印度尼西亚法律不能属于任何党派的军人的话，那么他就会当上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接着在提到那些进入政府机关的小政党的立场以及在答复我认为它们的行动会给政府以沉重打击并会引起政府的危机的见解时，大使说，未必能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这些党叫自己的代表撤出政府机关的要求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绝对明白无误的是，国民党的威信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在国内拥有大量的拥护者，所以不管内阁是否会辞职，国民党都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如果那些小政党在国民党的艰难时刻企图削弱国民党的领导决不会放弃的那个政府的力量，那么它们只会因此而遭殃的。现在呢，在跟随着国民党走的同时，小政党还在执政和享受执政党的特权。更何况，就算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倒台后会形成反对派——马斯友美党和社会主义者来

管理政府的那种情况,小政党也不能指望会在政府中得到席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好处。此外,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为了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政府危机,苏加诺总统的"贴身口袋"里有着一份他已经制订好的新政府人员的名单,其中列出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名字。然而,大使总结说,他所对我说的这些资料全都是当前用的资料。

国内的政治事件目前正在起着很大的变化,因此可能会造成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的那种情况,而这将会使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下面那个情况: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两天前还对国内形势持乐观态度,但最近几天他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据大使所拥有的资料来看,佐约苏哈托现在已经开始做安排国民党领导人员的避难所去应对最坏情况的工作了。

然后大使指出,国民党自身中现在也没有足够牢固的团结。其原因就是这个党对许多选区里已举行过的地方性的地方自治选举的结果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影响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例如,不久前在国内的某些地区里所举行的选举使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在苏加武眉地区——它在此之前被认为是马斯友美党的前哨阵地之一,那里还有大股的伊斯兰教的达鲁利盗匪集团在活动,在那里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另一个早就处于国民党的影响之下的地区,共产主义分子也在地方自治选举时取得了胜利。在其他许多地区里也有马斯友美党和国民党的这种失败。这一切导致了国民党内的不安情绪的增强,特别是在它的右翼人士中。

考虑到国内进步势力的影响的增强,国民党正在试图与反对党,特别是与马斯友美党建立合作关系。例如,今年 4 月,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和马斯友美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尤素福·维比索诺举行了一次会晤,会上讨论了两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合作问题。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次会谈还是没有带来能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最后大使说,他预料今天或明天当地的中国人会送来许多消息,此后他将把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消息告诉我。他答应于 16 日或 17 日来拜访我。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说,依我之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从自己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太少向国内的舆论界通报自己的旅行感想,不过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也给他提供了很多机会去观察国内已发生的变化。我说,想必他的这种沉默寡言的态度是与民族的政治危机及不愿意恶化与反对党的关系的想法有关联的。

大使同意了这一看法,却又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总统和政府成员们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大使接着讲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访问中国时所发表的一些感想。特别是总理赞赏鞍山冶金联合工厂,并把它和美国的匹兹堡冶金中心相提并论。在参观鞍山联合工厂和其他的工业项目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这些企业里的设备很感兴趣,并说使他感到大为惊奇的是,安装在这些企业里的大部分设备上都有着苏联工厂的商标,而且几乎是同一年生产出来的以及苏联竟然能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向中国提供数量如此之多的设备。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为工业企业培养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的培训制度显得特别感兴趣。他感到惊奇的是,人家告诉他,一部分中国专家和熟练工人是在苏联得到培训的,而一部分则是在当地,在中国,在到中国来出差的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训练出来

的，苏联专家培养出中国专家后立即就离开中国了。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5，л. 77－84

№09897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

(1955 年 7 月 15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1955 年 8 月 31 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 年 7 月 15 日

今日 13 时 45 分，我应周恩来的邀请拜访了他。周恩来转交了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两个通报的答复：关于与尼赫鲁谈话问题的答复以及周恩来给梅农的信。

周恩来说，给梅农的信还没有发，将在周恩来与我谈话结束后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发出。

除转交的文件中所述的内容外，周恩来请求立即将下述内容报告苏联政府：

迫于舆论的压力，美国当权集团不得不在日内瓦会议前夕做出姿态，表示他们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竭力回避这种谈判。为了迫使美国政府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实际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中美于 7 月 21 日在日内瓦开始直接谈判。这一谈判应在大使级进行，其任务是为中美最高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美国总统间的谈判做准备。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不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中美最高级谈判。但是他没有提出另外的地点，只说这个问题容日后再谈。

周恩来指出，美国政府对中方的建议可能持以下态度：

美国政府将同意于 7 月 21 日开始直接谈判，并认为遣返公民的问题是这次谈判的主要

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就不应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虽然同意于7月21日开始直接谈判,但是只限于谈双方的遣返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愿意就台湾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直接谈判,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建议推迟中美谈判,或者根本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晤。(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像上述情况一样,发表相应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

接着,周恩来谈了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四国会议上肯定会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目前释放美国飞行员是不适宜的。他说,最好是在与美国直接谈判时,中方再同意释放这些飞行员。

周恩来强调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中国留学生的问题,等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它于今年5月制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即已知的中方对梅农有关计划的反计划)。周恩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将该计划交给了苏联政府,他还说,中方在与梅农谈话时没有全面阐述这一计划,但是它是严格遵照这一计划行事的。

我允诺向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这次谈话的内容。

参加谈话的还有外交部长助理何伟、周恩来的翻译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 Ф. В. 莫丘利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1,л. 274-276

№09892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

(1955年7月18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8月31日

第686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7月18日，周恩来约见了我，要我向苏联政府报告以下情况：

美国政府不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7月2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人还建议于7月19日发表这一联合公报。周恩来说，美国想给人们造成一种中美已就谈判达成协议的印象，以避免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说，由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暂时没有答复美国政府，想听一听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外，美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中有"北平和华盛顿"接触的措辞，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措辞是侮辱性的，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说，当苏联代表团提出台湾问题时，美国大概会说，他们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最好指出：据它从中国政府获悉，在即将举行的与北京的谈判中，美国打算只讨论与遣返公民有关的问题，而不是讨论台湾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和周恩来的翻译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1，л. 291－292

№1346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

(1955年7月18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285/с号

1955年7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

1955年7月18日

今天19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设午宴为我妻子即将启程回苏联

而送行。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大使馆参赞 E. 扎布罗金同志和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及其妻子。

在举行会谈时大使问,我对在克马约兰机场上欢送去麦加朝圣的苏加诺总统的场面有什么感想。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苏加诺在机场上的举止中表现出一定的自信和安详。我指出,送行的人士中也有陆军参谋长班朋·乌托约少将及其副职卢比斯上校,而且卢比斯站在前排中的一行中,而班朋·乌托约站在略远处。我补充说,在为总统送行时大量的警力都聚集到机场前来了。

黄镇说,有些人愿意认为副总统哈塔没有到机场来的情况是有特殊意义的。但是依他——大使之见,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副总统以往也没有出席过这类送行仪式。

接着大使说,分析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的结果是,他的脑海中对最近那些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分歧有关联的事件大致形成了下面的情景。

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最近有所缓和,这使总统有机会可以去朝圣。此外,总统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军队,足以在紧急状况下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

最近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己阵地的措施。

7 月 14—15 日,苏加诺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同政府成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目的是要更多地加强执政党的合作和团结。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在进行这些会晤时,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断然声明,在与军队里的危机相关联的那些事件中确实可以看到外国人的干预,特别是美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干预。最近一段时间里在这件事中表现得特别活跃的是美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它利用外国石油公司来掩盖自己同马斯友美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系。

在进行上述会晤期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政府成员宣布,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一直执政到举行普选为止,在必要的情况下它甚至将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

为了巩固自己在军队下层的阵地,苏加诺不止一次地召见过中级和低级指挥官员。

黄镇指出,第四军区的指挥官巴赫伦上校是总统的追随者,他与总统一起到麦加去了。

根据已收到的情报来看,政府故意答应让那些对政府持忠诚态度的军区指挥官参加 5 月底和 6 月初举行的、由卢比斯上校主持的军区指挥官会议。政府以此来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容许军队里发生分裂,或许还容许发生国内战争,而且还对卢比斯施加压力。

在军人会议期间政府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其中指出,如果军人不与政府谈判的话,政府就将采取极端措施。此外,政府还要求与会者提出 3 个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以便有机会从这 3 个人中选出一个最能为人所接受的候选人。

在总结上面所说的那番话时,黄镇指出,部署在爪哇岛上的三个军区中有两个军区(第四和第五军区)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至于第三军区,那么它的指挥官卡维拉兰则

是坚决反对政府的。然而，这里必须考虑到下层指挥员(连长、营长)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大使接着说，反对派同样也没有在浪费时间。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斗争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变得特别激烈了。考虑到进步势力的影响的扩大，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已被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共产党人在许多地区里获得了胜利所证实以及考虑到国民党的威信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而有了提高，反对派明白，他们不大有机会在即将举行的国会和立宪会议的大选中获胜。

此外，反对派难以寄希望于执政党中间的分裂。反对派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积极地加强自己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在为了西方国家利益而召开日内瓦四大国首脑会议的前夕就已形成的局势。

大使说，第三军区指挥官卡维拉兰上校不久前任命萨米·阿特马迪纳特中校顶替阿基尔中校，并因此而使自己的追随者当上了雅加达卫戍部队的指挥官。

根据已收到的、却尚未得到证实的情报来说，卡维拉兰上校撤掉了两个效忠于政府的团长。此外，他派了两个营到雅加达去，但是它们就在城门口被忠于政府的部队拦截住了。

大使说，中国大使馆的职员在这些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试图与泗水(东爪哇)通电话，但全都白费劲。问电话站的服务员无法与泗水联络的原因时，后者却给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大使补充说，中国大使馆的生活中首次发生这一事例。

接着大使说，根据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第一军区的指挥官辛博隆早在7月12日就与卡维拉兰上校有过一次会晤了。在这次会晤以后辛博隆写了一封信给卢比斯上校，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在7月12日率领自己的部队站出来反对政府，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卢比斯要把5名军官逐出陆军参谋部。然而，卢比斯没有履行这个条件，于是第一军区的反政府行动也没有付诸实践。

在回答我的关于空军和海军对现在所发生的事件持何种态度的问题时，黄镇说，空军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他补充说，如果说空军的主要力量以前是集中在万隆地区的，那么从去年起他们就开始渐渐地转移到泗水地区去了，该地区是印度尼西亚海军舰队的主要基地。海军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尤其是马斯友美党在他们中享有特别大的影响力。黄镇指出，海军指挥官苏比亚克托和哈塔副总统是自家人。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1, оп. 11, п. 8, д. 5, л. 94 - 97

№24901

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

(1955 年 7 月 23 日)

一、总论

喀什噶尔矿管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南部喀什噶尔区喀什噶尔县。矿管处的中心在距喀什市以西 97 公里的康苏(Кансу)村,有可以通过载重汽车的道路通过康苏村到乌鲁克恰提(Угугчаты)村,然后到伊尔克什坦与苏联接壤的边界。

来自新疆省中心——乌鲁木齐(迪化)的报告证实,沿公路可以从喀什到阿克苏,然后到乌恰,还可以乘坐民航飞机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在新疆的南部叶尔羌、和田、克里雅(Кери)到喀什有优质的公路。康苏村的海拔是 2 274 米,喀什市的海拔是 1 330 米。康苏地区是强烈的大陆性沙漠气候,昼夜温度变化不定,温差为 20 摄氏度,每年的温差为 30 多摄氏度。春天(3—4 月份)的风极其强烈,雨雪很少,大部分是在夏季的月份(7—8 月份)降阵雨。冬季经常是完全都不下雪。地势高低不平得非常严重,海拔达到 3 800—4 000 米,相对高度达到 100 米以上。缺乏植被,除了沿河床上有个别的树木和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带刺的灌木。该地区的人口密度极其稀少。主要的人群是回族人,该区的西部是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在大的行政中心以及康苏村和沙里塔什(Сарыташ)村有大量的汉人。

喀什矿管处于 1952 年开始建设,用的是前苏中联合股份公司"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的资金。根据苏中在 1954 年 10 月 12 日签署的关于把"苏中联合金属公司"转交给中方的联合公报,喀什矿管处于 1955 年 1 月 1 日被完全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喀什矿管处是一个采矿选矿企业,主要的产品是对精铅矿和精锌矿进行加工。

矿管处有如下的车间和生产场所。

1. 沙里塔什 1 号矿井,生产能力为每昼夜 300 吨矿石。矿石的开采有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①]在必要的情况下,矿井还可以增加生产能力,每昼夜开采 500 吨矿石。

2. 选矿厂的生产能力为每昼夜生产 250 吨矿石,生产型号为 KC-2 和 KC-3 的精铅矿和型号为 KЦ-2 的精锌矿。该厂配备有埃尔斯拉·台尔曼厂、布卡乌·波尔夫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科特里亚科夫厂(列宁格勒)的选矿设备。该厂于 1954 年投产。……在半年后就开始进行提高该厂生产能力的工作。

3. 柴油发动机-锅驼机发电厂,登记的发电能力为 1 958 千瓦,但实际上根据设备的状况和当地的条件发电能力为 900 千瓦。……

---

① 该档案在俄国发表时有多处删节,均以省略号标示。——译注

4. 每昼夜生产能力为 60—80 吨的煤矿。勘察工作，采矿准备工作以及开采工作。清理工作不用进行，这是由于为煤矿机械设备提供的电力不够。

5. 机械维修中心，下设位于两栋大楼内的铸造部、机械部、车床部、磨制部、钳工部、锻造部、热处理和电修部。维修中心配备有苏联生产的现代设备。

6. 辅助车间和生产场所：氧气站、为饮用水和工业用水提供保障的泵水站、车库等。

7. 投资建设部，每年投资额为 570 万元，包括一些附属的生产——石膏混凝土工厂、石膏露天采矿场、木器加工车间等。

8. 地质勘探小组——霍什布拉克勘探小组、乌鲁克恰提勘探小组、沙里塔什勘探小组、乌帕尔勘探小组、和田勘探小组、叶尔羌勘探小组和阿克苏勘探小组，勘探工作的总花费为 126 万元。

9. 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总居住面积大约为 1.2 万平方米，并且有日常文化设施——食堂、俱乐部、幼儿园、医院、银行、邮局、学校和贸易机构。

喀什矿管处共计有 2 000 名员工，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的居民人数有 5 000 多人。

喀什矿管处 1955 年第二季度计划的执行。

二、主要的生产

1955 年第二季度，喀什矿管处的处境极为困难，这就导致了计划中的一些主要的指数没有完成。

首先，电力不足(这一点已经谈过)导致了对所有的生产车间，其中包括对主要的矿场、工厂和煤矿都实施限电。在 3 月底“民族”号柴油机发生故障以及 5 月 8 日第一号锅驼机发生事故之后，电力的状况就特别恶化了，即使其余的机器最大限度地发电，无论怎样也不能保障工厂的需要。

第二，1955 年 4 月，在企业所在地区发生了强度为 7.5 级的地震，这对电站、选矿厂的部分设备以及沙里塔什矿井的部分输矿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工厂停产了 158 个小时，而有 12 天矿石的正常开采受到了影响。4 月份的计划仅仅完成了 42.3%，而企业在 5 月份和 6 月份不能完全完成计划中没有开采的矿石量，尽管采取了一切措施。

矿管处 1955 年第二季度计划中的主要指数的完成情况如下表：

指 数 名 称	计划	完成	完成占计划的(%)
采矿(吨数)	17 050	16 524.4	96.9
剥离工作(立方米)	7 500	806 432	107.5
采矿准备工作	57	67.7	118.5
矿石加工	18 805	15 042	80.0
所开采矿石中的金属含量百分比			
(1) 铅	7.98	9.12	114.3

续 表

指 数 名 称	计划	完成	完成占计划的(%)
(2) 锌	4.89	3.39	69.3
同名矿石中提取金属所占百分比			
(1) 铅	75.0	78.68	104.9
(2) 锌	31.5	15.73	49.9
精铅矿中金属的含量(百分比)			
(1) 铅	50.0	52.01	104.0
(2) 锌	11.18	8.84	79.1
精锌矿中金属的含量(百分比)			
(1) 铅	11.16	12.79	114.6
(2) 锌	45.0	42.71	94.9
精矿石的开采			
(1) 精铅矿按50%计算	2 250	2 159.2	95.6
(2) 精锌矿按45%计算	644	74.8	11.6
加工时间(小时)	1 806	1 582	87.6
电站生产,千瓦/小时	1 967 984	1 135 900	57.7
采煤吨数	5 250	207.5	80.0
总产品			72.9

在企业得到57.7%的电力保障的情况下,工厂在87.6%的工作时间内生产了计划中95.6%的精铅矿。各车间在电力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煤矿自4月份事实上就已经停工了。

矿石开采计划没有完成是由于1954年对成堆矿石的开采极其滞后,而这些成堆矿石是应当首先被加工的。矿山掘进工作和剥离工程对于企业今后工作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工作被超额完成了。

选矿厂的铅浮游选矿的质量指数超出了计划的指数,并高于以往时期相应的指数。

锌浮游选矿工作继续稳定发展,但提取锌的计划指数还没有达到。必须就这个问题咨询高水平的选矿专家。

企业工作中的重大不足及其工作不相协调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工程工人和车间主任这一中间环节的工作不够清楚以及实行轮流监督,他们不能独立地做出需要在业务上做出的决定。在此方面苏联专家向中国同志提供了全面的帮助,但是尚未取得足够的成果。……

三、地质勘探工作

到第二季度之前,苏联专家对中国地质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实践上的帮助,提供的帮助的

项目如下：С. П. 布雷切夫对乌拉根(Ураген)和别尔布拉克勃勒(Бельбулак)矿石产地的沙里塔什一号矿和煤矿提供了帮助；Г. С. 鲁缅采夫向乌帕尔(Упал)村所在地区进行的勘察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Д. И. 特鲁京斯向叶尔羌和和田地区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产地的检查工作提供了帮助；В. Б. 搓戈耶夫向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帮助；Г. С. 别夏斯特诺夫向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搜寻和地质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Н. Г. 瓦沙泽向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和搜寻工作提供了帮助。

上述项目的短期成果如下：1. 沙里塔什矿场。继续使用山地重型设备在第二号水平巷道对矿体进行勘探。确定往年的结果——该巷道内的矿化情况支撑不住，并且发现了一簇没有工业作用的矿石。用钻孔向下进行勘探也确定了工业矿化情况的不足。根据 1955 年 7 月 1 日的状况，就各矿石产地制定了进行作业的矿藏储量的清单。2. 煤矿。地下钻井已经钻到了预设的主煤层的侧翼，现在暂时停留在直到泵站装置那里的地方。石门(不直接通地面的水平矿山巷道)通往东北方向以便贯穿各煤层。地表上进行了准备工作，设置第三个深层钻头以便在主巷道下 100 米的深度贯穿 3—4 个煤层。3. 乌拉根矿石产地。由于布卡乌·波尔夫电站缺乏备用零件，对该矿石产地第二季度的供电不足。因此钻探工作没有进行。重型山地设备的掘进工作继续进行，但是掘进器过早地遇到了在矿井井筒中的岩石，在第三季度这些岩石将被运往地面。4. 别尔布拉克勃勒矿石产地。大量的重型矿山工程没有考虑到 1954 年的工作决定的工业设备的极限。5 月矿石产地的重型矿山工程被中止了。第二季度在矿石产地进行的钻探工作也没有开展。1954 年安置的钻头钻到了 110 米的深度，由于塌方以及钻到了设备而发生了严重的故障。现在故障被消除了。7 月初钻头开始钻探。5. 乌帕尔。在乌帕尔地区的搜寻和测绘工作计划是在第十三地质勘探队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该勘察队通过对该地区前第三纪的精矿岩层进行取样分析后确定：矿石中铅的含量提高了。5 月份和 6 月份在这一岩层比较有希望的地方采取了 599 份矿石样本，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含铅。矿石采样分析的工作继续进行。6. 和田地区。搜寻矿石的路线长达 400 公里，视察了当地居民众所周知的卡兰谷(Кан-Чакыл)和塔木的铅矿产地，杜阿(Дуа)、卡雷-卡尔达(Каллы-Калда)和卡泽-卡尔(Кызыл-Кар)煤矿产地以及杰米尔-巴克洛克(Темир-Поклок)的铁矿产地。早先当地居民曾对卡兰谷铅矿产地进行了开发。现在这一铅矿产地则没有被开发。根据地质学家特鲁宾诺的看法，该矿石产地在工业上的价值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粗晶体方铅矿同含量较低的方解石芯连在一起。……根据居民们的申请，检查工作现在在克里雅市区继续进行。7. 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自 1955 年第一季度开始进行的钼矿产地的勘探工作继续进行。在地表寻找矿石产地的挖掘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从挖掘中得到的试样分析，工业矿石在 150 米深的地方。当地地质学家怀疑是否有含量丰富的钼矿。……根据 1955 年的计划，在矿石产区开展了测绘工作。测绘面积达 45 平方公里。确定了两个钼矿点，预先对其进行的勘探工作从第三季度开始。

上半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执行总情况同计划对比的情况如下表：

各种类型	计划		完成		
	全年	半年	年初以来	完成百分比	
				每年	半年
重型矿山工程	925	450	814.2	88.3	180.9
钻探工作	2 040	1 000	701.43	34.3	70.1
轻型矿山工程	8 000	3 500	2 853.1	35.6	81.4
地质测绘(1∶25 000米)	150	65	131	87.5	201.5
搜寻线路	2 500	1 000	907	36.2	90.7
矿石取样分析	4 000	1 500	1 400	35.1	93.5
以当地货币计算的花费(千元)	1 293.4	625.4	572.4	44	91.5

从上述所列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地质勘探工作计划中,矿管处超额完成的只是重型的矿山工程以及比例为1∶25 000的地质测绘。其余的工作尚未完成。轻型矿山工程没有完成的原因是,两个计划开展的轻型工程的项目卡拉-贝克特(Кара-бекты)和乌帕尔的工作量为3 500立方米,这些工作不再有意义了,因为在第一季度的工作中没有在这些需要进行轻型矿山工程的地段发现可能蕴藏矿石的地区。

这种状况导致了在野外作业初期,矿管处不得不对卡拉-贝克特和乌帕尔搜寻队进行改组,在这两个队的基础上组建两个新队,以便在阿克苏和叶尔羌地区开展勘探工作和检查工作。5月的部分时间和整个6月份都在进行改组工作。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钻探工人,钻探工作一直是矿管处工作的薄弱环节。在钻探工人和苏联专家转入阿尔泰工作之后,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此外,由于在萨雷-巴伊(Сары-бай)对钻台发动机不断进行的修理停工了一个月,而由于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井架被损坏,这次停工持续了两个月。

由于乌拉根的电力供应不足,钻井在整个季度都没有开工。

为了应对面临的局势,完成指定的各类工作计划,采取了如下措施:1. 在霍什布拉克矿石产地,钻探工作改为用钻粒钻头钻进,使第三台钻井投入工作。2. 就第二台钻井投入工作在煤矿开展准备工作。3. 从6月份开始在塔木矿石产地(铅锌矿)开始挖掘工作。4. 增加从事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和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轻型矿山工程的工人的数量。

采取的这些措施将有可能明显地弥补滞后的钻探工作计划和轻型矿山工程计划。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小组成员被分配到各生产地段。

到1955年1月1日,共有84名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他们担任行政职务、技术职务,也有负责工程的人员。随着向中国转交相关的工作,随着前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完成,部分苏联专家开始撤出。到1955年3月1日留下的28名苏联专家中,有16人在第二季度被召回了苏联。

到1955年7月1日,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有11名苏联专家:列夫·叶夫根耶维奇·埃

格尔，前矿管处局长，矿山工程师，带领整个苏联专家小组，直接领导沙里塔什矿工的采矿工作，地质勘探队的采矿工作以及就企业工作的总的问题提供咨询；叶戈尔・叶夫列莫维奇・库什内利，工厂以前的厂长、选矿工程师，直接领导工厂的选矿工作、技术检查工作，领导研究工作和化学实验室的工作；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以前的总机械师、技术员、矿山机电机械师，领导各车间的机械部；谢尔盖・卡皮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曾任电站站长，电气工程师，直接领导电站工作以及总动力工程部；特罗菲姆・涅菲多维奇・达维多夫，曾任基建处主任、建筑工程师，领导建设和设计工作，领导基建部和维修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布雷切夫，曾主管地质工作，地质工程师，领导苏联地质专家小组，直接领导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煤矿和乌拉根地段进行的勘探工作；维克托・巴特尔别科维奇・措戈耶夫，曾任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队长，地质工程师，在有三段工程的乌鲁克恰提地质勘探队任苏联专家；诺达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夏斯特诺夫，地质工程师，在霍什布拉克地区的搜寻测绘队任苏联专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特鲁宾诺，地质工程师，在和田地区搜寻和检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戈尔曼・谢尔盖耶维奇・鲁缅采夫，地质工程师，在叶尔羌地区的搜寻和监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

该报告附上的南疆地区的地图上指明了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各个地段。

苏联专家参与改善生产的工作。全体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了如下问题的解决：

1. 采矿工作：在矿石配料图标的制定上提供实际的帮助，保障所开采矿石达到计划中的矿含量，在地震之后，帮助重新制定计划，保障工厂得到金属含量得到提高的矿石；帮助设计、准备和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大规模的爆破，保障了剥离工程的超额完成，并在露天采矿场建立了采矿场所；改善了地下采掘工作的状况，并着手准备使下半年矿石的开采量增加20%—25%。

2. 对选矿厂的帮助：改善了技术工艺，结果使铅的提取与1954年相比增加了6%—7%，锌的提取增加了3%—5%；引入了无氰矿石浮选法，这极大地节省了资源，极大地加强了工作的安全性，并改善了产品的质量；帮助工厂改进设备，把其生产率提高20%—25%，这项工作将从下半年开始进行，开展一些科研工作来推广选矿方法，并对预计开发的其他矿石产地的矿石进行研究。

3. 对电站提供的帮助：制订锅驼机和柴油机工作的主要工作计划，并贯彻这一计划，改善其运行的方法，这些措施提高了电站的工作效率，尽管一号锅驼机和二号柴油机发生过故障；对方案进行局部的改进，改善锅炉和机器的使用，这项工作在第三季度已经实施完成。

4. 对机械维修部提供的帮助：处理好浇铸车间的工作，研制配料和得到高质量的铸液，帮助准备可以拆换的钻头，改善对技术设备维修的组织。

5. 对基建部提供的帮助：亲自参与到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中，处理好扩大石膏矿渣混凝土厂的工作。

6. 对地质勘探工作提供的帮助：对一个铅矿工地和一个钼矿工地(霍什布拉克)进行开

发和新的勘探。对当地地质干部开展的各类地质测绘和搜寻勘探工作提供日常上的帮助,制定对矿石产地和较有可能勘探出矿藏的矿石产地进行局部勘探的方案。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所有的苏联专家开展了大量工作来培养中国干部,其途径是授课、作报告、进行谈话、传授实践知识、参与日常工作问题的解决、就技术问题和组织问题分别制定出措施。在1955年上半年培训了1 000多名工人。

一些苏联专家——达维多夫、埃格尔、加夫里洛夫以及其他同志应中国当局的请求向南疆政府、经济部门和军事单位就一些专业问题提供了咨询。

群众政治和文化工作。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现在有11人。一些专家同其家属一起在这些地方生活。在这11名工作人员当中有5人是工会成员。此外,还要算上没有工作的党员(现在在莫斯科)。地方委员有14人(3人有家庭)。在康苏有苏联专家的两名孩子(上中学的年龄)。在体育组织有3人。工会成员也是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基层工会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康苏加入了党组织。地方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共青团组织的成员,在康苏任职于地方委员会小组。体育小组也是按照这一原则组织。在康苏的各组织中有5人是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的,其中:工会组织1人;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委员会委员3人;地方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人;体育组织1人。地方委员会的职务授权地方委员会委员梅利尼科夫同志履行。因此,在14名地方委员中有5人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

在康苏的全体成员在第二季度顺利开展了社会工作;在列宁纪念日和五一节日期间举行了会谈。顺利开展了支持公债的签名,收集了在世界和平委员会呼吁书上的签名。个别同志还就内外政策问题作了报告。所有的苏联专家都完成了社会组织的委托。

有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对苏联专家进行了描写和报道,这些报纸包括:《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劳动》、《教育报》;这些杂志包括:《星火》、《苏联》、《苏联妇女》、《女工人》、《女农民》、《人民中国》,一些时尚杂志等。

此外,苏联专家还订购了一些技术杂志,并对其进行了阅读和研究,这些杂志包括:《苏联冶金问题》、《莫斯科自然实验员公报》(地质部分)、《科学院通讯》(地质系列和地质物理系列)、《机车和工具》、《铸造》、《苏联建筑》、《莫斯科的建筑和建设》、《关于新技术以及把其转化为建设经验的材料集》、《建设机械》、《重力工作的机械化》。

在第二季度观看了9部苏联影片,这些影片是通过地委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苏联专家集体参加了两场舞会。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参加了中国演员举办的三场音乐会。通过地方委员会渠道送来的各部电影,在放映的时候中国领导同志也来观看了。在第二季度就苏联的内外政策问题进行了11次会谈、讲座和报告。

苏联专家的日常生活条件。在康苏村,苏联专家生活在两栋大楼内,所有有家庭的苏联专家都居住在单独的住所内,这些住所是两室一厅,38平方米,有厨房、浴室、卫生间和客厅。为单身的苏联专家提供的是诸如两室的住所。所有的住所都配有电器、水管、排水设施。住所和房间内配置的家具是令人满意的,在三套住所内有收音机、有无线电转播台,但

它们现已经不能用了。在野外工作的队员们的日常条件明显就要差多了，苏联专家生活在没有日常设施的土坯房内，或者生活在帐篷内。无论是在康苏村的专家，还是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专家们的饮食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霍什布拉克的专家除外。曾多次向矿管处和联合企业的领导提出过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饮食仍然是非常的单调，味道极差且贵。没有可能为大多数人修建房子，因为在11个人中有9人是单身。此外，大部分必需的食品商店中都没有，而商店中有的食品通常质量都很低劣。

通过马伊贡茨(Ма-и-гунцы)系统供应的工业品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缺少鞋、内衣、针织品、外被、家庭日常生活器具、艺术品。儿童用的被子和鞋完全没有。

苏联专家的工资状况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1955年6月，苏联专家的工资额被降低了两次。根据7月1日的情况，同1月份相比，工资平均下降了40%。通过乌鲁木齐市商务代表处得到的部分工资的支付极不及时，要延迟25天到2个月。苏联部长会议允诺的3、4、5月份多达600卢布的汇款到7月底还没有收到，而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还不知道。工资这样不能及时支付，特别是工资被减少40%，使苏联专家们都处于困难的物质条件下。

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的相互关系。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以及绝大部分当地专家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友好关系。苏联专家的建议被非常高兴地接受、讨论，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完全履行。也曾有过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没有被履行的情况，但这几乎总是同生产方面总的困难、工人中低下的劳动纪律有关，或者是由于高水平的中国专家不够，有时候不能解决一些小的生产组织问题。

可以举出以下一些例子：(1) 康苏电站的工作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站厂长卓宗贵(Джо Цунгуй)同志不能实施苏联专家加夫里洛夫同志和埃格尔同志多次详细提出的建议：遵守维修工作的计划、加强机器维修队、对制订的指示进行研究等等；(2) 选矿厂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多次违背工艺规则，这是由于一些轮流值班的工人想尝试一下，如果改变了规则，或者增加了某种试剂会出现什么结果。

绝大部分中国领导人，无论是厂长还是车间主任，包括担任技术工程师的人员都不是专家，而是从以前的军人、行政干部、贸易或者其他单位的干部中，从政治方面挑选出来并被任命为这一职务的。受过专业教育的专家只有在矿场和选矿工厂才有，在生产部门和主要的机械部门才有。

与此同时，也有个别的车间主任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并对企业领导人的指示进行直接的讽刺。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基建处老工程师章丁(Джан Дин)同志总是试图败坏苏联专家提出的关于使用当地的建设物资进行建设的建议，技术保障部主任尚庆(Шан Чин)同志经常破坏预定的技术保障措施，杜撰一些重要的关于企业保障的报告，不仅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履行企业领导直接下达的指示。通过对其他一些较小的关于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情况进行的实例分析，我们相信，所涉及的这些人也不履行中国企业领导人直接下达的指示，根据中国领导人对这些人的评价，这些人根本就

不能很好地对待中国的工业化。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不在矿管处工作,但有的仍然留下来工作。

类似的个别事实是特别明显的,这是因为企业的领导人冀福海(Ти Фухай)、郭云思(Го Июньс)、萨德科夫(Садыков)、刘浩昌(Лю Хаочан)、阿卜杜拉赫曼(Абдурахман)以及大部分车间主任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认真听取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他们对苏联在个别生产领域的生产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很感兴趣,他们都学了很多东西,并阅读技术文献,对于遇到的所有疑问都向苏联专家请教。

苏联专家讲的课程和作的报告都有大量的听众。在就目前的计划的履行情况定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正如在就个别问题召开的生产工作会议上一样,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被接受,并且通常都被作为会议的主要决议和命令。

1955 年下半年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主要任务:(1) 关于采矿工作:对沙里塔什一号露天矿井进行设计,做好使用掘土机、钢丝绳冲击钻进、平土机、推土机和自卸卡车的组织工作;改善地下采矿工作的状况,减少损失和矿石的贫化,使矿井的生产能力达到每昼夜生产 250 吨矿石;在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湿式钻岩以及用可拆卸的钻头进行钻探;对煤矿中的一号采煤场进行开采。(2) 关于选矿厂:把选矿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昼夜生产 320—350 吨矿石,在同名矿石中提高铅和锌的提取率,提高精矿的质量;搞清楚能否顺便得到含有金、银和钴的精黄铁矿的可能性;对尾矿场的设计和建设提供帮助;开展研究工作,并进行在卡拉-杜别(Кара-Дюбе)矿石产地建设实验性钼工厂的设计工作。(3) 在电站和电力部方面:从实践上参加电站柴油机部的设计工作,参与新进的功率为 450 千瓦的柴油机的安装;通过设置静电电容器,在加强对电站电能的利用方面提供帮助;根据技术管理规程,对锅驼机、柴油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的修理拟定详细而严格的程序;通过装配闭塞的蒸汽管道、采用精选的煤、机械化除灰来加强对锅驼机的使用。(4) 在机械维修部方面:引入对各类主要的设备进行维修的规程,加强对掘土机、推土机以及其他主要设备的使用,准备一系列可拆卸的钻头,为选矿厂浇铸一些球体和合金铸铁品;对于一些复杂的设备的维修提供帮助,组织有色金属铸品的生产,改善热处理车间的工作;为康苏选矿厂准备浮选机提供帮助,为卡拉-杜别钼实验性工厂挑选和准备尚未运送到的设备。(5) 在地质勘探方面:亲自参与和田、叶尔羌、乌帕尔、阿克苏、伊尔克什坦地区的检查工作和萨雷-巴伊、萨沃雅尔达(Савоярда)、霍什布拉克、卡拉-杜别、沙里塔什一号、乌拉根煤矿产地的地质勘探工作;进行的检查工作和地质勘探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决一些主要的任务——扩大喀什矿管处的原料基地;亲自参与对已知的矿产地的矿产储量进行核算和评估,制定 1955 年关于地质勘探、地质搜寻以及地质测绘工作的报告;帮助制定 1956 年的勘探工作计划。(6) 在基建部方面:在 1955 年 12 月 1 日之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降低石膏混凝土块石的成本,提高其质量,并把其推广到矿管处在各地的建设中,这将极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除了上述所述的任务,苏联专家的任务还有通过就各技术问题作报告、进行授课、进行会谈、传授实践知识以及亲自展示等途径来培养地方干部。下半年打算从领导干部中成立

学习小组，就地质工作、采矿工作、化工、选矿、机械、动力学等科目定期讲授课程。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必须提供的帮助。在喀什矿管处的工作中还有三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依靠现有的苏联专家的全体力量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在电厂安装的CK-250锅驼机在当地煤矿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地煤的发热量很低，块头小，能产焦炭，火焰长，在燃烧时炉渣会烧结，这为建立必须的燃料规程增添了很多困难，锅驼机只能发挥出其60%的效能。

电站供热的机械化以及除灰的机械化问题还没有解决。根据赛兹兰工厂的设计制造出的燃炉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是由于炉条对燃煤的适应能力差。必须采用高水平的热处理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帮助运送以煤气发生炉的燃料工作的柴油机和锅驼机。

2. 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产地的铅锌矿石中提取的锌不稳定，锌的提取率不超过15%—20%，在这种生产工艺条件下精锌矿的质量急剧发生了变化。1953—1954年喀什矿管处向苏联的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运送了大量的铅锌矿石。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的选矿厂不能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中提取锌，而只能提取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计划让喀什矿管处从沙里塔什一号矿产地的矿石中生产精铅和精锌。必须从在华东工作的专家中输送一些有经验的选矿者，以便帮助处理好锌的浮选工作。

3. 喀什矿管处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效能不高，对铅和锌进行的大量分析都是错误的，这就导致工厂在金属的平衡方面出现不协调，导致在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和采矿工作时出错误。由于缺乏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没有对钴、钼、金、银和其他的成分进行分析。必须在2—3个月内派出有经验的化学家来教会当地干部，帮助他们处理好实验室的工作。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一位化学家。

4. 选矿厂和实验室过磅处的工作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工厂自动传送的材料的计量有很大的错误，对接受成品矿石的斗车的重量的计量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计量专家，特别是没有对一些专业的构建自动传送的重量进行计量和分析的专家。必须派遣一名计量专家出差1个月到1个半月来做维修工作，处理好计量工作并培训相关的干部。

5. 矿管处图书馆现有的供苏联专家个人使用的技术资料陈旧，并且极其不足。关于采矿工作的期刊、地质应用的期刊、选矿问题和化工问题的期刊完全没有，关于机械和动力的期刊不够。相关机构通过苏联驻喀什的总领事馆向每位苏联专家发送了必要的文献清单的申请，必须尽快满足这些申请。

Л. 埃格尔

И. 库什内利

Т. 达维多夫

П. 梅利尼科夫

С. 加夫里洛夫

С. 布雷切夫

B. 措戈耶夫
H. 瓦沙泽
Г. 别夏斯特诺夫
Г. 鲁缅采夫
Д. 特鲁宾诺
1955 年 7 月 23 日

РГАЭ,ф. 9022,оп. 1,д. 3241,л. 248－255,259－282

№099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

(1955 年 7 月 25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1955 年 9 月 14 日
第 717 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 年 7 月 25 日

我应约到中国外交部后，何伟同志对我说，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至今没有收到关于日本政府拒绝向参加日本全世界反原子弹和氢弹大会的中国代表发放签证的消息(见 1955 年 7 月 24 日的谈话)。昨天(7 月 24 日)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已致电大会筹备委员会，请就中国代表的签证问题尽快给予答复。但至今未收到答复。

何伟请求询问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是否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上述大会。我允诺照他的请求去办。

接着，何伟同志又讲，今天(7 月 25 日)北京时间 22 时将播放一个联合公报，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在英国的外交渠道交换意见后商定，去年一年在日内瓦进行的双方领事级代表间的谈判今后将在大使级进行，以便办理遣返自愿回国平民

事务、为今后进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以及解决目前双方未解决的其他一些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第一次会晤将于 1955 年 8 月 1 日在日内瓦进行。”

上述公报将同时在华盛顿播发。

何伟同志请大使馆立即将公报文本转发莫斯科。我说将按他的请求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

T. 斯克沃尔佐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8, п. 394, д. 11, л. 297 - 298

№21437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 年 7 月 29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出境管理委员会在 1955 年 7 月 6 日的决议，允许在苏联出生和受教育的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和妻子 M. C. 费多托娃到中国长住。

目前 M. C. 费多托娃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费多托娃的理由是，她把自己的女儿和父母留在了苏联，他们都需要必要的物质帮助。

M. C. 费多托娃，生于 1928 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教学或者其他实际的工作经验。

考虑到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我们认为应当询问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就这一问题的意见。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 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5 年 7 月 29 日

第 25 - с - 1582 号

手写批注：

关于这一问题已经于1955年8月15日准备好新的报告。[1]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8月17日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苏联公民)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和他的夫人M.C.费多托娃(苏联公民)到中国去长期居住。费多托娃(化学副博士学位,可用于教学或者科研)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不必正式询问,但要弄清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费多托娃到中国去是以苏联专家的名义还是以刘允斌夫人的名义为好。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我们将派遣费多托娃同志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去工作。

请告诉我们应该给费多托娃同志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更合适。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238-239

№09829

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31日)

机　密

1955年8月31日

第69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7月31日11时于外交部

何伟通报说,周恩来让他通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释放11

① 参见以下№21440文件。——编注

名现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这一步骤同今年 8 月 1 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系在一起。

何伟接着通报说，今日晚 7 时，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将宣布释放他们，10 时 30 分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广州。关于这一点，首先是向苏联通报。然后，在今天下午和明天早晨，还将通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英国和瑞典。

明天北京时间 17 时，电台将广播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内瓦是早上 10 时。

然后何伟通报了飞行员名单：

1. 约翰・诺凯・阿诺尔德，尉官；
2. 比利阿姆・赫尔・巴谢梅尔；
3. 尤真・约翰・巴季；
4. 沃拉斯・拉马尔・勃拉文；
5. 埃尔默・弗雷德・列维德林；
6. 约翰・谢德林・巴克；
7. ……①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 罗迈进

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д. 11，л. 301－303

① 档案复印件以下字迹不清。——译注